人文常州

第 7 辑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 编

南方音像電子出版社



第7辑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陈泳超　薛国屏

主　　编：包立本

副 主 编：毛　玮　袁国华

编　　委：刘　琨　刘锦岚　肖　飞　张修民
沈建钢　陈　磊　黄小兵　魏茶菁

目　　录

【卷首语】
雪　花 ……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1）

【前沿观察】
关于加强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科学保护与合理传承的建议
…… 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课题组（2）

【本期特别策划】
常州古桥记
八百年沧桑庄城桥 …… 肖　飞（9）
双桥载礼嘉　古桥叙礼让 …… 周大兴（12）
桥梁和区划同名——郑陆桥 …… 周　星（15）
“资善庆贺”善庆桥 …… 尹少鹏（19）
常州烈帝文化遗存——后烈帝庙桥 …… 张　军（21）
多少传说乌路桥 …… 陈立仁（25）
浦河畔，举善堂下忆江桥 …… 唐立峰（28）
常州城东大小白家桥 …… 吴　炜（32）
记忆中的儒林石拱桥 …… 诸葛佩圣（36）

【乡土乡情】
常州节庆习俗 …… 史文佳（40）
上　梁 …… 周　星（47）
探访吴王墓山遗踪 …… 肖　飞（51）

【人文史海】
宋军将士血战虞桥 …… 肖　飞（55）

东门义冢 …… 赵德明(62)
故宫设计营造的总设计师是常州人蔡信 …… 薛焕炳(66)
沪上双“愚”:两位武进乡贤的心事与云烟 …… 张　军(72)
包焕赓创建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横山桥支部
…… 包立本　张　军(75)
红色电波破长空 …… 智　化(78)
孟秋江故居轶事 …… 孟建英(81)
常州魏碑书家周子青 …… 周　星(83)

【常州骄子】
中国催化科学的先驱者张大煜 …… 包立本(90)
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 …… 包立本(95)
美国力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邹福康 …… 包立本(98)

【色彩与梦想】
武进“小鲁迅”的传奇人生
——民国才女、文坛奇才陈布文 …… 肖　飞(101)
青果巷街区走出了一位“女中豪杰”
——史良传奇 …… 朱剑虹(107)

【明德惟馨】
朱献国:在创业创新中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 陈育凡(112)
社会责任的践行者李健 …… 常统轩(117)

【江南烟雨江南情】
德润毗陵　藏鉴千秋
——缅怀常州文博耆宿赵争先生 …… 包立本(120)
先生远去　文博留芳
——缅怀文博专家朱松度 …… 朱小元(122)

【岁月藏金】
常州春书: 江南唱春的源头和范式 …… 黄　靖(127)
民国时期金坛上新河小学教师聘书收藏记趣 …… 彭　程(132)

孤本文献——《代数学因子分解》蜡刻油印校本现世 …… 张　涛(135)
一张渡江战役前夕的常州筹借军粮收据 …… 杨新文(139)
一纸题词寄初心 百年家风伴新婚
——题词新婚纪念封的收藏 …… 王子旭(140)

【地名故事】
百渎村 …… 何晓华　智　化(142)
古　村 …… 包立本(146)
柚山村 …… 诸葛佩圣(148)
桃园村 …… 包立本(150)
花　街 …… 李　永(153)

【家谱文化】
青果巷声远堂沈宅营建沿革及沈启洪家族谱系 …… 沈一新(155)
广巷沈氏三善堂宗谱第七次续修序 …… 张永方(157)
泽巷德馨堂许氏源流考略 …… 张永方(161)
祝贺《洛阳北湖三径堂蒋氏宗谱》宏发 …… 黄中秋(164)

【兰陵旧事】
民国时期常州古迹的拆与保 …… 薛焕炳(166)
40年前,常州烙画如何"撬动"一个国家级职教项目 …… 汪鹤鸣(168)
常州的茶食票旧事 …… 刘彦卿(171)
回忆在常州市煤矿中学的日子 …… 吴克贤(173)
乌龙庵——巷子深处的老宅 …… 陈可如(176)
从十子街到木桥头 …… 谢未艾(179)
我与他 …… 蒋志超(182)
我是宣传委员 …… 袁黎明(186)
童年钓痴虎郎的乐趣 …… 程协润(189)
悠悠我心——上店往事(之二) …… 恽仲坤(191)

【非遗传承】
包立本,痴心守护常州宣卷 …… 王喜根(197)
以刀为笔　以牙为纸

——象牙浅刻大师坡石的艺术人生 …… 张　军(201)
王胜利,传承百年梨膏香 …… 王喜根(206)

【特产佳肴】
董永与茅山六雨茶 …… 宋仁年(209)
纪念岳飞的腊八粥 …… 肖　飞(213)
孟河米屑饼 …… 程协润(215)

【人文论坛】
齐梁王室祖居地在今常州毋容置疑 …… 扬　润(218)
文旅融合背景下常州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研究
——以本土地名宣传推广为例 …… 刘锦岚(224)
藤花旧馆(孙氏馆)考
——五陈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我见 …… 汤祚永(234)
江左文脉　家学渊薮
——清代常州族塾考略 …… 秦大峰(238)
孟宪民院士梦想起航的地方——孟宪民读书楼 …… 孟小星(242)
同心同行:我与民建的情缘 …… 包立本(246)

【人文动态】
纪念横山桥党支部成立 100 周年暨包焕赓书记
诞辰 119 周年座谈会召开 …… 袁国华　毛　玮(249)
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 140 年座谈会隆重召开 …… 思　耘　毛　玮(251)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编纂
工作推进会召开 …… 常　文(253)
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 余知健(255)
探寻龙城水脉遗韵　聆听古桥百年回响 …… 毛　玮(257)
《大宋忠烈:包圭传》首发式举行 …… 毛　玮　袁国华(259)

雪　　花

啊，下雪了！窗台上已铺上了一层白白的雪花，薄薄的、茸茸的，像是谁悄悄撒下的一层银粉。夜空里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仙女，在挥舞着她的银白色花篮，往下抛撒着无数朵银白色的花。花儿飘飘洒洒飞落下来，落在对面房子的屋顶上，落在屋边的树杈上，落在大地上。顷刻间，眼前呈现出一个银白的世界，纯洁极了，也美丽极了。

窗外，已是一个洁白纯净的世界。那纷纷扬扬的雪花，那么高远、飘逸、圣洁，它们不疾不徐地飘落着，像是从时间深处缓步走来的古老诗篇。不远处，一个孩童稚嫩的嗓音悠悠飘过来："小雪花，小雪花，落在空中像朵花，落在窗户像窗花，落在手中不见了……"那童谣清澈如雪，在寂静的夜里轻轻荡漾开来，仿佛把这漫天的雪花都唱成了一首流动的歌。

《人文常州》刊物不正像这漫天的雪花吗？它一片一片地飘落在常州的大地上，落在青果巷的石板古道上，落在天宁寺的飞檐翘角间，落在古运河的粼粼波光里……每一篇文章都如一朵独特的雪花，有着自己精致的棱角和纹路，记录着这座城市的历史温度与人文情怀。那些关于舣舟亭的旧事、关于文笔塔的传说、关于红梅阁的逸闻，都像雪花一样，一片一片地堆积起来，渐渐铺成了常州人心中那座温暖的精神家园。

雪越下越大了，常州，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在雪夜里该是怎样一番景致？想必红梅公园的梅花正在雪中悄然绽放，暗香浮动间，《人文常州》刊物曾细细描绘过的那些园林风骨，此刻一定更显清雅高洁；想必前后北岸的黛瓦上已覆了厚厚一层白雪，古宅老院里，《人文常州》刊物曾深情记述过的江南人家的生活图景，在雪夜里一定愈发温馨动人……这座城市的人文底蕴，就如这场夜雪，看似悄无声息，却早已润物细无声地浸润了每一个常州人的心田。

《人文常州》刊物的纸页上，仿佛也隐隐透出一股雪夜的清冽之气，一行行文字在灯光下静静排列着，像是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引领着读者走进常州文化的深处。

常州市名人研究会

关于加强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科学保护与合理传承的建议

背景情况

常州市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丰富，类别繁多，遗迹遗存涵盖从古代到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登记在册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点超过数百处，其中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多种类型。

在古遗址方面，有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等，这些遗址不仅见证了常州地区悠久的历史文明发展过程，而且对于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古代社会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古建筑方面，则以明清时期的历史河道、桥梁（包括水闸、码头、水渠等水利设施）、民居、祠堂、道观、庙宇为主，这些建筑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也是了解当地传统建筑风格和技术的重要窗口。此外，常州还保存有一定数量的近现代工业遗产，它们是常州工业化进程的实物见证，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具有独特的价值。

2007 年 9 月常州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划定武进、天宁、钟楼、戚墅堰、新北区和溧阳、金坛共计 7 个文物普查单元，9 支文物普查队伍，400 余名文物普查员和志愿者，对全市 4385 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拉网式的文物普查，通过 5 年普查工作，截至 2011 年 6 月，全市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1677 处，其中新发现的文物点 1270 处，复查文物点 407 处，调查登记消失文物 207 处。

近年来，我市对文物保护工作倍加重视，社会各界的呼声很高。2017 年 6 月《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常州有了第一部关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2021 年 5 月《常州市焦溪古镇保护条例》正式实施。

2022 年 7 月常州市委市政府举行了《全市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会议中要求积极与国家战略和重大部署同频共振，让厚重历史文脉

焕发时代活力，给人文地理版图绘就全新画卷。常州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运河少数几座穿过主城区的城市，要围绕“一江一河”即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生态文化公园建设，努力将常州沿江、沿河地区打造成为文化繁荣、产业兴旺、生态文明的示范样板。要依托“一点居中、两带联动、十字交叉、米字交汇、左右逢源”区位优势，统筹各方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制造业集群、新兴数字文化产业基地，进一步凸显常州长三角文旅中轴的文化底蕴，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常州份额、展现名城气象。



全市文物保护工作座谈会



民建常州市委会文保课题调研专家座谈会

2023 年 9 月举行的常州市政协十五届八次常委会会议，专门围绕“挖掘利用历史名人资源、彰显万亿之城文化厚度”课题开展专题协商，市长盛蕾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盛蕾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挖掘利

用历史名人资源的责任意识，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入挖掘名人资源，加强保护活化利用，加快将常州打造成为全国历史名人传承发展的高地，要重视保护与名人资源相关的各级文保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截至2023底，常州市统筹实施总投资超300亿元的老城厢保护更新工程，季子文化展示中心、大观楼、止园等文旅新地标开工建设。全面启动常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三星村、寺墩被纳入首批江苏省遗址公园名录，累计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验收59项，验收面积6309.53万平方米，出土石器等各类遗存4050余件（套），其中，溧阳鲍家遗址出土环太湖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新岗遗址贾家塘地点和新农村地点考古工作获省田野考古优秀项目奖。武进区于2023年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决定》，由该区文体广旅局公布了一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常州市在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已经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工作存在一定可能与问题，亟待解决。

问题分析

一、常州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由于分布广，数量多，给保护和利用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由于其大多位于乡镇田野地区，位置偏远，这就导致了日常检查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破坏风险高的实际情况。许多自然村空心化，许多老旧建筑衰败化，使得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环境发生变化，保护利用难度有所增加，在遇到城市建设发展时，一般采取迁建异地保护的形式，失去文物的原真性。

二、文保单位数量与历史文化名城荣誉不相符合

常州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相当丰富，素以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而著称。但与苏州、无锡、镇江等周边城市相比，我市文物资源总量虽多，但文保单位公布的数量、等级与周边城市差距较为明显，概括为数量少，等级低、质量差。截至目前，苏州拥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61处，省级127处，市（县）级693处，总计881处；无锡拥有全国重点文保单位34处，省级74处，市（县）级359处，总计467处；而我市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91处，总计355处，仅是苏州的38%，无锡的74%，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称极不相称。

三、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申报与辖区部门缺乏高效联动

我市政府部门职权、事权下放以来，相关责任措施没有落实到位，名义上文保单位申报由市文保部门与各辖市区文化部门联合负责，但相互之间出现等待观望和扯皮现象，辖市区领导及文化部门对此项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区里不报，市里不办”，除武进在2023年公布一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外，其他区（市）均无动作，导致一大批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桥梁）被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老孟河闸、烈塘闸、常锡联圩闸、曾公堤遗址、叶家码头、土龙嘴遗址、石龙嘴遗址、白云渡遗址等破坏严重，又如某区因企业发展，数座古桥毁于一旦；常州地区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横山桥党支部），因辖区反对申报，所以连续三次未能公布为文保单位。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

我市虽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如《常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常州市焦溪古镇保护条例》等，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无论是《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是《文物保护法》都未将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范畴，专门的公益诉讼法律也未出台，导致了个别办案人员对法定领域之外的公益诉讼探索不积极，尤其对一些保护标准不明确、保护难度较大的文物损害公益诉讼案件线索，不能及时履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检察公益诉讼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领域的作用。文保部门现在监管范围有限，目前主要集中针对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监管，而对于数量庞大的县和乡镇级不可移动文物，监管力度相对较弱。从常州市第三次普查公布资料来看，五年中有207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调查登记）消失，令人痛心。

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重要性的认识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提高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也是文物的认识，切实履行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到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要意义，加强对文物保护有关规定的学习，加强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安排调度，履行好文物保护主体责任，例如：市委市政府每年领导干部在党校培训班中增加历史文物保护的相关课程内容。

二、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宣传力度，扩大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

加大文物保护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力争全民参与文物保护工作。政府和文物保护主管部门要加大文物保护有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物保护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

中，推动文物保护工作更加有效开展，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多种媒介广泛传播文物保护知识及其重要性，特别是在短视频，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分享成功案例和感人故事能够有效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

建立和扩大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是加强文物保护的措施之一，要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资源的发现与保护，定期奖励一批文物保护志愿者，曝光一些较为典型的文物破坏案例，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三、将文物保护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历史文化遗产要得到很好地保护，资金对其来说非常重要。资金不足历来就是常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仅仅依靠中央政府设立的专项资金和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需要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资金投入机制。各地要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合理的预算增长机制，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尝试通过社会团体赞助、捐赠等方式获取资金，进一步解决文物保护工作中资金不足的问题。

四、定期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各类设施（建筑）公布纳入文物保护名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有众多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被发现，同时又有相当数量的地面文物被破坏，如琅玡墩、凤凰墩、尚湖墩、霍墩、蔡邕墓、陈杲仁墓、王洛墓等，遭到破坏的原因就是没有及时列入文保名录。建议每届政府必须公布一批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以及一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古宅、古墓、古代水工设施等当年发现，当年履行文保单位申报手续，及时列入保护名录。

五、优化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公布流程和办法

我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与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少、等级低的原因之一是公布流程和办法不合理，不科学，往往造成一名区级领导可以轻易否定文物部门与专家的意见。建议借鉴兄弟城市的做法，取消辖区管理公布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做法，改由文物专家组认定后，由文物主管部门报送市政府直接公布，取消征询辖地政府的意见。利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机遇，增加一批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并逐批逐次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提档升级。

重点建议清单 1：

定期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各类设施（建筑）公布纳入文物保护名录。

重点建议清单 2：

优化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公布流程和办法，取消辖区管理公布一般不可移动文物的做法，改由文物专家组认定后，由文物主管部门报送市政府直接公

布，取消征询辖地政府的意见。

重点建议清单 3：

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合理的预算增长机制，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文/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课题组，顾问：邵志强、薛焕炳、沙春元、孙五一、马树杉、沈建钢、陆慧琦、叶霞、李东华，组长：包立本，成员：周菁、沈澍、邱桃东、杨维忠，执笔：包立本、周菁、邱桃东）

注：本课题转化为民建常州市委会集体提案，被评为 2025 年度常州市政协优秀提案。

本期特别策划：

常州古橋記

编者按：

在常州的悠悠历史长河中，每一处地名文化遗产都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们不仅是地理标识，更是城市记忆的承载者、文化脉络的延续者。地名文化遗产的背后，或是先辈们辛勤奋斗耕耘的身影，或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响，或是当地风土人情的展现，它们共同汇聚成了常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为了深入推进“读城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地名里的常州，常州市民政局、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联合举办“阅读地名”征文活动，刊发桥梁地名文章。



八百年沧桑庄城桥



庄城桥

庄城桥，又名福兴桥，坐落于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庄城村西首，东西向横跨庄城河，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常州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之一。

该桥始建于北宋末年，距今已有800余年岁月，饱经时代更迭，主体结构保存完整，集中展现了宋代江南石拱造桥的高超工艺水准，是江南水乡宋桥遗存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实物标本。

庄城河连通丹金溧漕河，间接对接京杭大运河，古代这里水陆通达，是金坛西北区域重要的水陆要道。在未有此桥之前，两岸百姓往来只能依靠渡船，每逢汛期河水暴涨，渡河风险极高，百姓出行多有不便。北宋末年，地方乡绅募资，工匠就地取材，修筑这座石拱桥，取名“福兴桥”，寓意福泽乡里、百业兴盛，后世因地处庄城之地，普遍称作庄城桥。相传建桥之初，曾有本地进士刘汉撰写桥碑，记述建桥缘起与工匠功绩，可惜这块珍贵碑刻早已佚失，只留下文字记载流传后世。

乌砖济民善筑古桥

笔者少年时代曾生活在庄城桥附近的肖家村，听外公说，关于建造庄城

桥有一个民间故事：庄城西王巷有个贫苦长工叫吴三保，父母早亡，常年在河东地主家做工，为人老实厚道。一年大水，庄城河暴涨，过河的石闸被洪水淹没。吴三保每晚涉水过河，脚连续多日被水底一块块方砖绊到，他便一块块捞回家，随手堆在屋角做鸡窝。

一晃多年，儿子都长到 6 岁。一日整理鸡窝，才发现那些黑砖，竟是乌金砖。夫妻俩意外得巨财，没有贪图享乐。看到庄城河每逢汛期，百姓涉水过河，常常遇险，便决心把这笔钱财拿出来，牵头募捐，联合乡邻，修建一座大石桥。历经数月辛劳，一座横跨庄城河、坚固平整的青石拱桥终于落成。

大桥贯通南北，终结了百姓涉水渡河的凶险岁月，从此两岸通行无阻，车马行人安稳便利，集镇商贸愈发兴旺，一方百姓安居乐业。乡民感念吴三保的善心义举，将这座桥视作福泽一方的善桥，取名“福兴桥”，寓意福佑乡邻、兴旺万家，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见的庄城桥。

宋代古建桥梁典范

整座桥梁为单孔大跨度石拱桥，采用江南宋代经典的分节并列砌券工艺砌筑，全桥以青石为主要建材，桥长 37 米，桥身上宽 5.87 米，桥基底部宽 6.7 米，下宽上窄，稳固贴合河道地基。桥拱净跨 12 米，拱矢高达 6.9 米，拱高跨大，拱券凌空如虹，巨大的拱洞便于过往船只顺利通行，充分适配古代漕运通航的现实需求。分节并列砌券是宋代石拱重要技术，将拱券石料分成多道独立券肋并列排布，石料之间依靠石榫咬合、紧密扣合，既分散桥体承重，又便于施工修缮，历经洪水冲击、地壳沉降，800 多年拱券没有发生大的变形，足以印证宋代造桥工匠的力学智慧。

桥梁整体雕刻装饰典雅克制，尽显宋代古朴简约的审美。桥面两侧设置护栏，每侧各 10 根望柱、9 块青石栏板，桥头两端安放一对抱鼓石，构件齐全完整。望柱柱头雕刻覆莲纹，莲花瓣线条圆润柔和，莲纹是宋代古建筑常见吉祥纹饰，象征清净安稳，寄托百姓祈求平安渡桥的心愿。桥洞上方左右对称设置四枚桥耳，桥耳雕刻螭首与如意纹样，古人认为螭首可以镇御水患，保佑河道行船平安，是江南古桥典型的镇水装饰符号。桥面台阶由麻石铺砌，东西两端设有石阶，桥面正中预留纵向凹槽车道，是旧时独轮车常年碾轧留下的深深痕迹，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车辙，记录着古桥曾经车马往来的烟火岁月。

唐代先贤心系故土

唐代大诗人储光羲（约 707—约 766），出生于金坛孝德乡庄城西村，后世



称储氏庄城一世。他自幼浸淫耕读家风，酷爱陶渊明诗文，10岁便可出口成诗，乡邻但凡有宴集、游赏，常唤少年储光羲即席吟咏，小小年纪便名传延陵乡间。18岁那年，他与同乡挚友丁仙芝一同辞别故土，赴洛阳太学求学，二人同乡同窗，一生诗文唱和，储光羲《贻丁主簿仙芝别》便是怀念少年乡居、结伴远游的往事。

开元二十一年（733），储光羲厌倦了官场生涯，辞去县尉一职回到延陵故乡隐居。故乡茅山近在咫尺，他多次入山游历，写下《游茅山五首》。少年时他便常游茅山，受茅山隐逸道风熏陶，这也奠定他一生偏爱田园、向往归隐的底色。在家乡期间，他走访田家，观察江南农家劳作，很多田园诗作的生活素材，都来自延陵乡间的所见所闻。

安史之乱，储光羲身陷叛军，乱平后被贬岭南，客死蛮荒。按照储氏宗谱记载，他的灵柩辗转归葬金坛庄城故里，即今金坛金城镇庄城村，后世储氏族人尊其为江南储氏始祖，历代祠祀不绝，墓园至今尚存。

庄城三杰　抗日英烈

庄城桥是当年茅山抗日根据地外围重要交通节点，诞生“庄城三杰”：吴甲寅、徐文彬、张品山。

吴甲寅（1911—1939），庄城桥人，教员出身，兴办乡村教育。抗战爆发，在家乡拉起抗日武装，加入金坛抗日自卫团，配合新四军开展敌后斗争，是地方爱国士绅代表，后壮烈牺牲。徐文彬（1902—1940），又名徐小荣，抗日地下工作者，牺牲于庄城桥边。当年他在桥上执行任务，遭遇敌人，血洒石桥，当地口口相传“魂断庄城桥”的悲壮往事。张品山，庄城本地爱国志士，投身敌后抗日，为新四军传递情报、掩护伤员。

抗战时期日军占领庄城桥，在桥两头修筑炮楼，把石桥变成关卡。过往百姓必须出示良民证，才可通行。后来新四军到来，拆毁桥上炮楼，古桥才重归百姓。老辈人还会讲起当年桥上盘查、百姓冒险掩护游击队员的口头故事。

时光流转，陆路交通兴起之后，庄城桥不再承担主要通行功能，但文物价值愈发凸显。1986年，庄城桥被列为金坛县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正式列入江苏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系统性保护。当地落实文物保护举措，划定保护范围，开展桥体环境整治，修建庄城桥文化长廊，挖掘整理古桥历史故事，守护这份宋代建筑遗产。

（文/肖　飞）

双桥载礼嘉　古桥叙礼让

地名是镌刻水乡岁月的活化石，一方古桥，孕育一方集镇。江南水乡诸多集镇，大多遵循“先桥后市、因桥得名”的发展脉络。岁月更迭，不少古镇旧桥早已湮灭，只余下空留的地名。而武进礼嘉却得天独厚，双桥规制至今尚存。



礼嘉双桥

武进礼嘉双桥同为单孔石质平梁桥。其中礼嘉桥横卧兴隆河，太原桥静跨太原浜，首尾相接，一横一竖，卧波成双。礼嘉桥如端庄的大家闺秀，太原桥似灵秀的小家碧玉，二桥相映成趣，形成常武地区较为少见的L形连体格局。

更为难得的是，礼嘉完整留存了“姓氏标地—谐音定名—镇以桥名”的地名演变脉络，地名由最初的“李家桥”谐音雅化为“礼嘉桥”。桥存，名变，故事在，使其成为常州地名文化当中少有的活标本，在江南众多桥乡之中独树一帜。

两族落桥：兴隆河畔的郡望分峙

礼嘉的人文根脉，可追溯至明初的宗族迁徙与河畔开发。据《武进李氏宗谱》记载，明洪武年间（1368—1398），李华一（字乐耕）从兴化迁居至都浜里，

也就是如今礼嘉镇新生村李三房一带，在此扎根立业、繁衍生息，成为当地最早的定居宗族。至明嘉靖中期，李氏后裔李杰迁居小村上，即今礼嘉村李家村，为便利两岸乡民通行，在兴隆河上架设木桥，乡民依其姓氏习惯性称作“李家桥”，这也是礼嘉地域最早的地名雏形与市井缘起。

岁月流转，李氏宗族日渐式微，族人多逐渐外迁。木桥历经风雨，桥板朽蚀，但“李家桥”的地名已在两岸落地生根。河岸的主导权已悄然递变。明代中后期，孙、王两族先后迁入定居，接续主导了河畔人文发展。孙氏落籍兴隆河西岸，以本族郡望“乐安”为地域标识，聚居形成的街市渐渐得名“乐安街”；王氏源自周陈桥王氏支系，迁居河东落地生根，沿用宗族郡望“太原”，为便于太原街货物接驳、水运往来，拓浚太原浜，并于河口修筑太原桥。一条兴隆河分隔东西两岸，架起礼嘉桥，分立孙、王两族居所；一条太原浜见证了当时太原街的繁华岁月，浜口的太原桥，也造就了礼嘉双桥错落相依的L形独特形制。后世河道变迁、太原浜逐渐填没，太原桥脱离水系成为旱桥，反倒避开常年水流冲刷侵蚀，完整留存古桥形制；而河西乐安街的旧称代代相传、沿用至今，河东“太原”的地域古称，则随河道湮没慢慢淡出大众视野。

两姓释嫌：石桥上的和解佳话

“礼嘉”二字的定名，藏着一段水乡邻里冰释前嫌的真实佳话。清雍正七年（1729），乡中旧有李家木桥年久失修、不堪使用，河西乡贤孙竹所独资修缮，将木桥改建为稳固的石桥。孙氏家族郡望为乐安，遂拟将新桥定名“乐安桥”，以承家族渊源与故土文脉。因桥梁东墩坐落于王氏地界，这一命名方案遭到王氏族人反对，新名悬而未定，桥身始终未镌正式桥名，这一悬便是80余载，民间始终沿用旧称“李家桥”，两族芥蒂也随古桥默默留存。

清嘉庆十八年（1813），古桥再度大修，乡中贤士不忍宗族隔阂代代相传，主动居间斡旋调解。两族长者摒弃宗族私念、放下过往嫌隙，于桥畔握手言和。众人取“李家”谐音定名“礼嘉”，恪守原文本意：“礼”为以礼相待、谦和共处，“嘉”为嘉许两姓摒弃纷争、重修和睦的礼让善举。桥以礼立名，镇以桥得名，自此兴隆河两岸两族相融、邻里相安。今人咏武进礼嘉这段和美往事，有诗叹曰：“双桥卧水阅千秋，一自冰消两姓仇。不独石梁通野渡，礼嘉二字写温柔。”

无独有偶，宁波古林也有礼嘉桥村。同是“李家桥”谐音改为“礼嘉桥”，武进因两族互谅和解，宁波因李家感念徐家谦和礼让——殊途同归，一座小桥，两处故事，道尽江南乡土重礼求和的淳朴民风。

残石宗祠：地名演变的实物印证

2025 年 8 月，我初次走访礼嘉双桥。现场至今无市级文保碑，仅有简易责任人公示牌，文物辨识度极低，因此并未多加留意。当时只见太原桥形制完整、石刻清晰，便忽略了礼嘉桥的桥名遗迹。后经多方查证，得知礼嘉桥尚存清代题刻，遂于今年 8 月再度专程寻访。在当地老人指引下，我立于远处古码头，放大镜头细致搜寻，终于在桥身东南侧桥孔石条上，辨认出嘉庆年间镌刻的繁体“禮嘉橋”三字。据乡老口述与地方资料线索，该石为 1954 年拓浚河道、拆除老桥时唯一留存的原刻石，是“李家桥”更名“礼嘉桥”最直观的实物遗存，唯暂无官方档案明文佐证。

据 1985 年《礼嘉乡志·水利》记载，1954 年礼嘉大河拓浚工程中，老牌礼嘉古桥被整体拆除，桥西民居、沿河驳岸一并迁改。礼嘉双桥于 2011 年 1 月获评常州市文保单位、入选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三普）十大新发现。2014 年，双桥按“修旧如故”原则完成保护性修缮。如今礼嘉桥全长 27.16 米、宽 3.9 米；太原桥现已改为旱桥，无河道水流冲刷，桥体原始形制保存更为完好，桥身长 11.5 米、宽 1.16 米。

周边宗族遗存，为桥名更迭、两姓释嫌的百年往事提供了有力旁证。河东中沙周陈王氏宗祠为省级文保单位，古建风貌完好；河西孙氏二分祠、河东孙氏大宗祠同属孙氏文脉体系，均设孙觌纪念展陈，传承家族文脉。古桥石刻与两座宗祠遗存相互印证，完整留存下孙、王两族从宗族对峙、心存芥蒂，到弃私礼让、和睦相融的乡土变迁史。

地名无声，岁月有痕。从明初姓氏地标“李家桥”，到嘉庆和合定名“礼嘉桥”，再到今日礼嘉集镇，双桥串起 600 年移民史、聚落史与邻里相融史。读懂礼嘉双桥，便读懂常州地名文化的一段温度：争执易起，和解为贵，礼让方能共荣。所谓乡土文脉，从来不是冰冷地理符号，而是镌于石桥肌理、留于街巷地名、流于宗族记忆中，生生不息的人文印记。

（文/周大兴）

桥梁和区划同名——郑陆桥

常州东门外，北塘河蜿蜒东去。行至郑陆镇所在，河面豁然开阔，一道平桥横跨两岸，车行其上平稳无觉，行人往来如织。这就是郑陆桥了。

论形制，这座水泥平桥实在平常不过；论年代，建成不过十数载光阴。然而，倘若追问脚下这片土地何以名唤“郑陆”，就绕不开这座桥——桥梁名即区划名，区划名即桥梁名，这在江南水乡虽不鲜见，但能上溯至南宋方志者，却屈指可数。





郑陆桥新桥

据《郑陆镇志》载:“郑陆为郑陆桥简称,因桥得名。郑陆桥之名始见于南宋咸淳《毗陵志》晋陵县图。”南宋咸淳四年(1268),常州知州史能之主纂《毗陵志》,为今存常州最早的州(府)志。该志卷首列有晋陵、武进等县境图,道里、河渠、桥梁、市镇一一标绘,郑陆之地名赫然在图。不过,此时的“郑陆”尚是因郑、陆两姓聚居而得名的区划称谓——宋代至明初的数百年间,当地居民多聚居于今郑陆镇街北一里许的李家头一带,以郑、陆两姓为主,故区划叫“郑陆”。方志地图中标注的,正是这个聚落地名,而非实体桥梁。

桥因区划名而名,则始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据地方口碑相传,彼时桥畔郑、陆两姓结为姻亲,为便利两岸往来,合力于北塘河上架设木桥一座,遂以区划名“郑陆”名之,称“郑陆桥”。自此桥梁和区划同名,相沿至今,最终“郑陆”二字由区划之称而兼为桥梁之号,桥立、地名兴、乡域盛,延续数百年而不改。没有英雄传说加持,也没有文人题咏附丽,郑陆桥以最“普通”的姿态,保存了最典型的水乡聚落记忆。

木桥不耐久,屡修屡坏。清光绪四年(1878),在姚孟廉、谈鸿赞两位乡董经手下,木桥改建为青石单孔拱桥。据地方史料记载,此桥长约十八米,宽约三米,设五十级石阶,两侧石栏护持。石材取于本地青石,拱券线条圆润舒朗,通体无繁饰雕琢——这是清代江南民间桥梁的惯常风格:实用为上,耐久为要,不贵奢华。光绪年间修成的《武进阳湖县志》记其驿路方位:“北出和政门至羊头桥七里,又北至郑陆桥二十三里,又北至三河口十里。”寥寥数语,将郑陆桥钉在了常州府城向北的交通干线上——它是旅人驻足的地标,也是舟楫停靠的码头。

然而水运的需求在 20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根本变化。北塘河要拓浚,单孔石拱桥成了瓶颈。1971 年秋,青石古桥被拆除,近百年的人间足迹随之没入河道。1980 年,原址以东另建水泥双曲拱桥——这种桥型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的中国乡村极流行,结构轻巧、造价低廉,唯独承载能力有限。30 年后,它也老了,被鉴定为危桥。2013 年,郑陆桥列入武进区农桥改造计划,投入近 300 万元,施工百余天,改高拱为平桥,桥长 51 米,可容机动车双向安全通行。今日所见之郑陆桥,已是第四代身了。

木桥、石拱桥、双曲拱桥、预应力平桥——四代桥梁的更替,恰是一部微缩的中国乡村交通史。每一次更换,都是区域水文、建材工艺、荷载需求合力推动的结果。只是桥梁拆建易,记忆迁移难。古桥的青石今在何处?是否尚存碑刻或石构件散落于桥畔?这些疑问,或许是将来进一步调查的方向。

形制四变,桥址两移,郑陆桥作为一方文化符号的功能却始终未变。抗战



常州临时流通币上的郑陆桥图案

时期，常州地区小面额辅币奇缺，市面找零为难，当地商家便自行铸造临时流通代用币，今称“常临币”。其中一款币面正中赫然铸着郑陆桥的单孔拱桥图案，桥下流水行船，上方镌“郑陆桥”三字，下缘标明“伍分”面值。金属虽小，却将旧桥形制固定在了方寸之间，成为钱币收藏界珍视的实物。它同时提醒我们：至迟到民国，郑陆桥仍是四乡商贸往来的核心枢纽——否则商家不会将它的形象铸造在本地通货上。

比代用币更沉重的是写在史册里的血色记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由太湖据点分路侵扰常州。太守金豪束手，省祭官张格受命率乡勇御敌，其子张邦定见父亲不习兵事，慨然请代，太守遂委其为义官。五月十四日，这位23岁的武庠生率民兵300人迎击倭寇于郑陆桥，自辰时战至酉时，斩首百余级。倭寇佯退设伏，邦定乘胜追击，终因寡不敌众、后援不至而被围。这位年轻人在襟袖浴血之中仍手刃数倭，最终马踬被执，遭肢解而死。百姓在桥畔立庙祭祀，呼为“郑王庙”，朝廷赐建张义士祠于常州和政门内。清道光帝为其题褒“胜国忠义”四字——虽是前朝旧事，忠烈气节却超越了改朝换代的政治评价。《武进县志》《古今图书集成》皆录其壮举，信而有征。

又据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逼近常州，三河口人李岳生（字子乔，县学生）率乡团练迎战于郑陆桥，兵败遇害。这只是漫长动荡中一桩地方旧事，却再次证明郑陆桥地处冲要，凡有兵燹，首当其冲。

战争早已远去，桥梁的日常回归到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对郑陆人而言，郑陆桥首先是桥——是过河的桥，是赶集的桥，是走亲戚的桥，是婚丧嫁娶必经的桥。数百年来，一代代人的脚步将青石桥面磨得温润如玉，两岸农人的扁担、商贩的货筐、孩童的书包、新娘的花轿，都曾在这50级台阶上留下印记。如今，桥面虽换成水泥，但“过桥”这一日常动作本身并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桥的物理形态。

站在今天的郑陆桥上向南远眺，不过数里之遥，便是寺墩遗址。这座距今

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核心聚落，1973年发现后历经六次发掘，出土大量玉琮、玉璧，被学界认定为太湖北部良渚文化的中心之一。若将历史尺度拉长，郑陆桥的700年，不过是寺墩先民耕土层之上薄薄的一层晚近沉积。但正是这层层叠压的历史地层——5000年、700年、100年、10年——构成了乡土中国最真实的时间纵深。一桥一墩，一水一土，串起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当代的完整文化序列。

郑陆桥终归是一座小桥。比起赵州桥，它没有惊人的营造技术；比起二十四桥，它没有诗词附丽的文雅名声。它只是江南无数乡村古桥中最普通的一座。然而正是这类“普通”桥梁的大面积消失，让郑陆桥在当代具备了样本意义——它用一种看得见的物质延续，让我们理解了一个地域名称的由来、一个家族聚落的生成、一种商贸货币的流通、一次抗倭战争的惨烈，以及700年间乡村交通方式的全部更迭。

桥还是那座桥，河还是那条河。北塘河水东流不息，恰如郑陆桥承载的记忆。今人踏桥而过，脚下四代桥基层层叠压，每往下掘进一分，便是一段乡村史的重新出土。这座不起眼的平桥，就这样默默立于水上，既不张扬，也不争辩，却把郑陆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地渡到了对岸。

（文/周　星）

“资善庆贺”善庆桥



善庆桥

善庆桥，俗称“高桥”，又名资善桥、高要桥，位于溧阳市戴埠镇竹行头街双井1号屋西侧，是戴埠向南进通南部山区、向北达南溪即戴埠河之间的重要桥梁。

善庆桥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清乾隆年间重修，为单孔石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溧阳县续志·桥梁》：“善庆桥，乾隆二年（1737）建，在戴埠。”因桥名“善庆”寓意“资善”与“庆贺”，且当地有“启安”之意；跨镇中河，据传当年百姓在此桥畔敲着军乐锣鼓欢迎太平军将士凯旋，故将此桥称为善庆桥，故得名“善庆桥”。善庆桥南北向跨双井巷北涧河，为青石砌筑的单孔石拱桥。桥体呈南北走向，桥长15米，矢高5米，采用分节并列砌法。桥面中心用长1.4米，宽0.3米花岗岩条石贯通。桥面平缓无级，桥额石用楷书阴刻“善庆桥”三字，桥面两侧是青石砌扶栏。护栏为条石相间石砌成，无望柱，二对抱鼓。

一座座古桥，一条条涧流，一幕幕往事，承载岁月的轮回，传达着古代文明的延续。据《建康志》载：高要桥距县城25里，是通往广德军路的。处在老街区域的戴埠大河上有五六座桥，如“桐梓桥”“善庆桥”“戴埠大桥”等，还有“马灯桥”遗迹，其中要数“善庆桥”最为有名。当地人称之为“高桥”，也是戴埠古镇的一个重要标志。桥埠墙上刻着：戴埠镇全镇人民祝建国十周年所建，高桥福利大码头　落款：福利委员会1959年10月1日建。历经风雨侵蚀，桥上

及河道两岸原本白色的石栏杆已经变成烟灰色，且已随岁月斑驳。岸上整排的香樟树却是枝繁叶茂，遮蔽了一些阳光，并倒映在河水里。300多年来，善庆桥历经世事沧桑，目睹悲欢离合。任凭太平军的战马嘶鸣，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还有载着沉重山货的独轮车艰难前行；任凭风吹雨淋，潮起潮落，巍然不动。善庆桥周边的古老建筑保持着水乡小镇的古朴风貌，桥南堍向东的双井巷，尤其古色古香。座座相连的二层木结构小楼，后墙齐河沿而建，前墙、特别是楼上全由木板拼制而成。窄窄的巷子依然保留着青石板路。从镇中心向南的竹行头街也保留着几座古宅。竹行头街是戴埠镇的老街，因古时街面多竹匝铺，编制扁担、耙柄、蚕匾、竹篮、鱼篓、竹椅、竹凳、竹席等竹制品。2003年，善庆桥被公布为溧阳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戴埠，山青水秀，物产丰富。自古以来就有“金张渚、银湖汶，蚀了本归戴埠”之说。据《溧阳县志》记载：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已有举善镇，俗称戴埠。明弘治年间（1488—1505）成为全县七镇中集市最盛的一个。溧阳多竹，已远近闻名。万亩竹林大多分布在市域南部的戴埠、平桥、横涧、李家园等地。南山一带，涧水潺潺，人们依泉而居，守着万顷修竹，悠闲生活。旧时桥南侧有一条用长石铺垫的老街，径直通往南山深处。沿街居民大多以收购毛竹编织农具为生，故取名竹行头。据说，新中国成立前，竹行头有十多爿竹匠店，专制竹器用品。旧时，过往载满山货的牛马和独轮车必经此桥。长年累月的车轮碾转，老街通往高桥的道路呈现出一道道深深的车痕。每逢夏秋，周围群众总会三五成群，手持蒲扇，坐在高桥栏板上纳凉，论古道今，谈笑风生。高桥建造后带来了人气，也给竹行头平添一道风景。随之，邻近开办了茶馆，做豆腐的也来了，还有裁缝店、副食店，从事编织的农民的生意也日益红火。稻箩、秧篮、簸匾、菜篮、筲箕等农家用具应有尽有。

早在1960年，江苏省举行文艺汇演时，戴埠太平军锣鼓的演奏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引起国内音乐界、文史界的重视。当时，省音协和上海民族乐团曾对此进行过采录和整理。其后，1976年7月，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再次作出调查，并在江苏《文博通讯》1976年第10期上，以《溧阳戴埠发现太平天国时期锣鼓曲谱》为题作了报道。1980年5月9日至11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室、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上海艺术研究所、苏州博物馆等单位又在善庆桥上，对此锣鼓进行了录音录象和调查采访，并摄制成彩色录像片《溧阳戴埠太平天国锣鼓》。

（文/尹少鹏）



常州烈帝文化遗存——后烈帝庙桥



后烈帝庙桥(和尚桥)

在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夏雷社区许家村西北角,蔡家浜(北半夜浜支流)上,静静横卧着一座并不起眼的古石梁桥——后烈帝庙桥,民间又称和尚桥、香花桥。此桥是原后烈帝庙(大连庵)的庙前桥,也是湖塘镇前、后两座烈帝庙仅存的地面实物遗存,是常州、武进中心城区少见的城隍神信仰遗存。古庙宇早已消逝在城市化进程之中,唯有这座古桥,默默留存着常武地区关于武烈帝陈杲仁的乡土记忆与民间信仰故事。

石梁犹在:一桥别名载旧闻

后烈帝庙桥为南北走向平板石梁桥,确切始建年代已无文献可考,据地方口述资料,至迟清代已经存在。桥梁实地目测全长约 10 米,宽约 2 米,桥墩以整块粗大长方体麻石垒砌,用料敦实厚重,东侧仍能看到两只紫色石质桥耳,桥耳大方庄重,似存明代古意,是江南乡间典型的石梁桥形制。桥墩南内壁留存有水泥修补痕迹,刻有“一九七三年重拓”字样,是该桥唯一明确可考的重修记录。虽经 1973 年修缮,桥体主体结构依旧保留清代旧制,桥墩用石规整,兼有黄石、紫石,这是其多次修整的见证。岁月侵蚀之下,原桥面石梁出

现断裂，后世在古石梁之上另铺水泥桥板维持通行，至今仍是夏雷、烈帝两社区居民日常通行要道。桥南石墩缝隙间曾生长树木，砍伐之后残留树桩，对桥基安全构成隐患。因此桥已兼做闸坝功能，桥两侧水位有一米高低差，桥西低，桥东高。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承载厚重乡土历史的古桥，至今尚未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名录，《夏雷村志》也未对桥梁作详细记述，相关信息仅散见于田野走访资料。据说桥名“和尚桥”由来，源自后烈帝庙内僧人募化资金主持筹建并管护此桥；旧时四方香客赴后烈帝庙进香，必由此桥经过，故而民间也呼之为香花桥。

两庙相望：烈帝信仰话传说

后烈帝庙桥的兴衰，始终与咫尺之遥的后烈帝庙紧紧相连，同时又与东南500余米之外的前烈帝庙，共同构成湖塘一地烈帝信仰“一里两庙”独特的民俗奇观。据各类旧志记载，历史上常武地区有多座烈帝庙——府城青果巷忠佑庙为主庙，现新北地区有两座，余下两座便是湖塘的前烈帝庙、后烈帝庙，这两庙相距仅500余米，分属旧时烈帝村与夏雷村，民间依方位俗称前庙、后庙，二者不存在祖庙与行宫的官方等级区分，同为乡间祭祀武烈帝陈杲仁的祠宇，据说在元末明初，前烈帝庙还相当于整个常武地区烈帝庙的主庙。

武烈帝陈杲仁为隋末司徒，更是常州本土最重要的地方神祇。相传他才德兼备，有忠孝文武信义谋辩“八绝”之称，后遭姻亲沈法兴毒害殒命。自唐代起便立祠祭祀，南唐加封武烈帝，宋朝赐庙额“忠佑”，千百年来，江南各地广建庙宇，百姓遇求雨禳灾、驱疫保平安，皆前往庙宇祈祷，而围绕湖塘两座烈帝庙，当地流传着两则截然不同的民间叙事。

其一出自《夏雷村志》地名掌故的赈粮传说。相传古时常州城南遭遇大旱，秋粮绝收，百姓饥寒交迫。城内青果巷烈帝庙的烈帝老爷心生悲悯，未向天庭禀报便私自开仓放粮，将粮食运到大、小钱村之间的土坝赈济灾民。玉皇大帝因其未奏报便擅自动用粮储，一怒之下，将烈帝老爷逐出城外三里流落民间。数年之后，城南连年丰收，百姓凑齐钱粮，想要送还城中烈帝庙，又请愿烈帝老爷重回城内，却未得到应允。于是乡民便在赈粮坝东南择地兴建庙宇，恭迎流落民间的烈帝神像安奉于此。恰逢皇帝巡游至此，听闻烈帝老爷赈灾救民、百姓知恩报恩的故事大为感动，钦定此庙沿用烈帝庙之名，把赈灾土坝定名赈粮坝；又下拨银两，在庙宇东侧开挖S形河道宋江河，庙后开凿一亩有余的慈塘，庙前修筑石桥，即今日之和尚桥，便利往来香客行人。这则故事属于乡土口头传说，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却代代流传，深深烙印在本地民众

记忆当中。

另一则广为流传的是朱元璋征伐常州的传说。相传明太祖攻打常州之时，每到夜间，城头便亮起火炬，灯火通明，千军万马严阵以待，弓箭如雨，让明军屡屡受挫。朱元璋乔装探查，才发现并无真实兵士，原来是烈帝老爷调集阴兵守城。朱元璋勃然大怒，斥责神明不助王师，掌掴神像，勒令其离开常州城十里安家。于是民间认为，烈帝神像被驱赶到湖塘乡间，便有了前、后两座烈帝庙。不过地方文史研究者指出，洪武三年（1370）朝廷推行信仰改制，下令革去前代给城隍、忠臣烈士的溢美封号，改用木质神主，取消帝王级封号，陈杲仁庙也遵照制度改称“隋司徒陈公之神”，只是民间依旧习惯称呼烈帝，一直沿用到后世。这才是乡间烈帝庙兴盛的真实制度背景，神话故事只是民众对制度变迁的浪漫化演绎。

庙毁桥存：石梁静阅沧桑变

两座庙宇，各有自身的兴衰轨迹。

后烈帝庙又称大连庵，始建失考，民国 18 至 22 年（1929—1933）大连乡乡公所便设置于庙内，庙宇共有房屋 18 间，分前后两进，设有文昌殿、东岳殿，供奉烈帝菩萨、四大金刚、东岳菩萨、泥马渡康王等十余尊塑像。庙内香火旺盛，每年举办庙会行会，1913 年行会失火，烧坏部分神像，随即重塑；同年，庙内开设学堂，宗教与教育在此并存。1949 年 7 月庙宇再次失火，文昌殿焚毁。20 世纪 50 年代初，庙中塑像神龛全部拆除，庙宇建筑改为烈帝庙小学。后称烈帝小学。2000 年烈帝小学并入湖塘桥中心小学，校舍闲置；2002 年产权转让，此处改为毕昇印务公司，整座古庙建筑彻底消失，只余下庙前石桥。

东南方的前烈帝庙，坐落于烈帝社区，相传始建可以追溯至宋代，民间口碑称其早于后烈帝庙。庙宇有两进房屋，附带东西厢房，供奉烈帝、东岳大帝、观音、王灵官、蓝千岁等上百尊神像。附近百岁老人生前曾与笔者叙述其亲历过前烈帝庙盛大的庙会出会，庙会范围以前烈帝庙周边八座桥梁为界，覆盖周边大片村落，有捐轮车、荡荷船、台阁等丰富多彩民俗表演。捐轮车是常州独有的民俗，相传源自陈杲仁征战所用云车，孩童坐于轮车之上巡游乡里，热闹非凡。前庙还邀请城里戏班演出京剧、昆曲等娱神大戏；而后烈帝庙则不演戏，民间甚至流传后庙另供的东岳老爷，是从降子庙当中请回的故事。前烈帝庙在太平天国战乱中遭损毁，之后很快修复；20 世纪 40 年代做过兵站；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为国家粮食仓库，2005 年，因 312 国道与京杭运河南移工程，整座庙宇被全部拆除，地面建筑荡然无存，仅留下“烈帝社区”这

一地名延续至今。

旧时后烈帝桥不只是进香要道，还是重要乡间交通节点，是聚湖、烈帝、夏雷一带乡民往返常州城、丫叉铺、湖塘桥镇的必经通道。桥畔南侧沿着蔡家浜，原有一米宽的石板古道，绵延于田野之间，供人行走。后来石板被挪作他用，古道踪迹基本无存。随着城市化推进，夏雷、烈帝两社区旧村落逐步拆迁，赈粮坝、慈塘、宋江河旧貌也大多改变，有的已经湮灭。

如今，曾经香火缭绕的两座烈帝庙已经化为历史，唯有后烈帝庙桥静静伫立河畔。它没有华丽的雕刻，却是那一段信仰岁月留下的唯一实物，承载着赈粮坝的民间故事、烈帝庙会的热闹记忆，见证着乡土社会的悲欢变迁。这座朴素的乡间古桥，提醒今人，在高楼遍地的城市近郊，还留存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常州乡土文脉。

2025 年 4 月，后烈帝庙桥（和尚桥）被列入常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名录。

（文/张　军）

多少传说乌路桥

乌路桥，位于常州城东北 20 里，即今郑陆镇与青龙街道交界处的丁塘港上，古属孝仁乡四十七都三图，今属天宁青龙街道华严村，是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型花岗岩单孔环洞桥，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原名咸明桥，寓意四通八达，世道清明。桥梁设计独特，全长 38 米，桥高约 7 米，宽 4.25 米，桥上没有安装栏杆。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修，并改名乌路桥。清咸丰十年（1860），乌路桥遭战火被毁。此后，地方上前芳基村的蒋庆余等乡人发起集资重建。

过去，乌路桥向东去横山桥，向南到戚墅堰，往西进常州城，往北通郑陆，且四向离乌路桥都是 15 里，地理位置独特。加上此地水陆交通发达，附近不过两三里的朱家村（今青龙街）、代渡桥、潞城等地纷纷形成集镇。此地逐渐衰败后，但乌路桥却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

有关乌路桥桥名的传说地方上有多个。

一是说与白家祖坟有关。出生在今白家桥畔采菱村的白昂（1435—1503），字廷仪，是天顺元年（1457）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明朝大将戚继光曾赞美他是“天降哲人，秉义持节。荦荦天资，彬彬雅态。德懿道范，学同香山。景仰高风，江左柱石”，由此被世人敬仰，去世后安葬在



乌路桥

白家祖坟。还有，明朝中丞白圻（1466—1517），字辅之，号敬斋，成化二十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司左布政，顺天府尹，都察院右副御史，也安葬在白家祖坟。咸明桥就是建造在白家祖坟西侧的西丁塘港上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修时，为保护白家祖坟，重修时就向北移动了 500 多米，又由于此桥地理位置独特，水陆交通发达，桥南又已经形成一个乌路集市，重修后，就将桥名改为“乌路桥”，桥拱上刻了“重建乌路桥”5 个大字。

二是说古时丁塘港这一带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芦苇荡，丁塘河水急难渡，只有飞鸟才能飞过去，乡人集资造桥起名“鸟路桥”，请当地一名李姓秀才为桥题写，秀才感觉润笔费不理想，故意将“鸟”字少掉一点，他本想补笔费又能再捞一笔，谁知桥梁建成典礼上一只麻雀正好停留在“乌”字中间，直到鸣炮通船，惊起麻雀，众人才发现原来“鸟”字少了一点，大家也只能将错就错，就叫“乌路桥”了。

三是咸明桥改名乌路桥，在史书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根据《道光武进阳湖合志·舆地全图（丰东乡图）》地形分析，“乌路”这个名字来源于武城、潞城两个地名，武城位于丁塘北（属东青镇武城行政村），武城，玄武之城。按中国“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说，潞城以南，武城在北，“乌龙”故有“镇武”的意思。明代乡人松轩在《潞城八景·乌龙镇赋》诗中写有“百尺长松界断虹，水吞元武秀涵重。天心柱耸犹惊汉，地北山高不受风。云际会时相会虎，雨行闲处作闲龙。几多头角神威体，俯仰闲来事岂空”句；潞城位于丁塘南（属潞城街道潞城行政村），松轩在《潞城八景·潞城毓秀》诗中写有“一泓碧水抱南村，木有虬枝竹有孙。谢宅兰敷陈宅砌，郄林桂长邓林园。万灵人物魁华夏，千载交流继泗源。更直露饶民土厚，佳禾瑞麦岂胜言”句。武城、潞城合称“武潞”，乌路桥坐落在武城、潞城两城之间，久而久之，“武潞”被喊成乌路，咸明桥重修建后改名，就取了“乌路”的名字。

乌路桥还有个奇迹。

常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乌路桥曾是兵家抢争的要地。《常州战事》书上就有记载：太平军占领常州后，各地团练依然与太平军进行了多次战斗。1860 年 5 月 27 日，一支太平军取道北塘河向无锡进军，以姚永发为首的丰西、丰东、丰南、丰北、大宁等 6 乡团练上万人在乌路桥袭击了太平军，战斗激烈，血战一天半夜，为常州留下了乌路桥“仗义抗击”的战事。很为惊异的是，在这场战斗中，乌路桥两边有家号称“梅十万”的人家，因为战火，梅氏住宅烧了三天三夜，近百间房屋和所有财产都化为灰烬，但乌路桥在劫难中却屹立不倒，实在是一个奇迹。

自然，乌路桥横跨的丁塘港水流在当年确实是湍急的，遇到发大水，乌路桥就影响正常排洪。为有利泄洪，1982 年政府有关部门因地制宜，将拱桥西侧桥堍的驳岸开通，在水流中筑起两座墩子，设三孔梁桥一座，与乌路桥连成一体，桥身由长条青石砌成，分两段，一段是拱形，一段是石板平桥，石板上的雕花清晰可见。这样，高大的拱桥桥孔供航船通行，增造的梁桥孔助泄洪，陆行、航行、泄洪三方面相得益彰，古桥与兴修水利有机结合了起来，成为水乡既有泄洪能力又有观光价值的桥梁，这在常州水利桥梁建筑史和保护古桥上是一个典范。

在常州现存的独孔古石桥中，乌路桥规模仅次于奔牛的万缘桥，乌路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物价值较高。2012 年 2 月，乌路桥被公布为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现今，乌路桥所在的青龙区域内环境更是得天独厚，拥有横塘河、丁塘河、玫瑰湖、横塘河湿地公园、玫瑰湖水上体育公园、丁塘河湿地公园“两河一湖三湿地”的独特生态优势，景色秀美，保持着传统中的那份闲适、那份优雅。乌路桥在这里屹立着，就像一个历尽风霜的老人，娓娓向人们叙述着一个温婉而动人的故事。我常想，假如能乘着一只小巧的游船，一边听着摇橹的船工随口哼唱的地方小调，一边随着两岸的花光草影，穿过古老的乌路石桥时，一定会觉得，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是一种享受。

（文/陈立仁）

浦河畔，举善堂下忆江桥

一湾浦河缓缓流淌，蜿蜒穿过西夏墅的乡野阡陌，水波清浅，倒映着两岸四季更迭的田园风光。古孟渎的水流漫过千年岁月，带着东汉的烟云、两宋的风尘、明清的月光，将江桥的旧事轻轻揉进江南温润的微风里。这里曾是古武进通江乡的一方水土，河网密布，稻浪翻涌，桑麻遍地。石桥静静枕着流水，任凭风雨剥蚀，桥墩上斑驳的青苔记录着时光的厚度；古井幽深，藏着岁月的尘烟与人间的悲欢离合。江桥祁氏的袅袅烟火与绵延善念，便在这河畔生根发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河水不止，故事不绝，浦河的每一朵浪花里，都藏着一个家族跨越千年的记忆与守望。





江　桥

古桥三迁留履痕，石墩犹记往来人

如今的江桥早已不是旧时模样。岁月几度更迭，旧石桥历经风雨变迁，1974 年浦河疏浚拓宽，古桥向北迁移 500 米，更名新镇桥，以新的姿态继续连接两岸人家；后又经危桥改造，再度焕新，唤作浦河桥，横跨在拓宽后的河面之上。旧时三块长条青石铺就的平板石桥，总长不过十米有余，两个古朴的石墩静立水中，历经洪水冲刷、岁月打磨，依然沉稳如初。这两座石墩承载过无数行人的步履——挑担的农夫、采桑的村妇、求学的稚子、归乡的游子，也默默见证过祁氏宗族在此扎根繁衍的漫漫光阴。桥因地名，村因桥兴，一汪清凌凌的河水，一座沧桑的古桥，串联起光武凿渎的古老传说，也开启了祁氏家族落脚江南的漫漫篇章。桥是路的延伸，更是家族记忆的起点。

光武凿渎传佳话，七里井畔起江桥

追溯江桥之名的源头，有一段温暖而传奇的往事。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少时曾流落江湖，夜宿七里井。彼时正值灾年，饥馑遍地，善良的百姓虽然家无余粮，却将仅有的一点粮食悉数拿出，救济这位落难的少年，并为他“指途达江浒”，指引前行的方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后来刘秀登基为帝，成为一代中兴之主，他始终铭记七里井百姓的恩情，下令在此开凿孟渎——也就是今天的浦河，南通京杭大运河，北入浩瀚扬子江，引水灌溉，通航舟楫，造福一方百姓。后人感念这份恩德，又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石桥，从此处出发可“达江浒”，直通大江。七里井遂改名为“江桥”，这个朴素而深情的名字，带着帝王与百姓之间温暖的故事，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靖康烽烟南渡客，祁氏屯垦扎深根

千年之后的两宋之交，靖康烽烟骤起，金戈铁马踏碎中原山河，大批士族百姓纷纷南渡避祸，涌向江南寻求安身之所。据《常州祁氏族谱》所载，祁氏始祖殷公原籍河南汝南，世代供职于北宋朝廷。金兵南下，子孙随宋室仓皇南渡，其中祁业公，字鼎彝，才学过人，高中进士，出任武进主簿。时值南宋乾道年间，君王励精图治，志在恢复中原，江南圩塘与孟渎沿岸尚有大片荒芜滩涂，芦苇丛生，水泽遍布，亟待开垦。祁业公身负屯垦安民之责，率领军民披荆斩棘，围垦荒田，筑堤围塘，改造河边沙地与低洼陂塘。昔日杂草丛生的滩涂，经他精心经营之下化为万亩良田，稻麦遍野翻金浪，油菜花开似云锦，茶园错落散芬芳，桑麻遍地织绿荫。屯垦所得既补给军需粮饷，又安养一方百姓，可

谓功在社稷、利在苍生。抗元名将李庭芝曾盛赞他开辟荒芜、安民济世的卓著功绩，将其比之萧何之治粟、寇恂之安民。一纸敕令，一面褒奖锦旗，是那个时代对他的最高肯定，而祁氏一脉，就此在浦河之畔的江桥一带深深扎下根基，犹如河岸的老树，根深叶茂，世代绵延。

举善堂前传家训，七村分衍共根脉

岁月流转如浦河之水，祁氏子孙定居江桥，在此繁衍生息 700 余载，分衍出河东、河西、主簿巷、石桥头等七处村落，星罗棋布于浦河两岸，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座举善堂巍然矗立，成为整个宗族的精神内核与凝聚之所。堂号曰“举善”，相传康熙年间御赐匾额高悬堂前，“以仁孝治家，以举善传家”——这 10 个字，化作刻进祁氏骨血里的家风箴言，成为每一代祁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江桥主祠堂坐落于河东浦河岸边，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层层递进，天井承接四时风雨——春雨霏霏润青苔，夏日炎炎洒浓荫，秋风瑟瑟卷落叶，冬雪皑皑覆瓦檐，也收容着一族人的温情与亘古不变的道义。逢年过节，祠堂香火缭绕，族人齐聚一堂，祭先祖、叙亲情、议族事，举善堂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流淌在祁氏血脉中的精神符号。

祠田周济暖寒岁，善念不囿高墙内

在那个世态炎凉的旧时代，江南乡土的融融暖意，多半来自宗族祠堂散发的微光。每至岁暮天寒、年关迫近之际，朔风凛冽，大雪封门，祠堂便开启周济之门。祠田一年的收成，化作白米与钱粮，一担担、一袋袋送到族中鳏寡孤独的手中，让他们能在除夕之夜吃上一顿饱饭，感受人间的温情。待到青黄不接、春耕难熬之时，贫寒之家也能从公产之中得到接济，借粮度日，熬过饥馑荒月。族人遭遇婚丧大事，倘若囊中羞涩无力操办，祠堂也会酌情予以资助，不让贫苦之人因穷困失了人间礼数与体面。然而这份善意，并不只囿于祁氏族人祠堂的高墙之内。祁氏子弟心系桑梓，将温暖的目光投向整个浦河乡野。浦河支流水道淤塞不畅，便出钱出力参与疏浚；乡间小桥倾颓欲坠，土路泥泞难行，便慷慨捐资修葺路桥。河水滋养万顷田地，路桥连通十里乡里，一桩桩看似寻常的善举，如春雨润物细无声，默默滋养着江桥这片温暖的土地。

兆庚疏河惠万顷，善念随波流远方

光绪年间，祁氏族中又出了一位急公好义之人——祁兆庚。彼时北塘河淤塞多年，河床抬高，水流不畅，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涝患频仍，沿岸百姓苦

不堪言。祁兆庚挺身而出，牵头募款，奔走呼吁，发动乡民疏浚北塘河。工程浩大，耗资不菲，他多方筹措，率先垂范。河道疏浚之后，河水畅流无阻，涝患大为消减，惠及西夏墅、浦河一带万千田亩，让乡野百姓得以安守耕织、安居乐业。举善堂的善念，顺着畅通的河道，流到了更远的乡野之间，流进了每一个受惠百姓的心田。从南宋祁业公屯垦安民，到明清族人修桥铺路、周济乡邻，再到光绪年间的疏河壮举，祁氏“举善”的家风从未断绝，一代又一代人用行动诠释着“善”字的千钧分量。

梓里桑麻织锦绣，农耕烟火寄欢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浦河两岸沙质沃土，疏松透气，最适宜桑麻生长。祁氏后人福一迁居江桥河东之后，远赴他乡学习技艺，带回优质桑麻种子，在河畔高地广植桑树，种麻制绳，开启了江桥桑麻产业的先声。岁岁春日，桑林一片青翠欲滴，嫩芽吐绿，家家养蚕缫丝，夜夜机杼声声不绝于耳，织出一匹匹光洁的丝绸。桑麻副业日益兴盛，成为武进西北乡百姓赖以谋生的重要依靠，被时人美誉为“梓里桑麻”，名扬四方。农耕之余，民间烟火化作斑斓艺术，调马灯、荡湖船的民俗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传承。每逢节庆，锣鼓喧腾震天响，彩灯流转似游龙，欢声笑语洒满乡间，这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最质朴、最热烈的祈愿。千百年间，耕读传家与行善济世，交织成江桥最深沉、最温暖的生命底色。

伫立浦河岸边，河水依旧滔滔东去，不舍昼夜，一如千年前的模样。古孟渎的传奇故事，祁氏举善堂的温暖往事，桑麻遍野的葱茏记忆，都深深沉淀在西夏墅江桥的泥土之中，化作这片土地最厚重的文化层。石桥虽已数度改易，祠堂虽已褪去昔日辉煌，但江南乡土宗族那份守望相助的温度，如同浦河不息的流水，悠悠不绝，岁岁绵长。浦河之水长流，举善之光不灭，这便是江桥留给这个世界最动人的篇章。

（文/唐立峰）

常州城东大小白家桥

在常州城东，大小白家桥曾是重要桥梁，承载着一代代城东市民的生活记忆。桥畔的东风印染厂、国棉三厂、色织厂，则是常州纺织工业的发展的见证者，那些世家故事和市井烟火，也顺着河水，一辈辈口耳相传。

双桥枕水

大白家桥横跨大运河（古时也叫漕渠），南边就是菱溪口，桥北那片地方，老人们习惯叫上塘。它最早并不叫白家桥，本名政成桥，因为河边住了不少白姓人家，大家便顺口唤它为白家桥。

大白家桥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就已经建好。几百年间多次重建重修：明万历、清乾隆年间重建，道光、同治年间又不断修补。一次次修缮，足以说明，当年这里是运河上举足轻重的交通要道。到了民国 5 年（1916），老桥又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塌了。天宁寺冶开大和尚联合地方乡绅，想出一个办法：把整座桥往东挪大约 300 米，离开原先菱溪西边的旧址。乡里百姓纷纷出力断



白家桥新桥



白氏宗祠

坝作业，拆除老桥，耗时整整一年，新的大白家桥就此落成。建成后的白家桥气势宏伟，为单孔石拱桥，南北各有台阶。该桥长 47.4 米，跨径有 11.2 米，桥宽接近 5 米。

不少老一辈还记得桥洞底下那条纤道。家住桥北的郑德全老先生曾任上海大厦对空台台长，回忆儿时的场景时说到："以前运河上行船，枯水的时候大多靠撑篙、摇橹，只有汛期大水，才需要纤夫拉船。约半米宽的纤道贴着桥洞，纤夫不用爬上桥面，在桥洞下就能拽着绳索把船拉过去。"可到了黄梅雨季，河水暴涨，水位能抬升一米多，纤道常常直接被大水淹没。河水湍急，从运河顺流而下的船只，和从采菱港小白家桥驶出来的船，很容易在桥洞口相撞。船家之间争吵、冲突时有发生，这也是当年把大白家桥向东搬迁的原因。

小白家桥为东西向，跨采菱港，该桥原名定安桥，大概是因为体量较之政成桥偏小的缘故，又称为小白家桥。相传桥下的菱溪是隋炀帝下江南时期开凿的，是通往南边行宫的河道，现在附近还有离宫东路的叫法。小白家桥始建年代不详，明清时期也多有修缮，最终于 1966 年春夏季间拆除。

彼时乡民入城，商贩往来，都要经过大小白家桥。周围四邻八乡如雕庄、南岸头村、强家弄、许家村、周庄村等地的农民，会挑了自家种的各种时令蔬菜来卖。桥北遍布南北杂货、菜饭馆、茶馆等，烟火气十足。

望族留痕

运河岸边，曾住着两大名门：晋陵白氏与菱溪钱氏。民间广为流传的侠客

白泰官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虽然只是民间传说，却藏着老百姓心中对侠义善良、扶危救困之人的崇拜。

晋陵白氏在小白家桥的西侧建有宗祠，按照家谱记载，白氏来自于河南洛阳，因为躲避战乱来到了常州，宗祠始建于明弘治三年（1490），由白昂之子白埈主持；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三世孙白禹扩建成宗祠，题写“仁荣堂”匾额。民国 5 年（1916），十八世孙白驹再集资修缮，江南大儒钱振锽亲笔题写“白氏宗祠”横匾，至今高悬。白氏家族与常州地区的名门望族结亲，并且重视对族中子弟的培养，历史上人才济济。明成化年间，在常州城中甘棠桥南（今南大街与青云坊交会处附近）有父子京兆坊，就是为纪念白昂和白圻所建造。2007 年，白氏宗祠修缮一新，牌坊蔚为可观。2008 年 2 月，晋陵白氏宗祠遗址被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菱溪钱氏同样声名远扬，代表人物便是钱名山。钱名山道德文章驰誉大江南北，有很多著作：《名山诗集》《名山文约》《阳湖钱氏家集》等。面对陈腐的官场，他毅然辞官回乡，在住宅东侧的寄园创办书院讲学 20 余年，园中走出谢稚柳、谢玉岑、程沧波、马万里等一大批文化大家，寄园与苏州国学讲习会、无锡国专并称民国时期江南三大书院。

五园荟萃

旧时城东清净雅致，不少文人雅士偏爱在这里造园居住。历史上，除寄园外，还有归乐园、石园、洛原草堂、菱溪草堂等园林。

其中归乐园是白昂退休归来养老之地，取的是陶渊明“乐夫天命”的语义，他还摘取《归去来兮辞》文中词句，分门别类，为园内各处景致命名。石园是白昂次子、督察院右都御史白圻所建；洛原草堂是白圻长子、尚宝司司丞白悦所建，洛原草堂处处带着“洛”字，是为不忘家族洛阳故土。菱溪草堂则是由邵长蘅的族人邵龙文所建，他构建读书处，藏书千卷。

这些园林旧址已经消失在城市变迁中。幸运的是，今人集腋成裘，把五个不同时代、不同主人的园林，用水系、桥廊串联，建成萃园。一园之内集齐明、清、民国常州城东园林的五种气质。

古桥今语

20 世纪 80 年代，运河提升为四级航道，河道由 30 米拓宽至 50 米，石拱桥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航运的需要。1984 年，白家桥拆除后，在原址新建了钢筋混凝土现代桁架拱桥，新建的政成桥有四孔，桥全长 93.3 米，桥面宽度达

到 16 米。两端均有引桥，匝道环内种植花草，形成一处小公园。

到了 2016 年，政成桥再度重建，长 214.1 米，宽 30.6 米，为七跨简支梁式桥，向南跨越凤凰岛北路，向北跨越延陵中路。周边工业地块，也进行了改造再利用，人文积淀和工业遗存迎来新的篇章。

400 多年前，著名画家钱谷用他的画笔画下了大小白家桥，帮我们留下了历史的遗迹。今天的我们站在白家桥向西望去，双桥枕水的清丽景色仿佛还在眼前。

（文/吴　炜）

记忆中的儒林石拱桥



儒林桥新桥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谷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歌想必年龄稍大一点的人都非常熟悉，个个会唱，人人会哼。这是1956年拍摄的电影《上甘岭》里面的插曲。

我们儒林也有一条大河，她是儒林人民的母亲河。我们的儒林大河也是稻谷香两岸，我家也在岸上住，我也听惯了艄公的号子，我也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更令人魂牵梦绕的是儒林大河上的一座石拱老桥。

记忆中的儒林老桥是一座圆孔石拱桥，它横跨在儒林东街的大河上，大河通长荡湖，通太湖，通长江。整座桥全是花岗岩麻石砌就，虽不是很大很长，但也雄伟壮观。古时没有水泥，石块之间全是用糯米浆灌注，异常坚固。桥面中间有一条凹槽，那是用来推独轮小车的车辙，凹槽两侧是长条石板铺成一级一级的阶梯形台阶，供行人行走。桥面两侧是装有石榫的石栏杆，雕龙画凤的浮雕十分精致，栩栩如生。

相传，古代儒林大河上通往东西两岸的一直是一墩木桥，这木桥可能要追溯到唐代以前，因为唐代以前儒林的地名叫储村，所以这墩木桥的名字一

直沿用下来叫“储村桥”。清乾隆版《金坛县志·桥路》上记载:“储村桥在县东南四十五里。”直到清末民初,金坛儒林的厚仁村上出了个史尧棠,这个厚仁村很大,当年行政区域划分,厚仁村中间一条河,以河为界,村西一半属于金坛,村东一半属于宜兴,这个史尧棠住村西,所以他就是金坛人。史尧棠可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当地的大乡绅、大地主,有钱有势,可他却是个大善人,当地名声非常好,他给地方上修桥铺路、救济穷人。当年金坛地区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坛两个棠,威名扬四方;城里马荫棠,乡下史尧棠。”

话说这史尧棠见老木桥年代久远,风吹日晒雨淋,朽木腐烂摇摇欲坠,心想这大河两岸人口众多,河西又是街镇,应该修建一座石桥才是。于是他就发出倡议号召殷实富户,大家捐款建桥。史尧棠有号召力,因为他是当时的“大图董”,图董是什么呢?图董是当时的地方行政长官,“图”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每个图有个图董,史尧棠是当地五个图的大图董。当时的行政机构是按地方上的姓氏家族划分的,史尧棠管辖的有“史祠图”“臧祠图”“许祠图”“储祠图”“朱祠图”, 其他零散姓氏的都根据所住的地理位置和村庄划归在大姓家族的图里,他是五个图的大图董,相当于乡长的职位。建造石桥,五个图和其他图都出了一部分钱,但大头还是史尧棠出的。

桥造好了,得起个桥名,史尧棠开会叫大家讨论,后来一致通过桥名叫“桃园桥”,为啥叫桃园桥呢?是因为桥墩边有一座古老的尼姑庙叫桃园庵,这桃园庵当时香火很旺,老百姓祈祷十分灵验,保佑着一方百姓风调雨顺、平平安安,所以大家认为叫桃园桥吉祥吉利。这桃园庵也有来历,相传当时来了两位尼姑,看到儒林河东边是一大片桃园,且这里风水极好,于是两位尼姑就在此化缘,造了一座尼姑庙,起名为“桃园庵”。据老人说,当年桃园庵的两尼姑是才女,庙造好后她们仿照唐伯虎的《桃花庵》诗,自己作了一首《桃园庵》诗写在墙壁上:桃园边上桃园庵,桃园庵边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

在上世纪 70 年代前,运输物资没有公路和汽车,全靠水运。乡镇基本上不通公路,只有城市之间连接着一条沙石公路,比如常州、金坛、溧阳、宜兴的城市之间才有公路和汽车,农村乡下人出行全靠轮船,运输货物全靠水路船只。

这儒林镇是个大镇,儒林河桥墩边上就是轮船码头,也是装卸物资的水码头。运输物资的船队都停靠在大桥南北两侧的河边上。据老人讲每天都有很多做生意的船只轮流停靠码头上,有上货的,有卸货的。桥的南边一直停到破桥湾,桥的北边一直停到洪家湾。这儒林大河从大桥往南 2 里处,河道就向西拐弯了,拐弯处有一水坝,是河东高田地区雨水流入大河的水坝,水坝上

架了一墩破木桥过往行人，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大河拐弯处叫做“破桥湾”。大桥往北 2 里处，河道也向西拐弯，一拐过去就是长荡湖的湖头大桥，此处原先单独住着一户姓洪的人家，当地人就称此地为“洪家湾”。

我们小时候天天从桥上走，因为我们的学校就在河对岸桥边上，每天上学必须过桥。每次走到桥上时都会驻足观看河里各色各样的船，尤其是中午放学和下午放晚学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会从校门口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跑上高高的桥背，中午放学时刚好从常州开往儒林的轮船准时到达儒林，轮船汽笛“呜——”的一声长鸣，声震云霄，靠上轮船码头后，船上的人依次先上码头，很有秩序，没有人争先恐后。然后码头上的人再依次上船，大家都守规矩，很是文明礼貌。客人上岸的上去了，上船的也上来了，轮船又“呜——”的一声长鸣，开始起锚回程，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和睦和谐。

放晚学后桥上的人更多，轮船是看不到了，每天只有一班轮船，每天中午到。可其他时间里，河里的各种船来来往往不断。那时放晚学放的早，小学低年级三点多钟就放学了。我每天放了晚学第一个冲出校门，占据桥背上的最佳位置，观看河里的来往船只。那河里的船可多啦，有大船、有小船、有帆篷船、有拉纤的船、有两边船帮上站满捉鱼老鸦的小渔船、也有连成一条线拖着十几条货船的运输铁驳子大船。最为惊险好看的是帆篷船和拉纤的船过桥洞时的景象。拉纤的船在靠到桥洞前，船上的人就先把扣在船头的纤绳解开，岸上拉纤的人迅速把纤绳收拢在手上，然后快速跑到桥背上，那船在解开纤绳后由于惯性，只要掌舵的人掌稳船舵，船还自动向前行驶，待船一过桥洞，等在桥背上的纤夫立刻把绳准确地扔到船上，船上的人麻利地把绳扣在船头，纤夫又好继续拉纤了。如果纤夫在桥背上丢绳慢了，那么船迅速离开桥洞了，纤绳就落在河里，这样就麻烦了。纤夫要赶快回到岸上追船，然后把纤绳用力扔到船上扣住，才能继续拉纤。

那竖着桅杆扬着帆篷的大船过桥洞更加惊险，帆篷船要不早不晚，在临近桥洞大约一里路时，就要缓缓降下帆篷，等到篷落下后船接近桥洞了，此时，那高高的桅杆迅速倒下，因为圆形的桥洞小，桅杆不倒过不去，眼看着桅杆要撞上桥洞了，把我们看的人吓出一身冷汗，可它偏偏撞不到，稳稳地倒在船上，待船一过桥洞，桅杆又像活的一样立即竖了起来，紧跟着那帆篷就呼呼地升了上去，船上的舵手掌稳了舵，调整好风向的帆篷又被风鼓得满满的，船就像箭一样地射出去了。

让人悬着心的是那种大型铁驳子拖船，它老人家慢慢吞吞，哼哧哼哧的，后面拖了十几条货船。老远看见它来了，两边的小船知道撞不过它，迅速靠



近岸边稳住身子，让它老人家先过去。大拖船离桥大约还有 2 里路，就雄赳赳地张大喉咙鸣笛两声，告诉人们和其它船：我来了！我们看到这种情景都是悬着心，生怕它们一不小心撞到桥洞上，因为它的吨位太重，力量太大了。这烧柴油的大型机动船，临到桥洞那推上来的水流碰上桥洞两边的石头上掀起高高的浪花，真的是“船到桥洞自然直”，大驳船拖着一长溜的货船稳稳地驶进桥洞，直到船队全部过了桥洞，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重重的吁出一口重气。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要放学后我总归趴在桥栏杆上看河里的船来来又往往，看河里的鱼鹰蹿上又蹿下，好像永远也看不腻，好像永远也看不够。

1966 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由于形势的发展，儒林大河要拓宽，只能拆除了这座百年石拱老桥，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水泥大桥，改名儒林桥。

老石桥服务了几十代儒林人，老人们回忆，拆桥的石板石块都抬到洋龙沟上筑了水坝，那镌刻着“桃园桥”三个繁体大字桥名的大石条也不知埋在何处了。老石桥，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精美壮观的儒林石拱老桥，一回忆起来就引发出深深的眷恋。

（文/诸葛佩圣）

常州节庆习俗

节庆是指在固定或不固定的日期内，以特定主题活动方式约定俗成、世代相传的社会活动。习俗指民间风俗、百姓习俗。常州节庆习俗从常州现存最早的方志《咸淳毗陵志》开始有记载，已逾 700 余年。

和整个江南地区一样，常州经过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南北交往，再经唐宋元三代文化积淀，到了明清时期，则出现了农业结构变化、工商业市镇的兴起等发展变化。另外，由于当时人口急剧增加，社会民众生活日益追求享乐时尚，民俗生活形态丰富多样。这些节庆习俗既是江南民俗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自身特色，也反映出当时常州富足的生活状态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习俗有的已渐渐消失，有的至今仍在沿用。

一、新　年

这天一早，长幼均要起床洗漱，开门后放爆竹三声，称之为“开门炮仗”。在爆竹中要夹着五色纸，寓意“满地金钱”。然后叩拜天地、祖先、再互相拜贺。每家每户要一大早用酒、水果、米粉做的金银元宝迎灶神，吃汤圆，取团圆意，中午要吃长寿面。按黄历上记载的喜神方位，出门依次拜见家族尊长、亲朋好友，即为“拜年”。读书人这一天还要首次启用新笔，用红纸写上吉利字。

新年这一天有很多禁忌，比如说不喝汤，喝汤就会出门遇雨；不洒扫除尘，否则会扫去财气。如果白天听到乌鸦鸣叫，“主老人灾”，有喜鹊声，则预示着有丁壮死亡，而有雀声，则会“殇小儿”。新年以阴天为佳，所谓“大年初一黑碌秃，高低田稻一齐熟”。这一天晚上要早睡，以免妨碍老鼠嫁女之类。小孩子们还会在鼠穴旁放置米团插花，说是送嫁。

二、元　宵

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城内各街便盛放花灯，祠庙庵观都是张灯结彩，而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夜晚更为盛大。元宵节人们敲锣打鼓，进行各种表演，称之为“闹元宵”，其中尤以调龙灯最为出彩，现在新北区的太平龙灯便是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太平龙灯演出时需 60 多人，有督旗一面以及八卦旗布阵，锣、鼓等器乐均为双副，气氛热闹非凡。表演时按序幕、进阵、舞龙、阵式四个步骤进行，随着八卦阵、梅花阵、一字长蛇阵、月牙阵、蝴蝶阵等阵式的不断变化，产生不同的舞龙表演效果，十分精彩。另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万绥猴灯也是这时表演。表演时，队伍阵容壮观，演员一律戴特制的猴面面具，戴猴帽穿猴衣，前有猴王魁星和大旗开道，一路锣鼓喧天，威风凛凛。此外还有现在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跷等。高跷最盛时期为清光绪年间，木匠街的匠人们闲暇时制作木制高跷娱乐嬉戏，久而久之，便闻名江南。

三、清　明

清明是上坟祭祀的日子，田野间挑菜筐，手携纸钱的人满目皆是。人们折杨柳、桃花，插于门上灶间，传说是用来纪念介子推。这一天早晨，常州人往往将隔年蒸制的大团子切片入油煎之，加红糖盛盘中，用来供奉祖先。宗族还在宗祠举行祭典，礼毕宴饮，称之为“吃祠堂酒”。除祭祀祖先之外，还要祀灶和祀宅神。

常州称放纸鸢为“放鹞子”，放鹞子是常州春天的一大盛景。到了晚上，会在放鹞的绳索之上系上红绿纸灯笼数十盏，当中点燃细烛，有的还系上烟火，遥望如繁星点点，称之为“鹞灯”。常州有“清明断鹞”的谚语，意思是清明以后麦苗苗壮，不应再在田间放鹞。

四、立　夏

立夏时要吃三鲜，并以之祭祖先，三鲜也叫作三新。有所谓地上三鲜，即苋菜、蚕豆、元麦（也有说是燕笋），树上三鲜即樱桃、梅子、香椿头，河中三鲜即海丝、鲥鱼、咸鸭蛋（也有说是白虾）。

五、浴佛节

四月八日是释迦生日，世称浴佛节。常州妇女从正月初六开始到八月初八，便要烧八庙香，或者叫“八寺香”，又称“八字香”。这八庙，即真武庙、营田庙、季子庙、关帝庙、张睢阳庙、烈帝庙、晏公庙、灵官庙，张睢阳庙后又改为东岳庙。据说烧八字香，可以使来生获得一个好的“八字”。八字香以正月初六、四月初六和八月初八为盛。这一天，常州各大寺庙中人头攒动，男女会集，名曰“传经”。僧尼装饰香花灯烛，放铜佛于水盆，信徒们争相扔钱财于水盆中，称之为“浴佛”，此外还要举行“放生会”等仪式。寺庙僧侣还会散放糖豆、做

“青精饭”,即鸟米饭馈赠信徒。晚上又有坐夜之会,自黎明方散,乡村中则田垄之间到处都有信徒聚集。

六、端　午

端午节的主题是送灾和驱逐不祥。所以在端午前后,道士会送符箓以驱邪,人们也会在中堂悬挂钟馗像,插菖蒲艾叶于屋檐下。端午前一天,家家要以箬叶裹制粽子,有火腿、赤豆、豆瓣等各种名色,在端午一早食用。中午要饮雄黄酒,同时洒于室内,小孩子则用雄黄酒涂于背上,再在额上画个“王”字,还要用朱符粘于门上及堂奥,烧辟瘟丹,用以避疫。常州还盛行制作“长命索”,小孩子们用彩线搓成五色,互拴于手臂。妇人们会剪彩纸作人形,如豆子般大小,称之为“健人”,又制绒布的老虎花,插于儿童头上。

这一天,常州还要举行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活动,即云溪竞渡。云溪竞渡是常州人引以为豪的岁时景观,所谓“常州龙船天下无”,现如今划龙舟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龙舟竞赛在常州城内风景最好、文人聚集最多的白云溪进行,一般于五月一日开始,基本要持续一个月时间。选择这时间,固然是临近端午,同时也是因



白云溪龙舟竞渡

为时近梅雨，白云溪水开始上涨，便于龙舟行驶。如时值干旱，溪水太浅，竞渡便必须取消或者移地，所以有“云溪水浅舟难行，今年竞渡不进城”之说。四月三十日晚上，所有龙舟都要汇集于晏公庙，进行拜谒。晏公祠是祭祀水神之所，通过拜祭仪式，祈求整个活动的安全。按照惯例，前一年龙舟竞渡结束后，还要有迎取龙舟的仪式。根据记载，龙舟一般在六条左右，最盛时，曾经到了七龙，洪亮吉便称“六龙城古龙舟七”，包括大小青、大小白及乌龙、金龙、五色龙，此外还有秋千船等小龙舟不包括在内。龙舟竞渡一度得到政府支持，每只龙舟可以支取浒墅关税十余两，所以洪亮吉有“税额仍分浒墅关”之说。但一艘龙舟耗费远不止十两，所谓“一舟费已倍千金”。另据传说，为了防止龙舟翻倒，龙舟下面悬着块石头，随着牌楼的加高，而加重石块，船舷也一天天接近水面，到了五月末，龙舟的牌楼早已高出岸边楼阁了。所以洪亮吉在诗中称“高处灯光碍月轮，轩窗无地着飞尘。生生视昔加三倍，树上禽巢树下人”。岸上同时还有云车戏，与龙舟遥相呼应，热闹非凡。夜间还有夜龙船，或称灯船。

七、夏　至

夏至日早上要吃元麦粥，午饭要吃烧酒、馄饨，据说可以不会“疰夏”。常州家中还会在这一天用大秤称人，以验体重，据说也可以一夏无病。此外夏至后七日称之为头时，再过五日称之为二时，又过三日称之为三时。到三时结束，如果有雷雨，那么就会有水灾。所以农谚称之为“三时三送，低田白弄。”

八、六月十九

六月十九传说是观音得道日，前一天晚上，善男信女便会携着香烛，聚在小南门外清凉寺作金钱布施。清凉寺北的德安桥是河衢要道，当天会有许多人聚集在德安桥上比赛唱山歌。

九、七　夕

这一天又称乞巧节，女子会采凤仙花染指甲，还取河水和井水各半，盛于碗内，在日光底下晒热，到正午时分，在太阳下用绣针放入水中，让针浮起，然后看水底针影，如果像宝塔或者笔形，那么就代表得巧，即人会变得聪明；还会把蜘蛛放入梳妆盒中，如果次日早晨蜘蛛在盒中织网，也代表得巧。常州北门外十里有牛郎庙，旁边还有一木桥，俗名“织女桥”，女子经常会在这一天来牛郎庙烧香求姻缘，并徘徊在织女桥边，所以洪亮吉便有诗云：“七月七日侵晓妆，牛郎庙中烧股香。回途更把裙衫整，织女桥边鉴春影。”这一天，常州

人会制作巧果，即用面粉调油加糖或椒盐，烘制成有如成人拇指般大小的饼，或像是人物，或像是花鸟。因“吃巧”和“乞巧”谐音，故名日巧果。这一天，妇女还会在晚上焚香，用巧果来祭祀织女。这一天如果下雨，便称之为“洗车雨”，谚语有云：“七夕不洗车，八月依旧车。”意思是如果这一天不下雨，到了八月就会有旱情，必须要戽水。此外，七夕前后十数日，常常会有银河隐没不见，常州风俗便以这一段时间的多少来判断米价的贵贱。

十、中　元

中元节即七月十五，俗称鬼节。这一天各大寺庙会举行盂兰盆会来超度亡魂，晚上各家各户会准备酒饭，祭祀祖先，叫作“过七月半”。人们还会在路边焚烧纸钱，祭奠各路孤魂野鬼，称之为“结鬼缘”，又叫“退太平祟”。人们会在地上插香，叫作“烧地香”。晚上还会剪五色纸，制作荷花灯，放入河中，称之为“放河灯”。到了晚清，人们“做中元”更加兴盛，“往往于通衢中高搭彩蓬，悬挂灯火，并有纸糊匾联，绘画十王，及扎成各种鬼怪形象，插烛点火，沿路陈设”。家家户户还会有面粉制成半圆或圆形的茄饼，如果用茄子丝作馅的，是专门供祖先用的。

十一、中　秋

八月十五日是中秋节，节前一二天，人们多用火腿、月饼等为礼物互相馈赠，称之为“送节礼”。中秋节早晨，要吃“糖芋头”，或者叫“芋魁”，是用芋艿和以碱煮到烂熟，加以红糖、桂花而成，也要用来祭祀祖先。晚上，家家户户聚会宴饮，吃月饼，所谓“月圆饼圆月饼圆”。妇女们常常在中庭设香案，供上菱藕，烧香斗，祭祀月宫。香斗用线香作斗，纳香屑于其中，上插小纸旗。清乾隆间，中秋前二日，正值帝王生日的万圣节，居民皆张灯结彩，连续五个昼夜，南大街和西瀛里等商户云集之处，尤为热闹。

十二、重　阳

九月九日重阳节惯例要登高，常州城内无山，所以人们争赴东门外的文笔塔，登上塔顶，眺望全城景物。这一天早晨要食重阳糕，先一日用米粉蒸制，上缀红绿丝、红黑枣、栗子、松仁、黑白芝麻等。

十三、下　元

农历十月十五，民间传统的“下元节”，又称“下元日”，旧时人们又尊这一

天日为“水官生日”。这是因为常州属江南水乡，农村多种水稻，副业捕鱼捉虾、驶舟航船等等皆与“水”有深厚的缘分，所以农家对“水官生日”特别重视，多于此日“斋三官”（祭祀天官、地官、水官），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斋三官”之俗起源甚早。南宋吴自牧《梦梁录》载：“十月十五日，水官解厄之日。官观士庶设斋建醮，或解厄，或荐亡。”可见唐宋时代道教对此已极为重视。而道教诸神之中，“三官”地位颇高，特别是在黎民百姓之中影响较大，其起源乃是土生土长的原始民间信仰中人们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另据《典略》，东汉时早期的道教就吸收了传统的原始民间信仰，奉天、地、水“三官”为主宰人间祸福的神灵了。至宋代又将“三官”与“三元”（正月十五“上元”为天官生日，七月十五“中元”为地官生日，十月十五“下元”为水官生日）联系起来，称“三官”为“三元”。后来，随着道教的逐步衰落，百姓对“三元”的认识逐步模糊，三官生日也越来越淡化了。

可是，“斋三官”的风俗在常州地区农家，却一直传承。到了近代，主要是新米磨粉做团子。常武地区农谚云：“十月半，牵砻做团斋三官”（斋三官的团子是通常的小团子，不是“十月朝”的“糍团”）。有些农家还按古制，在大门口竖起高高的“天杆”，白天在杆顶张挂杏黄旗，旗帜上写“天地水府”、“风调雨顺”等字样，到了晚上则换上三盏“天灯”，以示祭祀天、地、水“三官”。新中国成立以前，东门外“三官堂”香火极盛，届时前往烧香念佛的善男信女云集坐夜，通宵达旦念诵《三官经》。但是，坐夜念佛的婆婆多数没有文化，念佛口耳相传，有口无心，难免以讹传讹，穿凿附会，错误百出，往往闹出许多笑话来，所以常州民间谣谚中有“瞎传三官经、丝瓜炒面筋”之句，常州方言也有“瞎缠三官经”或“瞎串三官经”的说法。

清代，常州城内每年十月十五“下元节”也自有一番热闹。诗人洪亮吉《南楼忆旧》中有诗为证：“才过中元又下元，赛神萧鼓巷头喧。年来台阁多新鲜，都插宫花粉杏园。”亮吉自注云：“赛神会中每用七、八人扛一桌，上扮金元院本诸故事，名台阁。”说当时民间行会新鲜热闹、丰富多彩。此俗辛亥革命以后逐渐废除，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有这个节日的存在。

十四、冬　至

冬至一直是重要的节日，所谓“冬至大如年”，常州凡有祠庙的大家族，必须在这一天祭祀祖先，所以重视冬至，如同过新年。而且常州冬至也饶有特色，冬至夜宴席中必须要有胡葱豆腐，祭祖也要用。谚语云：“若要富，冬至隔夜吃碗胡葱笃豆腐。”又有“富家冬至吃一夜，穷家冬至冻一夜”的谚语。冬至

早上要吃小颗粒糖圆，晚上要吃面，所谓“夏至馄饨冬至面”。此外，还有“干净冬至龌龊年”的说法。

十五、腊　八

这一天要吃腊八粥，又名“七宝五味粥”，原因是当天为佛祖成道日，粥寓祝意。常州各大寺庙会专门煮腊八粥，分馈各个主顾，还配以精致小菜数色，祈望这些信徒在过年时可以广为布施，润色香火。常州腊八粥至晚清变成菜粥，只有讲究的大户人家才会加上果肉。

十六、祀　灶

腊月二十四日，传说“灶朝天”，即是灶神上天汇报的日子，所以在前一天要“送灶”。常州人这一天要制玛瑙团，即用米粉加上红糖制成，每四个垒成一堆，称为“玛瑙团”，因色如玛瑙而得名。同时要作纸轿、纸马烧化，让灶神乘坐，还要放上豆子作纸马的“饲料”。

十七、除　夕

新年前一天即是除夕，常州称之为“大年夜”，其前一日则是“小年夜”，总呼为“大年小夜”。节前要做团子，依人口多少为准，人各二枚，因此称之为“人口团子”。除夕当天要插松柏于屋檐及灶间，在大厅中悬先祖神像，用香花供奉，到新年初方可撤去，谓之“落神像”。

家家户户会贴春联门神，用白垩在地上画弓箭、米仓，弓箭用来射祟，米仓用来祈祷丰收。当晚烧饭要加乌豇豆，准备可食用五日，称之为“年夜饭”。晚上在门外放一斛，斛上置釜，用长一尺五六的 36 根松材作燃料，里面放上豆萁、松柏点燃，称之为“着焰炉”。等到烧完后，将余烬放于门口，称之为“撑门柴”。晚间通宵不寐，将各事办完，即设筵畅饮，称之为“守岁酒”，守岁酒还规定必须论年纪喝酒，年轻的人先喝，卧室内必燃红烛一对，叫“守岁烛”。大人要给小儿“压岁钱”。临睡前要封井、封门，必须加水到满，灶下的柴火必须拣取干净，谚语所谓“穷灶仓，富水缸”即是指此。

常州岁时节日民俗特征，既体现了常州民俗在各个时代的特征，也成为常州这座千年古城真正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记忆。

（文/史文佳）

上　梁



上梁仪式

算来已是许久，没在郑陆镇村上见过人家上梁了。一来年轻一辈多进城置业，村里少有人再翻盖新屋；二来如今宅基地审批趋严，新建住宅本就寥寥，上梁自然成了难得一见的光景。唯独20多年前我家上梁的场景，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记忆里的乡间传统，素来把建房上梁当作顶要紧的人生大事，分量仅次于娶妻生子，常与新婚、添丁并称农家三大喜事，寄寓着安居乐业、家道兴隆的朴素期许。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家盖一座房子殊为不易。本土作家高晓声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以一篇《李顺大造屋》，写透了几代农人为一间屋熬尽心力的辛酸与执念。这份刻进乡土底色的造屋情结，在郑陆乡间延续了数十年未曾淡去。备料筹资常要耗费数年心力，因此对造屋的诸般礼数愈发看重。虽说自古“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地有一地的章法，但郑陆乡间对这桩事体向来分毫马虎不得，上梁仪式办得格外隆重。就本地旧俗而言，整套仪程大致包含贺喜、祭梁、升梁、抛梁几个核心环节。

贺　喜

新房屋架将成，要行上梁大典。家里早早选定黄道吉日，遍发喜帖知会诸亲百眷。母亲的娘家人最是看重这桩礼数，提前备妥了全套上梁贺担。我至

今记得分明，家中上梁那日，是 1994 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那日天刚蒙蒙亮，我就赶去学校，取回前几日请老师代写的上梁喜联。等我请假回家，宅前已是人声鼎沸，满屋喜气扑面而来。

大门口的八仙桌一字排开，母亲兄弟姊妹送来的 8 副贺担一一拆摆开来。16 只朱红漆圆盆列得齐整，盆里盛满面条、方糕、团子、面包，又配了苹果、甘蔗、橘子诸般鲜果，样样藏着吉祥彩头。每盆之上都覆一方剪花红纸，旁缀一枝青翠松枝，形制规整，喜气盎然。门墙之上，上梁喜联分贴左右，正中更悬着一幅用百张百元钞拼就的大红囍字，格外惹眼。一众亲友也携贺仪登门道喜，父母在旁迎来送往，眉眼间全是掩不住的笑意。

祭　梁

舅公是本地德高望重的老木匠，祭梁的主祭之职，自然非他莫属。祭梁伊始，瓦匠师傅先将披了红绸的正梁抬至堂屋正中。舅公随即在梁下正位设一张八仙桌，案上依次摆开猪头、鲜鱼、雄鸡三牲，佐以素果素菜各三式，恭祭瓦、木两行的祖师张班与鲁班。

苏南乡间素来有“张班造桥鲁班修”的俗谚，张班为瓦匠行的祖师，鲁班则是木匠行的宗匠。舅公与掌作瓦匠把酒倾入盏中，朗声念起祭梁吉言：

日吉辰良，天地开张。
吉星高照，正好祭梁。
宝梁一祭，大吉大昌。
生在深山万丈长，请汝来作正中梁。
鲁班仙师亲手做，平安顺喜富万年。
一杯清酒祭梁头，子子孙孙封王侯；
一杯清酒祭梁尾，子子孙孙中状元；
一杯清酒祭梁中，代代儿孙在朝中。

父母在案前跪地叩首，每闻一句吉言就应声答“依金口”，虔诚接福。三巡酒毕，再供上斋饭，整场祭梁仪程就正式礼成。

升　梁

祭梁礼毕，升梁大典正式开场。那根正梁本地俗称正桁，梁身正中贴朱红笺纸，上书“红日东升”四个烫金大字。舅公说，乡间也有写“吉星高照”的，全看主家讨的彩头。梁身正中悬一只红布囊，旁缀一株鲜活万年青。囊内盛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再掺米、麦、豆五谷，暗合早生贵子、五谷丰登、家业长青

的美好祈愿。

9时58分整，舅公朗声喝令“吉时已到！”，霎时间炮仗齐鸣，两挂五万响的黄鞭炮炸响连天，震得宅前屋后喜气翻腾。架上的师傅应声高喝“起梁！大吉大利”，话音未落就扯动粗绳发力起吊，底下帮工的乡邻也合力托举，正梁稳稳地向上升起。不消片刻，梁身两端就精准落进山墙顶端的梁槽，严丝合缝，安安稳稳。

紧接着行接包礼。舅公与瓦匠师傅将鲜果、糕食裹入红布，一边念着吉言，一边将布包掷入父母高高捧起的箩筐里——是为“接包”，取的是接住财运、纳福归家的好意头。

抛　梁

升梁落定，整场仪式最热闹的抛梁就开了场。屋架檐口边，早已摆好一溜塑料盆，盆里满满当当装着粽子、团子、馒头、糕饼，还有苹果、糖果各样吃食。第二通鞭炮响过，舅公按俗礼先朝南方位，捧起一把糕果撒下，口中朗声念着吉祥祝语。底下院中的大人小孩一拥而上，笑着闹着俯身哄抢。跟着是东、西、北三方，每撒一方，就是一阵欢呼哄抢。待四方礼数行毕，就不再拘着方位章法。一时间糕果、糖点、花生纷纷扬扬落下来，大门口场上的嬉闹声、争抢声一浪高过一浪，把整场仪式的气氛推到了顶点。没抢到的人仰着脖子朝上面喊：“往这儿也撒点呀！”梁上的师傅笑着应一声“来咯，接好”，随手一把糕果朝话音处抛去。

一场抛梁散罢，有人怀里揣了三两个馒头，有人兜中装满鲜果，有人衣袋里塞了满当当的糕饼花生。其间也难免有人擦破手背，或是踩滑摔了半身泥污，却没人在意这点小磕碰，个个脸上都带着笑。说到底，众人抢的不是吃食，是沾一份喜气，凑一场热闹——这份烟火气里的欢喜，本就千金不换。母亲常说，抢抛梁最有讲究的，是凑齐十二生肖属相的人，那才算得上十全十美、福泽周全。

我少时总对舅公念的那些吉言好奇，曾私下缠着他问起，他张口就念得朗朗上口：

抛梁抛到东，东方日出满堂红；
抛梁抛到西，麒麟送子挂双喜；
抛梁抛到南，子子孙孙中状元；
抛梁抛到北，囤囤白米年年满。

抛梁礼毕，正梁经日头晒过，谓之“晒梁”，取向阳纳福、家宅兴旺之意。随

后亲朋好友、邻里乡党，连同一众瓦木匠师傅一并入席，热热闹闹开了上梁喜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已是不惑之年。回想当年上梁的光景，尤其是抢抛梁的喧闹与热气，仿佛还在昨日。那年月的乡人本性淳朴，最爱凑这样的喜庆热闹，凡村上有上梁的，几乎户户都不肯落下；再加那时物资尚不丰裕，能抢到几块糕饼、几颗糖果，就是顶开心的收获。那时每逢村上有人家上梁，我总要提前叮嘱母亲，替我多抢些吃食。放学一路奔回家，第一件事便是翻查母亲的“战果”，见兜里袋里塞满了糕果糖点，一颗心便像浸了蜜似的甜。

如今乡间上梁的盛景已日渐稀见，可那份藏在糕果糖香里的喜气、裹在烟火人情里的乡情，始终是一代人心中最鲜活的乡土印记。

（文/周　星）

探访吴王墓山遗踪



雪堰访古现场

暮春时节的一个午后，阳光透过疏朗的枝叶，在太湖湾畔的山坡路上投下斑驳光影。笔者与郑国强、冯国平、唐立峰、张军等吴文化研究爱好者一行，在雪堰镇当地文史研究者王立新的导引下，踏上了吴地古遗存的探访之路。

1963 年出生的王立新是阳湖村人，几十年来倾心于地方文史研究，并精心绘制了以阖闾城为中心的吴地地形图，熟稔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与掌故传说。笔者一行循着他的足迹，穿行于弓堰桥、龙游河、武进港、七星墩、安墩、吴王山、孟春桥之间，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沉淀着吴地文明的厚重记忆，每一处遗存，都隐藏着跨越千年的故事细节。

弓堰桥：古堰锁流，岁月镌痕

行程伊始，我们便抵达弓堰桥。大桥静卧在宽阔的河道之上，因河道纵横交织形似弓形，此桥得名为弓堰桥，目前桥为新建。王立新指着桥身说，重建前的古桥初建年代已难以精准考证，但从建筑形制与工艺来看，当属明清时期江南水乡桥梁的典型代表，与雪堰镇“宋称薛堰、明成化十三年建薛堰桥，

后因合龙时天降大雪雅化为雪堰”的历史脉络一脉相承。

王立新展开自制的那幅地形图，指着上面标注的星星点点遗存，如数家珍。据《锡山景物略》记载：吴、许两长官萧梁时晋陵、无锡太湖水溢，二公修防不遗余力，赴水死焉。其以身赴义的地点就在今天的弓堰桥。王立新说，弓堰桥下的水道便是武进港。作为连接太湖与内河的重要水道，原先并无正式名称，武进港是新中国成立后拓宽的新水道，它见证了雪堰镇水运的繁荣。河面宽阔，水流平缓，如今虽不再承担繁忙的航运任务，但仍发挥着灌溉、排涝的作用。

抬头向西看，有三条小河横穿武进港，王立新遥指西边的第一道河流说：“那是龙游河。”龙游河历史悠久，古时便是当地重要的灌溉与航运水道，它贯穿于武进港，又从南拐向东，直入太湖。“龙游”之名，既寓意着河流如游龙般蜿蜒灵动，也暗含着吴地百姓对水的敬畏与祈愿。

我们站在桥身远眺，河水与远处的田野、村落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画卷。思绪随着河水奔向远方，遥想水乡先民依水而居的生活智慧，构思吴地匠人巧夺天工的建筑技艺。这条水脉始终流淌不息，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延续着吴地文明的脉络。而弓堰桥，犹如一位沉默的老者，静静伫立，见证着这片吴地的变迁与发展。

七星墩：星墩列阵，千年回响

接下来继续前行，七星墩映入眼帘。这片土墩群共有七座，错落分布在田野之间，如天上的北斗七星，故而得名。每座土墩高约数十米，顶部平坦，周围长满草木，呈现出自然质朴的风貌。王立新介绍，七星墩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与阖闾城的建设密切相关。

据史料记载，阖闾城为春秋时期吴王姬光所建，是扼守太湖北部的军事战略要地，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当年伍子胥奉吴王之命筑城，为加强城防，在周边修建了多处军事设施，阖闾城的主城有南北陆门，南门是连四方形的瓮城，北门在七星墩驻军守卫。有学者分析推测，七星墩可能是用于瞭望、屯兵的烽火台，也可能是祭祀天地祖先的祭坛，兼具军事与祭祀双重功能。

我们在其中一座土墩的断面处，发现明显的堆土层，这正是古代人工建造的佐证。王立新说，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七星墩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曾有村民在耕作时捡到过古代的陶器碎片、铜器残件。这些都印证了七星墩的悠久历史，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吴国的辉煌与传奇。

安墩：城内首墩，传说温情

走过七星墩，即来到安墩。这座土墩高达 5 米，被称为“阖闾城第一墩”，又传为“王子坟”，充满神秘色彩。王立新详细讲述了安墩的来历与传说：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姬光为巩固统治，在雪堰一带布防设垒，安墩便是当时的重要军事据点。墩上曾建有瞭望台，士兵在此监视敌情，守护阖闾城的安全。20 世纪 70 年代，村民平整土地时在安墩边上挖出大量红陶片。安墩旁边有一条安墩浜河，直通龙游河，安墩垒筑的土便来自安墩浜。

而“王子坟”的传说，则为这座军事土墩增添了温情色彩。相传当年吴王夫妇，为守护阖闾城，常年驻守在安墩之上，他们的子女也在此长大，协助父母戍守吴地。后来，王子不幸战死，被安葬在安墩之上，当地百姓便将安墩称为“王子坟”。此后，每逢清明时节，百姓都会来到安墩前祭拜，缅怀这位守护家园的王子。

我们登上安墩，墩顶宽阔，视野开阔，可俯瞰周边的田园风光与阖闾城遗址的全貌。风吹过耳畔，仿佛传来千年前的金戈铁马声，又似百姓祭拜时的低语声。安墩作为阖闾城的重要屏障，见证了吴国的兴衰荣辱，承载着百姓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其背后的传说，更是吴地百姓重情重义、热爱家园的生动体现。

吴王墓山：貔貅踞水，吴地灵秀

探访行程的核心，是探访吴王墓山。原来的吴王墓山形犹如貔貅，独具特色。山高达 30 余米，顶宽 40 余米，山下河道环绕，河底布满水井，因与吴王姬光相关而得名，是雪堰镇极具代表性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走近吴王墓山，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雄奇。山体虽不高，但形态独特，如一只貔貅盘踞在水畔，昂首向北，气势不凡。王立新说，原先此山四周环水，水面如镜，倒映着山体的轮廓，山水相映，构成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阳光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与山上的绿树相映成趣，尽显吴地山水的灵秀。前几年修建地下通道，才填没了水渠。

沿着山间小径攀登，沿途草木葱茏，鸟鸣虫吟，充满自然生机。王立新沿途为我们讲述吴王山的故事，相传吴王姬光曾在此山屯兵操练，山上曾建有兵营、点将台等设施，如今虽已不复存在，但仍能从山间的遗迹中窥见当年的规模。山脚下原有的水域，古时曾是吴王水军的操练场，士兵们在此练习水战，为吴国的军事发展奠定基础。

站在吴王墓山顶远眺，可将阖闾城遗址周边的轮廓尽收眼底，仿佛能看到当年吴王在此运筹帷幄，伍子胥、孙武等贤才辅佐其成就霸业的场景。吴王山不仅是一处自然景观，它又以独特的形态，承载着吴地人民对对吴国霸业的追忆，是吴地文明的重要象征。

孟春桥：春桥映景，文脉永续

最后，我们抵达孟春桥。这座桥横跨在河道之上，与春日的景致相得益彰。原桥身由青石板铺成，两侧设有石栏，栏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现今已重修。孟春桥周边，杨柳依依，桃花初绽，嫩绿的枝叶与盛开的桃花相映，尽显江南春日的柔美。桥下河水潺潺，孟春桥建于明代，“孟春”之名，寓意着初春时节，万物复苏，充满生机，与桥周边春日的景致完美契合，又与桥上的行人、周边的村落构成一幅宁静而美好的田园画卷。据王立新讲述，孟春桥曾是当地百姓往来的重要通道，也是文人墨客游览休憩的好去处，不少文人曾在此留下诗篇，赞美雪堰的春日风光与人文底蕴。

尾声：山藏古事，文脉恒昌

夕阳垂落，暖金余晖漫铺整个雪堰乡野，将弓堰古桥、粼粼河港、星墩土阜尽数晕染成温润绵长的古卷底色。当然，最动人的仍是那座吴王墓山，暮色里轮廓苍劲沉稳，草木覆坡、翠色含古，静静守望着脚下整片阖闾故地与绵延水脉。

半日踏访，从流水石桥到千年土墩，从烟波水脉到吴王遗山，我们脚下踏过的不止是寻常乡路，而是半部鲜活可触的吴地史册。那些藏在岸堤桥墩里的烟火，隐于七星土墩中的兵戈，留存在安墩传说里的温情，镌刻在吴地山水间的霸业风骨，还有这貔貅化山的千古佳话，跨越两千余年风尘，依旧那么清晰、依旧那么滚烫。

愿这些藏着千古传说的吴地遗珍，能被世代好好守护、细细铭记，江南古雅文脉能在岁月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

（文/肖　飞）

宋军将士血战虞桥

话说南宋德祐元年(1275),中原陆沉,汉祚飘摇。元军百万铁骑踏破江北山河,长驱南下,破建康、渡钱江,一路摧城拔寨、势如破竹,滚滚兵锋直逼江南腹地。彼时临安朝堂朽坏倾颓,百官惶惶自危,疆土寸寸沦丧,万里山河满目疮痍,唯余江南数座孤城,兀自苦撑残宋气运。

常州一地,扼平江咽喉、锁临安门户,是东南半壁最后的屏障。此地若破,元军铁骑便可长驱直入,大宋残存社稷再无险可守,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元军主帅伯颜亲率数万精锐重兵,铁桶合围常州,连营百里、旌旗锁野,堵死四方所有出入通道,将这座孤城死死困于重围之中。

城内绝境自此而生。朝夕之间,炊烟断绝,仓廪空空,军民无粮可食,唯以糠秕草屑果腹;伤病者累累沿街,无医无药,日日有人僵卧城头、殒命街巷。可满城军民从未生出半分降意,将士荷戈登陴,百姓荷锄相随,昼夜修补残破城垣,以朽木碎石为盾、以血肉身躯为墙,硬生生扛住元军一波又一波的狂猛攻势,死守孤城、翘首盼援。

内外隔绝、音信全无,绝境之下,常州太守姚訚、武进知县包圭遴选五名敢死之士突围。壮士们夜半束甲衔枚、敛声屏息,顺着百丈危墙缒城而下,潜行于元军连营壁垒的缝隙之间,闯过层层哨卡、避过巡夜铁骑,踏霜饮露、昼夜疾驰,奔赴平江府,向文天祥丞相递上一纸染血告急文书,字字泣血、句句惊心。

文天祥展读文书,见常州危局、百姓惨状,忠义肝胆骤然激荡,拍案长叹:“常州存,则江南存;常州亡,则大宋危!我辈世受宋恩、身居庙堂,临难若避,何以对苍生、何以对社稷!”家国沉亡之痛刻入肺腑,他不敢有片刻耽搁,火速传檄点兵,调四路劲旅星夜驰援常州。

麾下赣地猛将尹玉、麻士龙,皆是沙场宿将、勇冠三军,性情刚烈、赤胆忠心,深得将士信服。二人领三千赣籍子弟兵,皆是乡中勇武儿郎,久经战阵、悍不畏死,人人心怀报国赤诚;又命广军统领朱华为侧翼,淮军副将张全率淮军两千殿后接应。各路兵马合为一体,卷甲疾行、昼夜不歇,千里奔袭,奔赴常州

解围。



骨成墩

大军连日疾驰，终抵常州东郊虞桥。此地河网交错、港汊纵横，黄土高墩连绵起伏、错落林立，是通往常州城的唯一咽喉要道，更是击穿元军重围、连通孤城的生死隘口。援军当即择境内最高土墩修筑中军大营，囤积粮草军械、整肃兵甲阵仗，欲以此墩为壁垒，正面冲破元军外围防线，打通孤城生路。这座承载万千忠骨的土墩，便是后世闻名的骨成墩，岁月流转、乡音口传，日久讹为骨城墩。

彼时郊野之上，元军铁骑漫山遍野、铺陈百里。黑甲如墨、旌旗蔽空，凛冽朔风卷得战旗猎猎狂响，万马昂首嘶鸣，煞气冲霄、寒侵旷野。数万蒙古精兵皆为百战劲旅，弓马娴熟、甲刃精良，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沉锋静待大宋援军，只待一战踏平江南援兵。

先锋麻士龙一身玄铁重铠，腰悬凛冽环首大刀，手持寒锋长枪，立马阵前，双目凛凛如霜，扫视对面黑压压的元军大阵。他麾下三千赣军子弟，皆是同乡同族、手足同袍，人人束甲握刃、神色凝肃，眼底无半分惧色，唯存“救常州、卫江南、死社稷”的必死丹心。三军阵列严整、士气冲云，静静待战。

麻士龙按辔勒马，声震河谷、字字铿锵，对着麾下将士厉声喊话：“我等皆赣水儿女，食宋粟、沐宋恩，生为大宋子民！今日常州满城老幼身陷炼狱，国门危在旦夕。此战凶险，有死无生！愿随我赴死报国、斩虏卫疆者，并肩冲杀；若心有怯意、念及家眷，尽可回身归乡，我绝不追责！”

话音未落，三千将士齐声怒吼，声浪穿云裂石、震荡四野：“愿随将军死战！誓死报国，寸土不让，绝不后退！”军心烈烈、气贯长虹，满腔忠勇尽付山河。

麻士龙再无迟疑，策马扬鞭、长枪直指敌营，一马当先、破空冲杀。三千赣

军紧随其后，人人奋勇争先、舍生忘死，长刀劈风、长枪破阵，如猛虎下山、奔雷踏野，直直撞入元军阵中。元军连日围城顺遂，早已心生骄怠，全然未料宋军援军如此悍勇决绝，仓促应战之下阵脚大乱，人马翻倒、甲胄崩飞，一时间溃不成军。

刹那之间，战场之上刀光烁日、血溅荒丘，兵刃交击的铿锵脆响、将士厮杀的震天呐喊、战马悲鸣的凄厉嘶吼交织一处，响彻天地。赣军将士以一敌三、近身搏命，刀锋所至、胡虏披靡，连斩元兵无数，首轮鏖战便大破敌阵，援军人声鼎沸、军威大振。

沙场胜负，终究毁于人心。同赴驰援之役的淮军副将张全，生性怯懦畏死，素无忠义风骨。他勒兵安驻后方高坡，遥遥望见元军甲仗鲜明、兵马无边，前方沙场血肉横飞、厮杀惨烈，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两股战战。

左右亲兵跪地叩首、含泪急请："将军！麻将军孤军无援，麾下将士死伤渐增，危在旦夕！我军坐拥重兵，当即刻挥师驰援，岂可视同袍惨死、坐视家国沦陷！"

张全面色惨白、心神惶怯，连连摆手摇头，语声畏懦冰冷："元军铁骑冠绝天下，兵力十倍于我，贸然出战必全军覆没！保存实力方为求生之道，何苦白白葬送性命！"

自此，任凭前方同袍浴血鏖战、尸横遍野，张全坐拥兵马、冷眼旁观，始终按兵不动、寸步不发。一纸友军驰援的约定，终究化作空言，三千赤诚赣军，硬生生被推入孤军死战的绝境。

未几，元军主将收拢溃兵、重整阵伍，见麾下劲旅败于宋军偏师，勃然大怒。他披甲上马、厉声传令，调动数万铁骑倾巢而出，从四面八方合围虞桥战场。漫天铁蹄奔腾碾压，踏得尘土蔽日、天地昏沉，黑压压的兵潮如黑云压城，席卷而来，杀声震地、山河震颤。

麻士龙立马血战之中，环顾八方，不见半分援军踪影，唯见麾下将士带伤累累、浴血苦撑，却无一人转身逃窜。一名亲兵浑身浴血、身负重伤，拼死奔至马前，泣声急报："将军！张全隔岸观火、拒不驰援，我军已然彻底孤立无援！敌众我寡，大势已去，请将军速速突围，留存火种！"

麻士龙目眦欲裂、热血冲冠，征袍染尽鲜血，面容悲怆而决绝。他仰天长啸，声裂长风："大丈夫立身天地、食禄家国，自当以身许国、何惧生死！我等千里奔赴，本为救民卫国，今日战死于此，是我辈本分，不负大宋、不负苍生！传我将令：全军死战，寸土不让！以身殉国，在此一战！"

三千赣军将士闻声泣血，无人退缩、无人动摇，个个抱定必死之心，迎着

铺天盖地的铁骑兵潮，逆势冲锋、浴血死拼。旷野之上，两军死死绞缠、血肉相搏，刀起人头落、枪刺血花飞。宋军将士铠甲碎裂、遍体鳞伤，有人断臂仍紧握战刀、跪地劈杀，有人贯箭仍挺枪前冲、步步不退，有人身被数十重创、依旧屹立阵前、死战不倒。

血战自烈日当空绵延至日暮西沉，残阳泣血、天地含悲。整片原野被热血浸透，田间沟渠尽成赤色，层层叠叠的忠骨遗骸，散落于阡陌荒草之间，满目惨烈、触目惊心。

麻士龙纵横敌阵、身先士卒，长枪横扫千军、大刀劈破重围，孤身斩杀元兵百余人。流矢穿肩、利刃劈背，满身创口、血肉模糊，玄铁战甲早已破碎零落、被热血浸透。座下战马力竭倒地，他便弃马步战，徒手夺刃、近身搏杀，哪怕气力渐竭、身形摇摇欲坠，依旧死战不休。最终精血耗尽、轰然倒地，一腔忠魂殉于虞桥荒郊，以血肉践行了报国誓言。

官军孤军血战、尽数殉国的噩耗传遍乡野，虞桥百姓悲愤填膺、泪落衣襟。当地严氏五兄弟、周氏二子，皆是乡间赤诚义士，素怀忠义、心向家国。听闻官军为护江南、孤军赴死、血染疆场，他们不忍忠士独殉、故土沦陷，当即奔走乡邻、振臂高呼："官军千里赴援，为我江南百姓舍生赴死！我辈生为宋民，安能坐视忠魂喋血！愿执农具为刃，随我上阵，共拒胡虏！"

乡间青壮闻声云集，纷纷放下耕犁、抛下家事，手持锄头、柴刀、竹矛、木斧，无甲无胄、赤手赴戎。这群布衣百姓，未经战阵、不善搏杀，却凭着一腔滚烫忠义，迎着精锐铁骑、凛冽刀锋，悍然冲锋、舍身相抗。奈何敌我兵力悬殊、战力天差地别，布衣义士纵有满腔热血、一身傲骨，终究无力回天。严氏五昆仲、周氏二子与一众乡勇义勇，尽数力战殉难，清白乡魂、血染故土，埋骨这片厮杀热土。战事既定，乡中百姓听闻义士全员殉国，户户悲啼、人人垂泪，哀痛忠义之士殒命荒郊、忠魂无归。

虞桥防线，终因寡不敌众、无援可依，彻底陷落。残阳垂地、旷野萧瑟，尸横遍野、白骨露野，满目疮痍、山河含哀。尹玉听闻虞桥大败、麻士龙殉国、强忍彻骨悲愤，连夜收拢战场残兵，仅得数百疲敝伤卒，退守地势险峻的五牧隘口。他连夜修整壁垒、打磨残刃、整编残部，立誓死守要隘、再阻元军兵锋，伺机再战，不破重围、誓不罢休。

元军挟虞桥大胜之威，士气暴涨、锋芒更盛，数万精兵紧随而至，层层合围五牧阵地，昼夜轮番猛攻、不肯停歇。箭矢如雨漫天倾泻、飞石破空轰鸣坠地，元军兵潮一波叠一波、蜂拥冲杀，攻势凶悍凌厉，誓要全歼宋军残部、踏平五牧隘口。

尹玉身披残破染血战甲，面容刚毅如铁、目光凛冽如霜，立马阵前，厉声激励麾下将士，声沉语重、撼人心魄："麻将军与同袍、乡中义士，尸骨未寒、忠魂未远！我等退守五牧，身前是滔天胡虏，身后是常州孤城、是江南万里山河、是大宋万千苍生！退，则社稷倾覆、生灵涂炭；战，或可挽狂澜、存一线生机！我辈将士，唯有以死赴战，不负同袍、不负家国、不负忠义！"

麾下五百赣籍精锐死士，皆是层层遴选的血性健儿，人人铭记同袍殉国之痛、身怀守土报国之心，齐声嘶吼回应，声震山谷、气贯星河："誓死死守，绝不后退！以身殉国，无怨无悔！"

此时的五百壮士，历经连日血战，早已身心俱疲、伤痕累累。战甲破碎不堪、周身伤口渗血不止，粮草断绝、腹中空空，箭矢将尽、军械残破，却无一人心生怯意、无一人言及后撤。铁血信念根植骨血，忠义初心从未动摇。

五牧血战，昼夜不息、通宵鏖战。暗夜沉沉、杀声烈烈，从未断绝。尹玉勇武冠绝三军，孤身反复冲阵、纵横敌营，长刀起落、斩敌数十，铁骑难挡、利刃难侵，数次拼死撕开敌军合围，为残部将士博取一线生机。麾下将士人人浴血搏命，战刀砍至卷刃崩口，便持短兵近身肉搏；箭矢尽数射空，便以拳脚相抗；兵刃损毁断裂，便以血肉身躯死钉阵地、寸土不让。

漫漫长夜，血色浸染五牧寸土，天地昏暗、星月隐辉，山河悲寂、风云含恸。五百忠勇将士，以区区五百血肉之躯，硬抗数万元军铁骑，鏖战整夜、死守阵地、寸土未失。直至天光破晓、晨雾漫野，阵地之上尸骸枕藉、忠骨累累。五百壮士之中，仅四人身负重伤、拼死突围，奔赴后方传递战况，其余将士尽数殉国，无一人屈膝乞降、无一人苟且偷生，以铮铮铁骨、满腔热血，铸就大宋末年最悲壮的铁血风骨。

激战落幕，尹玉浑身重创、力竭脱力，终被元军生擒。元军主帅素来敬佩其骁勇善战、忠义刚烈，惜其绝世将才，不忍将其斩杀，亲自上前温言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兵权权势："大宋气数已尽、山河倾覆已定，残兵败将，焉能逆天改命？你智勇双全、勇武无双，若归顺大元，即刻拜将掌兵、富贵无双，何苦执念衰宋、白白殒命？"

尹玉身陷囹圄、遍体鳞伤，却傲骨铮铮、气节凛然，双目圆睁、厉声怒骂，声如洪钟、正气凛然："我尹玉生为大宋臣，死为大宋鬼！食宋禄、守宋土，忠义二字，刻入骨髓！尔等胡虏，窃我华夏山河、屠我苍生百姓，豺狼之行、禽兽之心，安敢以富贵污我忠魂！我头颅可断、血肉可竭，此生绝不屈身事虏！"

元军主帅百般劝诱、终不能动其丹心，知其心志如铁、宁死不屈，只得无奈下令行刑。尹玉昂首挺立、从容赴死，一腔赤胆忠魂，长存江南大地，千古流

芳、万古不朽。

虞桥、五牧两场惊天血战落幕，江南原野满目疮痍、苍凉萧瑟。荒草萋萋之间，白骨散落、残甲飘零，晚风穿野、呜咽悲鸣，细雨沾尘、泣悼忠魂，惨烈之状、催人断肠。当地百姓感念麻士龙、尹玉二公与数千将士舍身殉国、护佑江南的赤胆忠烈，心怀悲恸、感念于心。不忍忠骨曝于荒野、饱受风雨侵蚀、零落无依，乡间邻里户户出力、人人奔走，趁着战事短暂间隙，连夜奔赴两处血色沙场，小心翼翼捡拾散落的将士遗骨、残骸，尽数收拢合葬于当年援军屯驻的中军大营高墩之上。万千忠骨层层堆叠、聚葬一丘，垒成巍巍坟丘，乡人感念其忠，遂定名骨成堆，岁月流转，渐传为骨成墩。

彼时的常州孤城，依旧在绝境之中苦苦支撑。外援彻底断绝、仓廪彻底空空，城内军民饥寒交迫、伤病遍野，却始终众志成城、心如磐石、死战不降。百姓拆屋取木、凿墙取砖，日夜修补残破城墙；将士手持锈刀残矛、锄犁扁担，身无坚甲、衣不蔽体，以孱弱血肉之躯，死守危城半年之久，硬生生扛住元军无数次猛攻。

元军主帅伯颜初临常州城下，见城墙低矮残破、墙体斑驳破损，看似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不由得心生嗤笑、百般轻视。可他万万未曾料到，这座破败如纸的孤城，军民人人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数次击溃元军猛攻，令其损兵折将、寸步难行。反观彼时的平江苏州，城池高大巍峨、壁垒坚固、护城河宽阔幽深，军备充盈、粮草丰足，堪称固若金汤，可元军兵临城下，守军却未战先怯、望风归降、开门献城。

伯颜目睹两地天差地别的景象，感慨万千、长叹不止，对麾下诸将慨然叹道："苏州城铁铸，人乃纸糊；常州城纸糊，人乃铁骨！"自此，"纸城铁人"的千古美誉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宋末常州军民不屈抗争、铁血护国的千古佳话。

奈何虞桥、五牧援军血战殉身、全军覆没，大宋再无劲旅可援常州。孤城彻底孤立无援、绝境无依，粮草耗尽、兵卒凋零、伤病无医，苦苦坚守数月之后，终究无力回天、城池陷落。常州守城军民与虞桥、五牧援师，一守孤城、一战郊野，一内一外、同心赴义，以万千血肉之躯，硬抗绝世强敌，共同谱写了宋末江南最为悲壮苍凉、撼人心魄的忠义史诗。

岁月更迭、朝代兴替，百年风雨冲刷江南故土，山河几经变迁，却始终洗不尽埋骨于此的千古忠魂。清代之时，民间风俗忌讳"骨成"二字惨烈不祥，遂将古地名改作郭成墩。及至当代，文史学者考究古籍、溯源史迹，为铭记忠烈、还原史实、传承气节，恢复古名骨成墩。

如今此地已是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高墩之上丰碑巍峨、松柏苍翠，二忠

祠旧址静静伫立，岁岁守望这片埋忠藏义的热土。每至清明时节，四方游人、乡里百姓纷至沓来，焚香凭吊、躬身缅怀，追思麻士龙、尹玉二公千秋忠义，悼念殉国将士不灭忠魂。乡间老者代代口传千年往事，每逢风雨昏黑、夜色沉沉，伫立土墩之上，依稀可闻金戈铿锵、铁马嘶鸣，仿佛当年血战烈烈之音，穿越千年风雨、悠悠回荡不息。

这是不散的忠魂，耿耿烈烈、岁岁镇守江南故土，千秋不朽、万古流芳。

五绝·吊骨成墩忠魂：

热血酬家国，残躯护楚疆。
墩埋千古骨，风雨泣忠肠。

（文/肖　飞）

东 门 义 冢

至今，大凡讲到700多年前的宋元常州保卫战，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浩然亭、袈裟塔、骨成墩等古迹，这些都是专为纪念抗元英雄而建立。

前几天，本人查阅明代《永乐常州府志》时，发现有与宋元常州保卫战有关的“东门义冢”记载。几经核实，义冢原来竟在家门口不远处的一块区域。我家原住水门桥东堍的张巷弄内，巷南是东外直街即现在的延陵中路，弄北是武青路，过武青路不远，在东北方向就是和平新村即现在的五角场新村。小时候听父母亲说，原来这里是“乱葬坟”，但也有说是“尚书坟”的，那时年少无知，历史知识更是一片空白，后来也从未追问过。偶然听年长者回忆，原来这里是一大片由无名墓地、小池水塘及零星农田组合成的混杂区，地面坟冢杂乱，茅草丛生，十分荒凉，少有人迹。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运动，还曾在此处决过几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更加使人感到惊悚。我有一个同学的家更靠近这里，老母年已近百，思维还算清晰，她也说过去就是“乱葬坟”。今天通过查阅《永乐常州府志》，我们大致可以回望梳理这个历史谜团了。

元代的城垣，还是延续五代时期的罗城形制，东门称通吴门，就在今天的水门桥。东门义冢则位于水门桥东北武青路牌楼弄一带，全部面积应有200多亩，今天的五角场新村及月馨苑小区，基本就坐落于此，当时这里属于孝仁乡。明清时期的孝仁乡，东至丁堰丁塘河，南至大运河，西至关河，北部的边界就有些参差不齐，大致从今天的小东门桥、竹林、三里庵、高士桥到乌路桥，涵盖今天的红梅、青龙、丁堰街道的部分区域。因这里近城又临街，在交通位置上有一定的便利，可能也是当时决策者选址的有利条件。但为何民间里人对此一直会有“乱葬坟”和“尚书坟”两种说法呢？其实这是由两个不同年代、不同位置的墓区组合而成的混杂区域。原来两者之间应该是有一定距离并有各自边界的。但朝代更迭，年久岁湮，后来就有一些无名乱冢夹杂其间，慢慢地就导致两者边界模糊不清。所以几百年下来，即使当地里人也不知所以，于是就混为一谈。只有查阅地方史料，加上实地观感，才能去伪存真，分清原委。

先说“尚书坟”，位居片区的东北部。这里本有始建于唐显庆年间（656—661）的“显庆禅寺”，以年号命额，取地幽胜，殿宇轩仰，甲于毗陵。宋元祐三年（1088），时任朝廷右丞的胡宗愈请为家族墓地坟刹，朝廷赐额“感慈显庆禅寺”。杨龟山有“千年古刹传唐宋，一曲清溪绕凤凰”，称为“凤台福地”。“显庆禅寺”历经兴废，屡毁屡建，明代中期，遂重建大殿三楹，以后续建毗卢殿、观音殿、禅堂、斋堂，后遭“太平天国”兵燹，晚清再修，占地广达 20 余亩，殿宇高大，多进多楹，规制森严，成为本邑信众逢年过节必拜的“八大寺庙”之一。1995 年，还挖出原有一尊形状似轿的石经幢，近正方体，幢身周边镌刻《金刚经》全文，为明万历进士、邑人邹之麟所书，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现为常州市级文保单位，另行安放在天宁寺内。新中国成立后，1952 年由政府组织一批木业技工在“显庆禅寺”内创办常州市木业社，后改名为常州市木器一厂，专业生产各种木制家俱。据知情者回忆，其主殿因空间高大宽敞，一直作为油漆车间使用，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被拆除。在计划经济时期，常州市木器一厂口碑甚响，几乎没有人能离得开该厂的木制产品，同时该厂生产的“老头牌”牙签还曾出口创汇，一时风光无限。

胡氏是常州的望族，明代初期的“六朝元老”，礼部尚书胡濙及后人的坟墓亦安葬在此。胡濙龄及九十，是常州历史上高官中少有的长寿者。胡濙时为朝廷重臣，故墓制规格很高，墓前有神道往南一直通到大运河边，有石虎、石马、石翁仲等分立其旁，还有牌坊望柱等，甚为气派。历经岁月磨砺、风雨侵蚀，到上世纪 50 年尚存一些地面遗迹，故后来此地就取名牌楼弄。

“尚书坟”往西，就是里人口中的“乱葬坟”，实际上就是元代东门义冢，面积在百亩之间。由于二者距离相近，故后来有不少无名坟冢也安葬于此，二者边界逐步模糊以致最后消失，最终形成一大片空旷墓地。民国初期新筑武青公路，基本上是沿着墓区的南侧进行。由于荒凉偏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能远离就不靠近的。新中国成立后，大约从 1953 年起，常州市就在此平整土地，填没池塘，统一规划，逐步建造职工住宅，到 1959 年，和平新村已经基本形成，安排东门附近的大成二、三厂及裕民、民华、新毅等有一定规模纺织厂的职工数以百户，是本市继城南的工人新村以后又一大型民生实事工程，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当时报纸媒体曾有专门报道。初期的职工住宅基本上都为单层，一栋有六至八户，整齐排列，红砖平瓦，间有道路绿化，还有公共厕所。后来也开建三、四层的楼房。1965 年冬季，在现五角场南首新建南汽公司常州随车工具厂宿舍时，还在此处挖掘到胡濙儿子儿媳的石棺椁，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

和平新村是整体规划，统一建造的，总体呈长方形。但在周边还有不少闲地。为解决和平新村及周边农村的学生读书困难，1965 年就由东郊小学负责在武青路和牌楼弄相交的西北角上，新建牌楼弄小学。我们东郊小学的学生还都组织义务劳动，前来清理杂草，整理场地，绑扎竹篱等。

《永乐常州府志》中有洪武十年的《毗陵续志》，其中记载：义冢，在郡城东门外，元至元乙亥（1275），毗陵被兵死者众。至元辛巳岁（1281），判官郑云翼捐奉募力，收瘗柘骨累万，计为一冢。秦淮龚瑀作义冢记，赵文敏公隶书，石刻尚存。

记曰：大元以神武不杀一区宇，师旅所向，箪壶恐后。至元乙亥，江南平。独毗陵城守不下，死者众。辛巳（1281）承平，郑公云翼来为总管府判官，徵旧令以掩骼，布上泽于枯骨，捐奉募力，收拾瘗藏累万计，封于东门外。好义之民，实相斯役。且集道释，设斋法以薦殇亡。于今列世矣，国家隆平，伤痍远而生聚繁，霜降露濡，父兄子弟之念，犹隐然于邱墓间。其记识无闻，阙也。勒石表其事，庶有考于后云。至大三年（1310）十一月日记。

《泰定毗陵志》补曰：龚瑀子敬作记，有碑见留本寺，龚公今为兵部尚书。

上述“义冢记”将我们带入 700 多年前的腥风血雨年代。

南宋末期，元兵铁骑一路南下，元至元乙亥（1275），江南元军遣将围攻常州。常州地扼江南运河要隘，北有吕城为屏而临长江，南与无锡、平江（苏州）连成一线而控太湖。自元军进占建康（南京）后，常州成为宋军拱卫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的前沿城堡，故引来元军多次争夺。时为元右丞相的伯颜按元世祖忽必烈之意，先大举进攻建康，常州知州赵汝鉴闻讯后早已弃城而逃，巡抚戴之泰则开门投降，后被伯颜任为常州主管。但元军因兵员不敷使用，只遣少量兵卒与南宋降卒共守。

时为泉州司理，因故在宜兴的朝廷命官姚訚及陈炤以国是为重，组织义军收复了常州。宋廷即命姚訚为知州、陈炤为通判，包圭为武进知县，另遣浙西副都监王安节（即坚守钓鱼城抗击蒙哥汗进攻的将领王坚之子）与裨将张詹统兵守城，其后刘师勇也自平江来常州助守，城北吕城由殿前司将领张彦守御。

此外，当地乡绅胡应炎选乡民壮勇者 3000 人登城拒守，城内护国寺长老万安、莫谦之也组织了 500 名僧侣以抗击元军。元兵自镇江调集精锐攻城，常州城墙颇不完备，王安节等人“筑栅以守，相拒两月不下”。于是元军转攻吕城，守将张彦迎战失利，被执降元。元军从张彦口中尽知常州城中虚实，遂乘胜急攻。姚訚等人率军民昼夜拒战，元人让张彦至城下招降，刘师勇以大义斥责张彦，张彦惭愧而退。元人又遣范文虎来谕降，刘师勇伏弩射击，范文虎

狼狈逃走。但吕城失守后，常州形势更加孤立，姚訚遣人突围，屡向宋廷告急。十月，宋廷遣淮东将张全率2000人赴援，途经平江，时为南宋臣相的文天祥认为其兵马过于单弱，无济于事，便命部将尹玉、麻士龙、朱华等率广、赣勤王兵3000人偕行，但这些援军在武进陈墅虞桥一带被元军所截杀，常州变成一座真正的孤城。

十一月十六日，伯颜抵达常州，见常州被围攻数月而不克，大怒，亲至城下督战，多用火炮及弓弩日夜强攻。十八日，元兵杀入常州城内，知州姚訚战死，通判陈炤，知县包圭，将军王安节、胡应炎等人巷战不已，力尽阵亡。刘师勇率所部拔门栅突围而出，且战且退，逃入平江城。守城军民皆战死，无一投降。

常州市民在这次战争中也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全城存活者仅有7人，皆因“伏于桥坎获免”。南宋丞相文天祥坚持抗元，最后不幸被俘，在押解经过常州途中，写有《哀常州》诗，将常州军民的抗元战斗叙述得既完整又悲壮：

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
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
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
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

六年以后，局势基本安定，人气稍有恢复，时为常州判官的郑云翼才择地东门外设立义冢，并发动市民收拾散落在各处数以万计的残骸遗骨，集中义冢归葬，同时还举行法会超度，也是对亡灵的一种告慰。

时有元代任处州路总管的孟淳，字能静，也作《毗陵怀古》诗：

貔虎长驱铁瓮城，降幡无处不相迎，
千钧忽为鼷鼠发，一木难支大厦倾。
旷野天阴疑鬼哭，荒田岁久任人耕，
巴西猛将传忠节，不恨当年死乱兵。

其中“巴西猛将”就是指常州知州姚訚，他是四川潼川（今三台县）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曾任福建泉州司理等，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宁死不屈，最后因援绝食尽，城陷巷战，力竭纵火自焚而死，后赠龙图阁待制，谥“忠毅”。

通过方志中这段文字不多的“义冢记”，我们可以想像到700多年前宋元常州保卫战的惨烈，既为战争给芸芸众生带来的巨大祸灾而感到悲愤，同时也催生出“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确保国泰民安”的思考，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面前，我们应该永远保持一份清醒。

（文/赵德明）

故宫设计营造的总设计师是常州人蔡信

北京故宫(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之一。从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下旨营建北京紫禁城,到永乐十八年(1420)基本完工,先后历时 14 年。1961 年 3 月 4 日,北京故宫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 12 月,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如此宏大的紫禁城究竟由谁设计营造?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由苏州工匠蒯祥,也有人说设计建造者是泰州人陈圭或处州刘基。而学界有人以为故宫设计建造者当是蔡信,如知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燮平等人就这么认为[①]。

武进学者杨汉平同样认为,蒯祥仅是个木工,跟随父亲进京时才 18 岁,即使天赋异禀,也不太可能在这个年纪担任如此庞大工程的总设计师。再则,建造紫禁城光准备工作就做了 11 年,而图纸设计应前期就准备妥当了,蒯祥只负责按图施工。据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分析,故宫先期规划实施,首席营建师是蔡信。

如果蔡信果真是紫禁城设计建造者,那么蔡信又是何方人士?

常州地方旧志记蔡信为常州人,常熟地方志则记为常熟人。不过常熟记载紫禁城设计建造者为蔡思诚,而不是蔡信。清《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记曰:“永乐初,太宗欲创内府,于北京少师姚广孝荐常熟蔡思诚,驿召至便殿,问以制度奏以汉唐宋元,殿宇间架高下浅深之详。上大喜,遂听其所为,不复问:尝建殿之后檐长出二尺。上曰:后檐斜出矣。奏曰:此地北风劲,日久自直已,而又制四木座,数十年人莫测,其用将易簨。乃与其高弟蒯侍郎备言:其由后果用于一便室,四柱之下不差寸尺,其先见如此。”《光绪重修常昭合志》由丁祖荫[②]等编纂于清末民初, 志中详细记载蔡思诚于永乐初年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受命设计内府的事迹。其中说到蔡思诚向朝廷详细奏报了汉唐宋元殿宇的间架结构, 巧妙解决后殿后檐长出二尺以及四木座数十年的巧妙之

处，同时还写到蒯祥是其高弟（弟子）。以上事迹出自崇祯晚期所纂《明实录》，故此常熟学者认定常熟蔡思诚是北京紫禁城的设计建造者。

为宣传地方名人，弘扬大国工匠精神，常熟市政府官网为此介绍：蔡思诚（？—1473），明代著名工匠蒯祥之师，常熟人。永乐初，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先在北京建造皇宫。时任少师的姚广孝即推荐蔡思诚规划营建，成祖将其召到便殿，询问有关宫殿建造之制艺，蔡侃侃而谈，对汉唐宋元以来殿宇情况和变化详细论述。成祖大喜，便准姚所荐，遂主持建造明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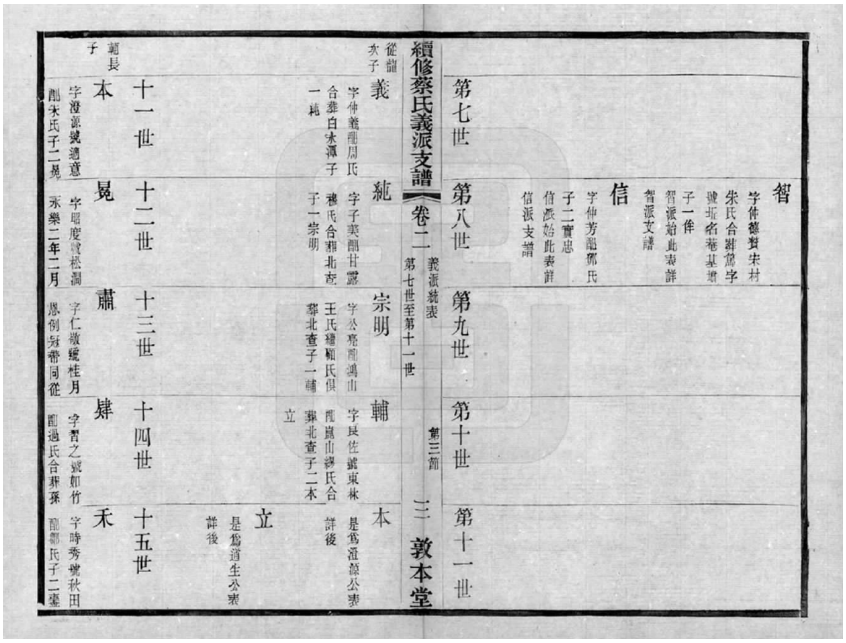
无独有偶，像许倬云、李燮平这样的老专家则认为，北京紫禁城的设计建造者当是蔡信，从常州地方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线索与答案。明万历初唐鹤徵《重修常州府志·方伎》卷十五有关于蔡信的记载：“蔡信，武进人，有巧思，少习工艺，授营缮所，正升工部主事。永乐间，朝廷营建北京，几天下绝艺，皆征至京，悉遵信绳墨。官工部侍郎。”清《康熙常州府志》《乾隆武进县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亦有记载，内容与唐鹤徵《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基本相同。

认定蔡信是常州人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常州《毗陵蔡氏宗谱》。常州家谱馆馆藏欧里蔡氏祇德堂民国丁亥（1947）《重修毗陵蔡氏宗谱》、民国敦本堂《续修蔡氏义派支谱》与民国壬戌《续修蔡氏信派支谱》。笔者在家谱馆朱炳国的配合下，了解到谱中基本信息。《重修毗陵蔡氏宗谱》序中记述：欧里祇德堂蔡氏自吴县洞庭迁至晋陵县欧里（今武进区横林镇欧阳里）。吴县洞庭蔡氏拜秘书公为南渡始迁祖，至蔡信已为第七世。秘书公传至五世为蔡从龙，从龙生有五子，分别是蔡仁、蔡义、蔡礼、蔡智、蔡信，蔡信为行五。除欧里祇德堂《重修毗陵蔡氏宗谱》外，蔡从龙各自支谱，笔者其中查到蔡氏义派支谱与蔡氏信派支谱。



《毗陵蔡氏宗谱》书影

民国敦本堂《续修蔡氏义派支谱》载：“从龙，字云碧，配东庄司马氏，葬白云潭父墓昭穴。子五：仁、义、礼、智、信。仁，字仲仁，配姚氏，子一治；义，义派本支表详后；礼，字仲，配周氏，子四震、顶五、顶七、顶八，礼派始此表，详礼派支谱；智，字仲


續修蔡氏義派支譜 卷二 義派統表 第七世至第十一世 第三節 三 敦本堂

第七世 第八世 第九世 第十世 第十一世

智 字仲慧號宋村 宋氏合葬筮字 塋坵名庵基坟 子一侔 智派始此表詳 智派支譜

信 字仲芳配鄧氏 子二實忠 信派始此表詳 信派支譜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十五世

本 字澄源號遵意 配宋氏子二晃 永樂二年二月 愚倒舒帶同從 長子

晃 字履度號松洞 字仁徵耀性月 字智之號仰竹 字時秀號秋田 配吳氏合葬 配鄧氏子二壑

義 字伸慧配周氏 合葬白水源子 一純 從舅 太子

純 字子實配甘露 穗氏合葬北彥 子一宗明

宗明 字公亮配鴻山 王氏繼配氏俱 葬北查子一輔

輔 字民佐號東林 配崑山譚氏合 葬北查子二本 立

本 是爲資生公裔 詳後

立 是爲資生公裔 詳後

《续修蔡氏义派支谱》书影

德，赘宋朱氏，合葬笃字号，坵名庵基坟，子一侔，智派始此表，详智派支谱；信，字仲芳，配邓氏，字二：实、忠，信始此表，详信派支谱。”

民国壬戌《续修蔡氏信派支谱》载：“信，字仲芳，配邓氏，子二：实、忠，（信）为本支祖。实，字子真，配吕氏，子一佐；志，字子诚，配司马氏，子二，世宁、世显。”蔡信子孙兴旺，其生有两子，六个孙儿。

通过查考祇德堂《毗陵蔡氏宗谱》、敦本堂《续修蔡氏义派支谱》、敦本堂《续修蔡氏信派支谱》，历史真相基本清晰，蔡从龙在元代时已迁至晋陵县（今武进东乡），五个儿子分别在常州繁衍生息，其中蔡信一支子孙最为兴旺。蔡从龙与蔡信的生活年代与《万历重修常州府志》记载蔡信相关信息基本一致，当然，也不排除重名、同时的历史巧合。令人遗憾的是，蔡从龙及子蔡仁、蔡义、蔡礼、蔡智、蔡信，蔡信均无生卒年，原因是同治、光绪前的《毗陵蔡氏宗谱》旧谱毁于太平天国战争兵燹，许多重要信息因此丢失，难以考证。

蔡信提出的紫禁城设计方案并不是他个人的凭空想象与创造，而学习借鉴宋代《营造法式》与明初南京故宫的规划设计，又集后人众人智慧才得以展开。《明成祖实录》记曰：“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由此得知北京紫禁城参照了南京明故宫的规制。而《营造法式》由北宋将作监李诫在江南工匠喻皓《木经》基础上奉敕编修，李诫于

绍圣四年(1097)重修,这一营造法式无疑也是紫禁城的参考蓝本。

唐鹤徵《万历重修常州府志》卷十五方伎一栏同时还记到三位常州人:一位是武进人徐暉,记曰:“徐暉,武进人,永乐间为吏,以木工官至尚书,与江阴徐晞同时。”一位是无锡人陆祥,记曰:“陆祥,字景祥,无锡人,宣德间营缮称旨,累官工部侍郎。”还有一位是江阴徐晞。徐晞(1372—1445),字孟晞,直隶常州府江阴人,永乐初年,以小吏入仕,参与营造北京紫禁城,升工部营缮司主事;宣德间升工部郎中;明英宗即位,升兵部右侍郎;正统元年(1436),授侍郎,历南京户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因功而晋兵部尚书。

明万历年焦竑编《国朝献征录》卷五十一对陆祥记载最为详细:“工部左侍郎陆祥,直隶无锡县人,初以石工,隶工部郑王之国选,授工副使。后又荐其一异技者,召工部营缮所丞,营作称旨祥也。老母病,或以闻命光禄,日给酒馔并钞五锭,以为养擢工部主事,进郎中,以至侍郎。祥巧思,尝用石方寸,许刻镂为方池以献,凡水中所有鱼龙荇藻之类,皆备曲尽其巧,然为人颇谨愿士夫不以其杂流而弃之。子:华,以译夷字簿馆阁,历官光禄寺署正。成化五年十二月卒。”《康熙无锡县志》云:“洪武初,朝廷鼎建宫殿,有陆贤、陆祥兄弟应诏入都,贤授营缮所丞,祥授郑府工副,食营缮郎俸。”

另外,故宫博物院官网分别载有蔡信、蒯祥、陆祥等人信息:

蔡信(生卒年不详),明武进(今江苏武进县)人。有巧思,少习工艺。授营缮所正,升工部主事。永乐间营建北京,凡天下绝艺皆征至京,都遵从蔡信绳墨,累官至工部侍郎。

蒯祥(1397—1481),苏州吴县人。本香山木工。初为营缮匠,后为营缮所丞。明正统十二年(1447)升为工部主事,景泰七年(1456 年)提为工部右侍郎。

陆祥(1374—1469),常州无锡人。明洪武朝应召入都,授郑府工副,食营缮郎俸。后升营缮所丞,擢工部主事以至工部左侍郎。历事五朝,至带衔太仆少卿,累加工部侍郎,赐予累钜万,末赐飞鱼服、犀带,官其子姪四人。享年 90 余卒,赐祭,归葬锡山。

陆祥出身在石匠世家,父、祖为元代“将作大匠”,与兄陆贤于永乐十五年(1417)应召参与北京宫殿营建。陆祥初任工副,以石雕技艺闻名,监造紫禁城太和殿龙墀丹陛、天安门华表及明陵石雕。景泰四年(1453)督建隆福寺获升太仆寺少卿,景泰七年(1456)擢工部侍郎,仍督工匠。曾用方寸石材雕刻方池,内置鱼龙荇藻,工艺精巧。天顺六年(1462),参与修建明宣宗景陵;次年,主持建造九孔马驹桥石桥,天顺八年(1464),完成明英宗裕陵石作。其母患病

时，明帝特赐光禄寺日供酒馔。成化五年（1469）十二月卒，享年 95 岁。子，陆华以译夷字入馆阁，官至光禄寺署正。

焦竑编《国朝献征录》与唐鹤徵纂《万历重修常州府志》早于常熟丁祖荫《重修常昭合志》300 多年，相距紫禁城营造仅隔 150 余年，时间越近可信度越高，蔡信身份且与永乐时期的“匠官”记录基本相符。为此可以推测，蔡信作为紫禁城的设计建造者的可信度最高。

2025 年 3 月 8 日，常熟有学者以“对云言”笔名发出推文《蔡思诚与蔡信——建筑史上的谜团与关联》，作者推测蔡信与蔡思诚很可能是同一人。其言：“过去，我从未对蔡思诚是常熟人这一点产生过怀疑，甚至为常熟能孕育出这样的人才而深感自豪。但深入挖掘历史资料后，我惊讶地发现，关于蔡思诚是常熟人的说法实际上仅有孤证支撑，这使得蔡思诚是否真的来自常熟，成为一个亟待解答的疑问……根据常州的旧志，如《重修常州府志》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蔡信的事迹记载。这些记载证实了蔡信的身份，并且与永乐时期的匠官记录相符。在多部方志中，蔡信作为常州的名人被详细记载，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以上推测基于明工部尚书雷礼编纂于万历初年雷礼的《国朝列卿纪》。《国朝列卿纪》提到的蔡信与《寅斋闻见》中提到的蔡思诚可能为同一人：“信”即“诚”也，“思诚为信”；“信”疑为蔡信大名，“思诚”或为蔡信取字，犹如唐顺之字“应德”，“顺之”为其大名。令人失望的是：《续修蔡氏信派支谱》记载蔡信，字仲芳，而非“思诚”，儿子蔡实、蔡忠的取名却与诚信有关，但未见有从父从事营造技艺的记载。

蔡信因“有巧思，少习工艺，授营缮所”，后来进京担任工部营缮司郎中，负责北京紫禁城的营建工作；蒯祥“初为营缮匠，后为营缮所丞”。《光绪重修常昭合志·人物志》说蒯祥为蔡思诚高足，蔡信年长蒯祥等人，又是他们的上司，由此分析，蔡信与蒯祥既有门派师承关系，又有从属关系，或者说还有辈分关系，这三种关系奠定了蔡信在紫禁城营建中的地位与作用。《万历常州府志》中有一关键词：“几天下绝艺，皆征至京，悉遵信绳墨。”朝廷召集天下能工巧匠进京，各作匠首诚服蔡信，均按照他要求的法度施工，为紫禁城顺利营建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

学界经常出现误将常州记为常熟的情况，如沙家浜在常熟，往往有人以为在常州；民国影后周璇有人记为常熟人，实际上周璇姓苏名璞，出生在常州小营前苏家。依据上述信息分析，蔡信究竟是常州（武进）人还是常熟人，事实基本清楚。笔者以为，在事实基本清晰的情况下，蔡信究竟是常熟人还是常

州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京紫禁城真正的设计营造者是谁！

蔡信、陆贤、徐晖、徐晞、陆祥、蒯祥等都是江南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笔者以为他们在北京故宫建设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陆贤、陆祥兄弟是石工出身，蔡信与蒯祥、徐晖为木工出身，土木结构的紫禁城基本上均有木工、石工主导，蔡信且与蒯祥、陆祥工序交集，身影不离，像紫禁城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纪工程不可能靠某一个人独立完成，而是包括处州刘基、苏州蒯祥、泰州陈圭、武进徐晖、江阴徐晞、无锡陆祥等人在内组成的团队，才有可能承担如此艰巨的重任，他们参与营建的时间或有先后，而作为实际参与者却是基本事实。在工部谋划下，蔡信在这一团队中成为一个核心人物。

永乐十八年（1420）十一月，紫禁城顺利建完工，京师由南京迁往北京，按照“凡宫殿工成，在工员役，均别久暂，叙赏有差”的惯例，朱棣对营建紫禁城有功人员进行论功行赏，蔡信得到朝廷充分肯定，故此委以重任。《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永乐十八年十二月）记道：“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升营缮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七员为所正，所丞杨青等六员为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文武官员及军民夫匠钞胡椒苏木各有差。”从《明太宗实录》记载中看出，蔡信是营建这一宏伟工程贡献最大、授官最高的功臣。或者说紫禁城营建的统领是开国元勋陈珪与工部尚书宋礼，督造官为工部侍郎吴中、太监阮安，蔡信是紫禁城规划与营建的总设计师。

注释：

①百度百科：菊斋《讲述难以忘怀的中式古典之美——蒯祥?蔡信?杨青?到底是谁造了故宫》。

②丁祖荫（1871—1930），字芝孙，号初我，初园居士，又号一行，江苏常熟人。少年就读江阴南菁书院，清光绪十五年（1889）庠生。中国近代知名官吏、学者、藏书家。

（文/薛焕炳）

沪上双“愚”：两位武进乡贤的心事与云烟

近代上海，是晚清变局的聚光之地。开埠之后，华洋杂处，商潮汹涌，新旧思想在这里碰撞交织。无数士人、实业家奔赴黄浦江畔，追逐功业，也安放精神寄托。在这批闯荡上海的人物当中，有两位同出自江苏武进的乡贤，命运轨迹在此交汇，又不约而同，钟情于一个“愚”字。一位是沪上名园愚园的最后园主刘树屏，一位是晚清实业巨擘盛宣怀，自号愚斋。一园一号，遥相呼应。同一个“愚”字，承载着两人不同的人生境遇与精神追求，园林楼台终成尘土，义庄旧业归于消散，只余下一段往事，藏进上海城市记忆的褶皱里。

刘树屏，字葆良，武进人，光绪朝进士，一身兼具传统士大夫的学养与近代新式教育的革新眼光。他不愿困于旧式官场，转而投身新式文教，在上海留下诸多印记。他编纂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图文并茂，风行全国，是近代影响极大的蒙学课本；也曾临危受命，接掌南洋公学，处理学潮风波，整顿学风，为近代新式教育培植人才。传统文人的底色，始终刻在他的身上，即便身处十里洋场，依旧向往传统文人的山水亭园之乐。



刘树屏像

晚清上海，张园、徐园、愚园并称海上三大名园。愚园坐落静安寺东北，即今南京西路常德路一带，最初由外商营建，几经易手，才归于刘树屏，他也成为这座名园的最后一任园主。愚园并非闭门私邸，而是对外开放的经营性园林。园内亭台错落，花木幽深，有池沼假山，蓄养珍禽，晚清时就开设夜花园，沪上名流、文人雅士、仕女市民，皆可入园游赏宴饮。园内日日高朋满座，笙歌宴集，

往来皆是海上名流，喧嚣热闹不绝。

明明要周旋宾客、打理园务，身处滚滚红尘的经营之中，刘树屏却没有厌弃“愚园”这个名字，反而安于这个“愚”字。古训云大智若愚，“愚”从来不是愚昧昏聩，而是守拙藏慧，不逞锋芒。园虽喧嚣，他却在园内辟出读书静处，题联“渐不为人识，时还读我书”。外界是十里洋场的机巧奔竞，园内是迎来送往的世俗应酬，而他内心，仍向往远离浮华、埋首书卷的本真。身处繁华而求守拙，于热闹之中守一份沉静，这便是刘树屏所理解的“愚”。只是时代无情，民国之后，时局动荡，园主无力维系偌大园林，亭台花木日渐凋敝，愚园最终被拆毁，楼台池沼荡然无存。昔日名园消失了，可工部局以园为名修筑的愚园路留存至今，梧桐绵延，把这一个“愚”字永久镌刻进上海的城市地名。

同为武进人的盛宣怀，则是完全另一番人生面貌。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他办轮船招商局，架设电报线路，修筑铁路，兴办新式学堂，周旋于官府与商场之间，长袖善舞，手握庞大实业，是时代浪潮当中举足轻重的实干家。世人眼中，他精于谋划，善于变通，洞悉世事机巧，可偏偏给自己取号为“愚斋”。



盛宣怀像

他的藏书楼名愚斋，文集定名《愚斋存稿》，家中藏书、信札档案，皆冠以愚斋之名。身后，更依照其遗愿设立赫赫有名的愚斋义庄。效仿范仲淹义庄的传统，分割部分家产归入义庄，用以赡养族人、救济贫苦、兴办宗族公益。半生殚精竭虑积累下偌大家业，临终却希望以义庄制度，安顿宗族，普惠乡邻。盛宣怀的“愚”，是历经宦海商海沉浮后的自省。看透世间万般算计，却依旧想要坚持一份不合时宜的道义，明知世事多变，制度难保永久，仍倾资去做，这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便是他的“愚”。

可惜世事终究过眼云烟。盛宣怀去世之后，家族内部纷争不断，时局又剧烈动荡，愚斋义庄维持数十年便宣告解体。庞大的藏书一部分散佚，一部分辗转各大图书馆保存下来。曾经寄托盛宣怀宗族理想的愚斋义庄，终究没能抵挡住时代洪流，化为历史往事。

值得一提的是，刘树屏与盛宣怀二人，既是同乡，亦有公务上的深度交集。当年南洋公学爆发学潮，校务陷入混乱，正是盛宣怀力邀刘树屏出任总理，主持整顿学校。一个是洋务实业的推动者，一个是新式教育的实践者，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共事相逢。同样来自武进，同样偏爱“愚”字，但是二者对“愚”的诠释，却各有千秋。

刘树屏之愚，是文人之愚。身在闹市名园，看尽宾客喧嚣，向往退守书斋，守拙避锋芒，是文人在繁华世间的精神自留地。园林作为载体，热闹是对外的经营，守愚是向内的修行。园子里的繁华是短暂的，读书守心才是本心。

盛宣怀之愚，是实干者之愚。一生纵横官商，深谙世间机变，却以愚斋自警，不恃机巧，寄望义庄永续宗族善举。他的“愚”，不是避世，而是入世的坚守，于功利遍地的时代，执着于传统士绅的道义理想。

二人一隐一显，一寄情园林，一寄托义庄。同样一个“愚”字，源头都是传统文化中大智若愚的精神内核，却因为人生道路不同，开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愚园早已片瓦不存，唯有愚园路的梧桐岁岁生长；愚斋义庄早已烟消云散，只有《愚斋存稿》、愚斋藏书静静躺在档案馆与图书馆，供后人翻阅。今天漫步愚园路，游人沉醉于老洋房与梧桐风情，大多不知道这条马路的由来，更不知道背后连着两位武进同乡，两段关于“愚”的人生。

大智若愚，古人寥寥四字，被两个异乡来沪的武进人，用园林、名号、义庄付诸实践。园林会倾颓，义庄会瓦解，功业财富终会消散，但那份不逐机巧、守心守义的士人心迹，穿越百年时光，依旧留存在上海的历史缝隙之中，等待后世来人细细回望品味。

（文/张　军）

包焕赓创建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横山桥支部



包焕赓像

今年是常武地区首个中共支部——中共横山桥支部成立100周年。回望来时路，当永远铭记革命先贤披荆斩棘、点燃常武大地红色火种的丰功伟绩。

1922年10月，上海大学成立，这里有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等常州籍共产党人和名师贤达任教，成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地和改造社会的实践地，吸引诸多进步学生求学，他们在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等的教诲下，思想进步很快。

1925年，来自常州武进横山桥镇包合兴南货铺老板的儿子包焕赓（1907—1947）考入上海大学。

包焕赓出生于小商人家庭，虽非巨商，亦稍有资产，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看到国家衰弱，民不聊生，从小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在中学读书期间，常常阅读进步书籍，帮助穷困同学。受革命思潮的熏陶，18岁的包焕赓只身一人赴上海大学求学，在同乡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上海革命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曾经规定“凡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我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包焕赓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在1925年秋，与家乡的同学朱瀛海（又名朱云峰）、王玉如等人加强联系，邮寄《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供他们传阅。1926年1月，包焕赓

趁寒假之机回乡，动员在无锡实业建设公司工作的朱瀛海辞职，会同严庄桥的王玉如成立私立横山高等小学校友会。随后，包焕赓发展朱瀛海、王玉如加入共产党。



横山桥党支部旧址

1926 年 2 月春节前后的某一天，位于横山桥镇东街 36 号的包合兴南货铺二进客厅里，一场重要的会议秘密召开。在庄严的气氛中，共产党员包焕赓、王玉如、朱瀛海控制住嗓门，唱响了“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这首气势磅礴的《国际歌》，庄重宣告中共横山桥支部成立，包焕赓担任首任书记。临街鞭炮齐鸣，喜气洋洋，人们只道包老板在为“新年纳余庆”而祝福，殊不知，常武地区第一面党旗正在横山桥冉冉升起。

自此，芳茂山麓点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常武大地燎原；三山港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在劳苦大众中生根、发芽。中共横山桥支部的建立，表明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4 年多后，常武地区首次有了党的基层组织，这是黑夜中航行的灯塔。

中共横山桥支部成立后，包焕赓接办私立横山高等小学，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点。中共横山桥支部以扫除文盲为平台，开展平民教育，通过创办冬学、夜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识字学文化的农民、店员、手工业者宣讲时势，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封建军阀与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劳苦大众的卑劣手法和罪恶。支部成员通过课堂教育以及社会接触，发现和培养入党对象。

1926 年，北伐革命期间，常州东北地区党的革命活动在以横山桥党支部为核心的统一领导下开展。

1927 年 3 月，支部吸收先进青年朱蘅根、朱锡根、包荣生加入共产党。

横山桥支部的建立为常武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共

横山桥支部建立半年后，中共常州临时（党、团）混合支部成立，10 月中共常州支部成立。一年后的 1927 年 1 月，中共常州独立支部成立，7 月，中共武进临时县委成立。此后，常武大地纷纷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烈火，仅 1927 年，横山桥支部的王玉如（时任中共武进西南区委书记）在武进西南地区就建立起 10 个中共支部，发展了 90 多名党员。

中共横山桥支部的建立在常武地区树起了一面党的旗帜。这是一面引领希望的血染的红旗。数十年峥嵘岁月，一代又一代横山人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下，为了主义和理想，前仆后继。许多革命先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鲜血将党旗染得更红。他们有的牺牲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有的坚持地下斗争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有的牺牲在敌强我弱时的奋力抗争中，有的牺牲在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夜，有的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横山桥地区有 46 位壮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英名永垂青史。还有许多人民英雄，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们都在鲜红的党旗上留下自己血染的风采。

遗憾的是：常武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横山桥支部的创始人包焕赓由于身体原因，积劳成疾，于 1947 年去世，未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文/包立本　张　军）

红色电波破长空

1940 年 12 月 30 日，延安西北 19 公里的王皮湾村，一孔简陋的土窑洞里，随着“铛……铛……铛……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 19 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的清脆呼号划破夜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束穿越战火硝烟的红色电波，不仅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新闻封锁，更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光荣诞生，为民族救亡图存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力量。

85 年后的今天，回望这段艰苦卓绝却热血沸腾的历史，依然能感受到那束电波中蕴含的信仰与希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大地陷入艰难的抗争局面。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严密的新闻封锁，企图隔绝中国共产党与



红色电波

全国人民的联系；日伪则通过广播大肆散播虚假言论，混淆视听、蛊惑民众。当时，我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常遭刁难破坏，新华社的文字报道需经无线发报、抄收、翻译等复杂流程，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受限。在这样的时代困境下，建立一座属于人民的广播电台，让党的抗日主张传遍全国，成为突破舆论封锁的迫切需求。1937 年，毛泽东就曾提出创办广播电台的构想，而这一构想的落地，离不开关键的技术与人员支撑。

1939 年冬，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病期间，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商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并于 1940 年 3 月回国时，将共产国际援助的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拆卸打包，经新疆、兰州、西安辗转运抵延安。以此为基础，中共中央成立了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担任成员，全面负责电台筹建工作。筹建过程充满艰辛，王诤将军带领军委三局技术人员面对器材匮乏、电力不足等诸多难题，因地制宜开展攻关：没有足够的动力设备，就将旧汽车引擎改装带动发电机发电，甚至用两个汽油桶相连制成大木炭炉发动汽车头保障供电；没有标准天线，就把三根树干捆成“Y”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机房和播音室则是在山坡上开凿的土窑洞，条件极为简陋。

人员组建同样凝聚着热血与奉献。首批播音员从延安女子大学选拔而来，18 岁的徐瑞璋（播音名麦风）和 17 岁的姚雯成为核心力量。从未接触过播音工作的她们，以极高的政治责任感投入训练，每天对着报纸反复练习吐字发音，纠正方言口音，遇到生僻字就查阅字典，字典几乎被翻烂。为保障播音质量，她们和同事们将边区生产的粗羊毛毯子挂在窑洞墙壁和门口隔音，用筷子敲击磁碗代替报时器，在炎热天气里则在窑洞墙壁凿方槽填冰块降温。编辑部设在 19 公里外的清凉山，编辑们围着四方炕桌、就着小油灯连夜编稿，机要通讯员需顶着严寒酷暑，甚至在汛期泅水过河，将稿件及时送到王皮湾播音室。正是这样一群怀揣理想的革命者，用双手在窑洞里搭建起了人民广播的最初阵地。

1940 年 12 月 30 日晚 7 时，首次播音正式开始。开播曲《国际歌》的激昂旋律过后，徐瑞璋和姚雯轮流播报了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部分章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详细播报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日军的辉煌战果，向全国人民真实展现了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大声疾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当时电台使用频率为 700 千赫，发射功率约 300 瓦，覆盖范围有限，但这束珍贵的电波一经发出，就通过进步人士的转播和记录传播，迅速产生了广泛影响。试播期间，报务人员汤翰璋前往不同地点测试收听效果，当“我在裴庄，声音很好”“我已

到杨家岭附近！声音清楚得很！”的消息传回时，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杨家岭正是中共中央机关驻地，这意味着党中央的声音成功传递到了核心区域。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作为突破封锁的舆论阵地，它的红色电波穿透了层层阻隔，让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的听众第一次清晰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昆明西南联大的进步青年在信中写道：“听了你们的声音，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不少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循着电波的方向奔向延安参加革命；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更是受广播影响，驾机起义投向光明。在皖南事变等关键历史节点，电台及时播出中共中央的命令和谈话，有力揭露了国民党亲日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成为“与敌伪展开空中宣传战”的重要武器。

作为人民广播事业的起点，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战火中不断成长。1943年春，因发射机电子管烧坏，电台被迫暂停播音，1945年8月中旬恢复播出，第一时间播报了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对日全面大反攻进军命令。解放战争时期，电台先后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等，跟随党中央辗转迁徙，始终坚守宣传阵地。1949年3月，电台迁入北平，同年12月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启了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崭新篇章。如今，从延安窑洞中的简陋电台发展而来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已成为国际上规模最大、业态最多的综合性传媒航母，继续传承着红色电波的使命与担当。

史实考证显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始于1940年春，王诤带领技术人员历经数月反复调试，成功解决了发射功率、天线架设、电波传播等关键技术问题，为12月30日的顺利开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最初的发射功率有限，但这束红色电波承载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传递的是民族复兴的希望火种。86年来，电波的载体不断更新，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大，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孕育的“艰苦奋斗、求真务实、坚守初心、服务人民”的精神内核，始终是中国广电事业发展的精神密码。

回望1940年那个寒冷的冬夜，王皮湾村土窑洞里的灯光与电波，照亮了民族救亡的道路。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播音，不仅是缅怀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更是要传承王诤将军等老一辈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让新时代的电波继续传递真理、凝聚人心，书写中国广电事业的新篇章。

（文/智　化）

孟秋江故居轶事

中国共产党新闻活动家孟秋江，原名孟可权，1910 年 4 月 28 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出生于今常州青山路大圩沟 43 号。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房屋翻建时，发现墙脚下一块砖上刻有“康熙廿四年孟夏吉旦建”，即康熙廿四年四月初一。可见，这座老宅子距今已经 300 多年历史了。

这里是我国著名园林“止园”的旧址。

明人计成的《园冶》中描述“乔木参差山腰，蟠根嵌石，宛若画意；依水而上，构亭台错落池面，篆壑飞廊，想出意外”。近年，高居翰先生与国内两位青年学者合著的《不朽的林泉》，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烟波浩渺的园林古画（一套图册首图）。史料记载，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吴亮辞官回乡，在家乡城北的青山门外建造了这座止园，他的后辈托苏州名家张宏绘制了一套《止园图》册。

孟秋江家位于止园的西北边（《止园》第 20 幅），推开南面的窗户，满眼望去是浩渺“止园”湖池。

孟家自办私塾，学堂设在家里，世代教书为主，兼有少量农田出租。代代秉承着儒家的传统道德习俗，勤奋、进取、节俭。岁岁能及，事事当毕。循规蹈矩，长幼有序。



孟秋江故居

一、形状

孟宅整体为“丁”字形建筑。

二、外围

房屋分为东西两门。南面卧室，推开窗户是“止园”。

东边作为自家生活用房，家人进出皆走东边门。门外有三大畦菜地，家人拾掇着四季蔬菜（后被人造了房子）。

学堂大门朝西，门外有一片大的操场，操场的北边有一口水井，学生课间有较好的活动场所，饮用水也方便。学生上、下学进出方便。（这口水井特殊时期被学校教导储主任要去，围进了学校，估计现在还在）。

西大门筑有像样的门楣，门两边墙对称如“左右肩膀”。大门由两扇厚厚的木门加上一根圆木门栓组合，方正实沉的木门槛稳稳当当的卧在大青石板上，往下铺着一片不规则的石板。门外沿墙种着蝴蝶花、凤仙花等。

西大门右侧朝南辟出一大块菜地，家人们种四季菜蔬。这里建有 3 架屋的柴草房。

西边左侧辟出一小块地，一孤独老男人（唐兆金）亲戚上门说情，让其建了 3 架住屋。

三、屋内分布

南面并立两间 7 架卧室。

东面是餐厅和灶屋 5 架。

西大门，进去是一个明堂，两边搭有花台，长年种的是玫瑰花，攀墙长着的是蔷薇花。再往里走就是一个书房（大教室）。

西边的大开间（2 个 5 架）就是学堂，木柱、木梁、木椽子，铺地是方方正正的箩底砖。

四、房屋被搭肩（省建一面墙）的情况说明

战乱之后，孟家还有一点钱，闻常州“止园”风水宝地，来到这里安家办学。听我奶奶说：那时候，南面推开窗户，一片碧波湖水，没有人家。东面也只有一、二户人家。后来族人陆续来到，与我家祖上哀叹苦境，我家祖上看族人生活拮据，发慈悲之心就让其搭肩建屋。

2026 年 7 月，孟秋江故居被公布为常州市地名文化遗产。

（文/孟建英）

常州魏碑书家周子青

在20世纪后期的常州，若有人要开一爿店铺、挂一块招牌，多半会想到同一个名字——周子青。彼时常州街衢，白底红字的搪瓷路牌、蓝底白字的巷弄名牌，以及市廛之间煌煌奕奕的店招，十之八九出自他的手笔。文史掌故家郑逸梅尝谓，常州市廛间的招牌颇多出于他老人家之手，北方写市招的华世奎有口皆碑，南方的周子青足以与之先后媲美。

一位久居巷陌的老书家，何以能在市招这一最“不雅”的场域中，与北方题额大家华世奎并称？答案不在书斋，而在街市——在他把碑学笔法写入城市日常空间的60余年。



周子青像

一、由唐入魏

一个书家的起点，往往不是他后来最为人知的那一笔，而是他最早学会如何把字站稳的方式。周子青一生写碑，笔下却始终藏着一副唐人的骨架。

周子青（1908—1988），字洛，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08年9月1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八月二十日）生于常州化龙巷黄石匠弄。巷以手艺行当命名，其家亦非书香门第。10岁进私塾启蒙，12岁入武进职业学校读书，本该按部就班地读下去。

13岁那年，其父周灿锦贫病见背，家道中落。少年人辍了学，远赴靖江庆

余典当学徒。柜台高过头顶，当票填满了白日，夜晚则属于毛笔。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靖江有位书法家方云举，见这个当铺学徒临帖用功，颇为青眼，遂加指点。周子青 14 岁起随方学书，从欧阳询《皇甫诞碑》入手。

这个入门次序，值得治书史者留意。自阮元倡南北书派之论、包世臣著《艺舟双楫》，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标举“尊魏卑唐”，碑学之风大盛，学书者多径取北碑，以唐楷为不足观。周子青却由唐楷立基，而后转攻魏碑，兼涉籀文、小篆、汉隶及晋唐以来各家。这条路径，与其说是取巧，不如说是时代风会与个人际遇的叠加——一个 13 岁失怙、14 岁拜师的学徒，遇上的启蒙者是承传有旧的式书家，而非趋新的碑学鼓吹者。而正是这份唐人法度，使其日后纵笔为大字榜书而不失检束，字字有来历，不落一般写碑者易犯的粗犷习气。

这一点有其子周源的实物鉴定为证。收藏家包立本藏有一把周子青 1941 年（辛巳夏）所作成扇，经周源鉴定，系目前所见周子青最早的书法作品。该扇 15 档，18×50 厘米，熟宣纸质，一面为周子青抄录杜甫《晚际遇雨》诗，书体为魏碑，落款“周子青醉笔”，赠“子祥先生”；另一面为清末民初画家梅禅所画梅花。据包立本考订，“子祥先生”即民国浅绛彩名家徐子祥。此扇原为本地民国大收藏家裴先生旧藏。周源指出：“这幅现存最早的作品明显受到方云举先生的影响，字体是魏碑，但和后期作品相比，字要瘦一些。”一个“瘦”字，既划出了与后期苍拙气象的界线，也留下了寻访方云举书风的唯一比对基准——方云举的生卒与作品至今仍待查考，但这一“瘦”字，恰为比对周子青风格演变留下了坐标。至 1949 年前，周子青已名列常武地区知名书家之一。1948 年（戊子）他与海上画家袁松年合作的《秋水野航》成扇，款署“瑞春先生正字，周子青”，钤“周子青”印——一柄成扇，足以说明彼时其字已入书画流通之列，与外地名家分庭抗礼。

二、双笔立身

有的人用一支笔谋生，另一支笔做梦。周子青的两支笔却做同一件事：在尘世里把字写端正，在端正中把日子过下去。

至 1949 年前其书名已立；而在这之前，他早已凭借另一支“笔”——商笔——在世间立足。26 岁起，周子青弃学经商。初在聚泰木行学徒，后自营及合伙开设信和银楼、勤丰五洋百货店、永泰和钱庄、第三信用合作社、庆和银楼、振丰木行，历任协理、经理、总经理。旧居在原西大街，是一幢体量不小的三层洋楼。

于是他一生始终有两支笔：一支记账，一支临池。商海浮沉 30 年，砚田未

尝一日荒废。商人与书家的双重身份，为其日后书写市招埋下伏笔——他比任何书斋中人更懂得，一块招牌对一间铺面意味着什么。

1956 年，他进入常州砖瓦厂工作，成了一名普通职工，至 1981 年 12 月退休。“文革”十年，是他自称“内心最凄暗的一霎”。多年珍藏的数百轴历代名家书画、视若性命的原拓字帖，被洗劫一空。他眼见毛笔沦为涂抹无辜者的“四大”武器，书法以“封资修”之名受挞伐，忧愤无以名状。

然而信念犹存。在厂里做杂役的日子，他仍用笔为工友服务。工人们笑传一句话——“老周在用两支笔劳动。”扫帚是劳动改造的工具，毛笔是安身立命的寄托。两支笔并置，道尽一位老书家在荒唐年代的倔强。

三、由体入神

碑刻是石头的语言，毛笔是手腕的语言。周子青穷其一生，不过是在这两种语言之间做一场漫长的翻译——而所谓“神”，就是翻译抵达了不需要字典的那一刻。

60 余年中，周子青寒暑不辍，取真、草、隶、篆之神，熔铸于魏，形成苍古沉雄、质朴险峻、笔力蕴蓄的魏碑风格。郑逸梅在《珍闻与雅玩》中专文论其书：“他的书法以魏碑见长，兼擅隶、篆及行草，其书苍古沉雄，质朴险峻，笔力蕴蓄，得众人喜爱。”又记其临习之勤：“其临习魏碑，不临则已，一临就是数百通，深入领会，既得其体，复得其神，体而范之，神而化之。点划之中遒劲逸秀，令人挹之不尽。”郑氏又引前贤语状其笔力气韵，谓“字势雄拔，如蛟螭虎豹，盘拏先后，精神为之飞动”。

“数百通”三字，是理解周子青的关键。他之所以能在市招这种最不“雅”的场域中维持笔法强度，凭的正是这份笨功夫——不是重复样式，而是由“体”入“神”的反复锤炼。

其书艺亦屡经媒体揄扬，《书法》杂志、《书法报》以及《光明日报》《天津日报》《中国纺织报》《常州日报》等，均曾作专题介绍。

据其弟子章晓郁对传世作品的归纳，其书风约略可分三期：早期得《龙门二十品·始平公造像记》的方笔斩截，笔画折处重顿方勒，结体扁方紧密，点画厚重饱满；中期糅合龙门四品（孙秋生、始平公、杨大眼、魏灵藏造像），用笔方峻，点画顾盼，游刃随心，结体中敛而外张，由俊秀饱满转向苍拙大气；晚期则在“龙门”基础上加入“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笔意，以隶势入魏，落笔斩截而方中见圆，凝重中见灵动之势，论者以为“人书俱老，已入化境”。

其落款行书亦以方笔为主，与碑体一脉贯通。早年喜署“子青周洛”“书于

映碧楼”——“映碧楼”是其书斋名；另有一枚闲章曰“两晋两汉南北朝文字”，径直标出了取法疆域。晚年复临“二王”，日课《圣教序》，兼习草书；兴致所至，偶作墨竹墨梅，谓书画同源。

四、市招煌煌

一块招牌挂在店门上，日日受千万人检视，它比任何宣纸上的字都更接近书法的本来面目：书法从来不是给一个人看的，它是给一条街、一座城、一个时代看的。

真正让周子青与这座城市长在一起的，是市招。

常州写市招，先有唐驼，后为周子青。唐驼（1871—1938）以工整秀劲的“唐体”为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题写市招，与沈尹默、马公愚、天台山人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周子青接过的，正是这一脉“实用文字—商业传播—书法风格”的地方传统。二人是否直接授受，尚无实证，此处仅言其先后与地脉。

1978 年之后，常州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业明星城市，百业俱兴，招牌需求随之骤增。周子青的魏碑“笔力沉雄，遒劲逸秀”，且擅榜书，写招牌字不用放大，“盈尺丈字，游刃有余”；更兼有求必应，不计报酬。于是郑逸梅所谓“常州廛间的招牌多出于他老人家之手”，并非虚誉。

三组数字，须分述而不可混同：1979 年 8 月，周子青应常州市公安局之请，书写全市街道里弄名牌；1983 年至去世前，写市招 500 余幅；此外义务书赠各界人士的条幅、扇面 1000 余件。

其中用斗笔乃至棉团、捆帚写就的“蔚为大观”者，有“常州钢材市场”“常州市百货商店城中批发部”“永红商场”“武进工业物资公司”“绿杨饭店”“常州医药商场”“德泰恒菜馆”“连云港市贸易中心”，以及宜兴太华商场、无锡太湖商场等。值得注意的是，宜兴、无锡、连云港三地赫然在列——他的字，早已越出常州城厢。

他还应邀为瞿秋白、恽代英、恽南田、张太雷、黄仲则诸纪念馆，舣舟公园、红梅公园月季园、文笔塔、新坊桥（《重修新坊桥记》碑文即由周子青手书），及星聚桥、浣纱桥、雪桥、香桥等处，书赠作品或书写碑记、桥名、亭名、楹联，远及江西抱石公园、四川巴中县灵山碑林、安徽太极洞等。

这些市招与题字，看似只是书家余事，实则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书法与城市空间的关系。1978 年之后的常州，工厂林立、商厦初起，城市面貌急剧变化，亟需一套可辨识、有气派的公共字体，来为新生的城市空间建立视觉秩序。周子青的魏碑——方峻、庄重、不媚俗——恰好契合了那个时代对“正牌、庄重”

的公共审美需求。他的字不是纸上的“作品”,而是嵌入城市肌理的“基础设施”:路牌是市民寻路的依据,店招是商铺信誉的象征,桥名是地方记忆的锚点。一个人写了 60 年字,最后把自己写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里的视觉坐标。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由一人之手笔塑造一城之视觉底色的现象,在近现代中国城市中并不多见。常州市民未必人人知道“周子青”三个字怎么写,却日日行走在他写就的街巷里;未必临过他的碑帖,却直觉其字“正牌、庄重”。他的字,就这样从宣纸走进了市井,从个人书写变成了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正是一座城市最深层的认同根基。

从学术上看,这一现象的意义远超书法本身。近年周源、何嫄所编《周子青市招与招幌民俗》,正是将改革开放初期一度时兴的魏碑市招作为“招幌民俗”的个案加以考察,收录其字招、路牌照片 300 余幅,获 2018 年度常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市招本是商业招幌,却因一地书家的手笔而凝结为共同的视觉记忆——一个人的书法,就这样成为一座城市经济起飞的物证。

五、映碧传薪

一个人写 60 年的字,最后把自己写成了一座城市的门面。然而门面终有更替之日——纸上的字可藏于箧笥,墙上的字却经风沥雨,而消逝本身,也是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他“有感于我国的书法,为世界上独有的艺术,不能不发扬,不能不普遍”,而发扬与普遍,应当从培养新一代做起,从基础做起。

晚年的周子青节衣缩食、争分夺秒。他将全部精力与财力投诸书法讲授、个别面授与字帖出版。他在市书协、书法研究会的讲习班长期授课,又赴江苏化工学院、扬州师范学院讲学,到戚机厂、东方印染厂、市一中、少年宫、文化宫作书法表演、讲座与评述,每日花大量时间为学生批改作业。所著《小学生书法训练》《中小学生字帖》《魏书百家姓》及《我是怎样写魏碑的》,有的已出版,有的至其身后方得面世。

课徒之法,最见其诚。彼时宣纸与字帖均不易得,他便先自己临写一通,学生再照他的字迹临写——如此虽看不到原碑,却可借他的功力避开石花剥蚀对用笔的误读。他临写的《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凡碑上残缺之处,均以红笔点出,一一标明与原碑之别。学生习作,无论多少,一字一字讲,一点一点批,分文不取。

其门下俊彦,首推凌文铨与高尊,二人皆由周子青精心指导十多年,堪称入室弟子。凌文铨原为厂外工人,因慕周子青书名,到厂拜师,十余年间风雨无

阻，于魏碑用功尤深，兼擅小楷。学成后入伍，因字迹精良——特别是小楷——被安排到中央军事博物馆书写卡片等，后调至南京政治学院任教书法，成为专职教授，授少将军衔。高尊则是周子青所在厂里的工人，朝夕相处，得其亲授，学有所成后赴北京大学深造，入艺术学院书画研究班，亦为周子青门下卓然有成者。次者章晓郁、谢佩、刘景祥、徐秋明、毛宏耀、宗建庆等，皆各有建树。而受其启蒙者更众：洪全庆、陶毅中、俞伟中、甘霖、张路、包立本、何盘荣、吴忠林、戴忠良等，或于少年时得其亲授，或于书法道路上得其指点，虽成就各异，而根源皆出于映碧楼。其中朱青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原为镇江中学学生，其父母见他于书画有天赋和兴趣，遂带至常州，拜房虎卿、周子青为师，学习书画，1970 年起跟随周子青临习书画，真草隶篆行魏碑帖均临百通以上，后进入北京大学深造，终成国际知名艺术史学者。

80 岁那年，他听说书坛有人评他不过是“写字匠”。其实他早有应答。在常州市文联《会员通讯》第六期上，他写道：“书法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有所创造，发挥各家所长，形成纷纭局面，以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陶冶性灵，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又说，要用自己的书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这并非为自己开脱，而是一位毕生与市招为伴的书家，对书法本质最朴素的认知。他从不认为写市招便低人一等——招牌挂在店门，日日受千万人检视，恰是最严苛的考场。而他确也在求变：据一位曾亲见其挥毫者的回忆，他晚年所书“柴拖集团”四字，在魏碑基础上大加变形，结体松散，不守比例，反倒生出真率之趣，识者以为至此方见其率性的一面。

其书其德，不仅为常州市民所重，亦为高层所赏。20 世纪 90 年代，中央部委办领导支持常州改革开放，在常州开发区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国家科委负责人李绪鄂在讲话中特别提到，常州有三大特色，其中周子青先生的魏碑了不起，会后专门让开发区办公室为他洗印了数十张周子青作品照片带回。1995 年 10 月，李绪鄂再至常州，约周源同看《周子青作品集》。又，邓楠到常州，在常州大酒店见到周子青作品，甚为欣赏，提出希望得到一幅。时任市领导洪文鑫转告周源，周源将家中珍藏的一幅作品相赠。此事虽小，却可见周子青书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常州对外交往中的文化名片作用。

他的笔还伸出国门。他多次应邀为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荷兰等国际友人书写作品，求取者甚众。1986 年响应“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捐出书法力作六幅，江苏儿童福利基金会的募捐亦应征捐赠。台湾同胞向其索书之事，1987 年 11 月间曾由《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爱国报》等相继报道。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写过一首自勉诗:“夕阳无限好,壮志何时已;老骥虽伏枥,犹思自奋蹄。”

1988 年 11 月 2 日(农历戊辰年九月廿三日)凌晨,周子青因突发心肌梗死逝世,终年 81 岁。此前不久,他已两腿发麻、双眼红肿,仍日夜挥毫,完成数十幅四尺中堂,以应台港同胞之请。

常州书协与常州建材设备制造厂联合举行悼念活动, 各界百余人参加,老一代书家纷纷前来悼念,20 余家单位致送花圈挽联,北京、上海、武汉、合肥、南京等地发来唁电,台湾《武进乡讯》刊发悼念专文。常州市书法研究会的挽联写道:“融古通今,自备一格,挥挥洒洒六十春;扶掖后者,苦心孤诣,孜孜屹屹是先生。”据记载,1989 年纪念周子青逝世一周年座谈会上,钱小山曾有讲话,对周子青的书艺与人品给予高度评价。

他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常州市书法工作者协会理事、常州市书法研究会副会长,并任江苏省硬笔书法协会常州分会顾问、江苏化工学院书画社名誉社长;与钱小山、胡一飞、孙江天并称“常州书坛四老”。常州新市志(三册)近现代人物传略中,已去世的书法家仅列钱小山、周子青两人,其历史地位由此可见。当年常州书协成立后之所以活跃一时,与四老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密不可分。作品曾参加“全国民主党派、工商联书画展览”“全国十二明星城市书画联展”“海峡两岸书画展”等 20 余处展出,并在徐州、扬州、安徽全椒等地举办个展或联展。

其弟子高尊尝作《周公子青书道人品》一文,以骈体论其书其德,略云:“夫书道者,心画也;人品者,艺根也。昔贤立论,尝谓书品即人品;今观周子,信哉斯言。”“先生以商贾之身,怀翰墨之志。平生作字,不独自娱,尤重济世。”“人或笑其终日劳形,先生笑曰:‘人死名灭,字传不朽’其旷达如此。”又云:“先生虽逝,墨痕犹在;映碧楼空,典范长存。后之览者,观其书如见其人,慕其德而仰其风,岂不慨然兴怀也哉!”此非弟子之私誉,实为知者之公论。

曾亲见其书的老常州唐仲庆亦言:“周老前辈的商牌、店楣、匾额,极有特色。他的字体给人感觉十分正牌、庄重,没有刻意的做作,又极含艺术风格,是大师级水平。”“周老前辈的字,在常州城里名仕圈内,那是顶呱呱的,一直让大众敬佩。”

纸上的字可藏于箧笥,墙上的字却经风沥雨,正逐年消逝——而消逝本身,也是这座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文/周　星)

中国催化科学的先驱者张大煜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月15日，常州府江阴县长泾镇。一户张姓书香人家，随着一声哇哇哭声，家中诞生了一位男婴。

男婴的父亲叫张奉生，母亲叫柳佩玉。他们给婴孩起名为大煜，字任宇。

“煜”者，光耀，日月星辰，光照大地也；“任宇”，任其在宇宙中翱翔也。名和字，既包含吉祥之意，又寄托长辈的殷殷期冀。



张大煜像

张大煜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后来成为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他是中国催化科学、胶体化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曾当选为中国化学学会副理事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

张大煜的家乡江阴长泾，古名东舜城，传说舜有庶子7人散处江南，其中一支生活在澄东南一带，舜城的命名与之有关。这里是吴文化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的江南水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喝着泾水河水成长的张大煜，天赋聪慧，从小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中学毕业以后，考入常州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后因为喜欢化学专业，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大学期间，张大煜与翟风阳、葛春林、袁翰青等同学组成大地社，他们经常探讨如何“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并多次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进行民主

演讲。

1929 年，张大煜于清华大学毕业，同年考取了公费留学德国的机会，赴德国德累斯顿大学学习胶体与表面化学。在校期间，学习刻苦认真，在 1933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

他还在德国考察了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等煤炼油工艺（Bergjus 煤加氢、F-T 合成石油、Lurg 炉低温干馏等），获得了当时国际先进的煤转化第一手技术资料，为将来科研奠定基础。回国后，即受聘于母校清华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大煜从长沙辗转到昆明，1940 年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任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化学所研究员。为支持抗战，他毅然从基础研究转向石油、煤炭方面的技术科学研究。1941 年，他利用云南丰产的褐煤，在昆明附近宜良滇越线上建立了一个从褐煤低温干馏提炼汽油的小型实验工厂——利滇化工厂，边实验边生产，历尽千辛万苦炼出了油。但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诸多困难，最终工厂关停。虽然张大煜的“工业救国”设想遭到了挫折，但却为他后来创建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煜从昆明回到内地，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同时兼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讲授工业化学和胶体化学，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

1948 年底，经地下党负责人动员，具有爱国情怀的他毅然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和朝鲜，翌年初到达大连，任初创时期的大连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担任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后改名为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研究员、副所长。该所始建于 1908 年，前身为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掠夺我东北资源进行调查和科研而设置的，盛时日本职工曾达 600 多人。日本投降后，隶属中苏合营的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燃料化学、窑业化学、农产化学、物理化学等 8 个研究室。1948 年底到 1949 年初，苏方移交该所，隶属于大连大学。

张大煜到任后，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大胆留用了部分有专长的日籍科研人员，形成强有力的研究班子。1950 年 9 月，该所改名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属东北工业部管辖。1953 年 4 月，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张大煜任所长。

是年 8 月，在所长张大煜和燃料工业部的积极倡议下，成立了液体研究委员会，张大煜任主任委员，侯祥麟任副主任委员，定期地对研究所的计划和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审查评议，这对加强研究所与生产部门的协作联系起了很

大作用。1954 年,工业化学研究所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同时成立“中国科学院煤炭研究室”,由苏恒任书记,张大煜任所长兼煤炭室主任。

当张大煜领导实力雄厚的队伍重新制订研究合成燃料油等课题规划时,他禁不住心潮澎湃。他认为选择石油化学作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使之逐步形成我国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的研究基地,方向是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亟待迅速恢复,各种建设项目纷纷上马,燃料成了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当时,美国对新中国实行科技、经济封锁,苏联专家宣判“中国是个贫油国”,李四光还未回国,中国的大庆油田还没找到,这个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不解决, 中国无法发展。张大煜再次奉命于危难之际,他认为科学研究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一定要为国分忧。于是他开发了我国人造石油的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及页岩油加氢,广泛应用于工业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外,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对于炸药的急需,他选择了直链烷烃芳构化制甲苯的研究课题。

直链烷烃芳构化制甲苯,是一种轻便的烈性炸药。

1950 年,世界风云变幻无穷,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朝鲜爆发战争,随后美国悍然出兵干涉别国内政, 直逼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迫保家卫国,入朝参战。志愿军急需轻便又威力大的炸药包,前方告急。周恩来总理把这一重大的任务交给张大煜。他马上停下手头的研究课题,先攻烈性炸药这一难关,急前线所急。经过日夜研制,加上他的智慧和学识,终于在短时间内创造奇迹——研制成功了这种威力极大的炸药,很快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大显神威。可以说,张大煜是不佩戴军功章的英雄功臣。

在全所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祖国交办的各种研究课题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其中“七碳馏分芳烃化合成甲苯”以及“熔铁催化剂用于流化床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曾获 1956 年国家科学三等奖。

此外,张大煜针对我国丰富的煤炭资源急待合理开发利用、特别是三大钢铁基地(鞍钢、武钢、包钢)建设急需炼焦煤基础数据的现状,不失时机地提出以炼焦为主的煤化学研究方向,并把组建煤炭组的工作列入他的第一议事日程。煤炭组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煤质分析方法,仿制了胶质层测定仪,建立了 2kg、5kg 小焦炉,取得了一批可靠的实验数据,为我国炼焦煤地质勘探和配煤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大煜认为,一个研究所必需具有良好的学风,才有生命力,尤其是要有

民主的学术气氛。作为领导,必须能容纳不同意见,支持新生事物,才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发挥集体智慧,形成学术领导中心,大连石油所于 1955 年 9 月在中国科学院系统第一个成立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1958 年和 1960 年,张大煜奉命组建兰州石油研究所和太原煤炭化学研究所。他身兼三个研究所的领导,殚精竭虑,沥尽心血,为科研机构的合理布局,为促进内地的科学事业,协同前来支援的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五机部研究所等专家合力攻关,终于研制成高能炸药,解决了原子弹、氢弹引爆装置这一大难题。

1960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科院第三次学部大会上,张大煜首次提出“表面键理论”。该理论在大跃进期间提出,既是张大煜学术团队十年催化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大跃进政治气氛重压下,张大煜集中思考总结出的、代表中科院、新中国学术水平的跃进成果。

1964 年,面对我国广大农村化肥缺乏,舶来品化肥杯水车薪、价格又高的窘况,国家又向张大煜安排了新的任务——研制国产高效化肥。他欣然受命,毅然承担了合成氨新流程三个催化剂的任务,担任攻关组组长。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出色地研制成功三个高效催化剂, 并在工业上迅速推广应用,为我国合成氨工业的技术改造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家经委、国家科委评为协作攻关成功的典范。

1966 年“文革”开始后,大化所实验研究中断,实验室被严重破坏。1968 年,张大煜也被投进牛棚,表面键理论研究中断了……

直到“四人帮”倒台后,1977 年 12 月,张大煜才调到北京中科院感光所工作,继续为我国科研事业鞠躬尽瘁。

1986 年 8 月 21 日,80 岁的张大煜已经有些痴呆, 当学生卢佩章去看望他,张大煜抱书要跟卢去所里上班。

张大煜儿子张寿连回忆当时的父亲:

“到了 1987 年,他已基本上叫不出在他身边照顾他的家人的名字了,他的生活也已经离不开家人的照顾。尽管这样,他唯一没有改变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去上班, 他那个装满书籍的黑色公文包是他唯一要保护和使用的东西。家里人每天为了说服他留在家里而不去上班费尽了心思。1987 年寒冬的一天,我早上起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几个房间找个遍,也没有找到,想到父亲的老习惯,急忙冲到楼下,这才发现父亲只穿着在家里穿的那件毛衣,右手拎着那个装满书, 足有 20 斤重的大黑皮包, 一动不动地站在公寓楼的北门外,问他为什么要一个人离开家,父亲告诉我,他在等车,所里的汽车马上就

来了。当我要抢过他的公文包时，才发现父亲的手指已冻得几乎伸不直了，显然父亲在这里等车已经站了很长的时间，望着父亲那焦急、消瘦、苍老、冻得发青的面庞，我心里充满了自责和敬意，眼睛被泪水湿润了。一位 81 岁的老人，在自己生活都需要别人照顾时，仍然没有忘记要上班，仍然想着要把在“文革”时期没有完成的工作补上去，他不顾自己已重病在身，总是想着要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工作，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想念啊！工作、工作、工作，这就是父亲一生最后的、也是唯一的追求。”

1989 年 2 月 20 日，为中国物理化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张大煜去世，享年 83 岁。

鉴于他一生在人造石油、石油炼制、催化科学、化肥工业、化学工程、色谱和激光等方面卓有成效，1996 年首届中国催化奖冠名为“张大煜奖”。2006 年，张大煜诞生 100 周年之际，他的塑像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耸立，中科院和大连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文/包立本）

计量经济学家刘大中

刘大中(1914—1975),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人,出身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清代大学士刘於义、刘纶,著名经学家、常州学派创始人之一刘逢禄,著名画家刘海粟等名人。如今,青果巷东下塘刘氏宗祠尚存。



刘大中像

刘大中的父亲刘成志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曾任粤汉铁路总务处长,参与组建交通大学。

刘大中受家庭影响,考入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36年毕业赴美,一年后获康奈尔大学工学硕士,1940年获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先后任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副商务参事、国立清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台湾大学教授。196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当选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66年当选世界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刘大中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传记的唯一一位华裔学者。

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

刘大中为蜚声世界的经济学家,计量经济学造诣尤深。1941年,刚从康奈尔大学博士毕业一年、年仅27岁的刘大中就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论中国的外汇问题》,成为在该刊物上发表论文的首位中国人。1946年,

刘大中首次做出中国的 National Accounts(国民收入核算账户)。

抗战结束,刘大中为了教育救国、经济兴国,毅然回到祖国,执教于清华大学。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百孔千疮,经济学更是一张白纸。刘大中一面在学校里教经济学和统计学,一面就组织人手调查了解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对于各地的经济矛盾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刘大中获得很多确信的数据后,和他的好友蒋硕杰一同提出一些对策,被他的康奈尔大学老学长胡适看到,大为欣赏。可在当时的局势下,刘大中和蒋硕杰空有一腔热血和满脑经济计划,却无从实施。

1948 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上海的通货膨胀不可收拾。胡适找准机会把年轻的刘大中和蒋硕杰力荐给国民政府,可是行政院长翁文灏却以为局势已经不可挽回,再有什么经济政策也于事无补,斥之一旁。失望之余的刘大中,只能回到了美国康奈尔,继续他的学术研究。

上世纪 50 年代,台湾大学聘刘大中为教授,请他回来帮助台湾制订经济政策。于是,他在台湾培养了很多学生,亲自参与设计了台湾的税制改革。刘大中要挽回大陆经济的梦想没有实现,转而在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小试牛刀,取得极大成功。

税制改革措施如下:

1954 年,刘大中建议台湾推动外汇贸易改革,实行单一汇率。1964 年,刘大中建议设立国民所得统计评审委员会,创建国民经济计划设计体系。1968 年,担任台湾“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推动台湾税制改革。

1970 年,因其杰出贡献,被“副总统”严家淦代表蒋介石授与大绶景星勋章。

余英时在 1999 年的一篇文章说:“台湾经济之有今日,当时(20 年前)都说‘六院士’,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等六人建言有功。”

刘大中虽然身在海外,但最拿手的研究就是统计分析现实经济状况,再加上他对中国国民性深刻地了解,所以准确地把黑市上的供需关系分解成十二种类型,分析它们对中美实际汇率的影响。战时的经济是特殊的经济,几乎完全不能用教科书上主流的均衡分析方法来讨论。刘大中的手法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刘大中还试图为解决中国现实的经济混乱出谋划策,或者为战时经济提供一个大致稳定可靠的替代方案。他提出,现实目标就决不能仅仅是稳定货币,而必须做出更大的全盘考虑。刘大中的学术观点在世界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从一开始,刘大中的学术命运就已注定,是要在一片

混乱乃至废墟上绘制新的经济蓝图。

1965 年，刘大中在普林斯顿出版社出版重要著作——《中国大陆的经济：1933—1959》。该书出版后，顿时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这本书成为了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经典。弗里德曼等大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总以这本书作为主要依据。

著名的教育家

刘大中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培养了许多门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上世纪 40 年代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1967 年主持筹设台湾大学经济系博士班，培养出许多经济人才。指导编制台湾统计年鉴，参与设计台湾财税改革，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台湾历任“财政部长”。1973 年受聘香港新亚书院校长。

刘大中在康奈尔大学指导的研究生恩格尔于 2003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名的艺术家

刘大中还是有名的艺术家，尤好京剧，吹拉弹唱无所不精，生旦文武无所不能。12 岁即在北京汇文中学登台演出《捉放曹》，在唐山工学院明诚堂扮演过宋江、周瑜、武松、铁镜公主等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角色。在清华任教时与程砚秋合演《奇双会》，在台湾与辜振甫合演《群英会》，在美国被称为“第一票友”，曾用英语演出过《打渔杀家》。

其夫人戢亚昭女士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刘大中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时的学妹。唐山交大老校长唐振绪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把家政系美女戢亚昭撮合给学弟刘大中，两人一见钟情。

戢亚昭也喜爱京剧，夫唱妇随，时常在家为刘大中击鼓伴唱。

1975 年，真乃天妒英才，刘大中检查出了肠癌，于是携妻从台湾返回美国，回到他心中的学术圣地康奈尔大学。不久，刘大中服药自杀，其妻戢亚昭亦服药身殉于侧，令人唏嘘感慨。

刘大中辞世后，“总统”严家淦、“行政院长”蒋经国等均参加了追思会。台湾军队国剧社、戏校连续义演三日，十几万元票房收入全部捐给刘大中文化教育纪念基金会，用以奖励在经济、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者。康奈尔大学也设立了刘大中奖学基金，不足两月即募集到十几万美金，用于鼓励华裔学生。

1971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兹，曾专门撰写一篇长达 16 页的文章来纪念他。

（文/包立本）

美国力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的邹福康

常州邹姓源远流长。源于唐代钱塘人邹实。据《武进邹氏家乘》(三古堂)载,邹实,字诚明,“世家杭之钱塘,隐居行义,乾德知韶州曲江县事,娶雄武军节度使马悼女无出,继娶王氏生一子智。公生唐天复三年(903)癸亥,卒宋淳化五年(994)甲午,寿九十二,葬由奉山”。



邹福康像

邹实被尊为常州邹氏一世祖。其子邹智,字知白,任西京作坊使,生一子元庆,字进发,任宋东头供奉官,娶周氏,生十子(常州城内十子街地名即源于此)。其中邹贾、邹覃、邹霖皆中进士,其余七子散居四方。

邹覃之孙邹浩,字志完,号道乡,登宋元丰五年(1082)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

据《云阳邹氏宗谱》(学正堂)载,该族始迁祖邹英四,系常州邹浩第十六世孙,于明初迁居丹阳(云阳)城内坊市口,为丹阳邹氏始迁祖,600 余年来,后世别为 10 派。

本文主人公、美籍华人邹福康博士先世系丹阳邹氏全二公派大寺支人。其祖父德芳于清同治年间迁回常州锁桥湾,曾任常州木业公所总董事、常州商会董事。

邹福康,1922 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常州锁桥湾。

据续修《武进邹氏宗乘》第十一卷“传略”记载:

邹福康自小无论学习什么，都很认真，务求学好。做功课时，精神集中，功课完毕，运动游戏，也很投入。小学、初中，就近攻读，品学兼优。10岁左右，毛笔字已颇出色，曾和堂兄福保结伴，摆摊卖春联，个子小，够不上桌子，就站在凳子上，现写现卖。1939年就读中央大学，家中生活无着，不能接济，赖贷金及奖学金，维持学业。1958年于台湾，通过留学考试，在他夫人王志贤的支持下，到加拿大、美国留学，境遇虽苦，但奖学金从未中断，得以完成学业，而我嫂嫂不得不单独留在台湾，任教多年，直至1963年才抵美团聚。

从1973年首次归国观光以来，频返故国，主张中美合作，可以说是成了美国的中国通。费城各高校在挑选中国留学生问题上，遇到疑问，很重视他的意见。在合作办科研的过程中，他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级科技人才。当时我国国家教委对其为我国育人的模式作出结论，并予推广。在美国、在中国，他始终很忙，工作很紧凑。以致来去匆匆，很难在家与年迈父母共叙亲情；老人也很理解儿子，照顾大局。1979年夏，应上海交大之邀，为国内不少高校的教师，讲了数十节课，同时又得接待众多社会人士，很辛苦，嗓子弄坏了，感染了，回美国医了整整两年，才算治好，并无怨言。

邹福康甚孝，1943—1992年，除有数年无法通邮外，一直坚持寄钱，瞻养双亲。到美洲的头几年，没钱，是朋友接济着寄的。有同情心，常以助人为乐，肯尊重人，原谅人，不乱作主张，乱发脾气。这种气度，颇似母亲，也和内眷扶持有关。

邹福康的主要专业职务如下：

1943年中国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机械工程学士；1958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机械工程硕士；1965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机械工程博士；1975—1992年美国Drexel大学机械工程教授；1986年中国西安交大顾问教授；1993—1996年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机械系客座教授；1988—1990年台湾成功大学航空航天研究所客座教授；1965—1975年美国Drexel大学机械工程助理及副教授；若干空间工业及政府机构的顾问。

邹福康的主要工作成就有：

对运动表面的传热问题完成了先驱性研究。首创用边界层理论说明这些复杂现象，并导致目前采用滚动法和挤出法来制造传热设施；在燃气透平的气膜冷却方面，刷新了叶片射孔的设计方法，从而使透平叶片的冷却更为有效；提出了用熔蚀法冷却炮筒的概念，并将理论公式化，成功地描述了此项方法；伸展了气体动力学Hugonist解析关系，加深了人们对早期开发的复合材料的基础性认识；发展了完全流状态的数字技术和湍动模型，包括管道中

的涡流，斜面冲击喷射和非单相流等；是75篇论文的作者和合作者。

鉴于邹福康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被美国费城Drexel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92年至今担任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院士。1987年名录入编Who′s? Who in America（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sia（亚洲名人录）等

邹福康学习刻苦，工作勤奋，情系故国，胸襟宽畅，厚以待人，毕生致力中美合作。1973年6月，应中国政府邀请，作为美籍中国学者归国观光团成员，归国观光，受到郭沫若接见。回美后，新泽西州州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福康大陆之行盛况。

邓小平首次访美，在华盛顿，邹福康偕同夫人，参加了杨振宁博士主办的欢迎会及餐会，会上，邹福康强调指出中美关系之重要。

1979年，邹福康促成六位美国工科名校教授访华，是中美科技合作蓬勃发展的先声。1980年，促成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会商科技合作，批准工程合作科研。其第一个项目——燃气轮机冷却问题由邹福康获得，1982—198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曾先后拨款44万美元，支持此项课题，在邹福康实验室和中科院工程热物理学研究所实验室进行。该所及西安交大的多批老、中、青学者赴美参加了美国部分的工作。合作科研的论文，已出版的有38篇。1988—1991年，台湾方面拨款15万美元，支持他与成功大学航空航天研究所之间，进行关于分离区流体力学与传热问题的研究，作为在中国台湾与美国间的合作科研项目。

邹福康博士自1973年以来多次返回母校江苏省常州中学。其中，2008年回常来母校参访新貌，受到当时的丁伟明校长、朱荫仙书记等校领导亲切接待。2012年5月23日，他与其弟邹福延（系江苏省常州中学49届校友）再次回母校，捐赠一千元美金，作为在校清贫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张耀奇校长和朱荫仙书记表示感谢外，特向邹福康校友颁发了荣誉证书。

（文/包立本）

武进“小鲁迅”的传奇人生

——民国才女、文坛奇才陈布文

武进师生的口中，她是文笔犀利的小鲁迅；著名作家王蒙的笔下，她是伟大忠勇的女神；国画大师丁绍光信里，她是慈母般的导师；而在更多的亲友眼里，她是中国近现代相夫教子的楷模。这是一代民国才女、文坛奇才、武进籍作家陈布文传奇人生中的多个标签。



陈布文像

陈布文，1920 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通江乡（今新北区孟河镇）五圩埭村。她家兄妹四人，陈布文是最小的女儿。父亲是晚清秀才，思想开明，这让陈布文得以从小接受文化教育，后来还考入常州学堂，这在当时算是“不得了”的事了。

陈布文自幼聪慧，喜欢读书，她上中学时就订了全套的《论语》《太白》和《宇宙风》（都是鲁迅发表过文章的那些杂志），还有《女子月刊》《小说月刊》等书刊。她把每本杂志都一一保存起来，一年下来，装订成合订本。

她有文学方面的过人天赋，加之早早地离开家庭进入陌生的环境生活学习，使她比同龄人更为早熟，也更善于观察和思考。陈布文 13 岁时，便在多个报刊发表文章，对当时热议的自由、爱情、社会时事等问题，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她撰写的《假如我有了爱人》成为《女子月刊》以“理想爱人”为主题征稿的第一名。另一篇小说《把自己交给了工作》，很能见出其文笔的纯净、老练，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对贫苦大众苦难生活的同情与怜悯，远

远超出同时期的年轻作家。

在初中时，她就敏锐地意识到，以成绩多少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价值大小”是十分不公平的，她的这种少年老成充分体现在她的文字中。此时，她的文笔日渐成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由于她言语犀利、敢于针砭时弊，文风有点鲁迅的味道，中学国文教员和其他师生都亲切地称她为“小鲁迅”。为此，她更加喜爱阅读鲁迅的文章，从此成为鲁迅的追随者。她不但酷爱文学，而且写得一笔好字，画画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陈布文16岁初中毕业后，父母给她寻了一门亲事，对方在日本留过学，而且家境非常不错。可是，这桩姻缘却与她一心寻求真理、渴望进入社会大学的理想相违。

为了躲避父母的逼婚，陈布文离家出走，并刻意选择了举目无亲的南京，以示破釜沉舟。她作好了最坏打算：“我不怕，我不会屈服的，因为我有死！”

陈布文只身来到了南京，靠着卖文艰难生活。后来，她在南京的一家报社担任了编辑。虽然陈布文年纪轻，但是文笔却非常老辣，不多久就成了报社的主笔。她还应邀约在《扶轮日报》撰文，不多久，陈布文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了。

陈布文到达南京后，偶与天才画家张仃相遇。青年才俊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因为给地下刊物《潮水》编排设计而被抓捕。后在同学们的保释下出狱了，出狱后经老师张恨水介绍，来到南京，在《中国日报》《扶轮日报》上发表漫画。

张仃作品都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讽刺意味，深深吸引了陈布文。两人很快便相见，并且一见钟情。于是，两人便在玄武湖畔租了个小房子，过起了清贫而又安乐的生活。成婚之时，张仃20岁，陈布文年仅17岁。

但是，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大批文化人向大后方撤退。陈布文、张仃流入西安，加入抗日艺术宣传队。两人又先后到内蒙古、榆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最终他们选择了投奔延安。此时，他们已经有了第一个女儿陈乔乔。

1938年底，陈布文与张仃带着孩子辗转来到延安，开始了“革命加文艺”的不凡人生。

陈布文来到延安之后成了一名驻地记者，由于出色的文采，她很快加入了“文艺抗敌协会”，担任鲁迅研究会的秘书。她读书不辍，奉鲁迅为榜样，以笔为枪，这对文笔出众的陈布文而言，可谓风生水起。

而张仃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刚到延安时，他为艾青、丁玲、萧军等朋友画过一批漫画，并办了小规模的展览。由于他喜欢毕加索画风和抽象派路线，

与当时的艺术审美相违背，被一些人看成“丑化革命形象”。

由于两人工作上的差距，再加上两人性格上的反差，使得张仃心理上的落差越来越大。

他动不动就对陈布文发脾气。她不但不生气，还在带孩子、做家务的同时，不断地安慰张仃。为了顾全张仃的面子，陈布文瞒着丈夫，偷偷求人让他进了鲁迅艺术文学院，当了一名教师。可即便如此，张仃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1940 年夏天，在周恩来副主席安排下，张仃只身去重庆参加“文化统战”。当时，陈布文已经身怀六甲，只好带着女儿乔乔留在延安。独自在延安的陈布文还是能够融进作家、知识分子大本营的。她参加过“战地写生队写生画展”，加入了“青年艺术剧院”。在延安的作家圈子里，陈布文的才华，深得作家丁玲和萧军的赞赏。

当年冬天，在延安的窑洞里，陈布文的第二个孩子出生。那一天夜里，风特别大，门被吹开了，一只狼窜了进来。所幸有惊无险，后来，她给这个小男孩取名为“郎郎”。

不久，“皖南事变”爆发，中央计划撤离延安。为防路途中孩子哭闹，规定一家只能带一个孩子。女儿乔乔已经懂事，陈布文只能忍痛把刚满周岁的郎郎交给组织，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红军家庭。

陈布文虽然退居家中，却经常关注社会时事，尤其对文化青年格外关心。对遇到的年轻人，她像母亲一样来关怀他们。儿女的同学、同事或朋友等晚辈，只要领到家里来，向她请教任何问题，她都会有问必答。她从来都是和颜悦色，从来没有对他们表示不耐烦，真正是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工艺美院的学生丁绍光、庞媛等，也都是她忘年交的小朋友。

1956 年，青年作家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毛主席关注，一时成为文坛新生力量，受到追捧。然而，他却意外便收到了陈布文的一封信，信中率真地表达不同的见解。陈布文与众人迥然相异，以一信之缘竟成为了王蒙心中的知己。一个月后，王蒙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农场，背石头、种树、迁坟、钉马掌，干了几年的体力活。此时，陈布文给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这封信让王蒙几十年来念念不忘。

1958 年，著名画家丁绍光在中央工艺美院读书时结识陈布文，受到布文老师的教导，自此开启了漫长的交往。

1962 年底，丁绍光分配到云南艺术学院任教，直至“文革”被关押，都一直与布文老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陈布文的 100 多封书信承载着她的性

情、精神，在特别的年代不断传送温暖。丁绍光称那些密集的书信："不是一般驱寒问暖的家书，那是一个在特殊年代又超越年代，闪烁着永恒、崇高、智慧的光华！"在丁绍光的心目中，布文老师如永恒的慈母、导师、女神般地存在，没有人可以替代。

"文革"期间，张仃蒙难几乎九死一生。他带学生采风被诬蔑为"搞流派"，临摹毕加索作品被诋毁为"毕加索加城隍庙"，受到批判。昔日的开国大典总设计师，挨打受辱、烧锅炉、打扫厕所，一夜之间坠入深渊。而陈布文始终不离不弃，陪伴在张仃身边，为他铺路、为他支撑，甚至为他牺牲。陈布文为保护张仃，让孩子们轮班守护他，"帮助他活下去，不能让他被打死，也不能让他自杀！"

陈布文十分关心几个孩子的生活、成长及精神状态，给予子女们最大限度的爱。家庭生活无论何时都是艺术化的，简洁的装饰，书籍随处可见，陈布文主持全家人一起朗诵诗歌，分享阅读心得。纵使后来张郎郎因"太阳纵队"文化沙龙入狱，陈布文也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她有自己内心的秩序。

张郎郎于 1943 年生于延安，他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1962 年，他创办了"太阳纵队"诗社，却在 1968 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被判了死刑。

不久，张仃和两个子女被关入牛棚或隔离，两个小儿子也下乡务农了。陈布文一个人坚守在家里，把有限的生活费用分成若干份，或邮寄给失去自由的亲人，或给在农村的孩子们。她一个人坚强地撑起整个家！

1970 年 3 月 5 日，张郎郎在即将被执行死刑时，他被周恩来总理一纸救出，改判有期徒刑 15 年。1977 年底，张郎郎假释出狱，后漂泊海外。他在大洋彼岸，还是靠中国文化底子养活自己。在退休之前的最后 8 年，他在美国国务院下属的外交学院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培养将要到中国工作的外交官。

1974 年，张仃因病回到北京。陈布文在香山租了一间农民废弃的老屋，让他得以静心养病。张仃的心越来越沉静，57 岁的他又拿起小学生的墨盒和毛笔，开始了焦墨山水画的创作。而陈布文依旧支持他，鼓励他，照顾他，让他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1979 年，张仃在北京举办了"平反"画展，他创作的焦墨作品首次亮相，人生也迎来了第二春，无论是名声还是威望，都大大提升。

当时，全家的情况都好转了，可是陈乔乔的生活却陷入困境。那时候，她身心劳累不堪，可是为了支持女儿开始新的生活，再次全力以赴。将外孙女薇薇接到北京来带养。20 世纪 80 年代初，三儿子张大伟在一度发不出工资的庐山中学当老师，陈布文就以各种方式帮助他，给他写了许多书信，让他开

阔眼界，大步走向未来。在她的影响下，子女都喜欢阅读、思考和写作。寥寥1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荒诞派剧本《日蚀》，后来又写作了大量的长诗、短诗、剧本、小说、散文、小品，而许多手稿上，都要有母亲改动、修订的笔迹。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做母亲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陈布文洁身自好，却有时也“盛气凌人”。她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人，不但不给好脸色，甚至当面痛斥。一次，一位老友来家做客，在聊天时不觉自鸣得意起来，对布文说：“现在咱们老伴儿都是院长了，咱们……”话音未落，陈布文就说：“你是什么夫人是你的事，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就立刻走人，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来找张仃喝酒，陈布文去开门，一见到是他，就迎面怒斥他：“赚了点儿稿费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断然抛弃你太太和孩子，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吗？”说完就把门关上。那位文化名人悻悻而去，从此再也不敢上门。

陈布文在晚年时期，经常挑灯到半夜，似乎又回到当年的状态与心情，阅读和写作成了她每天最主要的功课。她创作了大量的有关风物人情的散文，大多发表在《文汇报》《大公报》上，追今抚昔、品味艺术风景，所写内容轻盈质朴，却字字凝聚着她自由自在的主体精神。不难看出，她在日常中是一个她在日常中是一个温柔浪漫、充满诗意的生活艺术家。

陈布文热衷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就算做了“火头军”，也依然对它们保持着很高的热情，只要有空她就会写会儿字，她的书法温柔典雅而又苍劲有力，写的每一幅字都可称为书法精品。即使在最后的弥留之际，尽管手抖着，她也写下了最后的书法作品：“让我自由自在的凋落吧”。

她还喜欢学习京剧，不但与著名的梅派程派传人一起唱《荒山泪》《风还巢》《四郎探母》，而且还邀请了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来家里指导唱腔唱法，一起高声唱曲低声吟诵。每一次，她都能重拾心境再出发，这种安乐自得的心境也符合儒道精神，因而也成就了她传统文化精神特质，无可厚非，让人诚服。

1984年，陈布文患了“厌食症”，长时间不吃任何食物，只喝一点儿热姜茶之类。她的身体太虚弱了，尤其是晚上总是难受地哼着。然而，她知道已经病入膏肓，坚决拒绝去医院治疗，儿女们哭着祈求她吃点东西，她虚弱地说道：“生亦何欢，死亦何惧。”

中秋节的第二天，是陈布文的生日，她挑了蛋糕上一朵奶油花儿吃着，她深情地说道：“我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梦中都想闻家乡的油菜花香。”她对家人讲儿时的日常生活，讲过年时用胭脂点前额，还讲她如何抗婚。说着说着，两

行清热的泪水从她眼角慢慢留下……

1985 年 12 月 8 日凌晨，一代民国才女、文坛奇才陈布文去世了，她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是："忘掉一切，各自开辟新的生活。"

根据陈布文生前的愿望，儿女们把她葬在武进，墓地极为简朴。那是陈布文的故乡，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她退出人生的舞台，又回到了出生的原点。

无论生前身后，陈布文都是寂静的。直到 2017 年，作家王蒙出版了长篇小说《女神》，陈布文这个名字才在文学领域得以一现。

王蒙说："女神并不是只有一类，陈布文则出类拔萃，迥然相异。"他用"非虚构"手法从生活中探索她的本真。描写陈布文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为人们呈现出一个"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女神人物形象。王蒙更是给予陈布文三个十分卓越的评价："最文化的家庭妇女，最革命的母亲，最慈祥的老革命"。

2020 年，陈布文诞辰百年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著名评论家、学者李兆忠编选的《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春天的来客》收录了陈布文辞世后留下的 20 余万字未刊稿，其中包括她创作的大量小说、散文、诗歌，以及书信、日记等内容。她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审美格调，都与纯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一脉相承，叙事优雅节制，文笔清逸质朴。而其中的精品，即使以今天的审美标准，依然熠熠生辉。

陈布文传奇的一生，是与文字创作紧密相连的。斯人已去，如今，我们同样能在其文字中看到一位优秀的妻子和一位伟大的母亲的身影，看到一位饱含艺术风度、秉持精致简朴的生活态度、有气节有信仰的自由女性形象，领略这位不平凡女性的异样风采。

（文/肖　飞）

青果巷街区走出了一位“女中豪杰”

——史良传奇



史良像

常州南市河开凿于春秋，由吴王夫差在公元前 495 年开凿，隋炀帝大业六年（610）拓宽后成为京杭大运河组成部分，是中国大运河最古老河段之一。2014 年 6 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在青果巷与东下塘所跨南市河上，有一座中新桥，始建于民国 7 年（1918），为单孔梁架式青石与花岗岩条石结构平板桥。桥长近 22 米，宽 3.8 米，桥额镌刻楷书“中新桥”及“民国七年五月沈超等募建”字样。该桥在 2003 年被公布为文物保护控制单位，2008 年 2 月被公布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桥名取“中兴”之谐音，寓意革故鼎新，寄托了民初时局的期许。瞿秋白、张太雷、赵元任、史良等名士都曾泛舟此河、登临此桥。建桥后的第二年（1919），全国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五四”学生运动，为了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常州学生在史良的率领下，穿越中新桥，高举“收复青岛、废除二十一条”的标语、旌旗举行游行。

史良（1900—1985）字存初，中国著名律师、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她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新中国《婚姻法》的主要推动者。

她出生清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私塾先生。自祖父史致泽往上数，史

家出过五代举人，家风清正。父亲史刚有九个孩子，从小把她当男孩养，习字读书。她受学识广博并具有一定新思想的父亲影响，在与父亲谈天说地中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政治，萌发了初步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因经济拮据，史良14岁才正式入学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之后入常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常州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她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还被推为省立第五中学、常州南师和女师三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参加了学界联合会。她经常在外进行宣传演讲，许多函电文告均出自史良的手笔。

1922年，史良在好友资助下，进入上海法政大学学习法律，她认为学法律可以为受欺压的老百姓帮点忙。就读期间，史良参加反对校长只重金钱不管教学质量的斗争，上台演讲，还和100名同学组成护校团。其时王开僵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聘司法界知名人士董康为校长。史良转而进入上海法科大学，成为董校长的得意门生。1925年“五·卅运动”中，史良积极参加了示威游行，被捕一天后释放。她主编《雪耻》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7年史良被分配到南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因反对上司的贪污腐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在狱中史良结识了一批慷慨就义、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两个月以后，她的父亲通过董康请蔡元培出面，才把她营救出来。1931年她在上海挂牌执业，成为名律师。她经手的第一场官司就胜诉并拿到500元大洋报酬。她专门为穷人和受压迫的妇女打官司，有时工资比鲁迅还高，但从不贪恋钱财。有客户送她房子、地皮、汽车，她全都捐给了穷人或上交国家。同年，她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还加入了共产党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人道互济总会”，办理多起营救邓中夏、任白戈、熊瑾玎、方知达等中共地下党员的案件。此外，史良还办理了不少的妇女案件，其中比较多的是婚姻案件。在办案过程中，她了解了中国妇女所承受的压迫。她认识到只有妇女解放了，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解放的道理。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率先成立，史良是发起人之一，被推选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后，史良被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宋庆龄、沈钧儒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史良是其中重要一员。为了推动国民党抗日，她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于11月22日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其中唯一的女同志，也

是唯一主动投案的人。她躲藏一个月安排好工作后，化装成贵妇人前往苏州法院自首，对检察官说："你们不是悬赏五万元要抓我吗？我就是史良。"她在狱中坚持爱国无罪的正义立场，被宋庆龄等社会名流誉为"女中豪杰"。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共中央的敦促下，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杜威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援助，才被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出狱。这段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念。

抗日战争期间，史良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且是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中唯一的女性。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的权利。她提出不仅要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事实，并且要在"国民大会"这一章中写入妇女代表名额不少于 15%，实际上，她想争取 20%—30%。"这是前人未曾提过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社会为妇女争权到如此地步，实在是一种创举。"

近代中国的法律史就是一个争"民权"，争老百姓"参政权"的历史，史良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之中。1949 年 6 月，史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当时，周恩来就新政协委员名单的酌定问题，征求史良的意见，史良指出："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表明她对妇女权利的争取。新中国成立后，史良被任命为司法部首任部长，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性部长之一。她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原则，让中国妇女第一次在法律上成为独立的人。史良认为，妇女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谈不上解放。妇女权益的实现必须要有法律来保障。

青果巷出了个女君子，吴江的垂虹亭畔出了个大才子。在营救邓中夏时，史良遇到了陆殿栋。一个深造法律的哈佛才子，主修国际法。他治学严谨，仅读书卡片就积累万余张。陆氏在法租界巡捕房任翻译，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们一个通气报信，提供抓捕政治犯的消息；一个预先通知这些人尽快撤离，或在法庭上为政治犯辩护。陆殿栋性格腼腆，很会疼人，帮她熨衣服，连拍照片都会仔细写下说明。他们在和平饭店吃西餐，在大光明看电影，一个西服革履，一个裙角飞扬，情投意合。国民党画影图形，悬赏五万大洋抓捕史良时，史良躲到了陆殿栋的家中，后来在他的陪同下，去警方"自首"。史良出狱后，由沈钧儒主婚、宋庆龄证婚，在上海正式结为夫妻，场面和规格都相当高。她俩还因为"不般配"出名，史良外向爽朗，比丈夫大七岁，这在当时很少见，但两人却恩爱了一辈子。在史良的心中，小陆是她的真爱。1956 年的夏

季，北戴河畔风高浪急。史良与几位苏联专家同坐在船中，洋专家要求与这位世所闻名的女部长合个影。史良婉言拒绝并说："不行。在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没有他或者有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1976 年 1 月，在民主党派悼念周恩来逝世的追思会上，作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陆殿栋难以抑制住对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悲伤之情，他喊着"总理不能走，总理不能走……"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晚年的史良常沉浸在思念陆殿栋的氛围中，每天默默地坐在他的遗像前，黑纱不离身，参加国务活动时也是如此。

史良和宋氏姐妹私交甚好。史良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宋庆龄则通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渠道支持进步人士营救活动。1933 年邓中夏被捕后，宋庆龄委托史良参与法律援助，两人由此建立联系，并在救亡运动中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1936 年 11 月，史良和沈钧儒等七人被当局逮捕，宋庆龄公开发声抗议，并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亲赴苏州探望史良等人，给予极大鼓舞。1949 年上海解放后，宋庆龄起初对北上参加新政协有顾虑，史良因与她相知甚深，参与劝说和协助，最终宋庆龄同意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两人友谊持续半个世纪，从 30 年代延续到 80 年代，既有革命



史良故居

情谊，也有普通女性间的姐妹情。“文革”期间见面困难，但彼此仍通过书信等保持联系。史良给宋庆龄送过咸菜、泡菜，买过花布和蛋糕。宋庆龄刚出版个人选集就书赠史良，并在扉页上写“送给史大姐陆同志纪念”。宋庆龄逝世后，史良撰文悼念，称她为“良师益友”。

史良于 1942 年加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后历任民盟第一届中央常委、副主席，第二、三届中央副主席。1949 年 9 月，她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史良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79 年 10 月，当选为民盟第四届中央主席。

史良一生经手大量财富，却始终清廉自守。1948 年她承办上海“地皮大王”遗产案，胜诉后获赠一栋 60 多间房的楼房和十几栋弄堂房子，她全部捐给了国家。周恩来劝她留下一栋，她仍把最后一栋也卖了，所得分给亲友。1985 年 9 月 6 日，史良逝世，享年 85 岁。史良无子女，亲友整理遗物时发现，她平日佩戴的戒指、胸针、耳环、项链加在一起只值 3000 元。

在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系列活动中，“60 年中国影响力女性” 评选时，史良的名字赫然在列。邓颖超评价：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毛泽东称赞她为“女中豪杰”，肯定她在民族救亡和民主运动中的贡献。这个评价贯穿了她传奇而光辉的一生。

（文/朱剑虹）

朱献国：在创业创新中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朱献国作报告中

日前，就读于南理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2024 年毕业的王同学正式入职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欣喜之余，他向敬重的老学长、南京市新城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献国先生告知了自己的就业去向，并表示今后会努力工作，成为一名优秀的网络工程师，为祖国发展与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家境贫寒的小王因为品学兼优，在校期间曾得到过新城市教育基金奖的资助与褒奖。而捐资设立该奖项的正是朱献国先生。

作为从南理工走出的优秀校友，1978 年至 1982 年，朱献国在我校攻读火箭弹专业，1999 年又再次回校攻读工程硕士学位。上世纪 80 年末代他下海经商，先后创办了南京国际礼品公司、扬子江国际企业南京（有限）公司

和南京新城市商业置业有限公司。

对于风华正茂刚刚步入社会的南理工学弟学妹们，朱献国热情予以鼓励，并希望他们拓展胸怀视野，将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承担时代责任，投身强国建设，回馈母校发展。

把握商机，攫取创业第一桶金

提起朱献国，南京人自然就会想起曾经最好的电影院华纳上影影城以及生意火爆的龙江金润发超市。而这些仅仅是朱献国打造的 35 万平米超大“销品茂”——新城市广场的开篇之作。

身为成功企业家，朱献国究竟是如何攫取创业第一桶金的？他表示一切都是从一个陶瓷仿真娃娃开始的。1989 年，几个朋友带来的一个酷似真人的陶瓷娃娃礼品，引起了朱献国的浓烈兴趣。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难得的商机。于是，已就职于江苏省贸促会的他毅然辞去工作，投身商海。

1989 年 10 月，他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南京国际礼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创业之初，遇到的困难接踵而至，但生产工艺的突破与技术创新是朱献国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由于当时国内的陶瓷制品都是先出模再上色，而国外客户要求的陶瓷娃娃工艺是先上色，再一次成型，这种技术当时属国内空白。为了尽早攻下这个最大难题，每个周末他都会从南京赶到宜兴，泡在宜兴陶瓷研究所里，与技术人员一起潜心研究着色技艺与生产工艺。在一项又一项难题被攻克的同时，也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领域的空白。

当朱献国带着研制的样品出现在广交会上时，很快就被国外客户相中并一次性签下了十万美金的订单。就这样，下海的第一桶金被他成功地掘取到了。由于产品适销对路，国际礼品有限公司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短短几年便成为国内最大的陶瓷娃娃生产出口企业，并带动南京及周边地区形成陶瓷娃娃生产基地。迄今为止，累计出口额高达 1.68 亿美元。2000 年，朱献国的 NIGC 牌陶瓷娃娃被国家确定为名牌出口商品。

1996 年，朱献国前往西班牙考察商务，接触了世界著名供暖设备企业洛卡公司。联想到当时国内集中供暖方式的诸多不便，他明锐地觉察到这又是一个难得的商机，决定率先将分户采暖方式引入中国。就这样，扬子江国际企业南京（有限）公司应运而生。经过近十年的努力与奋斗，扬子江公司已成功地将洛卡（ROCA）供暖产品推向全国各主要省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洛卡经销网络。现如今，扬子江国际企业南京（有限）公司成为行业中

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年销售额近 3000 万人民币。

超前预判，创新社区消费场景

常言道，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商海中搏击更需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虽然已成功创办了两家企业，但朱献国仍以超前的眼光提前预判到国际礼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外贸企业必须及早转型。1999 年，他将目光投向了刚刚兴起的商业房地产业，着手创建南京新城市商业置业有限公司。

在国外考察期间，朱献国发现国外 50%以上的生活消费都是在一个叫“SHOPPING MALL”（销品茂）的商务圈中完成的。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巨大的“SHOPPING MALL”提供的就近一站式消费场景很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城市社区建设发展的趋势。

回国后，正赶上南京河西地区处于住宅大开发阶段，但生活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恰巧他的国际礼品公司就在河西中心，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将礼品公司迁走，用这块地实现自己“SHOPPING MALL”的梦想，为河西做个大配套，解决就近消费和集中消费的矛盾。就这样一个总投资高达 12 亿人民币，按国际化标准设计的巨型商业设施在河西悄然孕育中。事实证明，朱献国当初的眼光是超前的，做出的判断也是正确的，而他倾力打造的社区消费新场景也在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002 年春节开设了河西第一个大型卖场—金润发龙江店，解决了河西周围没有大型卖场的困窘局面，当年营业额就突破 4 个亿；2004 年 4 月底，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在内地的第一家控股影院南京华纳上影影城也落户新城市广场，这也是南京第一家国际五星级 8 厅影院，拥有国际最先进的数码放映技术，每月的票房可达 100 多万元；2005 年春节前最具时尚前卫卖场特色的新城市百货精品步行街热闹开街；2017 年六七月份餐饮休闲广场也盛大开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城市广场逐渐发展成为了全省最具规模、档次最高的大型综合性现代商业与生活配套中心。

这些年，在朱献国的引领和推动下，南京新城市商业置业有限公司先后开发了新城市假日、新城市花园、新城市广场、虹桥广场等住宅与大型商业，尤其是位于龙江的新城市广场在南京大名鼎鼎，成为区域的地标商业。

搏击商海数十载，朱献国愈加深刻地体会到依靠创新手段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他曾说：“解决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效果。用创新的手段来搞实业搞研究是困难重重的，是没有退路的，所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

是不可取的，要踏踏实实完成每一项事务，这样才能把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干好。”

感恩回馈，创造财富多元价值

“回报社会，首先应当从身边做起。”这是朱献国回母校时，常对学弟学妹说的一句话。身为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朱献国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思考挣钱以后的用途，以及如何使用才能创造财富的多元价值。在他看来，捐款恰恰就是金钱最有价值的用途之一。

翻开朱献国的捐款账簿，里面记录着他这几十年热心公益的情怀与担当。2000 年，出资 20 万元资助革命老区句容行香乡建立希望小学；2002 年，赞助徐悲鸿研究会 10 万元；2003 年，抗非典捐款 10 万元人民币，支持小红花艺术团 10 万元，支持南京外国语学校办学基金 12 万元；2004 年，出资 100 万元支持鼓楼区社区体育设施建设，出资 50 万元支持革命老区盱眙希望小学建设教学楼；2005 年，出资近 100 万元支持“市民学堂”活动。

……

学生时代在南理工的学习与生活经历令朱献国没齿难忘，对于母校的悉心培养，朱献国至今感念于心。2023 年在回母校参加 70 周年校庆时，他曾深情地表示，南理工 70 年，一批批校友们，借助南理工赋予的学习平台成长成才，传承母校优良校风，依靠自身拼搏进取，活跃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或许正因为如此，感恩与回馈母校成为萦绕在朱献国心头挥之不去的想法。

2005 年，出于对学校深厚的情感，朱献国在南理工设立了“新城市教育基金奖”，每年捐赠 50 万元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同学。这一助学善举至今已坚持了整整 20 个年头，累计向母校捐赠逾千万元，共奖励 1804 位优秀学子。许多得到基金资助的学子在向朱献国学长致以敬意的同时，也纷纷表达了心怀感恩，努力奋斗，用行动与成绩回报母校、报效祖国的心声。

……

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上开始涌动经商创业的大潮，不少体制内人员主动放弃稳定的“铁饭碗”投身商海，创造了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现如今，社会上却持续出现了考公考编的热潮，人们开始热衷报考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编制的岗位。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大学生究竟该如何实现自己的职业发展与人生价值？朱献国以他的人生经历告诉青年学子们：不

要贪恋轻松，轻松绝对不是好事。惟有敢于不断地突破自我，才能在“闯”的过程中增长才干，积累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经验。

诚如朱献国所言，求稳或许不是年轻人最好的职业选择。在这个剧变的时代，只有拥抱不确定性，才能求得确定性。因为拥抱不确定性是创新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求得的确定性，才是多元的发展机会和更茁壮的成长。

“把手里的事情努力做好，力求创新，你就能够完成人生路上的里程碑，实现更大社会价值。”这既是朱献国自我人生的深深感悟，也是他对莘莘学子的殷殷期许。

（文/陈育凡）

社会责任的践行者李健



李健在公益慈善艺术品拍卖会现场发言

聚新力，公益善举筑就温暖底色

作为江苏省新联会副会长、常州市新联会会长，李健全力投入各项社会志愿活动，他连续多年协助推动省新联会“苏新暖冬”品牌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省“苏新暖冬行动”自 2021 年正式启动以来，累计活动参与人数超 3 万人、惠及困境儿童人数超 1.5 万人。李健积极为“2025 年苏新关爱·苏新暖冬行动”全省启动仪式献计出力，推动 2025 年苏新暖冬行动实现两大创举——形式创新，首次增加艺术品爱心拍卖方式，筹集善款约 23 万元用于支持“苏新暖冬”项目帮扶困境儿童；服务创新，他认为“关爱更需要心灵的陪护”，组织成立心理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服务两个小组，提供经济支持之余，帮助困境儿童坚强内心、走出困境。

在李健的组织下，常州市新联会携手一加爱心社联合主办“2025 年玫瑰

义卖20周年”纪念活动，通过“互联网+公益”模式，推动该活动募得总善款超8万元，用于帮扶困境人群。

李健协调多方资源，建成服务常州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实践基地“星蜂汇”，通过探索结对共建新模式，他不断创新活动新形式，多措并举推进公益行动开展——

汇集总工会、社会工作部、妇联、团委、基层新联会组织等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护蜂行动”关爱新就业群体慰问活动，在全市发动建立30个新就业群体服务站，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技能培训、职业规划、法律心理关怀和爱心暑托班服务等。此外，他主持《在常企业法律合规100问和常居市民生活法律提示100问》丛书发布，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切实的法律帮扶服务。

启新程，建言资政助力社会治理

2019年，李健成为常州市政协委员，从此开启他建言资政的道路。2022年，李健成为江苏省政协委员。2024年的两会上，江苏省政协首次对委员履职进行评优，李健在此次表彰中被评为“2023年度江苏省政协优秀委员”。

2025年1月20日，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李健聚焦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自身实践与调研，就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建言献策。他提出，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以及新就业群体的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李健长期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民生开展走访调查。针对新能源设备即将批量退役的问题，他撰写社情民意信息，建议相关部门出台规范政策文件，引导新能源回收产业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规范产业固废回收与再利用。

2023年度《关于强化我省知识产权培育和保护的建议》提案被省政协通报表扬，《关于全省鼓励实施“工业上楼”政策的建议》《关于深化新能源产业优势，启动“常州加速度”强动能的建议》等多篇提案，被评选为优秀提案或重点提案。

在老旧小区改造加速的背景下，他发现电梯安装存在政策缺失或不足，就此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加梯政策推进民生实事工程的建议》被评为市政协“2023年度优秀提案”。

2024年8月，李健、包立本撰写的《进一步提高我省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水平的建议》社情民意信息，被评为“2024年度优秀社情民意信息二等奖”。

建新功，立足本职驱动产业创新

在本职工作中，李健一步一个脚印，凭借多年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和创新意识，于2012年以出色的能力被提拔为新阳科技集团总经理助理。他业绩突出，不断帮助企业做优做强，积极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的目标。一路走来，李健笃定地认为，无论多难多累，就是要通过奋斗努力寻找突破，创造机遇，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22年，李健被评为常州国家高新区（新北区）高质量发展创新争先劳动模范。

2023年，李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服务高质量发展，围绕“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城市定位，紧跟“532”发展战略，以新能源之都建设为企业发展方向，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他立足集团战略执行层定位，加强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持续做好制造业企业的安全环保和降本增效工作，2024年实现上缴税收1.5亿元、利润超2亿元。凭借持续高质量发展，他所在的新阳科技集团连续七年荣登“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位列“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467位、“2024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第309名。

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使命呼唤新作为。站在新能源之都建设的新起点，李健的目光投向更远未来：“我们将继续发挥新联会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科技创新最前沿发光发热，在社会治理第一线建功立业。”

李健始终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深入调研，积极履职，以实际行动诠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时代担当，用实干实绩持续书写履职答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文/常统轩）

德润毗陵　藏鉴千秋

——缅怀常州文博耆宿赵争先生



本文作者(右)与赵争

江南文脉绵延千载，毗陵藏风薪火相传。在常州当代文博收藏与文史传承的历程中，赵争先生是一位承前启后、泽被乡梓的泰斗级人物。先生系清代文坛巨擘、史学家赵翼六世孙，出身报业书香世家，一生躬耕教育、深耕收藏、深耕文脉，以毕生热忱守护常州地域文化瑰宝，为本土文博事业、收藏文化发展筑基铺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赵争(1921—2025)，笔名兆征、其严。幼承家学，浸润书香文脉。家族报业传家的底蕴，赋予了他求真务实、秉笔传史的治学底色；先贤赵翼“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治学胸襟，更塑造了他兼容并蓄、笃行深耕的文化格局。早年，先生投身教育事业，三尺讲台育桃李，潜心治学、诲人不倦，在教书育人的岁月里沉淀学识、涵养心性，始终秉持文人初心，坚守文化本心，为地方培育了众多文史爱好者与文化从业者。

半生从教，半生收藏。步入中年与晚年，赵争先生将全部心力倾注于常州文博收藏事业，成为本土收藏文化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上世纪 80 年代，百废待兴、文脉待兴，先生远见卓识、奔走牵头，先后发起创办常州市文博鉴赏学

会、常州市业余收藏协会、常州市职工钱币协会等多个重要文化社团，搭建起常州收藏界、文博界首个系统化交流、研究、传承平台，彻底改变了常州民间收藏零散无序、文史研究无人聚力的局面。他以身作则、凝心聚力，团结全市藏家与文史同仁，规范收藏体系、挖掘文物价值、普及文博知识，让散落民间的常州文脉瑰宝得以被珍视、被留存、被传承。

先生一生痴迷收藏，深耕数十载，藏古鉴今、持之以恒。他不逐名利、唯重文脉，潜心搜集、整理、保护常州地方文献、老报旧刊、钱币文物等各类乡土遗存，抢救留存大量濒临湮灭的常州近现代文史资料。其珍藏的百年老报等珍贵实物，见证了常州报业发展、城市变迁的百年历程，成为研究常州地方史、民俗史、传媒史的重要实物佐证。在他眼中，收藏从不是私人雅好，而是为乡存史、为城留韵、为文脉传薪的时代责任。

治学修身，笔耕不辍。先生晚年依旧勤勉治学，梳理半生收藏心得与文史研究成果，著有《赵争收藏生涯五十秋》《赵争文集》等著作，系统总结常州民间收藏发展史、梳理本土文物遗存脉络，为常州收藏史、文博史留下了详实珍贵的文字史料。九十高龄之后，先生依然心系文脉传承，受聘担任常州工学院赵元任研究中心、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常州市收藏家协会、常州市名人研究会顾问，耄耋之年仍躬身赋能后辈，答疑解惑、提携后学，毫无保留地分享学识阅历，助力常州文史与收藏人才接续成长。

立身以德、行事以仁、治学以谨。先生一生淡泊谦和、儒雅敦厚，兼具文人风骨与乡土情怀。他承赵氏书香家学，守教育育人初心，担文脉传承使命，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常州乡土，以收藏护文脉、以治学续传承、以公益聚人心，将个人志趣融入地方文化发展大局，用一生坚守诠释了新时代乡贤的责任与担当。

文脉有根，薪火有继。如今，先生虽已归隐道山，但他为常州文博事业奠基拓路的功绩、深耕文脉的初心、淡泊坚守的品格，永远镌刻在毗陵文脉长河之中。先生毕生守护的文物典籍、搭建的文化平台、培育的后学人才、撰写的文史著作，已然成为常州宝贵的文化财富。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赵争先生以一生坚守，续赵氏家学、兴毗陵藏风、传江南文脉。其德可昭，其功可颂，其志可传。我辈后辈当承先生遗志，守护乡土文脉、深耕本土文史、传承收藏初心，让千年毗陵文脉生生不息、代代流芳！

（文/包立本）

先生远去　文博留芳

——缅怀文博专家朱松度

2026年5月19日清晨，天气阴沉。我突然接到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执行副主席朱松度先生于当天凌晨去世的噩耗，顿时悲痛袭上心头，其中滋味，无法言表。

朱松度先生于1998年从横山桥镇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曾长期担任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副主席兼横山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在民间收藏、文物保护，特别是推动横山桥镇全民书画艺术水平发展工作上，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如今先生虽已经远去，但我和他共事的岁月里那一桩桩、一幕幕、一件件平凡往事，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时间追溯到2000年左右，那时民间收藏之风日盛。邮票、布票、粮票、铜镜、瓷器、玉器、字画甚至烟标、火柴盒都成了人们感兴趣的收藏项目。2002年元旦，常州市文博鉴赏学会横山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横山桥国瑞宾馆隆重举行，朱先生被推选为主任。与此同时，我也经人介绍成为了横山文博成员。

横山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朱先生首先从“观展”入手，即带领会员们走出去参观各种藏品展、书画展，及常武地区沪宁线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艺术展品，以此来拓展大家的视野，提升会员们的审美观，并且在观展的同时让大家不断学习、总结、反复、比较，从而提升会员们判别各种艺术品真伪的能力。

2003年10月份，上海某博物馆举行“国宝巡展”，其中就包含有闻名中外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种机遇可谓千载难逢，稍纵即逝。朱先生闻讯后立即组织落实。一辆大巴车满载着横山收藏爱好者的希冀和期盼向上海出发。可一到目的地，所有人的心都凉了半截，博物馆门口排队观展的人员如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龙，一眼望不到头。朱先生心急如焚，立即想对策，最终利用其在沪的人脉关系，让所有人得以从绿色通道入馆参展。安全返程时，天色已暗。我想这次行程最辛苦，但心里最开心的，却非朱先生莫属。

“悲鸿精神”——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从2015年7月至2021年四月共展出四届，朱先生就带着我们参与了其中两届（2017年6月份第二届在扬州美术馆，2019年7月份第三届在南京江苏省美术馆）。此时朱先生已年届耄耋，但他依然满腔热忱，领着我们一班年轻人上上下下，走南闯北，不知疲倦。第三届“悲鸿精神”观展结束后，他自掏腰包在南京一家知名酒店款待大家。“公事私办”“假私济公”一向是朱先生的为人和行事风格。

如果说带领大家走出去看展览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那么自己办展览出成果，便是横山工作委员会成立的终极目标。横山工作委员会成立20多年以来，举办过的大大小小展览不可胜数，个人藏品展、个人画展、联合书画展等。每次都搞得风生水起、像模像样。每次办展前，他都亲自将人员安排、展板制作、展品安保、来宾接待等工作一一落实，不留遗憾，力求完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亲自谋划和主持下，横山工作委员会分别于2004年、2011年、2022年举办了三届大规模的“横山人书画展”。展品极富鲜明的横山地方特色，具有时代气息，带有横山泥土的芳香。真正展现了横山人书画的水平和实力。几十年来，在朱先生的引领和谋划下，横山文博的同仁们齐心协力、锲而不舍、下足功夫，硬是把横山人整体书画水平从一个平台提升到全新的另一个平台。如此，朱先生功不可没！

时光不负深耕的人，几十年文博生涯的历练，朱先生本人也从一位收藏门外汉和“菜鸟”成长为一位合格的、优秀的民间收藏家。他收藏的名人字画，无论在数量及品质上，在常武地区都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的。关于收藏，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他退休后既不嗜赌，也不旅游，更无侍花弄草的喜好，但他平时只要看到别人毛笔字写得棒，心里就觉得特别的开心，于是逐渐萌生了收藏名人字画的念头。但朱先生的收藏之路也并非顺风顺水，一路坦途。收藏界“藏龙卧虎”，其实里边的“水”也是很深的。有的人为了金钱和利益会不择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鱼目混珠。如果不具一双慧眼，难免会在收藏过程中“呛水”“吃苍蝇”。但他自己定了个原则：一旦确定自己的藏品是高仿或假冒货他从来就是付之一炬，毫不惋惜。绝不会用赝品来充门面、哗众取宠。“尽了力子烧炼，方成一粒丹砂”。在收藏过程中，朱先生除了自己摸索、看书学习、上网比对外，还特别受到常州文博鉴赏学会主席包立本等一众老师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和专业鉴定，一大批珍贵的字画和楹联珍品，他在拍卖会上是无从下手的。朱先生生前如是说。

对于自己的藏品，朱先生从来不是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而是与人同乐，和人分享。几十年来，他个人藏品公益展办了一轮又一轮。布展前几天，他独

自一人在房间里分门别类、理顺包装。展出中，他充当义务讲解员，为来宾们讲解每一件藏品的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收藏的意义。展会结束，又和大家一起，花上一天时间默默地收展。他最后一次举办的“松竹含韵”百副楹联展是在2024年五一长假后才结束的，那一年他八十有八。可以说他把人生最后的精力和热情全部献给了他热爱的文博事业。

几十年来，献身文博事业的朱先生对横山地方文物的保护也倾注了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2022年1月5日，当他获悉横山西柳塘大份头村有一处文保单位急需保护和修缮，于是约了我直接开车赶过去。我们先到村支书办公室了解情况。书记知道了我们来意后也非常支持，与我们一同前往现场察看。那天恰逢寒潮南下，气温骤降，大雨如注，古宅门前积水没过鞋帮。86岁高龄的朱先生不听劝阻，一手打伞，猫着腰，踮起脚，接连跳过几块垫脚石，执意去到宅内查看。古宅南墙上一块银灰色的金属文保牌特别引人注目：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刘瑞林宅，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2012年2月1日公布。这幢古宅东边外山墙看过去还非常完好，横S型的黄石山墙高大结实，外墙上连接木柱和外山墙的黑色铁搭排列有序，外山墙正中窗户两边一组对称精美的砖雕，优雅别致，栩栩如生。可一进古宅内部，一幅破败颓废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倒吸一口凉气。四间连体宅院西首一间房顶已经完全塌陷，宅内碎砖断瓦、遍地垃圾一片狼藉，雨水顺着斜吊在半空中的一根根椽子不住地往下滴……让我们看了痛心疾首。临别前，朱先生语重心长地嘱咐村支书，要尽快筹集资金保护和修缮这些一般不可移动的文物。他说，这些古建筑都是老祖宗遗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贝，不可复制，弥足珍贵，要保护好它们……

一直以来，我被朱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折服。2020年敬老节后一天，我以《横山文化》主编的身份，和同事刘云燕一起去采访他。那天他和老伴任竹君双双出门相迎，两位老人格外开心。本来按照我们的意图，想在《横山文化》上宣传一下他主政横山时的政绩。毕竟他从1977年起在横山当了近20年的党委书记、第一把手，那时的横山桥镇一直是常武地区乃至全国都挨得上号的“明星乡镇”，但这些却被他“不值一提”四个字轻轻摆手回绝。那天窗外丹桂飘香，秋风送爽，室内清茶氤氲，气氛柔和。整整一个下午，他在我们面前一口气深情回忆起当年为横山地方经济建设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四位横山籍革命前辈——胆大勇猛的陈元度、屡立功勋的沈云康、雷厉风行的杨大年、平易近人的李汉平。在他看来，这几位革命前辈早年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历经枪林弹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身居高位，手中握有大权，而且有的还在那场史无前



2020年,《横山文化》采访朱松度(从左至右朱小元、朱松度、任竹君、刘云燕)

例的运动中受到过冲击,挂过牌,游过街,挨过斗,甚至蹲过牛棚。但后来落实政策后,仍然对党和人民一片丹心,无怨无悔。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官架子和私欲,淡泊名利、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他们的这些优良品德才值得我们的报纸去宣传和发扬光大。其实不然,据我们所了解,朱先生在担任横山一把手期间走过了清明山南北的村村巷巷,踏遍了三山港两岸的乡村企业。横山桥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见了面都认得他,叫得出他的名字。他是一位名副其实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的可亲可敬、口碑极佳的"平民书记"。其次朱先生还是一位"不识牌的书记",在他主政横山期间,他给自己和所有的横山基层干部定了一条规矩,划了一条红线,那就是"严厉禁赌",无论是纸牌、麻将、扑克还是骰子,任何形式的赌局一经发现严厉查处,绝不留情。打铁先要自身硬。由于他带头垂范,横山所有的基层干部都对他服服帖帖。再者朱先生还是一位"街上没有门面房的书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横山经济蓬勃发展,经过朱先生亲手规划的新街、市场、小区历经了一轮又一轮,"三世收个街角落",那是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的投资共识,能在街上拥有门面房还是一个人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可是朱先生没有在横山的任何闹市口和黄金地段留下一间门面房!用他自己的话讲:我退休后,芙蓉南朱老村上还有2间老房子,回去修修好,养养老不是蛮好!至于后来他居住的新式楼房,则是他儿子

在外商场打拼成功后，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才回来盖的。

朱先生 19 岁参加工作，65 岁退休，9 旬高龄驾鹤远去，可谓功德圆满。他的一生犹如一幅绚丽多彩、美轮美奂、完美无瑕的人生拼图，前半生他为横山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兢兢业业，鞠躬尽瘁。退休后心系文博，为常州及横山文博事业添砖加瓦、发光发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的远去是常州地区文博系统的重大损失。

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在他远去后一月余，各位同仁们继续在他开辟的未竟的道路上奋蹄扬帆、高歌猛进。2026 年 7 月 1 日由横山桥文博鉴赏学会、横山桥书画协会、常州市佛教协会、常州大林禅寺等联合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书画展隆重举行。那天宾朋满座，群贤毕至。108 幅代表横山人最新水平和实力的书画展品高悬在大林书画院内，整个大厅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开幕仪式盛况在网上传播后，立即引来网友们好评如潮，点赞无数！

我想横山文博同仁们在朱先生开辟的未竟道路上继续努力前进，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文/朱小元）

常州春书：江南唱春的源头和范式

一

唱春，又名“常州调”“春调”，流行于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广大农村。

民国 14 年（1925），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认定：“唱春调，我们知道是江苏常州的出产。”（《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 121 页）

“据先辈艺人说，靖江的唱春在清代后期就流行了，是由江南的常州、武进传过来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靖江市资料汇编》，第 481 页）2020 年，滨江新区 85 岁的曹松庆说，他父亲年轻时，得经常州府考试合格，春板上盖有“火罗印”，方能唱春。西来镇赵家村的顾林芳告诉笔者，有个江南人是叔叔的朋友，每年正月里来靖江唱春，住在她家。带（教）叔叔唱春，叔叔又教会了他们兄妹三人。可见，靖江唱春与江南唱春一脉相承。

二

常州人将印刷、抄录唱春词的文本称之为“春书”。2026 年 5 月 14 日，笔者于好友、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主席、收藏家包立本先生处观阅到春书二种。

（一）吴瑞芳抄本

毛笔抄写，书写稚拙。牛皮纸封面，线装。开本 18×12 厘米。封面自左至右竖写：“春书、吴瑞芳记、民国贰拾肆年梅月立”。内页竖排，上下两句 8 行，无标点。共 66 页 8344 字。

全书抄录无标题四句或八句的春词 40 首，标明“春歌”的长篇唱词 15 首。

（二）刘登旺抄本

毛笔抄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当时的一期《红旗》杂志目录为封面，线装，开本 18×12 厘米。封面自左至右竖写：“孟姜女送夫望夫寻夫科、刘登旺抄”。书尾注明：“此本刘登旺抄因甲子年正月初六日眼痛字丑勿笑在戴定楚和厉成文茶屋抄”。内页竖排，上下两句 7 行，无标点。结构为序歌及送夫、望夫、寻夫。共 19 页 1937 字。

三

两种春书，《吴瑞芳抄本》内容丰富、体式多样，堪称典型，特予深入分析。

首先，自忆自录

从抄本稚拙的书写以及体量与曲目判断，这是一位粗通文墨、满腹春书的唱春艺人自忆（自唱）自录，将脑子里的曲目一古脑儿地写出来，凝固成春书。分为五个单元：

第一单元：40 首短歌、长歌《十国阵》。

第二单元：《七十二座名山》《十张台子》《十二条扁担》。

第三单元：《十二杯酒（一）》《十二月花名》《十二月花名何文秀》《十碗菜》《三十六码头花名》《十二月方卿》《十二月花名盘歌》《十二条手巾》。

第四单元：《赞常州》《阎瑞生叹十声》、四句头短歌一首。

第五单元：《十二杯酒（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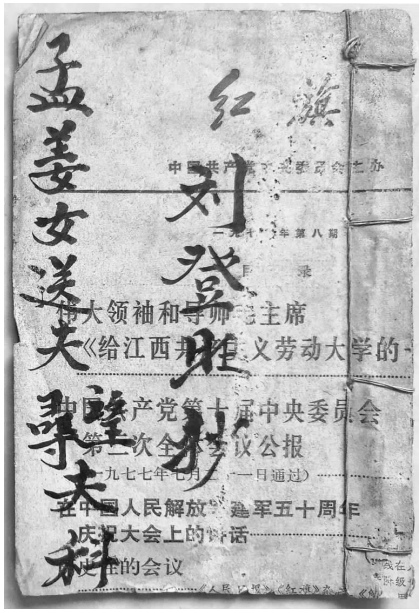
每个单元均署名“吴瑞芳记”“吴瑞芳”“瑞芳”等，以此为自然隔断的标志。

其次，自成体系。

《吴瑞芳抄本》曲目的先后秩序，绝非主观随意，而是由唱春活动的艺术实践所决定。一般而言，正月里唱春艺人来到主家，开头是见人唱人见物唱物的四句头短歌：

走进府门看青双（清爽），
团团一转白粉墙，
白粉墙上描金字，
代代子孙伴君王。





春书封面

这种站在门口见人唱人、见物唱物的套路套语，俗称“门套”。

唱完几首门套，若主家有赏便赶下家。若主家盛情相邀，则来到堂屋唱《孟姜女》《十二月花名》之类的长歌。吴瑞芳将此类长歌标注为“春歌”。换言之，先唱门套再唱春歌，既是唱春活动的模式，也是唱春内容的体系。《吴瑞芳抄本》自成体系，既彰显吴氏抄本的个性，又体现常州春书的共性。

按说，《吴瑞芳抄本》还空缺一重要内容：祝词。即平时民间艺人逢喜而至，视新婚、祝寿等喜事现场的情景现编现唱祝福语。可能因为祝词随机现编，故未抄录。

再次，书写率真

显然，《吴瑞芳抄本》为自己而抄，给自己看。书写既认真又随性。认真，一字一句地回忆、一笔一画地记录；随性，字、词信手拈来，不甚考究精准。但亦有规律可循：

1.同音通用

“方言同音通假”，是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吴瑞芳用常州方言抄写，自主践行“方言同音通用”。特举数例：

方言发音	书面表达
清双	清爽
压	鸭
对连	对联
张非	张飞
太杭山	太行山

2. 边旁简化

同样的字型结构，边旁不同，其字义、读音相去甚远。民间艺人图抄写便捷，随意简化边旁。例如，将“管”字省去“竹”字头，写成“官”。将“啥”写成“舍”。

正月里来开舍花？舍人落难卖粮（良）马？
舍人落难书来卖？舍人落难卖招牌？

——《十二月花名磐歌》

3.自创符号

遇到冷僻、难写的字，干脆自创符号，比如“方卿”的“卿”，字型复杂、笔画多，索性简化为符号：一横上面加一点，一撇与一横成夹角自右至左撇。 如此别出心裁，非得置于语境方能意会。

上述种种，看似笔误、讹错，其实是常州唱春“看到什么唱什么，顺手抓

字，出口成章”（《常州曲艺史》，第 171 页）的艺术传统的生动体现。

四

民间春书如海，两种抄本系沧海一粟，但十分珍稀。笔者试图藉此探究常州春书对江南唱春的影响。

（一）常州唱春范式流行江南各地

田野调查发现，靖江的唱春词由三部分构成：门套、小调、祝词。模式与《吴瑞芳抄本》如出一辙，且均以门套、春歌为主。

《吴瑞芳抄本》的第一单元，虽然没有明确标注“门套”，但许多曲目的内容和形式与靖江唱春的门套毫无二致。

脚踏府门看清爽，家主轴子挂中堂。
一对红烛佛前点，紫金炉里烧清香。

——靖江《徐汉林抄本》

《吴瑞芳抄本》的表述与《徐汉林抄本》大体一致：

走进府门看青双（清爽），福禄寿星掛（挂）中央，
龙香凤烛中见（间）摆，鲜红对连（联）分两旁。

与此同时，靖江民间还流播许多与《吴瑞芳抄本》的同名曲目，如《十张台子》《十二条扁担》《十二月方卿》《三十六码头花名》《十二条手巾》《十二月花名何文秀》，等等。此乃常州、靖江唱春一脉相承的必然结果。笔者在上海、苏州、无锡考察宝卷时发现，江南各地流行着许多同名春歌，亦可佐证常州春书的广播性。同时，江南各地的唱春，不仅仅文本内容大同小异，而且演唱实践与行规高度一致。比如，春锣、春板的形制及寓意以及肩背“龙袋”迈官步上门、用春锣接赏赐等行规，皆同出一源。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唱春文本形成相对稳定的艺术体式：“十二月花名体”“四季体”“十字体”“十叹体”“五更体”，等等。（《常州曲艺史》，第 149—153 页）有了这些范式，各地的唱春艺人既循规蹈矩，相沿陈袭，又照葫芦画瓢，填写新词、编创新歌。

（二）常州春书在流转中变异

唱春艺人是一个流动的主体，走到哪里便把唱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在流转中变异，在变异中流转，文本会因人因地因时变异。

孟姜女的传说，是常州唱春的传统题材，《刘登旺抄本》堪称经典。因民间艺人各展所长地二度创作，江南各地流传多种《孟姜女》异文。

江阴化整为零，一首变三首，分别为《孟姜女十里送夫》《孟姜女十二月望

夫》《孟姜女十二月寻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阴民歌民谣民谚集》,第16、18页)张家港人依《刘登旺抄本》为母本,改编为两首《孟姜女》。(《中国·河阳山歌集》,第155—157页)

靖江的文本虽然也是两首,但内容相异,第一首序歌似地缘起,引出下文。两首整合为一首,以《孟姜女动身上长城》为题,分别用[山歌调][春调]演唱。

吴县将《孟姜女》本土化,演变为长篇叙事吴歌,"长达两千余行(载《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说万喜良是苏州人,由于秦始皇做了一个梦,因而要抓他去筑长城,他逃到松江,相遇孟姜女。"(《中国·白茆山歌集》,第291页)

江南地区不管有多少《孟姜女》异文,但万变不离其宗,孟姜女故事的母题世代相传,人物、主题、事件等基本要素相对稳定。因记忆的讹错、口头叙事的个体差异,特别是民间艺人艺术素养参差不齐,对人物、故事的理解、把握不同,艺术处理各异,凸现异文的丰富多彩。

(三)借鉴常州春书编新词

生活在底层的唱春艺人,思维活跃、反应机敏,深切而及时地感知时代的律动、社会的变迁。同时熟悉生活、热爱故土。他们一方面将普遍流行的常州春书奉为经典,一方面又借鉴、参照常州春书的艺术范式,编创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色彩的新词。试举两例:

靖江人模仿《三十六码头花名》,编创《靖江三十六码头》。在列举特产的同时,还数说"推牌九""拳头把式""水老鸦""茶馆店""篾匠"等民间习俗,仿佛风情画展。(《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靖江县资料本》,第416页)

江阴旧瓶装新酒。以十张台子兴起,歌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江阴民歌民谣民谚集》,第127—128页)

《十张台子》唱遍大江南北,且有多种版本。江阴版与传统的《十张台子》,首先是传承:文体花名体、内容唱人物。其次是创新:用新中国的领导人取代岳飞、杨六郎、朱买臣、张生、武松等形形色色的古人。其共同的精神文化内核是对英雄、先贤的崇拜和敬仰。

综上,笔者得出"常州春书乃江南唱春的源头和范式"的结论,不揣鄙陋,就教于方家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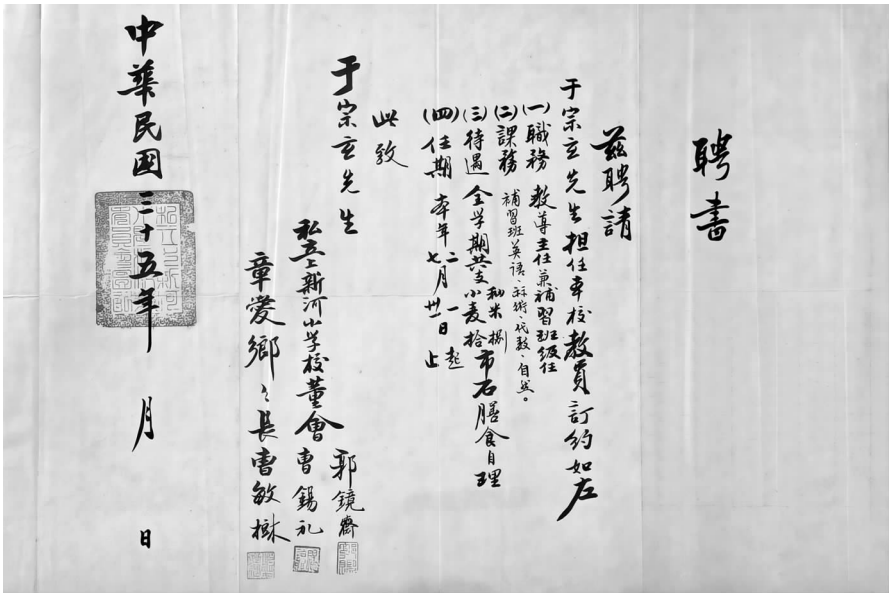
(文/黄　靖)

民国时期金坛上新河小学教师聘书收藏记趣

在收藏界，有一句行话叫做“捡漏”，指在卖家未察觉物品真实价值的情况下，买家以远低于市场价的成本购得高价值的藏品。我觉得，“捡”是一种机缘，仅是获得与藏品相遇的机会。至于能否发觉是“漏”，则在于收藏者本身的认知水平。想要捡漏，亦或是能够买到称心的藏品，机缘与认知，缺一不可。

以我的文史收藏之路为例，对于金坛人文历史的了解，也是逐步学习、慢慢拓展的过程。我也曾多次因事后才了解到某一段历史，回想到之前遇到过相关联的藏品，却由于认知水平的不足与之擦肩，而深感懊悔。但也曾有过因平时的知识积累，把握住相遇的机缘果断入手，而欣喜不已。

几年前，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一张民国时期金坛县中的首届毕业证书，


聘書

茲聘請

于宗立先生担任本校教員訂約如左

(一)職務 教導主任兼補習班級任

(二)課務 補習班英語、珠算、成教、自然。

(三)待遇 全学期共支小麦拾市石膳食自理

(四)任期 本年七月一日起 廿一年七月一日止

此致

于宗立先生

私立新河小学校董會 董會 郭鏡齋

章愛卿 曹錫礼

校長 曹敘楙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月 日

民国三十五年金坛县私立上新河小学教师聘书

证书主人名为于宗玄，但因高昂的售价望而却步，只是保存在收藏夹中。今年七月的一天，不知怎得灵光乍现，我鼓足勇气向卖家还价，卖家答复说早已售出，同时善意的提醒我，其有几张于宗玄的个人档案正在拍卖，且价格亲民。



本文作者在金坛博物馆举办“唯吾金坛”个人收藏展

我点开卖家推送的链接查看，是三件民国时期于宗玄的个人档案，仅剩九个小时截拍。其中，一件是于宗玄在宜兴私立东坡初级中学任教的聘书，一件是其在国立江苏医学院（抗战时迁至重庆）任职的委任状。虽然于宗玄是金坛人，但归根结底这两件资料并非属于金坛，我自然没有多少兴趣。

还有一件资料是于宗玄在私立上新河小学任教的聘书，卖家在介绍栏中标注为南京私立上新河小学。我扫了一眼聘书，发现并无南京字样，脑海中随即浮现出了金坛建昌上新河的地名。于是，我立马端详起这张聘书，当聘书中“章爱乡”的地名映入眼帘，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笃定，我在查阅资料时见过这个地名。

所谓眼见为实，我立马翻阅《金坛县志》，结果令人亢奋。清末，金坛改都为图，改里为村。宣统二年（1910），全县分为 1 个城厢市区、8 个乡、22 个镇、162 个图。其中孝德乡的庄城桥镇辖章字图、爱字图等 8 个图。民国时期改变建制，章字图和爱字图先合并为章爱乡，后章爱乡和庄一乡合并为上新河镇，属神亭区署的建北乡。

在确定聘书中的章爱乡属于金坛后，我又立即查阅《金坛县教育志》（征求意见稿），教育志中记载的上新河小学创办人，正是聘书上显示的校董会成员郭镜斋。据《建昌镇志》记载，郭镜斋是金坛建昌小桥头村人，一生从医，救死扶伤，在实现革命人道主义方面做了不少贡献，曾担任过抗日民主政府建昌区区长。

至此，这张私立上新河小学教师聘书的身世已经揭开，截拍时间所剩不多，我立马参与竞拍。或许是得益于卖家错误标注地域的原因，竞拍并不激烈，我最终将其收入囊中。其实，通过网络检索，可见信息只有南京上新河小学，毕竟地处金坛上新河的乡村小学，早已随着教育资源的不断整合被慢慢遗忘。

这张聘书，最终以合理的市场价成交，并不算捡漏。毕竟，地域性的藏品，只会在特定地域的收藏者眼中闪光，这便是地方文史收藏的独特性。之所以感到欣喜，与聘书主人的身份不无关系。于宗玄，是1925年金坛县中第一届九位毕业生之一，毕业成绩为第三名。而毕业成绩第二名的同班同学，则是数学巨匠华罗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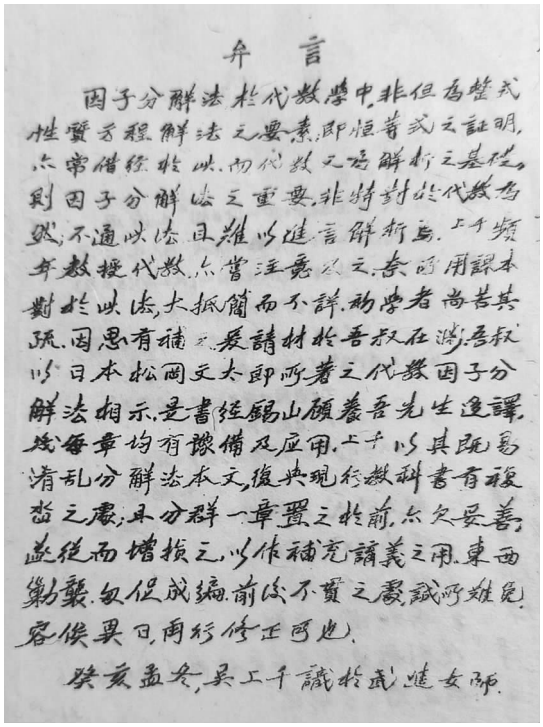
后来，每每想到这件事，既庆幸于那一天机缘巧合的询价，否则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藏品中，无论如何也搜索不到这件被错误标注地域信息且即将截拍的聘书；又庆幸于平时的点滴积累，记忆中留有关于上新河、章爱乡这些金坛地名的认知，否则也会被卖家标注的信息所误导，与一件带有金坛印记的藏品失之交臂。

起于机缘，成于认知。这世上的许多事，似乎也是如此。

（文/彭　程）

孤本文献——《代数学因子分解》蜡刻油印校本现世

日前，一册民国12年（1923）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代数学因子分解》蜡刻油印校本讲义在常州现世，填补了江南女子理科教育史的史料空白。依托讲义弁言、校本实物、最新人物史料互证，可以完整还原百年前常州女学文理并重、重智求真、突破世俗偏见的真实面貌。


弁言

因子分解法於代数學中非但為整式性質方程解法之要素即恒等式之証明亦常借经此以而代数之為解析之基礎則因子分解法之重要非特對於代数為然不通此法且難以進言解析焉上子頻年教授代数亦嘗注意於之奈所用課本對於此法大抵簡而不詳初學者尚苦其疏因思有補之要請材於吾叔在滬吾叔以日本松岡文太郎所著之代數因子分解法相示是書經鶴山顧養吾先生逐譯綫每章均有豫備及应用上子以其既易清乱分解法本文復典現行数科書有複咎之處乃分群一章置之於前亦欠妥善遂從而增損之以作補充講義之用東西勦襲纯促成編前法不賢之處識所難免容俟異日再行修正可也

癸亥孟冬吳上子識於武進女師

《代数学因子分解》弁言

偏差，源于传世女校文献多为教化类、文艺类读本，能够真实反映女子理科教学深度的一手实物史料极为稀缺，使得后人长期低估民初苏南地方女校的办学格局与课程高度。

武进女子师范学校为常州近代女子师范教育的核心源头，办学始于1906年粹化女学，1912年正式定为县立，校址设于青果巷都城隍庙，设师范、中学、附小三部，以“坚忍”为校训。学校不仅系统培养新式女师资，还开设贫民夜校、义务学堂普及平民教育，是民国苏南地区推动女性新式教育、打破性

别教育壁垒的重要阵地。此册 1923 年代数油印讲义为校内专用校本教材，从未公开出版，存世极少，是研究民国地方师范理科教学难得的原始文本。

一、文本溯源

本册讲义的编纂初心与学术来源，完整记录于卷首弁言，也是解开其文献价值的核心依据：

因子分解法于代数学中，非但为整式性质方程解法之要素，即恒等式之证明，亦常借径于此。而代数之为解析之基础，则因子分解法之重要，非特对于代数为然。不通此法，且难以进言解析焉。上千频年教授代数，亦尝注意及之。奈所用课本对于此法，大抵简而不详，初学者尚苦其疏，因思有补之。爰请材于吾叔在渊，吾叔以日本松冈文太郎所著之《代数因子分解法》相示。是书经锡山顾养吾先生迻译，几每章均有豫备及应用。上千以其既易淆乱分解法本文，复与现行教科书有复沓之处，且《分群》一章置之于前，亦欠妥善。遂从而增损之，以作补充讲义之用。东西剿袭，匆促成编。前后不贯之处，诚所难免，容俟异日，再行修正可也。

癸亥孟冬，吴上千识于武进女师。

通读全文可见，编者吴上千具备成熟、专业的教材研判能力。他常年讲授代数，深知因式分解是整个代数学体系的根基，是学生进阶学习与未来从教必备的核心能力。面对市面通行课本内容简略、体系残缺、不足以支撑师范生深度学习的现状，他主动寻求高端学术资源，同时审慎甄别域外译本的不足，发现原译稿体例混乱、章节倒置、内容重复，遂重新整编、删繁补缺、优化逻辑，最终形成适配武进女师学情的高阶校本课程。这一编纂过程充分证明：民国常州基层女校的理科教学，早已摆脱被动照本宣科的浅层模式，具备自主教研、课程重构、体系优化的办学能力。

二、人物考述

依托最新地方文史资料，可完整厘清四位关键人物的学术脉络，串联起一条日本原著——沪苏名家私译——常州本土改编——女校课堂落地的完整传播链条，史料确凿、闭环可信。

讲义编者吴上千，武进薛墅巷人，为民国知名数学家吴在渊之侄。他终身深耕常州女子理科教育，先后执教武进女师、芳晖女中，专授代数课程，数理功底扎实、教学严谨踏实。其人文素养亦颇为全面，1926 年曾与英文教师合作，为芳晖女子中学校歌谱曲，是民国时期常州少见的文理兼修、扎根女教的

优秀基层教员。因其专注课堂教学、不务虚名，方志无独立传记，其人其事唯赖此册孤本讲义与校史记载得以传世。

吴在渊（1884—1935），武进人，近代数学泰斗。他自学精通英、德、法、日四国语言，是中国近代数学教育奠基人之一。早年任教清华，后创办上海大同大学并长期主持数学系，主张“中国学术，要求自立”，一生翻译、编纂数十套全国通用数学教材，也是国内最早研究数论的学者之一。吴在渊藏书丰富、学术视野开阔、提携后辈无私，正是依托其顶级学术圈层与私人文献积累，稀缺的域外译稿得以下沉常州基层女校，成就了这份高水平校本讲义。

顾澄（1882—1947），字养吾，无锡数学先驱。为明代东林党顾宪成后裔，留学日本，民国早期顶尖数理教育家。1909 年译《四原原理》，为国内首部系统介绍四元数的著作，填补近代数学空白。先后执教北大、清华、交大、东北大学，曾任东北大学数学系主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率先开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无穷级数等国内前沿课程，1935 年参与创建中国数学会。他与吴在渊同为清华早期算学同人，学术互通、文献共享，其代数译稿从未出版，仅在沪苏教员圈层私传，属于极罕有的未刊学术资料。

松冈文太郎，日本师范数学研究者。经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民国数理总书目，未见其单行专著出版记录，可判定其内容源自日本师范代数专项章节，近代学人单独摘译、独立成册，仅在国内教育界小众流转。

由此形成完整可信的知识传播链：松冈文太郎原著内容——顾澄未刊私译稿——吴在渊学术资源流转——吴上千武进本土化改编——武进女师课堂油印授课。整条脉络唯此孤本可证，具有极高的教育史、数学传播史、地方文史价值。

三、课程实证

相较于大众印象中民国女校“重文轻理”的粗浅教学，这份 1923 年讲义展现出远超时代平均水平的教学深度。全书体系严密、梯度清晰，涵盖初等代数核心基础与多项高阶难点，包括指数运算、多元多项式、高次因式分解、分组拆解、添项拆项技巧、剩余定理、未定系数法等专业内容，更包含对称式、轮换式、交代式等高阶抽象代数内容。

此类结构性代数知识高度依赖抽象思维、逻辑归纳与严谨推演，在同时期多数男子中学中仍属拓展难点，而武进女师将其纳入常规必修课程，专门编印讲义系统精讲，足以证明一百年前常州女子师范的理科教学标准，完全对标同期高水平男子师范，不存在性别降维教学。

油印校本的形式，更折射出民国基层教育的实干风貌。在经费紧张、统一教材不足、时局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武进女师不将就、不敷衍，依托本土学术资源自主研发课程，以严谨教风突破时代局限。在全社会普遍质疑“女子不宜深研数理”的舆论环境下，武进女师坚持文理均衡、智德并重，以科学训练培育女性理性思维，是江南近代女子教育极为珍贵的革新实践。

四、历史价值与时代审视

常州近代文教鼎盛、人才辈出，尤其女性群体才情卓然、群英荟萃，绝非偶然。法律思辨、文学品鉴、艺术创作、教育教研的高阶能力，底层逻辑皆源于条理分析、层层推演、严谨求证的思维素养，而这些能力，正是百年前武进女师系统化代数教学长期培育的结果。一代代女师学子带着理性思维与科学认知走出校园，深耕苏南基础教育一线，持续更新社会对女性智力、能力、价值的传统认知，为江南女性智识觉醒奠定坚实根基。

客观而论，这份讲义仍带有鲜明时代局限。民国新式师范门槛较高，受学费、家庭观念、社会结构制约，理科优质教育仅惠及城区少数女性，乡村女性仍难接触系统新学；同时民国女性职业通道狭窄，数理才干难以充分施展；学术资源依赖私人圈层小众流转，也反映近代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现实短板。

1923年武进女师代数油印讲义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刷新了近代江南女子教育的传统认知，证明百年前常州女学早已跳出单一闺范教化模式，形成德育、美育、智育、科学教育并举的现代办学格局。

五、结　语

一册泛黄油印旧册，承载着常州近代教育最可贵的革新力量。在保守盛行的民国初年，武进籍教员吴上千依托乡贤吴在渊的学术视野，结合无锡名家顾澄的稀缺译稿，融汇中日近代数理成果，为武进女师打造出一套严谨、高阶、系统的女子理科课程，无声打破“女子无需深究数理”的世俗偏见。

所谓“算学开闺智”，即是以数理启理性、以科学破桎梏、以智识开新风。百年回望，这份孤本讲义不仅见证了常州女学文理并重、开放超前的办学高度，更记录了江南女性挣脱认知束缚、走向独立求真的觉醒历程，为近代江南女子科学启蒙与地方文教革新，留下了一份坚实、厚重、无可替代的常州文脉见证。

（文/张　涛）

一张渡江战役前夕的常州筹借军粮收据



借粮临时收据

1949 年 3 月，屯兵江北的百万人民解放军蓄势待发，准备在长江汛期来临前发起渡江作战。坚守在常州地区的各级地下党组织，为配合和迎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在坚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和发动群众工作。

武南地区地下党领导人钱梦梧、陆道南等召集各地区负责人开会，要求为保障南下人民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发动开展筹借粮草和船只工作，力争保障进驻常州的子弟兵要粮有粮、要草有草、要船有船。

这张借粮临时收据，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横林镇地下党开具给借粮群众的。收据上载明“今借到第六保江村粮户军粮念玖斤肆两，合将先给临时收据，此证。横林镇农商办事处。第八二号。”并钤有负责人“周祥祺”印章。

第六保江村即今横林镇江村村。解放战争时期，当地村民、地下党员周祥祺在村里成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站，多次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组织活动，并秘密发展了多名地下党员，群众基础较好。在筹借军粮工作中，他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积极支持，短期内即筹措粮食 5000 多斤，出色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筹粮任务。

常州解放后，周祥祺任横林镇首任党总支书记，这些老百姓借给人民解放军的粮食，也由当地政府一一偿还。转眼 70 多年过去了，这段往事随着那些参与者和经历者的离开，也逐渐被人遗忘。恰巧也是 3 月，这张保留下来的借粮收据，机缘巧合地被笔者征集、收藏，再次让我们回忆起这段与常州解放有关的历史往事。

（文/杨新文）

一纸题词寄初心 百年家风伴新婚

——题词新婚纪念封的收藏

人生至喜，莫过于执子之手、共赴白头；人生至幸，莫过于以赤子之心，得前辈先贤的殷殷嘱托。在我与陈晓梦结为连理、开启人生新篇之际，有幸获七一勋章获得者、革命先辈李大钊之孙、共产党人优良家风传承人李宏塔先生，为我们的新婚纪念封亲笔题词。这一纸墨痕，不仅是对一场婚礼的美好祝福，更是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落在寻常烟火里的温柔传承。

因为婚期是在今年（2026）的 4 月 22 日，而这枚新婚纪念封是精心设计的样封，信封背面的相关印刷信息已提前完整排版，版式庄重雅致，信息清晰规范。为更好地区分样封属性、凸显其特殊纪念意义，我们还专门设计制作了样封纪念贴，加贴于信封背面，让这枚承载着前辈嘱托的纪念封，在形制上更严谨、更具专属收藏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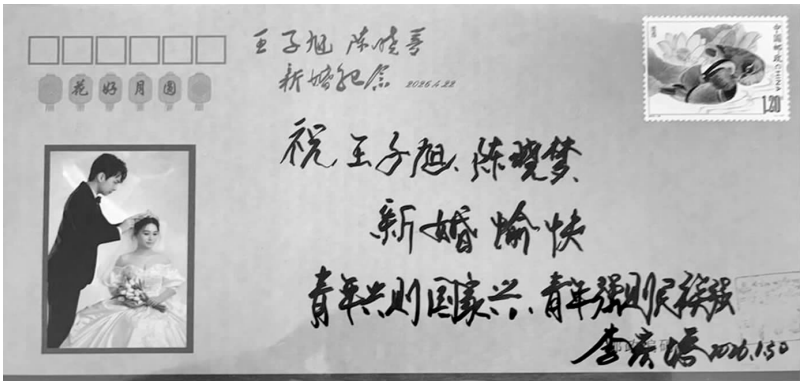
封面上，李宏塔先生的题词苍劲沉稳，力透纸背：

祝王子旭、陈晓梦

新婚愉快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民族强

李宏塔 2026.1.30



新婚纪念封

短短数语，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新婚愉快”是对我们婚姻的真挚祝福，而“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民族强”则是一位老党员对新时代青年的殷切期许。这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勉励，更是将红色家风与家国责任，融入了我们婚姻的起点。

当我们怀着忐忑与崇敬，向李宏塔先生表达心愿时，他谦和温厚、欣然应允。先生一生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始终以“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为信念，在民政岗位上深耕多年，心系百姓、情系民生，用一生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他提笔时，没有丝毫架子，目光专注而温和。笔锋起落间，我们仿佛看到了李大钊先生“铁肩担道义”的风骨，也看到了李宏塔先生一生坚守的朴素与纯粹。

这枚带有先生亲笔题词、专属样封标识与样封纪念贴的纪念封，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婚庆纪念品。它是一份精神传承的信物，提醒我们：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相守，更是责任与担当的同行；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日常，更应心怀家国、向阳向上；青年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者，更应是民族复兴的建设者。

往后，我们会将这枚纪念封妥善珍藏，让李宏塔先生的嘱托，成为我们婚姻与人生路上的灯塔。我们会以先生为榜样，把红色家风融入日常，把家国情怀刻在心底，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在携手同行中不负韶华。

（文/王子旭）

百　渎　村

常州太湖湾畔，水波浩渺，芦苇苍苍，藏着一个名叫百渎的村落。村子依水而建，青石板路蜿蜒曲折，老人们坐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总爱讲起那个关于“狸猫换太子”与三杆大旗的故事。



百渎村蓼莪寺

相传北宋年间，皇宫里正上演着一场惊心动魄的阴谋。宋真宗的李宸妃诞下皇子，却被心狠手辣的刘皇后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调包，诬陷李宸妃生下妖孽。真宗震怒，将李宸妃打入冷宫，而真正的皇子则被忠心的太监陈琳偷偷抱出皇宫，一路南下，只为躲避刘皇后的追杀。

皇子尚在襁褓之中，陈琳抱着他昼伏夜出，几经辗转，行至太湖湾附近。陈琳看到湖边有一艘正在捕鱼的小船，船上一对夫妇正弯腰整理渔网。陈琳来不及多想，抱着皇子冲到船边，“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声音颤抖：“大哥大嫂，求你们救救这孩子！他是……他是忠良之后，若落入恶人之手，必遭不测！”船上的夫妇便是“百渡村”的王采和他的妻子张氏。

王采 30 多岁，面色黝黑，是个老实本分的渔民，却有着太湖汉子的侠义心肠；张氏心地善良，见陈琳神情恳切，怀里的孩子小脸通红，正哇哇大哭，顿时心生怜悯。虽不知这孩子的真实身份，但见他可怜，便点了点头。

陈琳大喜，将皇子小心翼翼地递给张氏，又从怀中掏出一块刻着龙纹的玉佩，塞到王采手中："这玉佩可作信物，若他日有机缘，凭此玉佩，定能让孩子认祖归宗。"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王采夫妇抱着皇子回到村里，给孩子取名"阿贞"，寄意其成长为品性正直之人，对外只说这是远房亲戚家的孩子，父母双亡，便接来抚养。百渡村的村民都淳朴善良，也没人多问。

张氏待阿贞如同亲生，每天都会做他爱吃的鱼羹，冬天怕他冻着，连夜缝棉衣；夏天怕他热着，扇着蒲扇守在他床边。王采则常常带着阿贞去湖边捕鱼，教他辨认水性，告诉他太湖的故事。阿贞也十分懂事，小小年纪就会帮着夫妇俩做家务，晚上还会给他们捶背揉肩，一家三口的日子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刘皇后派来的暗探就找到了百渡村。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村里四处打听，专问有没有外来的孩童。王采夫妇心里一紧，知道是冲着阿贞来的，赶紧将阿贞藏到村后芦苇荡深处的柴房里。暗探在村里搜了两天，没找到线索，却注意到王采行迹反常。他每天都会绕远路去芦苇荡，身上还带着给孩子的吃食。

第三天夜里，月色朦胧，王采像往常一样提着食篮去柴房。刚走到柴房门口，就被三个暗探拦住了去路。"你这汉子，天天往这荒郊野岭跑，藏的什么人？"为首的暗探眼神阴鸷，伸手就要夺王采的食篮。王采紧紧护住食篮，厉声喝道："不过是给看芦苇的老人送点吃的，与你们何干！"

暗探哪里肯信，上前就要动手搜查柴房。王采知道，柴房里的阿贞一旦被发现，必定性命难保。他猛地将食篮朝暗探砸去，趁着对方躲闪的间隙，转身就往芦苇荡深处跑，一边跑一边喊："阿贞，快跑！别出来！"暗探以为王采要去报信，立刻追了上去。太湖边的芦苇荡密密麻麻，夜色中更是难辨方向，

在一处湖边浅滩，王采被暗探围住，身上被砍了数刀，鲜血染红了湖水。王采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死死抱住为首暗探的腿，不让他们再前进一步。直到张氏带着村民赶来，暗探才怕事情闹大，仓皇逃走，而王采却已倒在血泊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张氏抱着王采的尸体，哭得肝肠寸断，村民们也都红了眼眶，暗暗发誓，一定要帮王采守住这个秘密，护住这个孩子。

从那以后，张氏更加小心，她带着阿贞搬到了村东头的破旧渔船里，白天靠织渔网为生，晚上偷偷教阿贞读书，村民们也时常接济她们，帮着留意外来的陌生人。阿贞渐渐长大，到了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出落得眉清目秀，气度不凡。

这一年，宋真宗病重，刘皇后企图独揽大权，可朝中大臣们却都在暗中寻找当年失踪的皇子。原来，陈琳当年虽被追兵围困，但侥幸逃脱，这些年一直隐姓埋名，暗中联络忠良之臣，等待时机。他记得当年将皇子托付给了太湖湾百渡村的王采夫妇，便派护卫老将史成乔装成商人，前往百渡村寻找。

史成历经波折，终于在村东头的渔船里找到了张氏和阿贞。当史成看到阿贞身上的龙纹玉佩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即跪倒在地："殿下！老奴终于找到您了！"阿贞愣住了，张氏也红了眼眶，她拉着阿贞的手，哽咽着将当年陈琳托付孩子、王采舍命护主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阿贞听完，泪水夺眶而出，他跑到王采的墓前，磕了三个响头，额头都磕出了血："老爹爹，您的恩情，阿贞会牢记一辈子！"随后，在大臣的护送下，阿贞告别了张氏和村民，踏上了返回京城的路。离别时，张氏哭得撕心裂肺，村民们也都来送行，阿贞一步三回头，对着百渡村的方向深深鞠躬："等我回来，一定报答大家的恩情！"

回到京城后，阿贞在陈琳等大臣的帮助下，揭露了刘皇后的阴谋，还了李宸妃清白。不久，宋真宗驾崩，阿贞登基为帝，更名为祯，便是宋仁宗。仁宗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旨派人前往百渡村，接张氏进京享福，还要封赏所有帮助过他的村民。

可张氏在百渡村住惯了，她舍不得王采的坟墓，也舍不得这里的山水和村民，便婉言谢绝了："陛下能平安归来，执掌朝政，老身就心满意足了。你老爹埋在这里，我想陪着他，也想守着这个救过陛下的村子。"村民们也纷纷表示，不求封赏，只愿陛下能做个好皇帝，让百姓安居乐业。

仁宗知道他们的心意，也不再强求，但心中的感激之情却愈发浓烈。他于是下旨，将"百渡村"改名为"百渎村"，"渎"取"水脉相通、恩情相连"之意，既纪念这里依太湖而居的地理，也象征着他与百渎村百姓之间，跨越皇权与平民的深厚情谊，如同太湖的水脉，永远相连。

同时，仁宗还派工匠前往百渎村，在王采的墓前和张氏的住处之间，竖起三杆大旗：第一杆旗绣着"忠良之家"，表彰王采舍命护主的忠义；第二杆旗绣着"养育之恩"，感恩张氏十几年的含辛茹苦；第三杆旗绣着"太湖遗爱"，铭记百渎村百姓的善良与庇护。

念及百渎村依太湖而居，村民多以捕鱼为生，却常受湖水涨落不定、渔船出入不便之扰，仁宗又心生一计。他召来工部大臣，郑重下令："百渎村百姓曾于朕有再造之恩，朕命你们即刻调派工匠，在百渎村东西两侧各挖一条小河，让两条河贯通太湖，既能方便村民出行捕鱼，又能在湖水泛滥时疏导水流，保

护村落安宁。这条河，就命名为‘护村渎’，以此守护这片曾庇护过朕的土地和百姓。”

数月后，两条小河顺利完工。河水清澈见底，缓缓流淌着贯通太湖，村民们的渔船可以轻松从村口驶入太湖，再也不用受湖水涨落的困扰；遇到多雨季节，多余的湖水也能通过小河顺利排出，村子再也不用担心被淹。“护村渎”不仅守护着百渎村的安宁，更将阿贞与百渎村百姓的情谊，永远流淌在了这片土地上。

后来，张氏在百渎村安详去世。仁宗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特意下旨为她修建陵墓，与王采的墓并排而立，还派工匠雕刻了石人、石马立在墓前，规格如同皇家陵寝。他还亲自写下祭文，派人送到百渎村，祭文写道：“朕本孤弱，流落民间，得王采舍命相护，张氏含辛养育，百渎百姓庇佑，方有今日。此恩如太湖之水，浩浩荡荡，朕永世不忘。”

如今，千年过去，百渎村的那三杆大旗早已在岁月中消散，王采与张氏的陵墓及墓前的石人石马，也被整理土地时深埋。每当太湖的风吹过遗址之处，仿佛还能还能看到王采当年护主的身影，听到当年仁宗感恩的心声。村里的老人们依旧会给孩子们讲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善良终有回报，忠义永载史册，感恩要刻在心里。而百渎村，也因为这个传说，成为了太湖湾畔一个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地方。

（文/何晓华　智　化）

古　村

古村位于常州市青果巷之北。

古村街巷东西走向，东临正素巷，西至晋陵中路中段（原西庙沟），中间与天井巷相通，全长420米。古村是南宋末年常州人民在抗元斗争过程中遭元兵屠城破坏后仅存下来的最古老街巷。



古　村

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世祖忽必烈下旨伐宋，左丞相伯颜亲率20万大军，从襄阳出发，沿汉水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克南京、占镇江、得常州、犯无锡，直指南宋首都杭州。就在南宋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泉州司理、回宜兴守母丧的姚訚，立刻从宜兴赶到无锡和晋陵两县，与陈炤和包圭商讨收复常州大计，又派人员去和退守江阴县的张世杰约定联合光复常州。张世杰派都统刘师勇率军增援，在军民齐心协力下，夜袭常州城，一举收复常州，同时一鼓作气连夜攻下常州西北屏障吕城。

常州收复的消息传到了大宋朝廷，大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元信心。南宋皇帝诏授姚訚为常州知州，陈炤为通判，包圭署理武进知县，另派副都统王安节带兵前来协防。伯颜获悉后，气得哇哇直叫，率领20万兵马再围常州，常州百姓毫无惧色，一方面加强守城防御，一方面派人突围与文天祥取得联

络，请求获援，不料援军受阻于五牧，全军覆没，常州成为一座孤城。

伯颜攻城50多天仍未占领常州，于是他派南宋降将城下喊话，用攻心术想策反城内将士，将士们不为利诱，严厉痛斥，箭射叛徒，吓得策反者狼狈而逃。伯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抓来四周百姓逼迫他们堆起土垒，慢慢向常州城逼近，守城军民无法向自己手无寸铁的的同胞射击，常州城危在旦夕。此刻，常州城内粮尽弹绝，连树皮老鼠都吃光了，士兵们为了气气伯颜，将纸剪成大饼的样子大口咬嚼，伯颜暴跳如雷，又增调兵力重围常州。土垒堆到城墙后，元军猛烈发射炮火。常州城墙被炮弹炸塌，伯颜登上城楼，攻入城中。常州军民誓死不降，和元兵展开巷战。深受重伤的姚訚为了不落入元兵之手，毅然跳入火中自焚。陈炤也毅然表示："离此一步，非我死之地"，杀敌数人后，壮烈殉国。双刀王安节被敌军砍伤了左股，仍然屈着双腿继续杀敌，最后被生擒活捉，拒绝投降，惨遭杀害。而包圭在化龙巷指挥军民抵抗，不幸被捉，"不屈，大骂贼而死。"全城百姓无一投降，数十万军民全部被元军杀害，仅剩七人劫后余生，伯颜最后不得不赞叹"常州，纸城铁人。"南宋丞相文天祥在抗元战败后，被元兵押送北上，途经常州时，写下了《哀常州》一诗，诗云："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壮甚睢阳守，冤哉马邑屠。苍天如可问，赤子果何辜。唇齿提封旧，抚膺三叹吁。"以悼念常州不屈的死难军民。"常州之战"被史学家列入"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的"临安之战"中最惨烈的一页。

今古村就是元兵屠城后仅存的居民住宅点，后来集聚成巷，以"古村"命名。

（文/包立本）

柚　山　村

现在的柚山村，得名于附近的一座小山。古代不叫柚山，明朝以前这个地方叫老虎山。

相传，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兵伐陈友谅，转战金坛时，安营扎寨于县城西南的顾龙山下（亦称乌龙山）。这里水陆交通畅达，易攻易守，而且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此时朱元璋踌躇满志，率众登上顾龙山顶，学三国时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曹操那样，雄心壮志，豪情满怀。他高瞻远瞩，极目远眺，突感词性大发，随即口占一首：“望西南，隐隐神坛。独跨征车，信步登山。烟寺迂迂，云林郁郁，风竹珊珊。尘不染，浮生九还。客中有，僧舍三间，他日偷闲，花鸟娱情，山水相看。”这首词后来被勒石并建造成了御碑亭，至今还在顾龙山下。

朱元璋吟词之后下山休息，地方官员命人抬来几大缸用当地“标米”自酿的黄酒，犒劳讨伐大军。朱元璋饮后大悦，赞其曰：“纯稠如蜜，芳香馥郁。”因



柚山村峭壁悬宕

长途行军劳累不堪，加上酒味清香甘甜，不觉多喝了几碗，以致大醉。地方官员急忙寻找醒酒之物，有人奉上刚从树上摘下的新鲜柚子，朱元璋吃了后问道："此乃何物？"答曰："此果名叫柚子。"朱元璋大加赞赏曰："甘甜有加，提神醒脑，哪里产的？"答曰："此处往南数公里之遥，长荡湖东岸儒林的老虎山。"朱元璋连声慨叹："老虎山柚子，绝佳水果，吾从未吃到过如此鲜美的水果。"其实不是柚子有多好吃，朱皇帝行军作战劳苦，又多喝了美酒，吃了新鲜的水果当然感觉味道不错了。第二天军队开拔，朱元璋命当地官员将昨晚饮剩的几大缸黄酒密封起来埋在地下，说待回头来再喝，可战争年代军队作战流动，朱元璋再也没有回到金坛。

三年后，朱元璋歼灭群雄，登基为帝，金坛官员将当年埋在地下的酒进贡给朱皇帝，朱皇帝忆起此事，随即开封与群臣共饮。经密封埋在地下多年的酒更加甘醇如蜜，朱皇帝与大臣们一致赞曰："好酒！"当即赐名"封缸酒"，并钦定为朝廷贡酒。酒后朱皇帝又想起了当年酒后吃的柚子，随即问金坛官员："朕当年在顾龙山下，喝得酩酊大醉，幸有柚子解酒，那柚子是产在那个什么山啊？"答曰："长荡湖东岸儒林的老虎山，皇上，此时也正是柚子上市的季节，知道皇上喜欢吃，你看我们也带来了。"皇帝曰："产柚子的山应该叫柚子山。"从此以后，老虎山就叫柚子山了，柚子山下的村庄就叫柚子山村，后来为图方便顺口，当地人就简化成柚山村了。《常州府志》卷四记载"周边十余里昔人多种橘柚于其山故名柚山"。几百年来，柚山村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文/诸葛佩圣）

桃　园　村

桃园村，位于古京杭大运河南岸，旧称桃园，今已改建为桃园新村。明清时期，该处曾是风景优美的著名园林，周围桃树绵延数里，每到桃花盛开季节，缤纷满目，游人如织，因此被喻为“武陵桃源”。曾有文人作诗赞美：“载酒寻芳甸，行行曲阜东。罗绮开金雀，笙歌拥玉骢。春风迷醉眼，疑是武陵中。”

桃园之名源于明末兵部侍郎李长祥与金陵才女、号称“钟山秀才”姚淑之间的一段佳话。

李长祥字研斋，四川达州人。少年时，即品貌出众、文武双全，老师称他“神采英毅、喜言兵”。明崇祯癸未科举，他中了“探花”，因此而进入翰林院。李自成打入北京后，李长祥“遭榜掠”，即李自成大顺政权曾招降过他，但他乘混乱之际，逃到南京，福王授予他监察御史之职，但南明政权操纵在马士英、阮大铖之手，他们结党营私，忌贤妒能，大肆散布李长祥“降闯”而不得重用。在遭到排挤后，李长祥投奔鲁王朱以海，鲁王授予他兵部右侍郎之职，并奉为“浙东义军盟主”，他集众在浙东一带抗击清军，他的部队且耕且屯，纪律严明，军不扰民，打了不少胜仗，一时声威大振，但清已立国，抗清终成败局。

舟山陷落时，李长祥为清兵总督陈锦所俘，羁于江宁。时江宁闺秀姚淑，慕长祥之名，私往其处论诗问艺。双双一见钟情，竟难分离，时长祥元配夫人已卒于兵荒马乱之中，李、姚遂为秦晋。未几，两人乘守者疏忽，逃出金陵，辗转来到常州桃园隐居。他们增建了“桃园草堂”“读易台”“海棠居”等，终日吟咏其间。

当时常州的一些文士及前任通判谢良琦等常雅集于此论文赋诗。长祥的《天问阁文集》中《桃园草堂记》说：“予居东门外之桃园，园背城而僻，多桃树，毗陵之人，春日以看花饮酒者也。”“读易台”是李长祥攻读易经之处。“海棠居”则是他夫人读书作画之处。长祥在《海棠居记》中说：“余内人居一小斋，读书其中，名曰‘海棠居’，妇女之性喜花，故虽以读书之居，仍花名也。”

姚淑著有诗集《海棠居集》，其间颇多夫妇唱和之作，为人所乐道。如“但



桃园读易台

得春风即有香，晴窗坐久觉衣凉。幽居自负书生性，却恨云鬟是女妆”。长祥和诗：“本是书斋静似秋，终朝书卷不梳头。登楼我亦看书去，闻妆书声又下楼。”诗中洋溢着夫妇相昵的闺中之乐。李氏夫妻终老后，此园渐荒。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全祖望曾多次来常寻迹桃园，其在《明兵部侍郎李公行状》中称“予过毗陵，累访其子孙，世无知者。”

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里曾是东郊有名的菜农村落。近年，桃园路南侧运河带绿化美化工程竣工，成为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读易台”等雕塑小品，布置在东坡公园一带市河之滨，成为一个景点。虽无“桃花千树绕”，却也是“绿色迷人眼”。

在民间，关于桃园地名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个姓梅的朴实青年，靠租了地主几亩地，种田过日子，由于单身一人，干活、洗衣、烧饭都要靠自己打理。因为穷，20多岁了，也没讨到老婆。有一年农历三月廿五日，青年从田间忙完农活回家，汗流浃背，又累又饿，忙着淘米烧饭，但想起饭锅还没洗呢。当他拎起锅盖，却见锅里饭已煮好，还蒸了两碗小菜，热气腾腾。再回头一看，只见自己又破又脏的衣服，也已经洗浆缝补好了。一连几天，天天如此，青年十分纳闷，询问左邻右舍，有谁去过他家，可都说没有。这天，和往常一样，青年又去干活了，想到了此事，心中好奇，便提前回家，一探究竟。

青年来到家门口，从门缝中向屋内观察动静，只见灶边有一位年轻女子，貌美端庄，正在做饭，他情不自禁地破门而入，上前道谢，那女子被他吓了一跳，羞涩地对他说，自己是天上仙女下凡，因为与青年前世有缘，又见他忠厚老实，独自一人怪可怜，所以前来帮忙。两人情投意合，彼此表示爱慕之心，不

久便结为夫妻。

好景不长，婚后仅半年时间，这天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女子惊恐万分，对青年说，我们缘分已尽，我本是天上桃花仙女私自下凡，如今王母娘娘要来抓我回天庭了。两人泪如雨下，表示即便是死，也不分离。

王母娘娘见此情景大怒，再次威胁桃花仙女，如果再不迷途知返，两人将遭到天谴。但两人决心已定，愿意同生共死。

又一阵狂风吹来，夫妻俩倒地而亡，只见刹那间仙女化作千株桃树，而青年则变成了万棵梅花，桃梅相映，一片鲜红，仿佛是用血泪在作无言地抗争。后人为了怀念青年和桃花仙女，便把这里叫做桃园村。

（文/包立本）

花　　街



20 世纪 90 年代的花街

金坛花街，旧名原为考棚街。老人讲述过这条老街改名的一桩悬案传说。

相传旧时，考棚街街上住着一户殷实富商，家资丰厚，门第清雅。主人膝下仅得一女，生得眉目如画、姿容绝世，父母视若掌上明珠，珍爱备至，早早立下规矩：女儿未满十六，绝不出闺门半步，外人更是无缘得见真容。待到小姐二八芳龄，家人才允她首次出门，游玩赏景。那日恰逢小雪纷飞，小姐缓步行走在考棚街上，足下一双绣花鞋精巧绝伦，鞋底针脚细密，绣着一枝清雅寒梅。她一路走来，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浅浅梅花印，引得路人驻足围观，惊叹天人下凡。自此之后，“考棚街”便渐渐被人唤作“花街”——“花”既是赞小姐容颜如花，亦暗合鞋上梅花、雪中芳踪之意。

大户人家爱女心切，护之愈深，竟为她筑起层层深院：女儿每长一岁，便添一道围墙、增一道院门。待到 16 岁时，外人若想见她一面，需接连穿过 16 道重门方能抵达内院，门禁森严，宛若深宫。

谁也不曾料到，这般绝世容颜，竟引来一场无妄祸事。

彼时，街上来了一个落魄乞丐，衣衫褴褛，形容枯槁，实则身怀异术——早年曾在峨眉山学艺，练就一门奇技，名曰“作揖开门”：只需对着大门拱手行礼，再坚固的门扉也会应声自开。乞丐偶然窥见少女容貌，顿时心生邪念，色胆包天，一心想要潜入深宅，行轻薄之事。

当夜天降大雪，鹅毛纷飞，万籁俱寂。乞丐趁夜深人静，凭借“作揖开门”的绝技，一路畅通无阻，穿过 16 道重门，潜入小姐闺阁，施暴作恶。事后唯恐罪行败露，他连夜仓皇出逃。为迷惑官府、扰乱追查方向，竟将鞋子反穿在脚上，一路从金坛奔往丹阳。雪地上的脚印方向全然颠倒，看上去仿佛是有人从丹阳而来、进入金坛，而非从金坛逃离。官府据此查探，线索错乱，辗转多日仍一无所获，此案最终悬置未破，成了一桩无头公案。而那乞丐逃至丹阳后，恶习不改，又犯他案，很快被官府擒获，判了刑罚。花街这桩奇案，便就此尘封，无人知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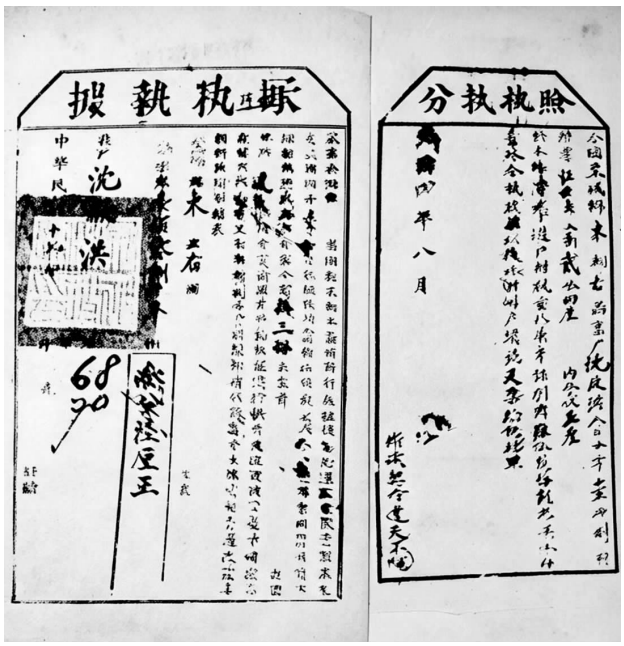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考棚街彻底成了人人皆知的花街，真真假假的旧事随漕河水缓缓流去。直到多年以后，乞丐刑满获释，已是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临终之际，他良心难安，终于将当年在花街犯下的恶行、反穿鞋逃罪的诡计，一五一十和盘托出。一桩尘封数十年的悬案，终在凶手弥留之际，大白于天下。

这段藏着美人、雪夜、异术与悬案的老街往事，便在金坛民间代代口耳相传，留在了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成为一段令人唏嘘的乡土传奇。

（文/李　永）

青果巷声远堂沈宅营建沿革及沈启洪家族谱系

青果巷东首临街的青果巷 27 号声远堂沈宅，是民国晚期常州实业营建与街巷人文变迁的重要实物遗存。此宅建设用地原属青果巷老牌原住民沈启洪的家族私产。民国 36 年（1947），常州实业家、同庆布厂大股东沈维耀，从沈启洪后裔手中购入该地块的一部分（包括目前保留的沿河三间二层楼房），随即动工营建宅院。



民国青果巷沈宅分执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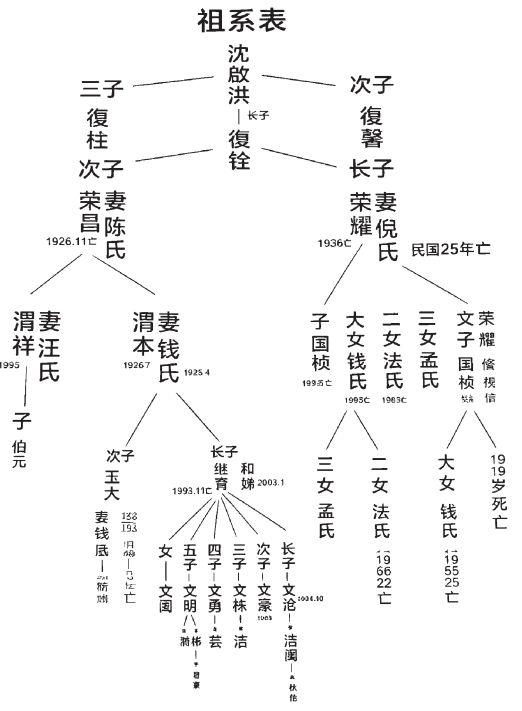
沈维耀与常州知名建筑幸福楼的建造者沈维贤为同胞兄弟。幸福楼于 1947 年竣工落成，青果巷 27 号沈宅动工建造时间与之仅相隔一年，是民国末年常州纺织实业界兄弟二人同期置业兴宅的珍贵实物印证。幸福楼后来并入常州大酒店范围，作为常州市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得到保护；而青果巷沈宅则留存巷内，见证了南市河畔数代人居变迁。

沈宅坐南朝北，紧贴南市河而立，是典型的江南临水民居，白墙黛瓦，格局精巧。宅院内部天井开阔舒展，民国时期原装花格门窗保存状态较好，梁枋细部雕饰雅致，尽显江南传统民居的温婉气韵。整栋建筑最具时代辨识度的一处细节，是石库门两侧留存着“文革”时期的金色口号，文字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虽下半部分字迹历经岁月风雨已有所漫漶，

却是那段特殊历史难得的印记，有着重要的时代记忆价值。

经过保护性修缮与业态活化，如今声远堂沈宅已不再沉寂，被打造为融合文创展示、休闲社交功能的特色空间，成为青果巷东片区颇受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点位，老建筑在当代焕发新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属沈启洪家族世代持有的青果巷 1 号（临河）、19 号、21 号（临街）三处老宅，至今仍深藏巷陌之中，建筑本体尚存，却尚未被大众熟知、也未开展系统性的文史挖掘与活化利用，如同沉睡的历史，等待被更多人知晓。



沈启洪家族谱系

溯源家族谱系，沈启洪家族的先祖在明代官任漕运主管官员，执掌南北漕运要务，凭借仕宦积蓄与社会地位，择居南市河旁的青果巷，置地建宅、开枝散叶。自明代迁入定居算起，历经明清更迭、民国动荡，沈氏一族在青果巷绵延繁衍已逾七代。家族至今妥善保存着历代地契、产权执照、民国拆执分执文书、手绘地籍地块四至简图以及沈启洪的世系表；手绘地籍所标注的地界范围，恰好与今日青果巷 27 号声远堂沈宅、1 号、19 号、21 号房屋实地位置一一对应，完整还原了数百年间家族地产传承与局部出让流转的全过程。

沈启洪一族自明代直至当代谱系未曾中断，留存有连贯的口述回忆与成套实物档案。这些建筑遗存与文史资料，详实记录了古巷家族兴衰、土地权属沿革、漕运人文底蕴以及近代实业置业历史，既是青果巷街巷史的鲜活注脚，也是常州地方宗族文化难得的一手见证，具备十分珍贵的乡土文史研究价值。

（文/沈一新）

广巷沈氏三善堂宗谱第七次续修序



《广巷沈氏宗谱》书影

盖闻天穹有北辰而众星拱之，江河有源头而支流衍焉。天地之大，莫大于人；人之重，莫重于祖。今欣逢盛世，广巷沈氏三善堂宗谱告成，实乃阖族之鸿禧，子孙之盛典也。

沈氏一脉，源出姬姓，乃黄帝之苗裔，周文王之胤胄。季载，周文王第十子姬载之别称，封于聃国，故称聃季载。古聃、沈通用，后世常称沈国，遂以国为氏，肇姓启族，迄今数千载矣。广巷沈氏，宗出本源，尊聃季载为远祖一世祖。宋绍熙年间，沈氏一支由吴兴武康苕溪（今浙江湖州德清）播迁无锡，由无锡迁居玉祁。生息繁衍至八十二世灿公，再由玉祁始迁广巷。历届续修，均推尊灿公为始迁祖，其子铭公，则为广巷第一世始祖。铭公生子方，方公生子二：璠、珊。璠公生五子：经、纶、组、绶、纬，世代居于广巷里，朴耕秀读，忠孝成风，蔚为常郡东南望族，所居广巷亦成为常郡东南三大名巷之一。珊公生子二：绣、絃，居徐巷。由五世始，而逐渐散支开叶，迁张公岸、迁洋荡、迁余巷。至光绪丁亥年间，玉祁分支沈巷与广巷合修。至民国 9 年，安桥、左舍里、祁舍、礼嘉宋家岸、运村、陆区、马杭老鸭村、宜兴方砀、岑村、六十亩岸等一众沈氏，源出大宗，决议合修于广巷三善堂。广巷沈氏以宽宏包容之胸怀，凝聚亲情，汇流成渠，最终修成 12 卷宗谱。

族史煌煌，世代簪缨，贤良辈出，或位列公侯，或文冠士林，或德昭乡里。

昔有先贤沈约，乃一代文宗，创“四声八病”之说；更有沈度公以台阁体书法称绝，深得明成祖赏识，被誉为“我朝王羲之”。清代有芑塘公、琳圃公进士及第；今有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力保护系统专家沈国荣先生；我国道路工程领域著名专家沈金安先生。此皆沈族之荣光，后人之楷模。

“三善”之堂号，其意蕴深邈。考其由来，与沈度公大有渊源。绍兴年间，沈度任余干县令时，为政清廉，留下“三大善政”——“田无荒土”，意即境内无荒芜之土地；“市无游氓”，意即境内无游荡之闲人；“狱无宿系”，意即狱中无积压冤案。如此政绩，深受百姓称颂，沈氏后人遂以“三善”为堂号，既表纪念，亦励后人。如今“三善”之义，内涵更丰，外延更广。可对应《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之大义；也可寓指“存善心、行善事、扬善名”之立身准则。凡此诸义，皆劝勉沈氏：立身行道之准则，垂训后世之箴铭。历代族人恪守此训，修身以正，持家以和，处世以仁，遂使沈氏门楣光大，世泽绵延。此次续修，特彰“三善”之名，意在令子孙朝夕省览，知所效法，勿坠家声。

广巷沈氏祠堂，据民国 9 年（1920）版宗谱记载，始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续建于乾隆辛未年（1751）、辛巳年（1761）两次，重修于光绪己卯年（1879）、再修于民国 9 年（1920）。其基本形制：前堂三楹，中为门道，左为厨房，右为祠役之所，民国时前堂东增一楹；中堂三楹，为飨祀之所，光绪年间中堂东增一楹为书室；后堂三楹，置神橱木主，后堂东亦增一楹，设洋荡支神龛。中堂后檐至后堂前檐筑穿堂二楹为甬道。一应享堂、膳室、书斋、厨房，均合体制。所建堂室，非一日之功、一次之力，俱是前人艰难缔造、积累功深之成果。或隔数年，或隔数十载，衔泥垒砖，终筑成后人拜谒先祖之圣地、族人寄托精神之殿堂，历经 250 余年。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沈氏宗祠与诸多姓氏祠堂命运相似，或荒废，或改作他用，或遭拆除。沈氏宗祠亦未能幸免，于 1984 年被拆，用于建造广黎小学。后学校撤并，祠基改为居民住宅，今已不复存在。呜呼！祖宗何以为安？族人何以拜祭？值续修告竣前，会长建钢、国春、国伟召族中贤达同谋建祠，在原址西北，钦志庵西建平房四楹，三楹为享堂，一楹为议事堂。新谱玉成，捧谱入祠；列祖神位，请于安坐。叩拜祭奠，以昭告列祖列宗，本届续谱、建祠，无愧先祖遗训，无愧后代相传。

广巷三善堂沈氏宗谱，由九世西雝公初创，十二世芑塘公于乾隆三十二年主修成谱；二修于嘉庆二十一年，由十三世心莲公、十四世尔识公主修；三修于咸丰五年，由十二世庭耀公主修；四修于光绪丁亥年，由十四世心绶公主修；五修于民国九年，由十五世乐山公主修；六修于公元 2011 年，由明荣先生任会长，夏立新任主编。

此次为第七次续修，虽与上次仅隔 15 年，然虑及上次修谱时未见民国版本，一至十五世仅有世系而无世表；十六、十七世世表内容仅凭回忆，错缪难免；部分分支未及列入；相关修谱文稿亦不够全面。且子孙繁衍、婚嫁丧葬等诸多事宜亦须增补入谱。因此，族内以十七世惠文先生为代表的诸多贤达相继提出应尽早续修、及时纠偏。2024 年末，族内建钢、国春、惠文、金祖等宗亲共同探讨续修可行之策，并征求其他分支意见，获得广泛响应与支持。惠文、俊浩及八咏堂沈仁根率先开始信息采编。至今年 5 月，建钢、国春、惠文、建洪、震寰、国忠、嘉一等宗亲成立筹备小组，多次举行座谈会，正式讨论续修事宜。6 月 15 日，筹备小组邀请各分支宗亲约 70 人，于朝安村委召开续修动员大会，气氛热烈，亲情融洽。大会提议聘请十八世国荣先生任名誉会长。成立续修理事会，一致推举建钢先生为会长，国春先生为执行会长；马杭鸭船村国伟先生、广巷建洪先生、国忠先生、金祖先生、洛社沈巷祖法先生为副会长，震寰为秘书长。成立编委会，由惠文任主编，俊浩任副主编，特邀本人参与编纂，并聘请八咏堂仁根先生和吴氏宗亲名誉会长吴建俊先生为顾问。至此，全面续修工作正式启动。

在理事会统一筹划下，续修工作如火如荼、有序推进。建钢先生承担七修之责，统领谱局事务，亲临每次座谈会指导，带领理事会成员走访宗亲、考察他姓宗祠。国春先生作为执行会长，运筹得当，布置合理。惠文先生作为主编，主持日常修谱事务，虽年长体弱，仍亲力亲为；与俊浩、仁根一同负责全族世表、世系的收集、整理与校对，尽心竭力，务求精准；内外联络不厌其烦，四处奔波任劳任怨，兢兢业业，本届谱成，其功至伟。建洪副会长、震寰秘书长勤策勤力，筹划座谈会、动员会、颁谱庆典等各项事宜；与各地宗亲往来联络，尤其在落实捐助与购谱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对资金规范管理、节俭开支，功不可没。副会长国伟先生以饱满热情，积极姿态，主动参与，以高度负责之精神，为家族文化建设出谋划策，无论续谱、建祠，皆首捐首助，实为族中之英。副会长祖法先生严于律己，在本支振臂领航，主动担责，关心谱事进展。理事会、编委会其他成员，金祖、建兴、金贤、伯荣、仲碧、克文（徐巷）、惠忠、维屏、全生、全海、志洪、鉴伟等宗亲，都各司其责，负责对本村之发动、动员、填写相关资料，确保任务落实与完成。邀请苏慎、上官鹤锦、张永方等先生撰写源流考、人物传序等相关文章 20 多篇，邀请钱浩新等书画家题写贺词。增设沈国荣院士为家乡捐建项目照片、村貌图及部分宗亲全家福、企业厂貌、优秀学子等彩照。

此次修谱，上溯得姓之始祖，下逮当代之裔孙，其间世系传承、支脉迁徙、

名人事略、文献著述，细加考订。新谱采用欧式谱系，竖式从右至左编排，宣纸印刷，古籍装帧，并配套精致函套（谱箱），以使本届续修臻美至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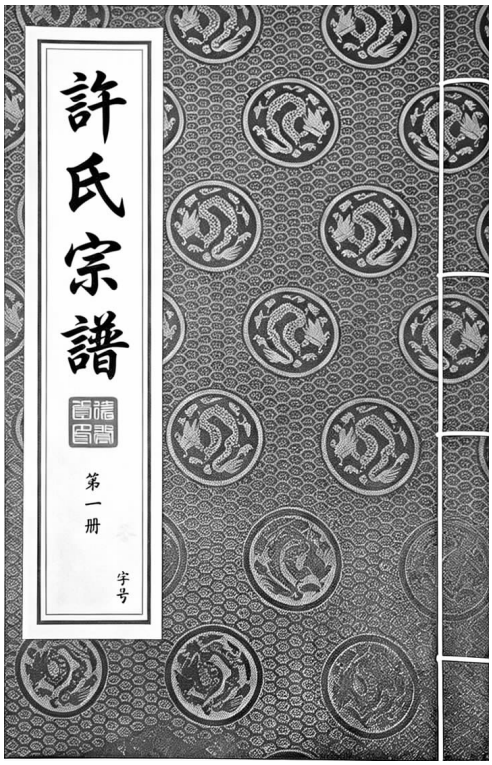
嗟乎！谱者，普也，普载家族之历史。后人展阅此谱，当知身之所自来，感念先祖筚路蓝缕、开基创业之艰辛；亦当时时拂拭“三善”明镜，照见自身，惕厉言行，以求无愧于先人，有益于社会。如此，则家道日昌，门庭益耀，方不负今日修谱之深心。

新谱问世，广巷三善堂沈氏终得至宝，仰祈阖族德馨流芳，鸿彦硕儒辈出，恭颂阖族枝繁叶茂，兴盛富甲常青。

（文/张永方）

泽巷德馨堂许氏源流考略

许姓在《百家姓》排列第 20 位，是一个多源流的姓氏。据 2018 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许姓人口 655 万，占总人口的 0.54%，排列第 35 位。许姓是常州地区人口最多的姓氏之一，全市有许姓人口 2.63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29%，排列第 19 位。常州许姓居住密度明显高于全国比例。



泽巷德馨堂《许氏宗谱》书影

许姓源流主要分为两支。第一支出自尧舜时代的高士许由。相传尧拟让君位与许由，许由拒绝，避逃到箕山，农耕而食。尧只好让位与舜。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境内，许由的活动地在河南许昌一带。此支许姓距今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然世系再无考稽，后裔乃尊崇其为许姓之祖。第二支出自姜姓。为上古四岳伯夷之后。四岳，尧舜时期官职，掌诸侯事；伯夷，姜姓，炎帝第十四代孙。公元前 11 世纪周灭商后，周武王分封异姓诸侯国，许国正是被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伯夷的后裔文叔姓姜，被封于许，史称许文叔，许国故地在今河南许昌东。春秋时，许国为楚国的附庸国，战国初期被楚所灭。许国亡国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许氏。其后裔分迁各地，其中一支迁到高阳，后许氏族人又以高阳（今河北高阳旧城）为郡望，因此，后人常以高阳许氏自栩，史称许姓正宗。

泽巷许氏，系出高阳，尊许文叔为得姓始祖。至宋三十承事公，讳敦，字希

道，任清河令。靖康二年，自高邮州扈跸南渡，见时局动荡，遂作舍卜居锡邑之嵩山。希道公生四子。长子德之公，讳焕，字振叔，绍圣元进士；次子之公，讳炳，号通叔，徙居梅里乡；三子御之公，讳炯，号抚叔；四子衍之公，讳　，号蕃叔，绍兴二年进士。希道公以子贵而赠朝奉大夫，泽巷许氏尊希道公为始祖。至希道公第九世祥三（细九公派），字瑞甫，自嵩山迁徙阳湖戴溪之泽巷，是为泽巷德馨堂许氏始迁祖。祥二徙居宜兴，另谱。祥七徙居华庄，至十七世思椿公，讳敬由华庄徙居郡城。

希道公自靖康二年（1127）卜居嵩山以来，代代更迭，已越 896 年，其裔孙枝繁叶茂，瓜瓞绵绵，繁衍至今已至三十三世。分支、房别繁杂众多，依据光绪版宗谱，按希道公第四世“细”字排行，先长后幼，细分如下。

细十三公派：九世尚二公徙居许泗桥，至二十一世大成公，讳裕山由许泗桥徙居黄柑浜。

细十五公派：九世和一公徙居苏团桥，和四公徙居高山，九世和六公徙居章巷桥；十一世润公徙居苏团桥，十二世埙公徙居邑中。九世开三长子清一公徙居陡门，开三三子清三公徙居苏潭桥；九世开二公徙居浜口，九世开四公徙居马迹山，九世开五公及开二公次子敏三徙居斗山。九世谦三公徙居松江，十世仲公徙居白龙桥，白龙桥二十一世嗣卿公徙居黄巷里。

细十七公派：希道公第七世太二公生六子，长子庆二、三子庆四徙居孙家桥；次子庆三、六子庆九徙居许巷桥，四子庆五、五子庆八居泽巷；八世显六徙居锡邑南门。十世平二徙居洞庭。

细九公派：瑞甫公，讳祥三（希道公第九世）徙居泽巷后，生子三：长公谊、次公谅、三公辅。公谊生子五：长文礼、次文智、三文信、四文俊，五文杰，俱随父居泽巷，具体析分如下：十一世文礼公为泽巷下场、前分、中分、中三分、东二分、西三房分之祖。西三房十四世琦公徙居马家沟，十八世良诘公由马家沟徙居西坝头；西三房十七世章公，徙居戴溪河东（今戴溪殷家头），十八世元博公徙居安阳山杨家村。十九世德翰公由下场徙居坂上北义张家巷。十一世文信公为泽巷五房（原名西家派）之祖，至十八世君雄公，讳自英徙居庄墅河东（今圻庄谢家头）；十七世振环公，讳均徙居陆区桥马大漕。十一世文俊公为泽巷东四房之祖，其子盛，生二子：其、玉，后代迁徙端楷桥，其十四世蔬徙居窑塘；瑞甫公次子公谅公（希道公十世）徙居何墅，生子文义，文义子景良公迁徙沟西，至十六世枝山公，讳楠徙居郡城东门。

纵观泽巷许氏宗谱，在八修时，以希道公为一世祖，至四世“细”字排行起，分支开叶，不仅主叙泽巷，也续旁支；重在泽巷细九公派祥三公蕃衍的世

系代传，又兼顾同房祥二、祥七的世系编排，在当时是创新、抑或实情使然。宗室俱以希道公为荣，当为同祖、同根、同宗之乐也。适十修之际，予以梳理辨析，将泽巷源流志于本谱，旨在正清历史面貌也。

（文/张永方）

祝贺《洛阳北湖三径堂蒋氏宗谱》宏发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今天是2025年12月7日，在这充满希望与喜悦的美好时刻，我们迎来了《洛阳北湖三径堂蒋氏宗谱》的盛大宏发。这无疑是常州市文化领域中的一件盛事，在此，我谨代表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以及包立本主席，致以最热烈、最诚挚的祝贺！



洛阳北湖三径堂《蒋氏宗谱》书影

宗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是家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它记录着家族的起源、发展和变迁，蕴含着先辈们的智慧、奋斗和荣耀。《蒋氏宗谱》的宏发，不仅仅是蒋氏家族的大事，更是常州市文化建设中的一抹亮色。它为我们展现了蒋氏家族历代的辉煌与传承，让我们得以窥探到这个家族在常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动人故事。每一页泛黄的纸张，每一行工整的字迹，都承载着蒋氏家族的记忆和情感，是家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象征。

值此常州市名人研究会成立30周年之际，此次《蒋氏宗谱》的宏发更具有了别样的意义。30年的风雨兼程，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始终秉持着挖掘、研究和传承名人文化的使命，在这片充满历史底蕴的土地上深耕细作。我们见证了常州众多名人的风采，领略了他们为这座城市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蒋氏宗谱》中记载着许多蒋氏名人的事迹，这些名人是家族的骄傲，也是常州名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奋斗历程、道德品质和文化成就，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

在过去的30年里，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团结了一批热爱名人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深入挖掘常州名人的生平事迹和精神内涵，为传承和弘扬常州名人文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深知，名人文化不仅仅是历史的沉淀，更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它能够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为实现城市的繁荣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希望以此次《蒋氏宗谱》宏发为契机，与蒋氏家族以及社会各界一道，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名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与蒋氏家族以及社会各界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我们可以共同挖掘更多具有常州特色的名人文化资源。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整合各方的资源和力量，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推动名人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最后，再次祝贺《蒋氏宗谱》宏发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宗亲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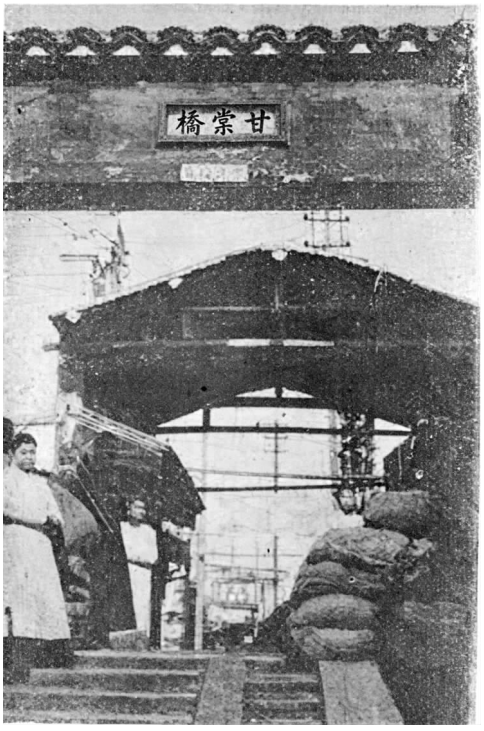
（文/黄中秋）

民国时期常州古迹的拆与保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江南经济建设与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期，常州亦不例外。此时，留洋回国的庄中希担任了武进县建设局长，他在常州电力工业、现代通信、城市建设、文教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谓功不可没。

庄中希两袖清风，廉洁奉公，膝下无子，以侄为嗣，全身心地投入他所热爱的事业。但在施政同时，也做了一些现在看来存在问题的事情，仅举“整理旧府署前街道”一事可以看出，每人眼光都会遇上历史局限性，不能简单采用“事后诸葛亮”态度苛求前人，追究责任。

1930年，江苏省政府批准建设镇江至江阴的镇澄公路，为方便市民出行，镇澄公路通过新马路（今怀德北路）途径新西门，打通与火车站的东西通道，庄中希是留洋“海龟”，眼光远，见识广，于是利用城内东西横街向东延伸，与新筑路（新丰街）贯通，这一手笔无疑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市政建设。



民国时期的甘棠桥

东西横街位于常州府衙前，街道狭窄，必须拓宽，两座石台与三座牌坊妨碍道路贯通。庄中希没有采取原地保护措施，而是采取拆除“中吴要辅”坊、“八邑名都”坊，移建于南门外唐荆川先生读书处。同时还将城中一批古桥一一拆除改建。

据1929年5月11日《武进商报》报道：“本邑建设局庄局长对于道路改良计划不遗余力，于市区各处尤为留意，所有各紧要桥梁，均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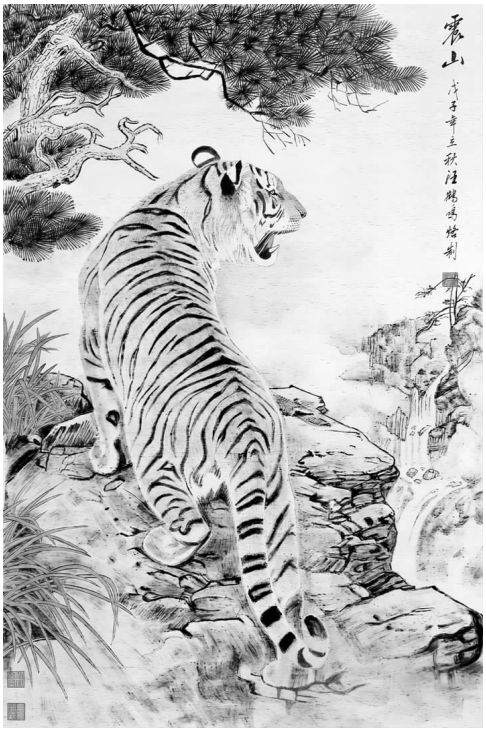
会同市政局署局长筹议进行。现在迎春桥兴工在即，天禧、新坊各桥亦在积极进行中……”按此计划实施，城中古桥（石拱桥）将百不存一。

这一时期，凡需通行汽车的桥梁统统拆除，由拱改平，即使普通便道，拱桥大部改平。如始建于宋、重修于清的甘棠桥于 1927 年拆除，改为钢筋混凝土桥梁；始建于宋、重修于清的迎春桥于 1928 年拆除，翌年改为钢筋混凝土桥梁；始建于宋、重修于明的广化桥（尉司桥）于 1928 年拆除，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梁；始建于唐、重修于清的天禧桥（今弋桥）于 1929 年拆除，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梁……

在庄中希担任武进县建设局长期间，由于实施桥梁“拱改平”的改造计划，包括觅渡桥、乌衣桥、红杏桥在内的 10 多座石拱桥改为平桥，幸运的是始建于南朝梁代的新坊桥躲过一劫。伍琢初见新坊桥过于高大，每逢雨雪天气，行人过桥多有不便，便想在古桥西侧另建一桥。儿子伍守箴、伍守谟谨遵父命，在先生去世后筹捐遗产 5000 银元，1929 年底，建成混凝土平桥，取名琢初桥。这样，准备拆除改建的新坊桥得以保存。

（文/薛焕炳）

40年前，常州烙画如何“撬动”一个国家级职教项目



汪鹤鸣烙画《震山图》

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普遍比较落后。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国家教委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商定：由这三部门管理的华夏教育基金会拿出50万美元激励有关城市建立一所先进的城市职教中心，将来能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以此推进全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

50万美元，在当时是多么大的一块“馅饼”啊！1987年9月，上述三部门负责人邀请北京、上海、苏州和常州4个城市的职教干部去香港考察职业教育，各个城市志在必得。我当时是常州市教育局分管职业教育的副局长，故由我代表常州去参加考察，并争取华夏教育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赴港学习职教经验，一幅烙画意外“加分”

那个年代到香港考察职教，看到企业和学校结合，学生在沉浸式的环境下学习、实习，理论和实践结合，大家感受至深。香港是学习德国职教的双元制模式，学生在这种模式下成才，很受用人单位欢迎。我看后心情迫切，很希望常州能建成这种模式的职教中心。

于是，我向考察团团长、国家教委职教司副司长孙振翰提出，希望他们能

邀请常州市的市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经委主任、计委主任、教育局长、劳动局长、人事局长、财政局长和乡镇企业局局长等一起到香港考察职教，形成领导层的共识，将来办成这样的职教中心应该是“一路绿灯”。

在香港考察将要结束的前两天，那天晚上，主办方为考察人员举办欢送会。席间，各城市向主办方回赠感谢纪念物，兄弟城市赠送的是市场上买来的礼品，我代表常州拿出的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烙画《雄风》——一只威武的猛虎，画面古朴、典雅、细腻，栩栩如生。在场的领导和嘉宾看后都肃然起敬，称赞道：“画得这么好，可见工作也是很细致认真的！”这件事情给项目主办方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们表示：“有这样的人员来主持这个项目也让人放心呀！”

“火针刺绣”：1600 年技艺的常州薪火

说起烙画，就不得不提常州，这里是中国烙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烙画艺术源于西汉、盛于东汉，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早在 1600 年前，随着常州梳篦业的兴起，烙画技艺与梳篦制作巧妙结合——匠人们在篦箕梁上刻花、在木梳背面烙画，使这一技艺在常州地区得到了空前发展。

我出生在常州一个梳篦世家。烙画，是我们家祖传的技艺。常州烙画又称“火针刺绣”。童年时，我常常看到父亲握着一支发烫的铜笔，在梳背上细细勾勒着梅兰竹菊。

“烙画是火的艺术，更是心的修行。”父亲这句话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耳濡目染之下，烙画慢慢也成了我的爱好。工作之余，夜深人静时，我总会在台灯下铺开木板，打开电烙笔在木板上潜心作画。

立志把中国传统烙画艺术发扬光大，1967 年，我将烙画与色彩相结合，突破了传统单色烙画的局限，逐步形成具有常州地域特色的烙画艺术风格。这一创新后来被中国工艺美术家学会正式定名为“烙彩画”。

一幅画，一份乡情，一座职教学校

回想那次在香港考察，我更深切感受到，我赠出的不仅是一幅烙画，更是一次让常州文化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机会。

后来我向孙振翰副司长所提的建议被主办方采纳。1988 年上半年，由时任常州市长曹锦成为团长的常州职教考察团到访香港。在此期间，国务院港澳办又动员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支持该项目。查济民、刘璧如夫妇是从常州走出去的，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的女儿女婿。捐资家乡，查刘夫妇二话没说，答应捐资 100 万美元（后追加 10 万美元）设立“刘

国钧教育纪念基金”,用于建设常州职教中心。加上华夏教育基金会的 50 万美元,这样常州一共获得了 150 万美元的资助。

经过综合评估和常州的努力,职教中心最终花落常州。1989 年,这个项目正式命名为“常州市刘国钧职业教育中心”,这就是现在的“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1992 年,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在常州举行,刘国钧职教中心就成为与会成员学习的重要现场之首。

距离 1987 年首次赴港已近 40 年,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少人说,正是我的那幅烙画,为常州职教事业起步助了一把力。想来,这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烙画不辍,一生修行

几十年来,我一直烙画不辍,还在多地举办烙画作品展。2016 年,常州烙画成功入选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力推常州烙画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为争创国家级非遗努力。

作为常州中国烙画研究会首任理事长,我发展了近 400 位烙画会员,致力让这门散落的民间技艺走向系统化、学院化的发展道路。我依托烙画艺术研发的相关教学成果,也被列入了国家级职业教育相关项目。

千度火候,万般匠心,方寸之间,自有山河。烙画是我一生的修行。希望这门常州的技艺,越淬越精,越传越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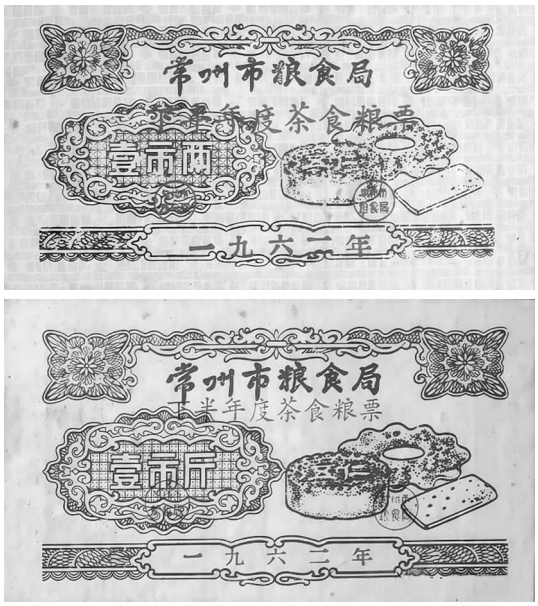
(文/汪鹤鸣)

常州的茶食票旧事

我写《中国茶票史话》时，第七章专记茶食票，第二节说到江苏。翻到常州，便看见一种特别的票——常州市茶食粮票。这东西，在全国是独一份，名字里带着“粮票”二字，却是专给茶食用的。听来有些怪，却正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1962 年，物资紧得很，什么都凭票。常州的茶食店里，寻常糕点都涨成了“高级饼”，贵得让人咂舌。唯有这茶食粮票，能让你按平价买到点茶食，算得上稀罕物。票分上半年、下半年两种，面额有一市两、一市斤，票面印着五仁糕的图样，有的还盖着“山芋干壹斤”的戳子。那山芋干，也是那时的茶食一种吧。票用得紧，按月发，隔月就作废，大多数都被收回销毁。如今能留下几张完整的，已是凤毛麟角。

看到这票，我就想起常州的老朋友高松元。他长我二三十岁，算是忘年交。家住常州市北尉司路，院子里总是静悄悄的。20 世纪 90 年代，我和包立本、陈伟军办《粮票文化》，杂志在常州印，我一年总要跑几趟常州，也便成了他家的常客。



常州市茶食粮票

高先生供职于常州市粮食局，负责管理票证。我们那份杂志，主办单位之一就是常州市粮食局，有这层关系，也是他牵的线。高先生书法不错，常州市发行的粮票，不仅由他亲自设计，票面上的“常州市粮食局全市通用粮券”几个字也出自他手。他的藏品甚丰富，家里藏着许多稀

奇古怪的粮票。

说起这套茶食粮票，他总说："这是全国独一份。"我便催他讲讲背后的故事。他笑着摆摆手，说要泡茶慢慢讲。说着就从书柜里摸出一小罐茶叶送我。我那时年轻，不懂茶，也不懂品，只道是客气，便错过了与他一边喝茶一边聊茶食票的机缘。

谁知这一错过，便是几十年。

等到我写《中国茶票史话》的"茶食票"章节，忽然又想起高先生，心里一动，赶紧翻出他家里的电话打过去。电话倒是通了，但那边回话说，高先生年纪大了，精神不济，已接不了电话。我拿着听筒，半天没说话。

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桌上的那张茶食票，仿佛也染上了旧年的温度。

世间事，往往如此——有些茶，错过了就再也喝不到；有些人，错过了就只能在记忆里相见。

（文/刘彦卿）

回忆在常州市煤矿中学的日子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之后中央又提出“扭转北煤南运”的号召。在这样的背景下,70年代初,江苏省和常州市革委会领导决定成立常州市煤炭建设指挥部,并决定派章化农、李晓春两位经历过抗日战争洗礼的老同志担任指挥部的领导,同时还有军队的同志共同组成领导班子,下设若干个工作部门,办公地点选择在武进县卜弋桥镇。先后在武进县卜弋桥、厚余乡,溧阳县上黄,金坛县茅山等地经过初步勘探建井开矿。为了适应煤矿建设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于1970年冬在卜弋、上黄、茅山三地成立三所煤矿学校,招收各300名左右初中毕业学生入学,学制暂定一年,他们边学习,边劳动,后于1972年上半年结业,大部分同学分配在矿上劳动,少部分同学则分配到市里有关部门及常州市煤矿医院工作。

创办常州市煤矿中学

为了调整布局,1972年6月,市里将原来的三所煤矿学校在茅山合并成立常州市煤矿中学,学校领导班子由杨坚武(现役军人)任政委、姚于方任校长、姜如章、钱詠林任副校长以及刘金坤等组成学校领导班子,下设办公室,苏清海、庄焕良;教务处吴克贤、吴锦成;总务处姚萍、陈洪宽、瞿祖微,另有厨师若干人。这些干部从市里有关部门和五·七干校抽调而来。学校从市区招收300名左右初中毕业生入学,学制暂定二年。教师则由市教育局从各矿校抽调(其中三分之一为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共计21名。开设课程有:政治由王顺泉、徐伯俊、曹锁海任课;语文由朱肇嘉、沈国民、高华娟任课;物理由陈天中、陈彩清、孟秉义任课;化学由蒋溢涛、吴家平、刘冲任课;数学由夏康龄、汤锁根、马浩熙、穆小英任课;外语由顾冠花、金杏根任课;体育由徐春生任课;地质等专业课由陆晓、华栋森任课。学生每周一至周六上课,上午四节课,下午二节课,其余时间为自习。学生除了上课之外,每周抽出一、二次课余时间参加田间劳动,主要是各班种植的蔬菜,一方面可以丰富和改善学生的伙食;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劳动观念,



1974年常州市煤矿中学全体干部教工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本文作者)

一举两得。这些学生分别编成六个班,从原矿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六名品学兼优的同学担任班主任,他们是耿东福、贺一新、何金兔、周粉海、石红芳、周锁美。另有六名教师兼任副班主任,协助班主任进行管理。教师对学生的学习除了平时加强考查以外,每学期都要进行期终考试。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考语文时,被我和监考老师发现有作弊行为,当场予以批评制止,但这位学生恼羞成怒,竟将考卷撕毁,我当即责令老师将这位学生逐出考场,并宣布这门课的考试成绩为零分,由此可见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我并不熟悉教务工作,但作为教务处主任,首先要安排各位任课教师上课的课程表。于是只好向老教师请教,买来一块白布,缝制成若干个小格,用硬板纸剪成小块,写上什么课什么教师,然后按照周一至周六,上午和下午将各课教师所应上课的时间科学地安排好,要照顾到主课和副课在某一天时间上的安排,还要照顾到每一位教师从周一至周六上课时间上的均衡,这里面确实也是有技巧的,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一个学期的课表排妥,教师们基本上都还是满意的,这也是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学校停办与师生去向

“扭转北煤南运”这个口号的提出,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它并不科学,就我

国南方地区来讲煤炭蕴藏量远远比不上北方地区，从常州地区的卜弋、上黄、茅山来讲，这些地方所蕴藏的煤炭基本上都是“鸡屎煤”，东一沓，西一沓，煤层浅，煤的品位差，大卡低，煤矸石多，所以开采的价值不大。就卜弋矿来讲，当年的斜井是由工程兵施工的，据了解掘井时要将地层封冻，每掘进一米要耗费一万元，就当时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一般干部的月工资仅仅五六十元。根据上述情况，煤矿再开采下去必然会造成亏损，从发展趋势来看，减产或停产也是必由之路，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依附于煤矿的学校适时停办实为聪明之举，这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于是在 1974 年 3 月煤矿中学就停办了， 全体教职员工于当年 3 月 28 日在矿中的校舍旁照了一张集体照以示纪念，教师和干部由市里调到有关学校和部门，学生也由市里统一分配到有关企业和机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矿校或者煤矿中学的师生员工和干部，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当上了市级领导，有的当上了局处干部，有的当上了校长，有的当上了律师，有的成为了企业家，等等。时光流逝，一晃 50 多年过去了，有的老同志已经仙逝，健在的同志都已离休或退休在家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家庭幸福。

（文/吴克贤）

乌龙庵——巷子深处的老宅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山花蕉叶暮色丛染红巾。
屋檐洒雨滴，炊烟袅袅起，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

每次听到这首带着明显吴侬软语韵味小曲，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另一个承载着我满满童年回忆的地方，那是爸爸的老家——常州乌龙庵。虽然知道这首曲子写的并不全是江南的小巷，但不知道为何，当旋律响起时，我似乎就重新站到了那片因为拆迁而已然不复存在的青白色墙面的 26 号老宅前。踏上几级门前的台阶，推开虚掩的木门，似乎还可以看到爷爷坐在桌边闭目养神，奶奶在灶间忙碌……恍若隔世。

乌龙庵，是位于常州市政府背后的那片江南老宅，那是爸爸从小长大的地方，是爷爷奶奶的家。从小我就觉得这个地名特别有意思——它不像一个地址，不是“××路”，“××街”，而是“庵”。后来才听说原来民间有“乌龙偷雨救民，百姓立庵纪念”的传说。

虽然我小时候大多数时间在上海长大，但常州的爷爷奶奶家也是每年寒暑假和逢年过节必定要来的。和上海弄堂里人来人往的烟火气不太一样，印象中的乌龙庵似乎很安静，巷子中只



乌龙庵旧影

是偶尔有人走过，如果碰上雨天则更有江南水乡特有的清冷感了。

从闹市区的大街一拐，转进一条典型的江南小巷——曲径通幽，绕来绕去，在几个岔口拐过几个弯。到奶奶家前会途经一个若干岔路交汇的小街口，那里有一口井。有时候会看到不同年纪的女子坐在井边空地的小板凳上，一边搓洗着脸盆里的衣服，一边聊着天。这些拐过来弯过去的岔路时常会把我绕晕，小时候的我总想着有一天能够从这片老宅的上空，俯瞰一下到底这些小巷子从哪里来，通向何处？巷子很窄，不过两三米宽，汽车是开不进来的，只有自行车可以自由地穿梭。因为拐角处看不见对面过来的行人或自行车，所以骑车的人在要转弯时会“嘀铃铃”地按响自行车铃，以此来告知拐角后还看不见的路人，于是，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时常回响在小巷的上空。

小时候每次跟着爸爸妈妈回去，总可以在巷口就看到翘首以盼的爷爷。小叔一直说，每到我们回去的那天，爷爷总是很早就会看着钟，卡着火车时刻表盘算着我们的行程：“火车开了吧”“该过苏州了”“现在应该到无锡了”“快到戚墅堰了，很快就到了”……然后再计算着我们出站，上公交车的时间，走出家门，到巷口等我们。小时候只知道每年春节回常州对爸爸来说都是一件不容讨论的事情，越是长大了越是能体会到回家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的不同意义，但却同样重要。

奶奶的家在巷子深处。推开家门，是客堂间。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干干净净。客堂后面就是灶间——生着炉火，灶头上架着大铁锅。穿过灶间，出门走过天井和旁边的一片院子，才能到后面的房间。小孩子是天生喜欢自然的，天井和那片长满了杂草的院子是我儿时的天堂，是爷爷奶奶家最吸引我的处所。

天井，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暑假里，爸爸妈妈经常会送我回常州呆一段日子。小女孩么，虽然在爷爷奶奶家，难免也会想妈妈。于是，支一张竹躺椅在天井里，睡上去，仰头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于是我会想：妈妈也能在上海看到一样的星星和月亮吧？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天井边那片杂草丛生的院子在孩子眼里则更是一个充满很多未知的神奇的地方。其实我从不走进院子深处，每次都只在门口的空地处玩耍。印象中似乎有些古树，但记不太清是围墙外还是院子里的树了。快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糕团，奶奶会在院子里搭起长条木凳，将做好的团子和印糕晾晒在木凳上。然后我的任务就是拿起筷子，蘸着被开水化开的可食用的洋红粉在每个团子和每块印糕的的正中间点上醒目的红点：白色的，褐色的团子和印糕，被加上了漂亮的红色点点，立马鲜活了起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里这是独属于小小的我的特别任务。

穿过院子和天井，就依次是小叔的房间和爷爷奶奶的房间。小时候如果我一个人回常州，是和奶奶一起睡觉的，就在最里面的那间屋子。推门进去就是一张桌子，奶奶的床和爷爷的床是分开的，分别倚靠着北面和东面两堵墙，相互垂直。奶奶的床靠门口的东面墙，虽然只是单人床，但是和奶奶睡在一起并不觉得挤。

虽说是江南，但常州的冬天还是挺冷的。那时候的人们会将挂水用的盐水瓶洗干净，灌上开水，然后塞上密封的橡皮塞子，放进被子里暖被窝——这样的暖水瓶就起到了汤婆子的作用咯。睡觉前灌进去的水是滚烫的，一个晚上捂在被子里，早上还有余温。隆冬的早上奶奶很早就起来操持家务了，我嘛自然是要赖在被窝里的。奶奶过一会就会回房间来看看我，有时候会宠溺地递给我一块常州特产的麻糕——即便我还窝在被子里，即便我还没有刷牙洗脸。抵御不住麻糕香味的我会从被窝里钻出来，靠着床头吃麻糕，别提多惬意了。口干了，我就从被窝里拿出暖水瓶，拔开橡皮塞子，“咕嘟咕嘟”喝上几口……小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有几次被奶奶撞见了，她也不说啥，只是看着我抿着嘴笑。

乌龙庵的老宅，虽然不是一直回去，但却很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在这里，我可以更肆意地玩耍做一个调皮的小孩：

我可以在那片巷子里自己转来转去，哪怕拐错一个弯，也会绕回到奶奶家门口；

我可以在天井里用一个大水瓢盛满水，然后向墙上泼洒，只为了看水流淌下来的样子；

我可以坐在客堂间里，看对面屋檐下挂着的长长短短的冰凌子，然后太阳出来后又化成一滴滴的落下的水；

我也可以在冬天赖床不起来，在床上用暖水瓶的水就着香香的麻糕打发时光，并顺带着填饱肚子；

……

如今，老宅已不复存在，爷爷和奶奶都留在了记忆里，童年的这一段都成为了我生命中一直会被不断回放的重要篇章。老宅也像一把岁月的钥匙，一经触碰，就会打开记忆的阀门，那点点滴滴都会像潺潺流水一样流淌出来，石板的地，青色的墙，斑驳的门，还有，很多很多盈满笑意的熟悉的面孔……

（文/陈可如）

从十子街到木桥头

我家原住在十子街。

十子街是一条东西向的小巷。北方称之为“胡同”,南方则是“里弄”。长大后去过许多地方,江南的小巷自有其情致,一如她那曲曲弯弯的河道,迤逦中总是带着几分逸趣。



十子街

我家原住在十子街,后来搬去了别处。再后来又搬了几次,及至亲自搬家时,家的去处,已在昔时的“城外”了。

幼时每过一段日子,奶奶便会张罗着把姨婆接来家中作客。姨婆不叫“姨婆”,而是唤作“西门阿公”,也即“外公”——她一生未嫁,便如男子般,做了外公和爷爷。

我记事时,姨婆便已是满头银发了。她住在西门,故其称呼中带有“西门”二字。然彼时之“西门”,仍在现时之城央。如今,姨婆和她的西门一道封藏进了岁月,白白留下关于老城的记忆,存作点缀。

十子街两头连着不同的巷子,一头是化龙巷,一头是娑罗巷。今日的化龙巷与30年前尚有几分神似,尽管街道两旁的店面已几番轮回。犹记得走在十子街口,对面便是理发店,母亲总是押我进去,不由分说便剪成了短发,像个男孩子。

今日的窄街曾是昔时的马路。过了马路，便从十子街，到了木桥头。

虽未见一桥，木桥头诚如其名。木桥头起于一片斜坡，坡有些陡，故而此处许是有过“木桥”的。有了木桥，便有了“小桥流水人家”之遐思，流水总能点染生活，此处既无流水，也便多了几分禅意。

路灯昏黄，人影稀疏。沿木桥头向南再向西，拐进一条更幽静、更悠长的巷子，便是到了乌龙庵了。乌龙庵轻舒腰肢，展开些许弧度，似引人放缓脚步，好捉一轮天上的月亮。

过了身侧一个形如牌楼的所在，巷子再度现出转机——这一截稍宽阔，三两步便可走完，名曰西公廨。随之再转，就到了沙家弄。

沙家弄其名最无惊奇，儿时的我想不透为何左拐右拐，仍在其中。好在经过一口圆圆的水井，便是过了最后一个转折，再向西去，抵达车水马龙时，便是北大街。

北大街柔软如梦。彼处乃是母亲的“娘家”，即我的外婆家。去外婆家总是欢悦的，推开临街的小门，外婆家在最里头；过了灶间即是狭长的堂屋，堂屋外铺展着一方小小的院子。从堂屋到院子需跨过一道门槛，我便跟着外婆，坐在小竹凳上，倚门听评书。

外婆有眼疾，只看得见模糊的人影，故以评书评弹为伴。

夜深了。母亲牵着我的手，沿着沙家弄、西公廨、乌龙庵、木桥头，一路荡漾回去。

时过境迁。

我想我有很久未曾再往老宅去。不知何时，十子街西边只余化龙巷，而木桥头等一齐失了踪，噢，不，它们只是开发营建过了，换了新装，教人认不出了。东边娑罗巷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它还在，然身侧的巷子们，皆已不再。

十子街的老宅，当年曾住过许多人。它原是曾祖父置下的，后来遇改革，房子便分作了十数间居屋。我家和叔叔家挨着，由一扇门板隔作两间，我与堂弟也便时常隔着门板佯装迢迢。

院子里有许多小伙伴。门板放平，做乒乓球桌。

吵吵嚷嚷的。不似今日般冷清。

昔时的邻居们各自搬了新家，留下老宅空荡荡的。

原本要建宾馆。与先时倚着的宾馆一道。谁知有变，老宅便荒废了，从锁眼朝里望，一片瓦砾。

十子街仍在。东边整修出了吕思勉故居，挨着恽代英纪念馆。我却没有去。

从十子街到木桥头，只隔着一条马路。

若非夜深，母亲不必陪着我，从十子街，走到木桥头。

沿斜坡向下，右转，便迎来了一片开阔的星空。秋夜的北斗星直朝地平线坠去，要走到这里，才能追着它的尾巴。

我曾站在老宅的大门前，看过春日的北斗星；一步跨到巷子对面，一抬头，撞上了天龙座；转身回家，立在院子里望天，红色的火星早已嵌进了双子座。

天色正好。群星闪耀。

星星们簇拥着小巷，东升西落。一如人生起起落落。

有许多人，曾生活在这个美好的地方吧。在那个局促的、日子过得尚很拘谨的年月，笑笑嚷嚷地生活，女人们围在井边洗衣聊天。

而这片土地，亦曾养育过、告别过许多人吧。星星消失于日光，人群掩藏于岁月，这里呢？这里亦不由自主地改变着，只是，去不了远方，惟有守候在原地。

幸有天上星子作伴。星星升起时，昔时的光芒仍在，曾经的岁月摇曳着香。

（文/谢未艾）

我 与 他

不是因为他成了常州的文化名人我要巴结他，而是因为我与他有着心灵上的感应，有些工作与生活上的交集和故事，内心里总有一种冲动——想写一写他。



本文作者（右）与张戬炜在华山合影

我与他结识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和共同的使命，让我们有缘来相会——走到了一起。我俩年龄相仿（他属羊，我属猴），个性有异（他洒脱中有敏锐，我矜持里藏豪情），同室履职（携手编稿，同心办刊），相处甚好（尊重理解，合作愉快）。

当年我俩供职于一个单位，在一个部门工作，前后搭头搭脑加起来，也就三四年的光景。后来他去了体育局、文广新局，直至退休。我则坚守原来阵地，尽管换了几个岗位，最终还是在这个机关一杆子到底——磨砺了数十年后告老还乡。你别小看了这人生中短暂的几年经历，它却为我们以后久长的联系——虽然不多不断线、心灵沟通似神交、志同道合成莫逆，播下了友情的种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是我诸多同事中一位才气逼人的佼佼者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每天的阅读量超大，20万字不在话下，涉及范围也很广，而且记忆力惊人，只要他真正关注和用心的文章，一般都能过目不忘牢记在心。我想这除了他后天的勤奋之外，与他爹妈给的先天的禀赋肯定是

绝对分不开的——让人好生羡慕！

他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晚上 10 点至第二天凌晨 2 点才是他阅读思考写作的最佳时间，好多优秀的诗词散文随笔等作品就诞生在这个时候。我对他在需要睡眠的黄金时间不睡眠会影响人体的健康曾提出过忠告，他虚心接受，就是坚决不改，而且这丝毫不影响他的体质，每次与他见面，感觉到他总是神采奕奕、精力充沛，让人真有点儿那么不可思议。

在百余次的公益文化讲座和中央、凤凰、省市电视台及一些自媒体视频的采访中，还有平时的人际交流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出口成章，也是他的显著特点。一些文学大家文字好，但口才欠缺，这里没有贬低大师们之意，只是觉得文才口才俱佳者确实凤毛麟角。我的这位曾经的同仁，文章写得快而好，表达又不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恐怕不是我一人之所见。既善写亦能说的“双料货”，在文学领域大概也是不多的吧！

这位老兄在行文演说的同时，还坚持学写毛笔字，行楷隶篆均涉猎，居然越写越来劲，一发不可收拾，心得成效颇丰，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一次我在市作协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一幅行书，比较勾引我的眼球。我就仔细查看落款处——哦，原来出自他的手笔。由于喜好，我家里也收藏了他的几幅书法作品。

他的才气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限于篇幅，不再多说。

他是我众多读物中喜欢阅读书籍的著述者

因为从小喜爱文学，在青少年时期就于课外断断续续看过一些大多数人亦阅过的中外名著。走上工作岗位后，也读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由于读的并不多，更不精深，写的也就一般了，当然最缺乏的还是文学天赋，因而就谈不上有多少成绩了，至多只是为以后的业余文学写作打了一个浅浅的基础。

我与他编《常州工人》时，原则上我负责工运理论部分，他承担职工文艺方面。他的文章及他编辑的文稿，对我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促使我也在这方面暗暗用了一点力。他的文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流淌自然，深入浅出，个性独特，自成一派，读来畅快，受益匪浅。我家里有很多文友赠送的公开出版的书，他的书是其中可观的一部分，大致收集一下有：《文化常州》《旧时月色》《荆蛮古色》《中吴风色》《书生本色》《毗陵味色》《六龙瑞色》《杨守玉评传》《走近法兰西》，还有合著的《中吴舆地》《常州运河史话》，主编的《常州词派研究丛书》7 卷《常州历史地理图志》《常州画派纪念馆图录》《常州老地图》，整理的常州评话《常州白泰官》（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第一名），古籍点校注

《常州赋》,古籍整理《常州先哲遗书》110 卷等,总计 20 本左右。它们中有我已读的,在读的,今后待读的,总之都是我偏爱读的书。

我今生曾结合工作生活实际,写了大量的新闻公文论文笔记等,有了一定的文字能力。但它们不属于文学范畴,这就需要向有文学天赋和成就的人士学习,没有时间和机会向他们直面请教,那就多读读他们的书吧。他就是我在这方面的榜样,他的书是我喜爱阅读的作品,自然也就成为必然了。我要从他的书里分享其中的故事,还要在这些故事里嗅到书香的气味。

他是我许多朋友中能够心领神会的同行者

相对而言,我偏重理性思考,他擅长形象思维,我与他在文学造诣上有差距。他已是一位享有一定盛名的文化学者,而我则始终是一个业余级的文学爱好者。但这并不影响我俩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可以在同一个思想平台上自由徜徉,我们也可以在同一个情感世界里互诉衷肠,我们还可以在同一个生活圈子里分享所得。

结伴同行上华山。1991 年 6 月,我与他出差西安,顺道去了一趟西岳华山。当时的华山没有索道,上山只能爬行。为了看日出,我与他傍晚先在山脚下的旅舍休息,将近零点时,我俩打着借来的手电筒,随着旅游人流开始了艰难险阻的快速登山运动(华山以险著称,导游讲摸黑上山不觉险)。黎明时分,我们终于"山高人为峰"——攀上了海拔 2100 余米高的华山顶,看到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冉冉升起,普照天下。下山时我俩一路小跑,频率不低,消耗很大,既渴又累还饿。我掌管着钱款,他多次向我提出要购山沟沟里食品摊上的东西填充饥渴,我生怕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带来更多麻烦不忍心地拒绝了他。后来我看他实在有点支撑不住了,平日里的豪气傲气荡然无存,乖得像小孩一样可爱可怜,我自己此时也感同身受了,于是就在一个稍正规一点的吃食点上买了两小碗尚有余温的小米粥,各自狼吞虎咽地喝了一小碗,暂时缓解了高度消耗的身体之需。你瞧,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彪形大汉的他,被一个精干灵活身手如猴的我,管理得恰似绵羊般服服贴贴——这不是相互体谅理解情愿心领神会兄弟情分又是什么呢?!

《合着黄金铸银生》。这是一篇 30 多年前刊登在《常州日报》周末版头条位置上的报告文学体裁的长文。文章的主人公是已故的原武进第一染织厂党委书记贡银生。我俩得知他的感人事迹后,就携手前往该厂作了实地详细采访。回单位后,两人又进行了认真商讨,并由他执笔以我俩的名义投稿发表。此文刊出后,反响热烈,市电台也播放了,还获得了江苏省 1991 年度报纸

副刊作品评选三等奖。当时我想，如果我写，只能是一篇长篇通讯，相比之下，那就要逊色多了，得奖就更谈不上了。

欣然写序添文采。十多年前，我也仿着一些文人斗胆出了一本公开发行的书——《我心依旧》。事前在请谁作序上，我想到了有文学修养的领导，但考虑再三后，最终还是把目标锁定在他身上，理由是他或许比别人更懂我。当我将书稿捧到他手里时，他咯噔不打，欣然同意，并在短时间内满足了我的愿望。“一般情况下，我不使用‘我们’这个词……今天，我却愿意使用‘我们’，因为，我与志超先生，是可以并足以使用‘我们’这个复数词的。”这是他序言中的一段开场白，其内涵即是我懂他他懂我的无需详说的见证词。省总工会的一位韦姓老领导看了我送他的这本书后，专门打来了电话：“志超，谢谢你的赠书，一定认真拜读。序写得不错，有文采！”我没选错人，由他不落俗套地为本书作序，客观上起到了争光添彩的效应。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期盼我的这位可谓阅读海量、笔健如飞、著述等身、性格开朗、老当益壮的老同仁旧文友，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继续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为繁荣常州文坛，传承吴地文脉，弘扬中华文化，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不要忘了把与我无功利关系的他的名字告诉读者——张戬炜——大家一定不陌生吧?!

（文/蒋志超）

我是宣传委员

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5 年,常州市有近 700 名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支边新疆,来到位于天山南麓的拜城县大宛其农场开荒种地,建设边疆。1966 年,常州市又有第二批 297 名社会知识青年支边新疆,也是最后一批去新疆支边的知识青年。该批社会知识青年分别支边于新疆乌鲁木齐市郊“八一”农场和“五一”农场,以及新疆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哈玛呼提、乌拉斯台农场,垦荒造田,参加边疆建设。

我原是常州市天宁区水门街道工厂职工, 于 1966 年 8 月初被动员报名第一批去支边的。当时 20 岁出头,是一名共青团员,曾担任过街道团支部宣传委员,能创作、能表演,是一位文艺“天才”。

我们自 1966 年 8 月 19 日离开常州,乘 52 次列车向西,在陇海线上飞奔了 3 日,直达新疆吐鲁番。23 日再转乘客车,在天山南麓的山谷中又转了两天,于 8 月 25 日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大家风尘仆仆,欢声笑语,终于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地方国营乌拉斯台农场。该农场距离和静县城和周边的焉耆回族自治县均相隔各 20 公里, 形成自然的△型地形。

常州支边青年初到此地,由于年岁小水土不服,大部分发生饮食不适,出现呕吐或者便秘等现象。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新疆属于高海拔的大陆性气候,早晚与午间的温差比较大,当地有俗语“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正是名不虚传。路经周折劳累和饮食不适,共二批 101 位邂逅在一起的常州支边青年,最后被安置于农场新的机构“学生队”。在农场领导的精心安排和热忱关怀下,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息和调节,终于开始新的劳动和生活,扛起建设边疆、立足边疆的重任。

当我们离开水乡江南,不远万里来到广阔的边疆,改变了我们的人生道路,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新疆是个好地方啊!天山南北好牧场,戈壁沙滩变良田,积雪融化灌农庄……”歌声响彻在蓝天白云的天山南麓,遍布于盐碱荒漠棘棘草生长的土地上。

9月初，通过学生队全体人员的讨论和评选，我当上了学生队俱乐部和膳食委员会成员。学生队团支部进行改选，我又被选举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团内的宣传工作是：负责组织团员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组织团员团课学习以及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宣传工作等活动。团外的宣传工作任务是绘字、剪纸、贴画等，将口号和语录大张旗鼓地布置起来。虽然我没有学过书法和绘画，但“在游泳中学游泳”，把这些绘制工作作为革命的需要去完成。光彩夺目的八字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和党的服务宗旨“为人民服务”，令人激励和鼓舞。在学生队的食堂和住宿处、墙壁上、树梢上，贴标语，挂横幅，插红旗，把整个学生队装点成红红火火，犹如红色的海洋。

学生队在团支部的带领下，组织常州支边青年成立“文艺演出队”。我是文艺演出队的骨干。因为参加各种场合的文艺演出需要进行创作、选材、表演等，我自愿担当，愿意辛苦一点，劳累一点。为了把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条不紊，我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在排练中亲自指挥和表演，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斟酌和推敲，力争使节目达到圆满。文艺演出队的常州支边青年们总是那样欢声笑语，呈现一股春天的气息，展示支边青年的青春活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曾多次举行大型会议，如迎接和静县社教工作组会议、乌拉斯台农场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静县革命群众和干部交流代表大会，学生文艺演出队受邀演出，把自编自演的歌曲、舞蹈、朗诵、戏曲等节目奉献给大会，受到领导和代表们的一致好评。通过一系列的大会演出，文艺演出队的队员们信心更足、热情更盛。

我在乌拉斯台农场期间曾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创作包括墙报、写作园地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如唱词《知识青年扎根在新疆》、三句半《工农兵齐扫害人虫》、苏州评弹弹词开篇《雷锋颂》，等等。

附：弹词开篇《雷锋颂》

领唱：雷锋。

齐唱：雷锋。

领唱：伟大的普通一兵！我们亲爱的人。

合唱：你的光辉事迹令人敬。

领唱：你是毫不利己胸襟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合唱：全心全意为人民。

领唱：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自由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残酷无情。

领唱：你说道，只要祖国需要你全力以赴，党的号召坚决响应，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领唱：你说道，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阶级仇恨牢记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领唱：我们要学习你！

合唱：热爱毛主席，爱党爱人民。任劳又任怨，天下为己任。不怕困难大，凡事有信心。

领唱：雷锋，你是我们青年的好标兵！

合唱：你的精神，千古存，好比高山松柏万年青！

（文/袁黎明）

童年钓痴虎郎的乐趣

我童年是在孟河老家度过的。有一年12月的一天，我外婆因同时给我家和我小阿姨两家烧饭，她没注意灶膛内的尾草拖在灶膛外，人就离开了，从而引起火灾，将一幢走马楼房给烧毁了。后来，我们两家被孟城大队安排住进了生产队里的3间仓库内。这点仓库肯定不够住的，不久，我姆妈就请来远房的亲戚帮忙，在3间仓库后面院子内，搭起了2间小屋后，才勉强解决了住房的问题。

我家西边是生产队的一个大柴场，北面除住着几家社员外，后面都是生产队社员的自留地，紧靠南边房屋外面，是一条通往马放沟的小路。这条并不宽阔的土路到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生产队的大部分老百姓，都要去马放沟里淘米、洗菜、洗衣服等。在白天里上马放沟的人，总是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甚至到了晚上，都有人来挑水回家，用“明矾”消毒后再食用。一到盛夏，住在柴场四面生产队里的一部分社员，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乘凉，就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蛙声、虫声、还有当地菜花蛇的叫声，组成了那非常动听的交响音的大合唱。所以，我童年时的老家，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是非常热闹的。

黄昏时，我就端着一张小凳子，坐在大门口的柴场上，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着大人们在一起聊天。这时，我的耳边就会常常听到从马放沟里传来“咕咕、咕咕”有节奏的声音，这是一种叫“痴虎郎”的鱼叫声，也是它在繁殖产卵时发出的一种声音。它把自己的卵产在了码头旁石缝隙里，自己在旁边守着、看着、叫着，直到天亮时它才肯离去。

这种野生的小杂鱼，我们孟河人都叫它是“痴虎郎”或者“痴婆头”。它和小黑鱼长得差不多大小，平时，看起来还有些胖呼呼的样子，它浑身上下都呈深褐色、一双小眼睛圆圆、嘴巴长得比较宽、嘴巴两边各长着蚕豆瓣似大小的一小块肥肌肉。小时候，我常常听大人说着这样的顺口溜：“痴婆头、痴虎郎，痴婆、痴虎胖呼呼，痴人有痴福”。现在想想，那老家人对这鱼的顺口溜，形容的倒是蛮对的。

后来，我听说：当年，西哈努克亲王到中国访问时，在无锡的几天时间里，

无锡大饭店就把这鱼的两块肥肌肉炸成豆瓣形状，作为特色菜给西哈努克亲王吃。另外还将这鱼笃豆腐汤让西哈努克亲王喝，味道简直是鲜美极了，西哈努克亲王赞不绝口。所以，西哈努克亲王每次来中国访问，都要到无锡去吃痴虎郎鱼。

在童年时，我与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夏天基本上都是赤脚的。我的哥哥很聪明，将我外婆与我姆妈在纳鞋底时将纳坏了的针（也叫银线、缝衣针），先保存起来。我常常看见我的哥哥用铁钳（老虎钳）夹住针头，把已豁了口的针尾巴，放在煤油灯上烧红后，再放在石头门槛上小心地将银针敲扁，做成鱼钓的柄。然后再用铁钳夹住银针的柄，把针尖放在煤油灯上继续烧红，再用另外一种小尖嘴的老虎钳，夹住针尖把它弯曲成像钓子一样，将其烧红后放在冷水里浸泡（淬火）一下，这样，已经弯曲了的钩子变成了很坚硬的钩子针尖。一番弄下来，这把小鱼钩子做好了，可以去钓痴虎郎鱼、昂公鱼及小穿条鱼了。

刚开始我的哥哥不让我跟着他去钓鱼，所以，只要等我哥哥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偷偷拿着哥哥的钓鱼工具，学着我哥哥钓鱼的样子，一个人去马放沟的码头上钓鱼。其实，我是很难钓到痴虎郎鱼的。有时，我钓了老半天，也只能钓到一些小穿条鱼。等到外婆与姆妈，不断在后门口喊着我回去吃中饭了，我才不甘心地回去。

记得有一次上午，我连续钓到了 3 条痴虎郎鱼，我高兴死了，赶紧送回了家，叫外婆把痴虎郎鱼清洗干净，先放在脸盆里养着，等到做中饭时，用蒸架把痴虎郎放在大海碗里，把放鱼的碗放到竹蒸架上，并向大海碗里放上已切成小块的豆腐与痴虎郎一起蒸，另外，滴上几滴豆油，并放入少量的冷水与食盐，等中饭烧好了，再闷上几分钟，痴虎郎也就自然地蒸熟了。这痴虎郎的鱼刺少肉多，但味道极其鲜美，肉质也挺细腻，这豆腐吃起来感觉到是彻嫩彻嫩的，入口就化了。一口鱼一小块豆腐，三下五除二，几口就把痴虎郎笃豆腐吃完了。现在，我只要一想起那种鲜美的味道来，我的口水好像马上就要掉下来似的。

到了 1974 年 11 月，武进县为了疏通老孟河，特地将老孟河改挖为拉直的浦河，并将马放沟彻底开挖掉了。生产队出钱分别打了几口水井，解决了老百姓的用水问题。我家与我小阿姨两家，分别在生产队的柴场上各自造了 3 间新房子，我原来住的 3 间仓库也在这次疏通老孟河时被拆迁了。那时，我也已经长大成人了，我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但这童年时的钓痴虎郎的经历，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了。

（文/程协润）



悠悠我心——上店往事（之二）

捉田鸡钓黄鳝

乡下人说的田鸡就是青蛙。

青蛙喜欢歇息在河滩、水塘、沟渠以及水稻田中，其肉雪白，味道鲜美。过去，乡下人想开个洋荤，吃田鸡肉是格不错的选择。



上店桥

钓田鸡是农村少年的拿手好戏，只要将鞋底线一端接上蚱蜢，另一端系在长竹竿上，将系有蚱蜢的一头在有田鸡的地方一上一下牵动引诱，在田鸡咬吃的瞬间迅速向上提竿，田鸡钓起，装入有倒插须的竹笼里就行。已经掏空肥料的灰塘[①]里经常有麻土田鸡，硕大无比。逮此种田鸡需要把水搅浑，在田鸡头露出浑浊的水面透气时，方能将其捉住。稍长，会用旧阳伞骨自制五个齿的鱼叉，或到庙桥的“三月半”节场上去买七个齿的鱼叉，到河边叉田鸡。晚上，则用一把手电筒就可以捉到田鸡。田鸡遇强光照射是基本不动的。稻田埂上，一旦照到田鸡，用脚快速踩住，抓入笼中即可。晚上捉田鸡的人村村都有。经常看到邻村大河头、滩井上、陈家村、陆家巷方向有照田鸡的电筒光，星星点点，散落在蛙鸣一片的水田间，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

黄鳝昼伏夜出，白天钻在河塘、沟渠和田埂下的洞里，天黑才出洞吃东西。过去能经常看到有人挑着许多有倒插须的弯竹笼在水稻田埂边下笼，第二天一早收笼取膳。冬季，有人拿着挖黄鳝的专用铁铣挖黄鳝。钓黄鳝的钩大多自己

做。用一根60厘米左右的阳伞骨，一头弯成勾，一头绑在一段竹柄上。钩上套上蚯蚓，由浅到深慢慢伸入鳝洞中，在洞中轻轻上下抖动，黄鳝上钩后不能立即拉钩，需要运用“软硬劲”[2]，将钩深入到黄鳝喉部两厘米左右，速将把柄稍为旋转以防脱钩，然后慢慢把黄鳝拉出洞口。黄鳝上钩后会使劲往洞里拖，要用好大一把力才能将其拉出。

有次与德荣、德群在周朗沟堤坝下通向兴隆河的沟渠里玩耍，发现一条大黄鳝顺水而下，我猛地扑下去，头入水中，瞬间咬住黄鳝的“七寸”，两手中指紧紧掐住，跑到岸上，用塘尘涂抹在黄鳝身上，身上的黏液就不管用了。德群掐了一根柳枝穿入黄鳝腮部，德荣拎着，一路欢笑到家。亲娘用秤一称，哇，一斤三两！共进晚餐，不亦乐乎。前年5月1日，德荣孙女婚宴上，我与岳定、岳高、岳汀、德群、德荣同桌，回忆童年，谈及此事，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从调皮鬼到少先队员

小时候贪玩，不好好读书。上课看上小人书，不专心听讲，为不被发现，不时装模作样，抬头看看老师，一堂课下来，不知老师讲了什么。

放学回去，一路上与同村的同学在竿棵岗里“捉野猫”，在河滩边摘野菜，采野桑子，在荒地上挖“土地公公”吃。到家后，书包一扔，架起三根竹竿挑高，或者搁起门板打乒乓球、玩跳绳、跳方格、笃铜板、打牌片，等等。大人催着做作业，我回答很干脆：没作业。有时实在躲不过，设法走捷径。比如老师布置抄字作业，同一个字要抄几十遍。为了图省事，有边旁的字我一口气写几十个，再写另半边，抄字不是为了写好字，而是为了交差。

要是有人帮我做作业，那更是求之不得。记得有一次，大姨娘女儿友珍表姐住在我家，每天早晨表姐主动扫地，将房前屋后、明堂等打扫得干干净净。平时我从不碰箬帚柄，见到表姐扫地，去夺她手中的箬帚，抢着要扫地，低声说：“我来扫，你帮我做作业……”老亲娘看到我在明堂里扫地，笑着说：“今天太阳西边出来了。”我指着东升的太阳，歪着脑袋瓜说：“这是西边？”站在一旁的阿爹被我逗笑了。

如此学习，成绩可想而知，在老师眼中肯定也不是好学生。不久，看到别格细佬戴上了红领巾，好看又神气，心里很羡慕。老师说，只有加入少年先锋队才能戴红领巾。老师的话触动了我，从此，我尊敬老师，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完成作业，成绩也有了明显提升，二年级时，我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

戴上红领巾的细佬是好细佬，是不能做坏事的。有次放学的路上，看到一个

老头挑了两筐枇杷去上店街上卖，因一头筐绳断裂，枇杷散落一地，有人哄抢，有人边捡边吃。我帮忙捡了一衣兜，统统交给卖枇杷佬，老头说“我是好细佬”。

三年级时，我已经是“二道杠”的中队长了，到了四年级，成为了三道杠的大队长。

坟地上的两个“放牛娃”

“牛是农家宝，干活少不了”。过去乡下干农活，比如犁田、耙田、推磨等都离不开牛。

放学回家，看到牛还在牛圈里，就会牵出去放牛，经常一边看书，一边让牛在田埂上啃草。若牛绳不拉紧，稍不注意，牛伸出长长的舌头，撩吃田埂边的稻棵，这时，得迅速更换田地，以免被人发现。

多数时候，我们都喜欢在坟地上放牛，因为坟地比较宽敞，野草鲜嫩茂密，且没有行人，一般将 20 厘米左右长的铁制牛桩钉入地里，水牛在缰绳长度范围内“自由”啃草，个把小时换个地方。牛啃草的时候，放牛娃可以坐在树荫下看看书，或者掏鸟窝、采野果。

有一天，隔壁的岳民与我一道在小河南坟地放牛。岳民说：“我们做个游戏怎么样？”我说：“好啊，怎么做呢？”

岳民说：“你闭上眼睛，嘴里衔块东西，直着向前爬行，我叫你停才可以停，才能张开眼睛。如果你一路不张眼睛且嘴里衔的东西没有掉，就给你一个细铜线。”我说：“这有嗲难？”

于是我闭上眼睛，岳民在我的嘴里放一块东西。他喊开始，我在草地上直直爬行。“停！”岳民大喊一声。

我张开眼睛，用手拿下嘴里衔的东西一看，竟是块干牛粪。

几天之后，我又去小河南坟放牛，心里想着如何给岳民一点苦头尝尝。我先把牛牵到坟地东面的小河边饮了一肚子水，牛饮完水后转身拉了一摊粪。此时，岳民正牵着牛，慢悠悠地从寿山桥过来。机会来了，我迅速扯几把杂草将牛粪盖住，牵着牛在一棵八角毛利暂树前钉好牛桩。

岳民到了，和我打了个招呼，把牛桩钉在小河边不远处，过来坐在我旁边。

岳民说：“今天再玩个游戏吧？”

我说：“好啊，可今天你要听我的。不用在地上爬，爬太吃力，嘴里也不要衔东西。只要你紧闭眼睛向前直走，听到我喊‘停’，立即向后转并迅速坐下，就可张开眼了。如果一路没有张开眼睛，能坐准地方，我给你一个铜板。”

说完，我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光绪元宝铜钱在他眼前晃了晃，跑到要他坐的

地方丢下一张纸。岳民看在眼里，蒙在鼓里，最后，我笑着对他说："行吗？"

岳民说："行，开始吧！"

几分钟后，他按照我的口令，不偏不斜正好坐到了那堆鲜牛粪上，弄得一屁股屎，浑身上下臭气熏天。他瞪了我几眼，对我高声喊："细狗日的，上你当了！"

"扑通"一声，转身跳入河里，水中溅起洁白的浪花，很快游到对岸，在水中脱裤子，洗净后晒到河边的树枝上。

那年，我11岁，岳民比我大5岁。

洗冷浴[3]

小时候，父亲基本不大管我，但看到我与同伴"笃铜板"[4]，二话不说，将砖头上的铜板和硬币用手一抓，甩到大河里。再就是看到我洗冷浴，拿了晒衣裳的长竹竿吓唬我，要戳我到河当中淹死我。其实他没想到，我7岁时就跟了桂和叔叔学会了游水，而且水平不差，踩水能露出胸脯，"钻水星"[5]一口气能钻出20多米。所以，那次父亲用竹竿想戳我，我一个"水星"下去潜到河对岸，紧贴岸边，才慢悠悠地露出头。老子在岸上无奈看着我，我在水里眨巴着眼睛看着父亲，父子俩对视良久。吃晚饭时，父亲说："你竟会游水了，我一世都不会，怕你淹死才不让洗冷浴，细佬弗要贪玩，要好好念书……"

父亲的话听过就了，如耳旁风。

有年暑假的某天下午，我和安大在门口大河里洗冷浴，发现细码头上系有一条我堂兄锡大家的小河泥船[6]，油光锃亮。船上有一支撑竿、两把划桨。我和安大商量一番，打算把船沿着大河划到周郎沟，那里偏僻，唔人看到我们洗冷浴。于是，我俩到岸上拿了衣裤上船，一个撑船，一个划船，不知不觉到了东洋桥。东洋桥离鸣凰不太远了，我对安大说："我们到鸣凰白相相再回家吧。"

安大说："好格。"

船到鸣凰，太阳快落山了。我们把船揽在鸣凰供销社的码头上，刚上岸就碰上了寄娘[7]徐毅华。寄娘在供销社当会计，她儿子丁正尧寄给我娘，所以我也叫她寄娘。寄娘也认识安大，因为安大父亲在供销社工作过。见到我两，寄娘死活不让我们走，带我们到店里吃了点东西，又碰到上店北街的陈昆安，他也在供销社工作。昆安好心说："天快黑了，今天住在这里吧。"

安大听了害怕了，怕家里大人找，说一定要回去。我呢，担心锡大哥不知道他的船怎么不见踪影了。最后商量，同意安大把船撑回去，并转告我父母，我在鸣凰正尧妈那里，一切安好。

安大那年才9岁。鸣凰到寿山村有7里多水路，到家天一定很黑很黑了。

鱼塘趣事

寿山村四周有大小河塘20多条，河塘密布，是上店地区拥有河塘最多的村庄。

每年的黄梅季节，大雨滂沱，河水猛涨，大大小小河塘里的鱼，随波逐流，顺流而下，沟渠边，田间地头，甚至晒谷场上都能捉到活蹦乱跳的鱼。

村前的兴隆河四通八达，是上店地区重要的水路通道。在经过寿山村的河面上，常有人架起“扮网”捕鱼。俗话说，“十网九网空，还有一网‘肉股郎’”，但偶尔也能捕到十几斤的大鱼。沿河两岸，外地的渔民撑了小船，在河里用“撒网”和“捕罾”捉鱼，捕到的鱼虾养在船仓里待售。村上人喜欢买点“穿条头”“棒皮头”“肉股郎”以及“糠虾”等小鱼小虾，放点自家腌的咸菜烧烧。可口，实惠。

寿山村有前巷中巷后巷，分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属于集体所有的河塘，俗称“公河”。每年春季，队里会在公河里投放鱼苗，到了深秋初冬季节，队里组织社员用大拖网捕鱼，或者用水泵把河水抽干后捉鱼，捕到或捉到的鱼，统一拿到晒谷场上，按鱼的品种、大小搭配，分成斤两差不多的份额，通过“捻九段”[8]手段，对号自取，秩序井然。

生产队不放养鱼苗的河叫“野河”。野河里的鱼虾等，村上人可以随便捕捉。村南端的望天河是野河。某年初冬，几个小年轻动了弄点鱼吃吃的念头。于是乎，岳兴、岳定、岳高，还有德荣、德群、岳听和我，将我家的水车抬到望天河架好，七八个人在水车上边唱山歌边车水，到第二天下午，河水车干，河底朝天。大家望着在河底乱窜的鱼虾，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年　猪

过去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养猪可以积肥，也可以卖钱，还能在过年过节时吃到猪肉——这在那个年代实在是件比较诱人的事。

能吃能睏能长肉，这是猪的特性。一头小猪仔，如果养得好，半年左右可长到100多斤，如果需要，就可“出圈”，也就是卖掉换钱回来补贴家用。猪食用的饲料相当广泛，比如大麦、小麦的麸皮，山芋、胡萝卜，油菜榨油后的油渣（菜籽饼），黄豆榨油后的油渣（豆饼），都是上好的猪饲料。田野里的灰条掌草、大蓟、小蓟等野草以及菜边皮等，猪也都爱吃。有次，我到常州菜市场专门捡拾青菜、黄芽菜、甘蓝菜等剥剩下来的边皮，满满两苗篮，足有百来斤重。常州到家18里地，所谓“百步无轻担”，一路走来，途经中凉亭、湖塘桥、茶庵上等，走走歇歇，到家已经下午一点多钟了。

村上有人家专门养猪婆(母猪)产小猪仔卖钱。开春过后,很多人家会去节场或街上买一只小猪仔,养到100多斤“出圈”,卖给供销社或外地的“收猪佬”,然后再捉一只小猪在家饲养,到年底差不多又是头大肥猪,宰了过年,这就叫“年猪”。

每天早上天不亮,母亲起床后要烧一大锅猪食。等猪食半热后舀到猪食桶,再一勺一勺舀到猪槽喂猪,这是父亲的事。对于父亲来说,喂猪是件极慎重的事,不容别人插手。印象中,他脱掉外衣,衬衣袖管撸到胳肢窝,把手伸进猪食桶里摸来摸去,捏来捏去,怕猪食里有铁钉碎石子之类吃到猪肚里。

过了腊月半,乡下人家开始准备杀年猪了。年猪多半得请人杀,俗称“杀猪佬”。宣庄村上的徐玉坤是寿山村上最有名望的杀猪佬,好多人家的年猪都由他宰杀。杀猪是件力气活,更是技术活。杀一头猪一块钱,但猪毛要留给他,洗干净晒干后,大概也能卖些钱。

年猪宰杀后,父亲早已计划好如何处理这一堆白肉:猪头、猪尾巴,还有心、肝、肠等猪下水,再有十几斤肉,家里过年用;一条猪腿和十几斤后臀肉,连同大年糕和实心的、青菜肉馅的、萝卜丝猪油渣馅的等各色团子,满满一担,挑到常州城,送给姑妈家,姑妈总会给不少馒头和一些给祖父母吃的糕点带回来;蒲岸里的老亲眷王春大孤身一人,也总要送点猪肉和年货去;剩下的一条腿,父亲会制作火腿,其余的猪肉,将骨头剔出,切成一二十厘米的条块状,用粗盐反复涂擦后放入大瓮头坛子里,乡下人称为“腌咸肉”。平时想吃,从瓮头里取出切成小块,在饭锅里蒸蒸。竹笋上市后,咸肉煨竹笋是一道上好的大菜,蛮好吃咯。咸肉要吃到麦收季节。此时,又一头年猪,差不多要在猪圈里开始饲养了……

注释:

①灰塘,过去苏南农村在田间地头存储农家肥的塘口。

②软硬劲,武进方言,力度把握有分寸。

③洗冷浴,武进方言,游泳的意思。

④笃铜板,武进乡下孩子的一种赌博游戏。

⑤钻水星,武进方言,潜水的意思。

⑥河泥船,苏南乡下主要用于在河塘里罱河泥用的小船。

⑦寄娘,武进乡下的一种习俗,为防止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遭难甚至夭折,选择“生肖”相合的长辈认作“寄父母”(“干爹”、“干妈”)。

⑧捻九段,武进方言,抓阄的意思。

(文/恽仲坤)

包立本，痴心守护常州宣卷



包立本编导的《金龙上寿》宣卷表演荣获全国银奖

在江南民间曲艺谱系之中，常州宣卷被誉为江南曲艺的活化石。这种以宝卷为底本，木鱼伴奏、方言说唱，韵白相间的古老艺术，在常武大地流传千年以上。宣卷不仅是庙会民俗里的说唱表演，更是普通百姓寄托善恶理想、传递乡土伦理的文化载体。它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锡剧的前身。

常州作为中国宣卷的重要起源地和传承地之一，拥有底蕴深厚、传承有序的宝卷文化资源，在全国宝卷文化和宣卷艺术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早在南朝时期，常州（南兰陵）籍的梁武帝创始《炉香赞》，这一作品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早的科仪宝卷，开启了中国宝卷文化和宣卷艺术发展的先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常州）窦刺史闻其（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这是全国关于俗讲（宣卷的前身）的最早记载。

遗憾的是：历经战乱、时代变迁，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量宝卷古卷遭焚毁散佚，老艺人相继凋零，曲调濒临失传，常州宣卷走到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在此危急时刻，包立本，一位土生土长的常州文化人，扛起了抢救、收藏、研究、传承常州宣卷的重担，30 余载风雨兼程，自费投入、四处寻访、整理古籍、

申报非遗、搭建传习阵地，让几近湮灭的常州宣卷重获新生。

包立本与宣卷结缘，源于家庭记忆。他的外婆李兰秀出生于1925年，曾拜民国时期知名宣卷艺人彭大林为师，逢庙会、朝山进香，便会演唱宣卷自娱自乐。童年时期，包立本常常听外婆哼唱宣卷曲调，听那些悲欢离合、劝善惩恶的宝卷故事。地道的常州方言，哭调、平调婉转起落，故事里忠孝节义、善恶有报的朴素价值观，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青年时代的包立本深耕地方文博收藏，痴迷常州本土文史。1995年，一次古玩寻访，彻底坚定了他抢救宝卷的决心。那一天，他在藏家处见到手抄本《白龙宝卷》，这是常州本土极具代表性的宣卷脚本，记录横山桥白龙娘娘的民间传说。他提出想要一并收购，却被对方拒绝。数月之后，他再次登门求购，依旧没能如愿。机缘巧合，时隔不久，他去另一位藏家手里购买古籍《易经》，意外发现这本念念不忘的《白龙宝卷》已经流转到此人手中。他在购买《易经》基础上，多加50元，终于将这本手抄宝卷收入囊中。拿到书卷那一刻，看着泛黄纸页上毛笔工整的字迹，他既欣喜，又心生沉重：流传百年的乡土文本，就这样颠沛流离，如果无人伸手，不知道下一刻会流落何方？自此，抢救宝卷、守护宣卷的念头，在他心中扎下根来。

此后30多年，包立本踏上漫漫寻访之路。常州地区的横山桥、湖塘、焦溪等乡间旧货店、农家老屋、古玩市场，到处留下他的足迹。民间收集宝卷充满坎坷。有的农户家传旧卷，视作祖辈遗物不肯出让；有的人家把破旧手抄本随意堆放在谷仓角落，受潮虫蛀；还有不少宝卷被当作废纸，廉价



包立本主编的《常州宝卷》（1—4辑）

处理。为搜集古卷，包立本前后自费 20 余万元，倾尽个人积蓄，抢救散落在民间的清代、民国宝卷手抄本与木刻本，累计收集 120 余种，150 余册旧卷，藏品数量、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由常州地藏庵于明代万历年间始刻的《念佛三昧经路修行西资宝卷》，这也是江南地区最早刻印的宝卷之一；还有全国罕见的孩童手抄宝卷，9 岁常州幼童朱少铨精心抄写的《一本万利宝卷》；除此以外，还有《梁皇宝卷》《三笑宝卷》《杨桥宝卷》等诸多珍稀版本，部分属于国内孤本，十分难得。有的卷本只花两元钱淘得，有的是从道士手中交换得来，每一卷背后，都有一段奔波寻觅的故事。他常常骑着车穿梭城乡，走访年逾七旬的老人，寻访曾经听过、演过宣卷的民间老者，一笔一记，记录老人口述的宣卷仪式、曲调、民俗场景。很多老人年事已高，记忆碎片化，他便反复登门，耐心访谈，一点点打捞快要消失的口头记忆。

收集只是第一步，到手的宝卷大多是破旧手抄线装本，纸张老化、虫蛀破损，字迹模糊。包立本一边学习古籍修复常识，小心保管原件，一边利用业余时间逐册阅读、校勘、整理。宝卷散文与韵文交错，大量使用常州方言俚语，很多词汇今天已经不再使用，校勘工作繁琐枯燥。他对照不同抄本比对文字，梳理故事脉络，挖掘平调、挂金锁、哭调、滚调这些濒临失传的宣卷曲调，把书本上的文本和老人口传的唱腔相互印证，还原常州本土木鱼宣卷的艺术面貌。

为了不让珍贵宝卷只锁在自家书柜，让更多人能够阅读研究，包立本牵头开展编纂出版工作。2010 年，《常州宝卷》第一辑正式出版；迄今为止《常州宝卷》已经公开出版 4 辑，把多年搜集的珍稀抄本影印刊行，配上提要解读，将私藏文献转化为公共文化资源。

目前，他正在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五）（六）》，计划系统收录常州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宝卷共计 100 种，总字数规模预计达 200 万字左右，如今各项编纂工作均按计划有序推进，进展顺利，预计 2027 年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

同时，他撰写 20 多篇学术文章，在《江苏社会科学》《人文常州》等刊物发表，向学界介绍常州宝卷的文化价值，吸引国内宝卷研究专家关注。国内宝卷研究泰斗车锡伦教授、北京大学陈泳超教授专程来常州调研，翻阅他收藏的宝卷藏品，对他的抢救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他所收藏 40 余种宝卷，被收入权威《中国宝卷总目》之中。

收藏文献、学术研究之外，包立本深知：宝卷是文本载体，宣卷是活态表演，如果没有人唱，再好的卷本也只是一堆故纸。抢救宣卷，既要救书，更要救艺。2009 年，他多方整理材料，积极申报，推动“常州宝卷”成功列入江苏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2012 年,推动常州宝卷入选江苏省珍贵档案文献名录,这份江南乡土文化遗产得到官方认定保护。申报成功只是起点,他着手搭建活态传承队伍,组建龙城宣卷团、西太湖宣卷队两支民间表演队伍,挖掘整理传统曲目,排演《白龙宝卷》《梁皇宝卷》《金龙上寿宝卷》等经典宣卷剧目,同时尝试创作贴合当代生活的新编宝卷作品。

没有现成老师,他对照宝卷文本,结合外婆留给他的记忆、走访老人收集的唱腔片段,反复琢磨练习常州木鱼宣卷的演唱方式,熟练掌握各类传统宣卷调式。他带领宣卷队伍走出常州,参加江浙沪宣卷汇演、全国宣卷传承论坛等。在第二届江浙沪宣卷演唱交流会上,由他编导的《白龙宝卷》斩获优秀表演奖;全国宣卷邀请赛上,《金龙上寿宝卷》拿下银奖,常州宣卷重新登上省级、全国非遗展演舞台,让沉寂多年的木鱼声声,再度响起。新华社曾专门为他的宝卷保护事迹刊发电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媒体跟进报道,让常州宣卷走进大众视野。

为了拥有固定展示传习空间,2016 年, 包立本依托雕庄街道卞庄庵古建筑,创办常州宝卷馆传习所。馆内陈列他珍藏的清代民国宝卷原件,陈列研究书刊资料,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成为集藏品展示、学习体验、传习演出于一体的阵地。他广收学员,培养包扬雯、许兰珍等新一代宣卷传人。他还和电视台、广播台合作拍摄专题纪录片,走进学校、社区开展公益讲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宝卷宣卷文化,解读宝卷之中劝孝向善、邻里和睦的传统精神内核。

包立本,一位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如今,他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宝卷(常州宣卷)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知名文史学者、文博鉴赏家。抢救常州宣卷是他非遗保护的生动缩影。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工程,更多是无数次下乡寻访,一页页旧卷校勘,一场场基层演出。一个人,一份热爱,30 多年坚守,留住一门古老曲艺的火种。这份坚守提醒我们:许多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珍宝,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消逝;而平凡人的痴心守护,便可以让千年文脉,薪火不绝。

(文/王喜根)

以刀为笔　以牙为纸

——象牙浅刻大师坡石的艺术人生



坡石在雕刻作品

在京杭大运河南岸，武进中心城区龙城大桥的西南方向，居住着一位以刀为笔、以象牙（猛犸牙）为纸的匠人。他叫坡石，本名倪久晋，年过七旬却精神矍铄。他平日会关上窗户、掩上面向大桥的房门，远离大桥与街道的喧嚣，在家中品茶静思、读书和创作。

童年时的一场骨髓炎，让坡石的腿脚变得不便，当地方言称之为“跛脚”。他将这一生命的缺憾，化作一个既自嘲又坚韧的艺名——“坡石”，既是“跛”与“拾”的谐音，也像一块静卧山野的石头，在沉默中自有风骨。

在他人生低谷时，邻居许医生来到他身边，鼓励他振作起来，并送给他一本《芥子园画谱》，建议他学习绘画以谋生计。这本书点燃了坡石内心的希望。他开始半卧在床练习作画，反复临摹书中的山水、花鸟与人物，逐渐领悟到中国画注重神韵的特点，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他尝试借助双拐行走，经过无数次跌倒，半年后终于能够独自走出家门。

1968 年学校复课后，家里因给他治病欠下不少债务。母亲觉得残疾的孩子读书出路有限，劝他去学修鞋或摆摊，但坡石坚持要继续上学。中学六年里，他拄着双拐从未缺课，课余时间在校办工厂劳动，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

1975年高中毕业时，他的绘画技艺已相当娴熟，在当地小有名气。通过持续锻炼，他终于可以不用拐杖缓慢行走了。之后，他被安排到武进工艺雕刻厂工作，负责为雕刻作品绘制底稿。

坡石在笔墨功底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无论是人物衣纹的兰叶描、游丝描，还是山水画的斧劈皴、披麻皴，抑或是点景树石的各类点法，他都能运笔自如，深得传统意趣。后来，他敏锐地察觉到近现代中国画受西方绘画影响的变革，便赴常州参加美术培训班，汲取中西视觉经验，逐渐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审美眼光。

当时，象牙浅雕十分受欢迎。坡石在厂里主要负责画稿，但他始终留心观察雕刻师傅的用刀技巧。1987年，他辞职回家，开始有人慕名请他做牙雕。一次，他在牙片上绘制了宋代马远的《雪中水阁图》，但请来的雕刻工无法刻出雪花的凝动效果。于是，坡石决定自己动手尝试。

握惯了画笔的手，起初难以驾驭刻刀，但他没有放弃。他从头学起，虚心向雕刻师傅请教。那个夏天，家中没有电扇，他刻一会儿就浑身湿透，妻子只好在旁边放两盆凉水为他降温。他最终掌握了刀法，他的第一件自画自刻作品《十八罗汉图》在一小块牙片上完成，十八罗汉神态生动。这件作品被一位澳门客商收藏，并与他签订了长期合同。此后，港台、新加坡和美国的客商也陆续前来订货。

初试成功让坡石信心倍增，但他并不满足。他意识到，先在象牙上画稿再刻的方式会限制刀法的自由发挥，于是大胆尝试直接用刀临摹原作。这对技艺要求极高，不能有丝毫差错。他总结出“寓目、胸臆、灵发”三个步骤：先细心研读原作，消化吸收，待内心产生创作冲动时再下刀，从而达到心手合一的境界。

坡石的刻稿多取材于古今名家的代表作，无论是龚贤的《溪山无尽图》、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还是戴敦邦的《红楼梦人物图》《水浒叶子》，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每刻一件作品前，他必先深入研究画理，把握原作精神。

2000年，坡石的牙刻作品《千岩万壑图卷》在第一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中展出，荣获象牙浅刻类唯一的国家级金奖。此后，《溪山图》《溪桥晚风》《钟山风雨》等60多件牙刻作品在全国多家媒体发表，并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博览会上屡获金奖和银奖。著名雕刻家蒋宝明先生，生前对坡石的浅刻极为推崇，曾赞誉他为“华东第一刀”。

坡石的刀下，从未出现重复的风景。每件作品，都是他与古今艺术对话的独特结晶：山水的皴擦层次、花鸟的灵动勾勒、墨色的浓淡变化……他刻的不

只是形态，更追求艺术的灵魂；不只是技巧，更是心性的流露。

“我追求的是金石味，刻制过程中不换刀，一把刀刻到底。”坡石说。他在象牙上施刀，慢一点捺、皴擦烘染，意随笔走，一刀而成，如落墨般自然。不仅以精细见长，更讲究笔法有致，刀锋所至，浓淡粗细、阴阳向背皆有章法。由于象牙微刻字迹极小，下刀时多以腕力控制，目力为辅，创作时需凝神静气，一气呵成。凭借扎实的书画功底，他以铁笔再现水墨神韵，令人称绝。

2025 年，坡石将创作重心转向刻绘郑午昌的作品，共完成三件：《红树青山》《洞庭行舟》与《叠嶂清秋》。坡石深知，郑午昌的山水画除了出众的山川布局，尤其以画柳闻名。郑午昌画柳先画干，后出枝，柳条由干而上层层勾勒，形态各异。他不仅用墨线，还以花青色加强质感和层次，最后渲染，使柳树在不同季节与天气中皆显生动婀娜。而在黑白灰的牙刻中表现柳色青青，则需通过雕刻进行二次创作。



坡石猛犸牙刻作品《叠嶂清秋》

以《洞庭行舟》为例，坡石以刀代笔，在方寸象牙上复现了郑午昌的独特神韵。坡石认为，刻柳之妙，在于捕捉风姿。郑午昌自谓“画尽万柳，柳如传神”，坡石以浅刻技法，虽无色彩而专注线条，却在黑白之间呈现出柳树的魂魄。他先刻柳干，以刀痕模拟枯笔苍老的笔意，转折顿挫间，老柳苍劲之姿跃然牙上；再刻柳丝，万千枝条全以柔线细劲为之，如依绳循丝，上下千条皆以“点”之法，通过用刀的轻重缓急，使柳丝迎风飘拂之态细致入微，不见刀工，唯有笔意，真正做到了以刀代笔，将“郑家柳”各具其态的灵动凝聚于象牙的温润与刀痕的深浅之中。

郑午昌的山水注重“一管中锋，诗骨盎然”，坡石的刻法延续了这一特点。

近处老柳盘曲，刀法的皴线暗合“披麻皴”“荷叶皴”等笔法，苍劲中带着秀润；中景湖面开阔，一叶小舟漂荡，几间屋舍隐于柳岸之后，通过刀痕的疏密变化，将水面的空灵与景致的幽静刻画得十分细腻；远处山峦起伏，以浅刀轻刻表现出云雾缭绕之感，与原作“山欲动，水欲生”的意境一脉相承。全图虽无色，却依靠刀工的深浅与线条的聚散，将郑午昌青绿山水的温润华滋、构图饱满，充分呈现，在黑白对比中营造出“烟岚活现、山川诗意”的意境。

在方寸之上以浅刻之法再现书画大师的笔墨层次，坡石无疑读懂了郑午昌“画不师袭，自辟门户”的艺术理念，更以刀代笔，于牙板既有古雅的精准，又不失笔墨化略的韵味。看他刻柳，淡刀轻擦带出山峦的缥缈；看他刻水，柔线浅划托出湖面的涟漪；看他刻屋，平刀齐切营造出屋宇的端凝。作品所呈现的，不仅是“入木三分”的技巧，更是远山不老的灵性与艺心不辍的追求。

除了刻画山水，坡石难得还刻点人物作品。

坡石的人物雕刻功底，早在数十年前便已扎根深厚。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象牙浅刻的人物题材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工农兵形象多见于展馆陈列；传统人物题材则主要出口日本、东欧，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特殊载体。彼时的他，便在绘制底稿的实践中吃透了《芥子园画谱》的精髓——“山水十八皴，人物十八描”的古训，这些都被他化作刀下的法度。男子衣纹多用铁线描的挺括、曹衣描的厚重，每一笔刀痕都精准复刻画稿神韵；而“开面”更是他眼中的重中之重，人物面部的神采、画面中人物的搭配构图、长卷里一组人物的仰俯互动与动态交流，乃至组群之间的气韵衔接，都直接关乎作品成败。即便如今已有 30 余年专注于山水雕刻，家中珍藏的多件《红楼梦人物》浅刻作品，仍清晰见证着他当年在人物浅刻领域的深厚积淀。

在临本创作时，坡石恪守准则，严格依照原作色彩敷色；原创作品中，他则随心赋彩，以自身理解赋予牙板上的景致独特意境。这份在山水创作中打磨出的构图功力与敷色心得，最终反哺于人物长卷创作，让《韩熙载夜宴图》的浅刻复刻，多了几分山水雕刻的章法与韵律。

《韩熙载夜宴图》本是南唐顾闳中的传世绢本，以五段场景串联夜宴始末，暗藏韩熙载“自污避祸”的复杂心境。转化为象牙浅刻，坡石依旧秉持“宁浅三分，不深一分”的准则，以“守气韵、删冗繁”为核心，弱化了原卷繁复的屏风纹样，将视觉重心牢牢锁定在人物神态与动线之上。

长卷起首“听乐”一段，他以 0.2 毫米尖细平口刀落刃，韩熙载的高帽长须用平行细刀勾勒，线条劲挺如铁线描，眉眼仅以数道浅线点染，便透出冷眼沉郁的心境。身侧琵琶女侧身端坐，手指按弦的动作细如毫发，琴弦留白写



坡石猛犸牙刻作品《韩熙载夜宴图》

意，宾客们近粗远细的线条排布，完美呈现出长卷人物组群的空间层次。“观舞”一段是全卷动感巅峰，舞女王屋山的飘带以兰叶描刀法一气呵成，转折处轻顿重收，与背立德明和尚的简淡静线形成鲜明对比，动静相生间，尽显原卷的叙事张力。

“暂歇”“清吹”“散宴”三段，坡石将山水雕刻的疏密节奏融入其中。暂歇时衣纹疏朗浅淡，让画面得以透气；清吹场景中，五位乐伎衣纹一组密一组疏，乐器孔位轻点不凿，规避了群像的拥挤感；收尾散宴，韩熙载持槌送客的身影线条重回沉稳，与开篇形成气韵闭环。敷色之上，他以临本的严谨态度还原古卷色调，又以原创的灵动赋予牙质温润的质感，让色彩与刀痕相得益彰。

这件《韩熙载夜宴图》浅刻长卷，既是坡石对自身人物雕刻功底的回望，也是他数十年浅刻技艺的集大成者。它将《芥子园画谱》的笔墨法度、不同年代的创作经验，尽数融于刀下，让千年名画的叙事内核，在非遗浅刻的精工之中得以重生，也让常州象牙浅刻的匠心精神，在方寸牙卷之上，永久流传。

几案上的台灯，见证了坡石多年的坚守。他注重艺术传承，创办了晋伯斋浅刻艺术研究所，多年来，他连续培养了数名市级非遗传承人和市级工美大师，致力于传承和发展象牙浅刻这门传统艺术，为常州象牙浅刻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他，仍在继续操刀，再攀牙刻艺术的新高峰。

（文/张　军）

王胜利，传承百年梨膏香



王胜利展示梨膏糖

在常州，提起梨膏糖，老辈人脑海里总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街头艺人肩挑糖担，手拿敲板，唱着常州小热昏，锣鼓叮当，说唱诙谐，围满看热闹的百姓，一曲唱罢，便捧出一块块棕褐色、带着淡淡药香的梨膏糖售卖。一块小小的梨膏糖，既是润喉养肺的食物，也是江南市井文化的缩影。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梨膏糖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胜利，一生与梨膏糖相伴，50余载坚守紫铜锅前，守古法、守良心、守文脉，把一门濒临淡去的老手艺，重新擦亮为常州的文化名片。

王胜利出生于常州青果巷蛤蜊滩，青果巷古巷幽深，商贾云集，从小耳濡目染老城厢里的市井烟火，街头梨膏糖艺人的说唱吆喝，是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记忆。1968年，18岁的王胜利和兄长王龙生一同下放至句容茅山脚下，命运的机缘，让他叩开了梨膏糖技艺的大门。在这里，他拜常州梨膏糖第二代传人葛仁福为师，正式踏入这门手艺的世界，成为梨膏糖传承谱系里的第三代传人。梨膏糖一脉最早源自常州东门洗米弄的金文宝，葛仁福便是金文宝的亲传弟子，一手完整承袭清末流传下来的古法配方与制作手艺，还熟稔梨膏糖配套的小热昏说唱卖糖技艺。

拜师第一天，师傅葛仁福的一番话，深深烙印在王胜利心底：“梨膏糖不

是普通的糖果，老百姓咳嗽嗓子不舒服才来买，我们做糖凭的是良心，要对得起每一位买糖人的信任”。年少的王胜利起初以为做梨膏糖不算难事，不过一口铜锅，糖料下锅熬煮，拌入草药，入模冷却切块即可。真正上手才明白，这是一门易学难精的苦手艺，门道全部藏在看不见的经验里。

初学阶段，王胜利交了数不清的“学费”，一锅又一锅糖熬糊报废，锅里焦糊的气味久久不散。日复一日守在灶台边，烟熏火燎，胳膊因为长时间搅拌酸痛抬不起来，半年多之后，他才慢慢练出一双“火眼金睛”，仅凭观察锅内状态，就能精准把控熬糖火候。熬过糖浆，还有划糖一关。滚烫糖膏浇入模板，自然冷却凝结成整块糖板之后，需要手工划线分块。手上力道极其讲究，下手太轻，糖块切不透，掰扯不开；力道过重，又会划破垫板，整块糖板损毁。轻重分寸，没有书本教程，只能反复实操摸索，数年沉淀，手上才能拿捏住这股巧劲。

除了熬糖划糖，选料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传统梨膏糖遵循药食同源，以雪梨榨取原汁，搭配甘草、薄荷、茯苓、杏仁、莱菔子、陈皮等十余味中草药，药材优劣直接决定梨膏糖的品质。师傅教导他，药材不能图便宜选次货，雪梨要汁水饱满，中草药要地道正品，每一味原料都要亲自筛选甄别，绝不偷工减料、删减配方。学艺期间，王胜利不光苦练手上技艺，还跟着师傅学习小热昏说唱。旧时卖梨膏糖分“文卖”与“武卖”，摆固定摊位说唱为文卖，肩挑担子走街串巷，敲板说唱招揽顾客，现做现卖便是武卖，三分卖糖，七分靠唱，说唱与梨膏糖技艺本就是一体共生的文化。他学唱小调，记诵通俗唱词，熟悉街头售卖的整套流程，读懂梨膏糖不只是一门吃食手艺，更是承载江南市井曲艺的文化载体。

下放十年光阴，王胜利在句容的作坊里沉淀打磨，把师傅传授的全套技艺烂熟于心。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落实政策，他回到故土常州，和兄长一起开办家庭小作坊，正式生产梨膏糖。那时候条件简陋，场地狭小，全部依靠手工操作，一口紫铜锅几套木质模具，便是全部家当。每天天不亮就要开工，熬糖、拌药、浇模、冷却、划糖、掰糖、包装，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日复一日重复劳作。作坊起步阶段十分艰难，没有宣传渠道，兄弟二人便效仿老一辈，挑着担子赶集市、跑街巷，一边小热昏说唱，一边售卖自家手工梨膏糖，老常州熟悉的吆喝声，再一次回荡在街巷之间。凭着实打实的用料和过硬手艺，王胜利家梨膏糖口碑慢慢传开。1989 年，王胜利创立“冬神梨膏糖”品牌，从家庭小作坊走向规模化生产，创办常州市兰陵冬神梨膏糖厂。品质过硬的梨膏糖走出常州，打入上海市场，上海 700 多家药房纷纷引进冬神梨膏糖，产品远销全

国20多个省市，曾经街头小摊的吃食，走进各大药房柜台，被更多百姓熟知认可。

时代变迁，传统梨膏糖也面临新的市场困境。传统梨膏糖含糖量高，不少老年、控糖人群望而却步；年轻一代对老手艺认知不足，传统口味也需要适配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坚守古法不等于固步自封，王胜利在守住核心技艺不变的前提下主动求变。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研发无糖梨膏糖。除此之外，还开发儿童梨膏棒棒糖、梨膏露等新品类，兼顾怀旧老口味与新生代消费需求，既保留老常州记忆，又贴合当下市场，冬神梨膏糖先后获评“常州老字号”“江苏省消费者满意产品”“常州市名优产品”，成为常州对外文旅的一张特色名片。手艺有所成就，王胜利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扛起非遗传承传播的责任。2023年，常州梨膏糖制作技艺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遗常州小热昏互为表里，共同延续江南独特民俗文化。

年岁渐长，王胜利意识到一门手艺想要生生不息，不能只守在工厂车间里，要走向大众，让更多人认识梨膏糖背后的历史文化。他积极走进社区、老年大学、校园开展非遗公益课堂。活动现场，他一边演示紫铜锅熬糖、浇模划糖完整流程，一边讲述梨膏糖源自唐代魏征孝母的古老传说，讲解清代传入常州之后的发展脉络，还会现场演示旧时小热昏卖糖的说唱形式，让市民沉浸式感受老常州的市井风情。

眼下，最让王胜利牵挂的是手艺的代际传承。一门非遗技艺，最怕人亡艺绝。他广收徒弟，不收学费，倾囊相授全套制作技艺，不光传授熬糖、划糖的手上功夫，更把师傅传下来“诚信做糖，良心为本”的行业信条传给后辈。走过50余载制糖岁月，如今的王胜利虽已年过七旬，依旧时常站在紫铜锅前。铁锅升腾热气，甜香混合淡淡草药气息漫开，锅里翻滚的糖浆，映着满头白发。从少年下放拜师学艺，挑担走街叫卖，到创办工厂打响品牌，成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半个多世纪风雨沉浮，变化的是时代环境，不变的是对这门手艺的赤诚坚守。

（文/王喜根）

董永与茅山六雨茶



茅山六雨茶

江南有一款誉满天下的佳茗：六雨茶，此茶产于风光旖旎的金坛茅山地区，以其独特香气、醇厚回甘与清亮汤色而闻名。千百年来风行四海，深受茶客青睐，饮者无不交口称赞。

关于六雨茶的由来，当地流传着一个感人至深的美丽故事。

在金坛直溪镇，有一村落名为董永村，亦称神仙村。名扬天下的大孝子董永，便生长于这片充满传奇的土地。董永八岁时突遭不幸，父母双双病故，只留下他孤苦无依。面对绝境，年幼的董永并未消沉，为妥善安葬父亲，他毅然做出一个令人动容的决定：卖身葬父。

这番赤诚孝心，竟感动了九霄云外的天界神仙。织女听闻董永事迹，心生无限怜惜，决意下凡相助。她来到董永卖身之处，凭借精妙绝伦的织艺，从苛刻的财主手中赎出董永，助他重获自由，随后二人一同返回故乡。

归乡后，古槐为媒，大地为证，董永与织女结为连理。二人男耕女织，董永勤恳务农，织女巧手纺织，彼此扶持，过着平淡而美满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玉帝得知此事，认为织女私自行事有损天威，强令织女返回天庭。织女拒不从命，玉帝便降旨风雨雷电诸神，三年内不得在江南茅山

一带降雨。顷刻间，江南赤日炎炎，茅山土地龟裂，庄稼濒临绝收，瘟疫随之蔓延，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董永忧心如焚，却束手无策。正当他几近绝望时，织女取出一只晶莹剔透的净瓶，轻声说道："董郎，你若能不惧艰难，走遍天下，将十八处名泉之水尽收此瓶，便可化解茅山旱灾，拯救苍生。"

董永听罢大喜，阴郁一扫而空，重燃希望。他急忙询问十八处名泉所在，当即立誓纵使跋山涉水、历经万难，也要取回泉水，解救百姓。织女见他意志坚定，便逐一告知泉名：庐山康王谷泉、无锡惠山石泉、蕲州兰溪泉、峡州蛤蟆泉、苏州虎丘泉、江州下石桥泉、扬子江中冷泉、洪州西山泉、唐州淮水源泉、溧阳龙池泉、丹阳观音泉、扬州大明泉、汉江金州泉、归州香溪泉、商州西谷泉、苏州松江泉、如州西南峰泉及郴州园泉。每一处泉水皆蕴天地灵气，唯有聚齐十八名泉之水，方能解除旱魃之灾。

董永牢记泉水方位，转身问道："娘子，为救茅山众生，我愿不辞劳苦前往取水。只是这净瓶小巧玲珑，如何能容纳十八处名泉之水？"

织女莞尔一笑，耐心解释："董郎有所不知，此瓶乃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之法器，神通广大，可纳五湖四海，自能盛下十八泉之水。聚齐之后，泉水将化为消灾祛病、救死扶伤的神水，届时旱灾瘟疫皆不足惧。"

董永豁然开朗，满心欢喜，辞别织女，收起净瓶，踏上了艰辛的取水之路。他原欲先往最近的丹阳观音泉取水，焚香祷告后忽生一念：十八泉分布天南地北，若由近及远反费周折。深思后，他决意调整行程，先从最远的汉江启程，再由远及近，依次取水，如此更为高效。

下定决心后，董永毅然出发，奔赴汉江。一路之上，他历经千辛万苦，堪比西天取经之艰，无论狂风暴雨或险峻山路，皆未能阻其步伐，从未有半分退缩。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历时整整半年跋涉，董永终于集齐十八处名泉之水，匆匆返乡。途经茅麓峰下时，忽见一位老人病卧荒野，气息奄奄，呻吟不止，显是染上重疫。

董永大惊，知老人命在旦夕，刻不容缓。他急忙俯身扶起老人，连声呼唤："老人家醒醒！老人家醒醒！"

老人微微睁眼，目光涣散，只含糊喊着："水……水……"董永连忙取出净瓶，小心喂水。不料老人一饮而尽，瓶中滴水未剩。董永见老人面色渐转红润，方才安心，关切问道："老人家贵姓？家住何方？我送您回去。"

老人长叹一声，气息稍稳，缓缓答道："老夫姓李名盘白，居溧阳观山山

顶，今日特来茅山寻访弟子，不料病倒于此。幸得你的泉水相救，现已无碍。只是你将如此珍贵之水尽予我，回去如何向尊夫人交代？”

董永毫不犹豫答道：“无妨，我可再行取水。只要您安然康复，我便心安，娘子处我自会说明。”言语间尽显其善良无私的本性。

说罢，董永向老人深深一揖，告别后再度踏上取水之途。刚转身上路，却心头一紧：只见一只吊睛白额猛虎雄踞道中，威风凛凛。董永正欲躲避，耳畔忽传来温柔熟悉之声：“董郎莫怕，此非寻常猛兽，乃是溧阳观山仁虎峰之仁虎，乃盘白仙翁特遣助你再度取水。你可放心骑乘，它将助你大幅缩短行程，早日归来。”

董永将信将疑望去，只见猛虎摇头摆尾，目光温和，俯身待骑。董永大喜，遥谢仙翁后，鼓勇骑上虎背。因已熟悉路径，又有仁虎相助，他只觉如腾云驾雾，行程飞快，仅用十八日便再度集齐十八泉之水，返回茅山脚下。

忽闻空中一声清亮鹤鸣，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乘白鹤翩然而至。董永定睛一看，正是此前所救之垂危老人，方知遇仙，连忙俯身叩谢。老人含笑自称溧阳盘白山翁，乃仁虎峰之主，昔日云游茅山得董永赠水相救，一直感念于心，故特遣仁虎相助，如今功成，前来收回仁虎。董永听后，伏地叩谢，满心敬仰感激。

老人从怀中取出一包清香四溢的茶籽，郑重交予董永，细细嘱咐如何植于山间，以造福乡里。交代完毕，便骑上仁虎，随白鹤渐逝于蓝天白云之中，唯留董永伫立山间，心怀憧憬。

董永携盛满泉水的净瓶行至大茅峰下，忽见山顶道观烈焰冲天，火光映红半壁天空。由于久旱无雨，水源枯竭，观中道士与香客只能眼睁睁看着火势蔓延，无助呼号。

董永心知此火灾因久旱焚香祈雨不慎而起，毫不犹豫高举净瓶，向空中倾泻。霎时间，十八道清泉如十八条飞龙自瓶涌出，化为倾盆大雨，直扑烈焰。

水龙所至，火势迅疾熄灭，浓烟散尽，不过片刻道观便恢复原貌，仿佛灾难从未发生。观中众人目睹此景，无不震撼，纷纷跪地叩谢董永救命之恩，感激之声回荡山谷，久久不绝。

茅山群峰叠翠，绿意盎然。山脚下竟神奇涌现十八眼清泉，各具风姿：喜客泉、桃花泉、玉蝶泉、白鹤泉、海眼泉、玉液泉、镜山泉、碧玉泉、丹谷泉、拊掌泉、一勺泉、百丈泉、玉砂泉、白云泉、鹿跑泉、朱砂泉、陶公泉、镜阳泉。十八泉交相辉映，构成茅山独特胜景。

乡民饮此泉水后，疫病迅速消退。茅山道长领众乡亲满怀感激前来拜谢

董永与织女。董永心怀慈悲，将盘白仙翁所赠茶籽分予众人，并细心教导种植之法，以此谋生。

董永与乡亲齐心协力，将茶籽遍植茅山，以十八泉甘泉浇灌。自此，茅山茶树繁茂生长，茶香弥漫。随时间推移，茅山茶叶品质愈佳，声名远播：秦汉时已为神仙茶，梁唐时更以“绿羽茶”之名列为贡品，成为茅山道茶代表，流传千古。

后人为纪念六月六日那场及时雨，将此茶命名为“落雨茶”，今正式定名为“茅山六雨茶”。

（文/宋仁年）



纪念岳飞的腊八粥

腊月初八，我国人民有吃腊八粥习俗，一直传到如今。冬季气候干燥，寒风入骨，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既美味又御寒。清代营养学家曹燕山所撰格《粥谱》，对腊八粥的健身营养功能讲得详尽、清楚，调理营养，易于吸收，是“食疗”佳品。

人们钟情腊八粥，其来历也有多种说法。而常武地区及苏南好多地方吃“腊八粥”呢，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



腊八粥

宋建炎四年（1130）春，岳飞率军驻扎于常州淹城，以南控广德、西观溧阳之势，截击完颜宗弼军渡江北归。

岳飞在屯兵淹城的短短时间里，组织兵士进行训练。岳飞对军队要求极严，士卒擅自拿人民的一根麻用来缚草，即被斩首号令。他特别注意练兵，冲山坡，跳壕沟，都穿着重铠练习。岳飞能左右发射，他的士卒也都能左右发射。

受过严格训练的士卒，严格依照命令行动，就是突然遇到敌人，也不会动摇。岳大帅赏罚分明，关心士兵，经常替病号调药；将士远征，他经常慰问他们的家属。作战牺牲的，抚养他们遗下的子女。凡上有赏赐，都平均分给部下。

岳飞身体力行，生活简朴。据说，他有句名言“文官不贪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就会太平”，就是在淹城出兵攻打敌军时对将士们说的。

当时，金兵占领溧阳，岳飞派刘经率领部队，乘夜出击，杀敌五百，活捉女

真、汉儿军及伪溧阳知县等 12 人，收复了溧阳。南下金兵狼奔豕突，到处烧杀掳劫，金兵窜到宜兴金泉乡。岳飞率军追到宜兴，与金兵在宜兴城南相遇，双方在百合场展开激战。岳飞亲自率军与金兵厮杀，双方军门遥对，战鼓咚咚，人马嘶叫，刀枪剑戟的撞击声，杂似松涛竹啸，战尘蔽天。岳飞横枪跃马，千百健儿越杀越勇，金兵不敌，狼狈向北逃窜。岳飞追杀一阵，派岳云率兵赴常作战。

据传，这次战斗，岳飞亲率部队扎营离常州城 20 里的淹城，张宪、王贵引本部兵马，伏师戚墅堰桥南，遣傅庆、王万领兵伏西河滩，又令岳云、张宪率兵扮作溃军伏新闸，遣李道、姚政东西援应，留刘经守营。不几日，岳飞亲率一千岳家军，与金兵在常州东郊相遇，双方展开血战。顿时，战鼓声声，伏兵四起，岳飞四战皆捷，兀术率军向西奔窜，敌人死伤和溺死者不可胜计。岳飞又从后掩杀，金兵横尸 15 里，活捉女真万户少主李堇、汉儿李谓等 11 人。

金兵西窜时一把火把常州烧成废墟。岳飞率军追击，向建康进发，在清水亭再与金兵接仗，又获大胜，敌人横尸十里，活捉女真渤海汉军 45 人，更斩耳环兵 175 人，获马甲金鼓无数。

后来，临安的议和派以及卖国贼秦桧进谗言，使朝廷下了 12 道金牌，召岳飞进京。岳飞无可奈何，急急班师。一路上将士们饥寒交迫，粮食不济。沿途的老百姓闻讯后，都拿出了五谷杂粮，熬粥劳军，岳军合混而食，道谢而去。其中，岳家军战斗过的常州、金坛、溧阳等地方的老百姓，全家出动，荷食箪浆，焚香迎送。因为岳家军路过常武地区时，是农历腊月初八，后来岳飞被害，百姓为示怀念之意，每年腊月初八烧起“百家饭”，来纪念岳飞和岳家军。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岳飞遭到大奸臣秦桧的陷害，苏南的老百姓都为他抱不平，说这样的大忠臣都落到如此下场，我们今后还怎么活呢！于是，在腊月初八这天，大家都把家里杂七八拉的食物一锅煮了。后来，吃“腊八粥”就成为当地老百姓纪念岳飞的习俗了，流传至今。

（文/肖　飞）

孟河米屑饼



孟河米屑饼

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在中国人的传统记忆中，八月十五不仅仅是吃月饼的日子，在江南水乡的千年古镇——常州孟河，还流传着一种独特的节俗：丈母娘给女儿女婿回礼做“米屑饼”。这饼里包的，不单是馅料，更是长辈对晚辈满满的疼爱与祝福。

古人云：日有周复，月有盈亏，时令节气，由历而来。中华民族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春节、清明、端阳和中秋这四大节日。“中秋”二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周代已有“秋夕月”之礼，即秋分夜晚祭祀月亮，但那时的祭月活动属于皇家祭祀大典，尚未形成民间普遍意义上的传统节日，仅仅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时间概念。直到唐初，朝廷才正式将八月十五定为中秋节。自此以后，只要是中国人，每年都要过中秋节，同时也在代代相继中沿袭着“张丈母娘”这一独具地域特色的传统习俗。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常州孟河，历经一千多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保留着一项别具风味的中秋民俗。每逢中秋佳节，家家户户都会在美丽夜空中那轮明亮皎洁的月光下，除品尝传统的月饼之外，还要吃一种名为“米屑饼”的食品——这便是张八月时丈母娘回赠女儿女婿的特制点心。所谓“张八月”，即中秋时节女儿女婿回娘家探望长辈的习俗，而丈母娘回赠的“米屑饼”，正是

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回礼之物。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孟河，张八月与张丈母娘衍生出了一系列独特的美食，比如满锅饼、米屑饼等，这些点心食品无一不是由丈母娘亲手制作，而且都绕不开“女婿”与“丈母娘”这两个温暖的关键词。孟河人的“米屑饼”也不例外，它承载着一种浓浓的亲情味道。

孟河的“米屑饼”，寓意着孟河一家子团圆和美、幸福圆满。它看起来和月饼差不多大小，外形圆扁，口味有甜的、有咸的，还有椒盐的，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喜好。制作时，米屑饼的两面被煎烤成微微的金黄色，再将黑白芝麻均匀地撒在饼的两面，远远地就能闻到一股喷香扑鼻、令人垂涎的诱人香气扑面而来。其实，制作“米屑饼”的工艺一点儿也不复杂，所需的原料也比较简单家常：糯米粉、黑白芝麻、豆油或菜油，再加上白糖与盐等调味品。“米屑饼”的馅料按照每个人不同的口味喜好来自由搭配，传统上以白糖黑芝麻馅和白糖豆沙馅居多，但如今，大多数年轻人都更偏爱豆沙馅、紫薯馅，以及咸香可口的椒盐口味，馅料花样不断翻新，但那份家的味道始终未变。

制作“米屑饼”的过程也是一门传统的手艺。首先将糯米粉倒入盆器中，然后将烧开的温水慢慢地倒入盆中，一边倒一边将糯米粉搅拌成均匀的絮状。接着，耐心地将拌成絮状的糯米粉一点点揉捏，直至揉成一个软硬适中、光滑细腻的糯米粉团。然后，再将这个糯米粉团均匀地分成若干小团子，一个个捏成小碗状，包入自己心仪的馅料。将包好馅的糯米粉团慢慢地边转圈边收口，接着用手轻轻压成小圆饼状，在粉团表面蘸上一些黑白芝麻后，便可以放入已经热好的油锅之中。随后，用慢火文煎几分钟，再盖上锅盖闷上几分钟，这“米屑饼”就做好了。因为糯米粉本来就是用温开水搅拌过的，所以已经是半成熟的状态了，一般只需要文火慢煎七八分钟即可，直煎到米屑饼的两面泛出微微的金黄色泽，稍微有些鼓胀起来，就说明这饼已完全熟了，此时便可出锅食用。刚煎熟就出锅的“米屑饼”，那口感和味道是最绝妙的，热乎乎的，酥香软糯，一口下去，幸福感油然而生。

这孟河张八月时丈母娘亲手煎制的“米屑饼”，一出锅便满屋子都是芝麻的浓郁香气，特别能勾起人的食欲。“米屑饼”制作煎好之后，一定要趁热吃。你一口咬下去，油香酥糯，甜而不腻，那滋味从舌尖一直暖到心间，让人瞬间就能感受到一股满满的团圆氛围和家庭的温馨。如此好看、好吃又满嘴留香的“米屑饼”，相信哪一位孟河人的女婿能够不爱呢？它既是舌尖上的享受，也是心头的牵挂。

可能有人会感到好奇：这“米屑饼”不是用糯米粉做的吗？糯米粉本是雪白雪白的，怎么叫做“米屑饼”呢？是不是有点名不副实啊？说来这跟孟河人的

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孟河当地人把面粉发音为“面屑”,而“米屑粉”就是“米雪粉”。“屑”与“雪”发音颇为相似,长此以往,孟河人便习惯性地把米雪饼称为“米屑饼”,这和孟河人所说的荞麦“屑”差连盘是同一个道理。虽然它只是一种方言的谐音,但中秋佳节吃“米屑饼”,颇有入口成诗一般的浪漫感觉。细细品味,这一枚“米屑饼”,其实就是孟河人“张八月”的一种情怀,一份流传千年的传统乡愁文化,更是对故乡记忆最深情的味觉表达。

(文/程协润)

齐梁王室祖居地在今常州毋容置疑

齐梁故里(祖居地)之争,经各方论证后,学术界已形成共识:“齐梁故里不在镇江,在常州。”并为《江苏省志》《江苏通史》和《辞海》《辞源》等所认定。故里之争本已平息,但南京大学张学锋教授在为镇江丹阳做“齐梁故里研究”课题时,又“对齐梁故里的地望进行了推断”,认为这个地方在今丹阳“帝陵之间”,并认为“晋陵武进县东城里与今常州万绥无关”。此论从 2010 年发出,10 多年来连续登报刊、在镇江开发布会,近年又到丹阳办讲座,并在网上广为宣扬。他的推断及论点是不符合史实的,笔者在此予以辩析。

首先要指出的是,他提出的观点和资料并不新鲜。早在 2009 年 3 月常州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发表的《南兰陵桑梓本乡,武进王业所基——齐梁故里考》中都已做过评析,发表在 2009 年 12 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齐梁故里考证与齐梁文化新论》一书中的《齐梁故里考论》的十篇论文中,其中还有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王文楚、史为乐、薛国屏和省市文史学者的论述,除胡阿祥教



齐梁故里——万绥

授当时提出无实指的武进、丹阳交界之“某一特定地方”外，都认为“武进县东城里为南兰陵”在今常州武进。

可是，张教授却回避或篡改正史，否认历代地理志书的记载，无视当代国家和省认定的历史地名，而为“齐梁故里丹阳说”造势。现仅就他在文章引用的一些例证，做些分析辨证就能明白，他的“齐梁故里丹阳说”是不能成立的。

一、他对宋《咸淳毗陵志》中一个“按”（语）如获至宝，并做出错误的判断。

宋《咸淳毗陵志》卷二七《武进》“兰陵城”记载：

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千秋乡万岁镇西。南齐四世祖淮阴令萧整侨居之地。按：万岁寺旧有伪吴天祚中石刻云：寺西去萧梁帝祖宅三十里，东城村初名皇基，更曰皇业。寺（万岁寺）后百七十五步即其城（兰陵城）也。

南朝宋时的武进县千秋乡万岁镇（今孟河镇万绥乡），就是从西晋到唐朝的武进县城，亦称武进故城，南朝梁改武进县为兰陵县，此镇就为兰陵县城亦称兰陵故城。但在唐初时武进县治所已迁往郡城（今常州市区），故称万岁镇“在县北八十里”。该志说得很清楚，兰陵城在武进县千秋乡万岁镇，这里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四世祖萧整最初从山东兰陵避乱南迁 “武进县东城里” 的侨居地，就是齐高帝的祖居地。在该志条文下有一个“按”。什么是叫“按”呢？“按”就是按语，是编者、校者在正文之外附加的说明或考异，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还有一说”。对此，我们首先要依据并确信该志的正文记载，兰陵城在武进县千秋万岁镇，这是齐高帝先祖侨居之地。正文下的按语，只是“另有一说”，而且伪吴石刻已不存在，学界认为“有无此刻石有待考证”，而不可贸然信以为真。

张教授又对《咸淳毗陵志》“兰陵城”条下一个由今人点校者新加的“注解”如获至宝，并据此认为“万岁镇不是东城里（村），这已无需再辨”。新加的“注解”是：“此兰陵城是东城里兰陵城，非万岁镇兰陵城，古属武进，今归丹阳，该兰陵城在县北八十里的千秋万岁镇往西三十里，而不是县北八十里”。这个新加的“注解”，在出版后才被人发现，后组织了调查。这个新加“注解”的点校者辩称，这个“注解”是他对“兰陵”条下一个“按”而做的个人理解。他解释道：“唐初以‘故兰陵地复置武进县’时，因天高皇帝远，丹阳有私心，就把原兰陵地（武进县），一半归还了武进，一半留在了丹阳。所以才有‘东城里（村），古属武进，今归丹阳’之说”。对这个 2005 年新加的“注解”，张教授却把它作为“珍贵的原始史料”而加以引证，并由此作出“东城里（村）不在武进县万岁镇，而在丹阳”的错误判断。

二、他看到《梁书·皇后传》上记有梁皇母亲和妻子葬“东城里山”，又作出把陵墓当故乡的错误判断。

《梁书·皇后传》记太祖张皇后“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高祖郗皇后，齐永元八月殂于襄阳官舍……其年归葬南徐州东海武进县东城里山”。太祖张皇后张尚柔是梁武帝的母亲，与父亲萧顺之合葬建陵，高祖郗皇后又称德皇后是梁武帝妻子，葬修陵。



万绥梁武帝萧衍旧第标识

对此，如何解读。《梁书·皇后传》上所讲两个皇后死后葬“武进县东城里山”，其陵墓石刻在今丹阳荆林乡，所以认为历史的武进县就是现在的丹阳市，其实不然。

理由一，历史上丹阳县地方志中就没有“东城里”“东城里山”这样重要地名的记载。经实地勘察，在建陵、修陵附近也没有东城里和东城里山。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在陵区西侧一个自然村新挂上“东城村”的牌子，把陵区附近一个叫团山和一个叫百亩山的取名为东城里山。在 2001 年和 2004 年出版的《丹阳古今》和《镇江研究丛书》中才首次在丹阳出现“东城里”的名字。

理由二，对梁武帝父母和妻子死后葬地说法不一。唐《隋书·五行志》记“萧顺之墓在曲阿建陵”。民国 10 年（1921）易白沙著《帝王春秋》说萧顺之“原先葬在丹徒”。《常州府志》记载：“梁建陵，在东城里，梁武帝父及献后张氏葬”。萧顺之于萧齐永明年间去世，武进古今相传，原先葬万绥孔村西南的“皇坟遗址”，与《南齐书》所记“归茔在焉”相符。梁武帝母亲死后葬武进故居东城里，至今在武进万绥仍保有张后陵遗址和张后陵桥。梁武帝妻死于萧衍任雍州刺史时的襄阳官舍，后归葬武进故里，葬于何处不得而知，但在今万绥镇北黄山脚下，有梁武帝为郗氏所建九龙禅寺，为郗氏宗庙。

理由三，梁武帝父母、妻子都死于南朝的刘宋和萧齐时代，均在梁武帝称帝之前，在他父母、妻子死后就在齐皇朝的帝陵区就建陵造墓，还设置神道华

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知道，萧道成父子对梁武帝父亲萧顺之“深相忌惮，故不台辅”。所以在梁武帝父母和妻子死后就有了先葬后移之说，就是死后先葬东城里故乡，在梁武帝称帝后再择地造陵移葬。

理由四，即使齐梁陵墓在今丹阳地域，泛称“东城里山”也可理解。齐梁帝王死后筑陵于建康（今南京）至武进的京畿地区，从今武进万绥到丹阳荆林乡相距二三十里，岗阜连绵，加之古代县域界限也不像如今这样清楚，所以虽为两县，因区域相近，而把祖居地与陵区联系起来统称武进县东城里祖地名，可以理解为墓葬在武进县东城里附近的山地，何况东城里这样重要的地名，在古代丹阳志书中却没有记载。还要知道，在古代用旧名命新名是常见的。如齐梁先祖祖居山东兰陵，南迁后仍在晋陵武进县侨置兰陵郡和兰陵县，梁武帝称帝后仍将武进改为兰陵。唐代撰修的《南史》《梁书》仍称梁武帝为“南兰陵中都里乡人”。要知道齐梁先祖萧整是山东兰陵中都里乡人，唐时仍称梁武帝为南兰陵中都里乡人，乃是北名南称、旧名新称，不足为怪。

理由五，张教授在文章中也承认“史书在编纂过程中，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的政区概念对撰写工作影响很大，无法做到完全依据旧有的政区名称来叙事，夹着作者生活时代政区概念是非常见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才是作为学者说出的一句明白话。所以，不能看到唐代《梁书·皇后传》上一句梁皇父母葬“东城里山”就当作是齐梁祖居地的武进东城里，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三、他对地方志书中一些不同记载，不加分析，就片面引证解读。

在地方志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和认知，本属正常，而他只引证镇江、丹阳和其他志书中的个别记载而置全国性地理志书和常州、武进历代志书的记载不顾，对各种史料不作综合古今对比分析、去伪存真和实证考察，就片面引证，随意解读，以致做出一些片面的、错误的推断。例如：

1. 关于梁武帝祖宅记载。从宋《咸淳毗陵志》到清代《武阳合志》《续修四库全书》和至今保存在万绥东岳庙中的清代康熙到光绪年间的十几块碑刻，都证实梁武帝祖宅在今常州武进万绥镇。而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古迹》记载：梁武帝宅“基在塘头村。即位幸旧宅，观井上梨枣，并儿时所植。”《大清一统志·镇江府》（古迹）称：“梁武帝宅”在丹阳县东北部塘头村东。帝即位，尝幸旧宅。井上有枣树，帝儿时所植。今井尚存。”清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古迹）记载：“武帝宅枣树在东门外塘头村。”

从以上两地不同记载中，镇江志记“塘头村”在“东门外”（此为丹阳县城，古今均为云阳镇）。而正史中有记载梁武帝旧宅在武进县的“东城里”“中都里”而从无“塘头村”的记载。《梁书》中梁武帝为“南兰陵中都里人”，《南齐书》

记载“武进县东城里为南兰陵”。当正史与地方史志所述不符或发生矛盾时我们应首选正史，而地方史志所述可作“另一说”留存，以进一步研究。所以，梁武帝旧宅应在武进县之东城里，即今常州市境内西北万绥镇。

2. 关于武进故城地址问题。唐《元和郡县志》记载：“晋武帝改武进为丹徒，别置武进于丹阳县东五十里。”清《江苏通志》讲：“晋分立之武进今县北七十里武进故城是也。”而 2001 年由镇江丹阳学者参与编写的《六朝文化》，把武进县地望指在“江苏丹阳东”。2004 年《镇江研究丛书》附《萧统籍贯考》，根据宋《嘉定镇江志》（卷一）中一个“按语”：南宋卢宪判断：“以《元和志》里数计之，在丹阳吕城镇上下”。于是就认为武进县城在今丹阳县东南吕城镇。那么，丹阳县东 50 里在现今什么地方呢？在 2000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地图上，丹阳县城与武进县万绥镇同在北纬 32 度上，且相距约 50 华里（25 公里），常州市市区到武进县万绥约 70 华里（35 公里）。而近有人把武进故城说在吕城，只见于《嘉定镇江志》上一个“按语”引一个人的判断，就信以为真。持此论的作者曾向笔者坦承：“惭愧，只是一家之言”。说武进故城在“丹阳东北部”，既无文献记载，也无实地所指，也只是一种推想而已。

3. 关于兰陵城故址问题。史载东晋初在晋陵武进县界内侨置南兰陵郡和兰陵县。北齐《魏书》（列传 68）上最早记载了具体地点。该书称：“萧道成，字绍伯，晋陵武进楚也。僭晋时，以武进之东城为兰陵郡县，遂为兰陵人。”正史《魏书》中讲得很清楚，东晋初在武进县东城侨置了南兰陵郡和兰陵县。前已考证，东城即在今常州西北万绥镇。从宋《咸淳毗陵志》到清代《武阳合志》都记在今常州西北万绥一带。对于兰陵城故址也有说在今丹阳。一是说在丹阳帝陵区附近，依据是宋《咸淳毗陵志》今人的一个“按语”。对此说专家认为，有无此石碑有待考证。二是说在“常州市与丹阳市东北交界处”，在今丹阳何地，至今也无具体所指。所以，对兰陵故城的几种说法，可以存疑待考。

4. 关于东城村、天子路、皇业寺等多种说法。

如东城村。丹阳、武进都有。大凡一个城市和乡镇，都有城东、城西之地名。1992 年《丹阳县志》记有两个东城村，一个在折柳乡有东城巷自然村，一个在荆林乡有三城巷自然村，而且相距几十里。可见，在丹阳帝陵区附近并没有东城村。前几年才在陵区西一个自然村新挂上了一个“东城村”牌子。武进县县志中万绥附近东之西夏墅乡古今都有东城村和东城巷、西城巷自然村，在北之孟城至今亦有东村、东巷之名。

如皇业寺。丹阳县东 25 里萧塘港北有一名皇业寺，又名戒珠院，在埤城乡亦有名皇业寺，在帝陵区山边有一个小寺，近年才扩建而名皇业寺。武进

地方志上记有两个皇业寺，一在万绥镇西东城天子路齐高帝萧道成旧宅叫皇业寺，一在万绥万岁街万岁寺，又称皇业寺。

如东城天子路。《南齐书》上记“东城天子路”，武进古今地方志书中均有记载，地在今万绥镇西。经查丹阳古今志书中都没有“东城天子路”的记载。现今有人把丹阳县北一个小莘村据说有秦时“驰道”所经，于是就把武进“东城天子路”搬到丹阳城北。

如东城里。东城里地名今已不存。丹阳古今志书中从未有过“东城里”的记载。而从梁朝《南齐书》开始，常州、武进历代志书中都有“武进县东城里”的记载，而且《南齐书》《魏书》中早有记载，东城里就是东城，东城就在武进县故城，今常州西北万绥。“东城里”地名今已不存，其原因可能是：一是时间久远，地名变迁，特别是万绥地区历经多次劫难，才有《武进阳湖合志》上讲：“东城天子路……萧整南徙首先居此，后毁于战火”的记载。二是武进故城（东城）从晋至唐初 300 多年后，县治所迁往郡城（常州市区），至今 1000 多年，故城逐渐衰落而为乡镇，原有地名也逐渐淹没不存。三是从萧整始居东城里到齐梁建国已有 160 多年，后世子孙当分家立业，各有所住，直到四世孙萧道成、五世孙萧衍做皇帝，正史和地方志上才记其住宅所在地，并有遗迹留存。虽然东城里今已无确切地点可指，但从古籍记载和齐梁遗存中仍可认定，东城里就在历史上的武进故城即古之万岁镇，今之万绥镇及其周边地区。直到 2001 年丹阳县新出版的《丹阳古今》中才把齐梁王室萧氏始迁祖萧整过江居“武进县东城里”改成“曲阿东城里”，才在丹阳第一次出现“东城里”之名。所以齐梁王室祖居地“武进县东城里”“不在镇江在常州”，这是古今认定的历史地名。是不容篡改和搬迁的。

结　语

历史和现实的存在，齐梁王室的祖居地“晋陵武进县东城里为南兰陵”在今常州西北孟河镇万绥地区，古称武进县万岁镇，后为武进县万绥乡，今孟河镇万绥村和南兰陵社区，而不是在今丹阳东北部的“萧梁帝陵区之间”。这是一个距今 1700 多年（281—2025）古今认定的历史地名，这是不容某个地方和某些人的主观认识所能篡改和搬迁的。

（文/扬　润）

文旅融合背景下常州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研究

——以本土地名宣传推广为例

摘要：本文以文旅融合为背景，围绕常州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展开研究，聚焦本土地名宣传推广这一核心切入点。常州作为拥有3200余年文字记载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虽留存丰富地名文化遗产，却面临传统地名遗忘、文旅资源挖掘不足、居民文化认同弱等问题。研究通过梳理315个市级地名文化遗产，开展立碑保护、课程开发等工作，构建四条地名主题打卡线路，并借“苏超”赛事实现文化破圈传播，同步探索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最终激活地名文化活力，为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提供“常州实践”范式，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关键词：常州地名文化；城市形象塑造；文化传承。

引　言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深刻认识城市文化内涵，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塑造独有的城市形象，并对其进行有效推广、传播，这座城市才能表现出可持续竞争力。

常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500万年的人类起源史，7000多年的农耕文明史，3200余年的文化史，2560余年建邑史，留给常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长河沉淀了无数珍贵的地名瑰宝，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记忆；一个地名，就是一种文化传承。这座“常乐之州”，不仅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江南风情构筑了城市的精神底色，更以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心灵原乡。从宋代文豪苏东坡“买田阳羡吾将老”的归隐之志，到清代诗人龚自珍“常州星象聚文昌”的由衷赞叹，无数文化大家在常州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传统地名及其背后的故事逐渐被遗忘，亟需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重新唤醒公众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并且文化旅游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文化 IP 和宣传内容，导致文旅资源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同时，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较弱，需要通过接地气、有趣味的宣传方式增强文化认同和社区凝聚力，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课题研究意义与价值

地名是城市记忆的活化石，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传承和推广本土地名，既能保护地域文化根脉，又能赋能旅游快速发展。通过挖掘其历史内涵、创新传播形式（如数字文旅、主题线路），可增强城市文化吸引力，打造差异化文旅 IP，促进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近年来，本课题组研究成员参与了江苏省文旅厅非遗大讲堂、常州市市级地名文化遗产整理、常州市地名文化遗产研究等多个本土地名推广项目，开展了田野调查、市民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多种形式本土地名宣传推广的调研活动。今年，课题组更是注入新鲜血液，组建了一支由本土地名研究专家、高校教师与大专院校学生组成的本土地名宣传推广团队，并整理总结出以下 4 点关于本土地名宣传推广的需求：

1. 文化传承需求：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传统地名及其背后的故事逐渐被遗忘，亟需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重新唤醒公众对本土文化的关注。

2. 文旅融合需求：文化旅游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缺乏具有吸引力的文化 IP 和宣传内容，导致文旅资源未能充分挖掘和利用。

3. 社区认同需求：本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较弱，需要通过接地气、有趣味的宣传方式增强文化认同和社区凝聚力。

4. 品牌塑造需求：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挖掘地名文化，打造独特的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与此同时，今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即“苏超”）火爆出圈。这背后是企业豪掷千万赞助，政府兜底补贴，良好的营商环境，文旅联动带火城市，江苏“13 太保”互怼背后是散装江苏的独特的文化自信。10 元门票引爆江苏全民狂欢，一场草根足球赛点燃了城市激情，激起了省内游浪潮。开赛一个多月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成为 2025 年体育圈、文旅圈一个现象级热点。

随着赛事的持续开展，依托体育赛事引流，催生出“体育+文旅”消费场景，推动文旅经济发展，拉动撬动了 3 亿元的经济效应。不仅是比赛精彩，参



“苏超”比赛观摩现场

赛城市还以此为契机，带动文旅消费，促进了城市间的百姓交流。以赛事促消费，成为了这项赛事的一大特色。留住客场球迷，常州用心促文旅。端午节期间，常州本地各大景区共接待扬州游客超 10 万人。

南京发布“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到央视新闻“笔画保卫战”、新华社“州 VS 南京”，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加入“调侃”江苏的队伍中，让“苏超”更具文化范。各地带着些许调侃的“热梗”将江苏历史典故、地名标志、饮食特色等地域元素，巧妙融入球赛叙事，在幽默互侃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江苏文化的深厚底蕴。如：“太湖三傻——苏得惨（苏州）、无所谓（无锡）、常垫底（常州），旁边还有个镇在输（镇江）”；“徐州与宿迁的比赛被戏称为‘楚汉之争’”，等等。截至目前，常州 5 轮 0 球继续垫底，被网友戏称“十三妹”，大呼“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更有常州本地辖区谐音梗，如：武进（无进）、金坛（进蛋）、天宁（添零）、钟楼（总漏）、新北（新败）、溧阳（利扬）等。官方带头玩梗、“掏空家底”宠粉，体现的不仅仅是江苏各城市的雄厚实力，更是“苏超”背后的经济与文化狂欢。短短一个半月的“苏超”征程，常州凭借“稳定发挥”，将火力和热度都吸引到自己身上，造就了“场内越惨，场外越爆”的魔幻场面。

在此契机下，做好全市地名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扩大地名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在全市营造浓厚的本土地名文化宣传推广氛围，本课题以常州地名为切入点，通过挖掘地名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通过线上线下

结合的方式，让地名文化“活”起来。旨在唤醒公众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增强文化认同感，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让更多人了解、热爱并传播常州文化，助力地方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二、课题研究现状与成效

（一）课题研究现状

2022—2026年，在市民政局组织下，市民政局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地方志办公室，对常州市域范围内，专名沿用时间较长、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有重要传承价值、知名度较高的古城（包括市级、县级古城）、古镇、古村落以及路、街、巷（里、弄、坊）名称和古桥梁名称等，经综合评估，并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和各地相关部门意见，遴选出414个地名列入我市地名文化遗产。针对于已经评定的市级地名文化遗产，课题组进行整理建档。做好地名文化遗产宣传保护各项工作，通过编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设立地名文化遗产碑牌、拍摄微视频、编纂地名文化丛书等多种形式，加强地名文化遗产宣传，提高地名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二）课题研究成效

本课题组成员多次参与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各类项目，吸取相关经验，如之前共收录、整理、公布各级历史地名保护名录近2000条，已经选择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重点历史地名，开展了立碑保护工作，共设置了45处历史地名保护碑、牌，对地名的位置、历史沿革、文化内涵等进行介绍，成为我市的重要文化名片。经过不懈走访考证、整理汇编，学会现为江苏省非遗项目苏东坡传说、市级非遗项目延陵季子的传说、舜的故事、焦丙与焦溪的传说等故事传说传承单位。名人事迹、传说（故事）的传扬与本土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共生关系”，相互成就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名人事迹、传说（故事）融入了文化元素和精神内涵，大大推动了地名的传播与认同；另一方面，本土地名作为所在城市的时空的载体，使其更易被记忆、传承和活化。因此，借助“名人效应”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的优势更为显著。根据故研究策划了以地名文化为主题的讲座沙龙、社区教育课堂、文化打卡路线等宣传推广活动。本课题以常州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单为切入点，聚焦名桥、名镇、名人、名城四条主题线路，通过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实践，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探索地域文化传承与城市形象塑造的有效路径，取得了一些切实可见的成效。

（三）深耕遗产，系统活化：地名主题文化资源的课程化、普及化成果

本阶段成效的核心在于将静态的地名遗产名录转化为动态的文化教育资源与艺术传播载体，实现了地名文化从“写在纸上”到“唱在口中、演在台上、学在心中”的质变。

1. 系统性梳理与故事挖掘

基于《常州市地名文化遗产（第一批）》，本课题组对名桥（广济桥、文亨桥、天禧桥、新坊桥、琢初桥）、名镇（万绥东岳行宫、孟河古镇、齐梁故里）、名人（“常州三杰”故居及纪念馆、前后北岸、东坡公园）、名城（御码头、季子文化中心、龙城书院、龙城象教天宁禅寺、天宁宝塔）四条主题线路所包含的地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与口述史采集。

不仅仅停留在空间指位，更着力挖掘每个地名背后鲜活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文化象征、人物事迹与时代变迁。例如，梳理了广济桥“龙嘴”的智慧传说、文亨桥“文亨穿月”的美学意境与旧时文人雅集；挖掘了孟河作为“医派之乡”与“齐梁故里”的历史地位联系，考证了前后北岸作为明清江南文脉枢纽的名人交游轶事；阐释了“龙城”意象在天宁禅寺与宝塔上的具象体现；解读了季子“三让王位”的诚信品格与吴文化渊源。现已在多个社区开设暑期课堂。

2. 校本课程开发与教育实践

与常州市多所中小学、高等院校进行合作，将上述研究成果转化为适合不同学段的校本课程。课程设计注重融合性（融合历史、语文、地理、艺术等学科）和体验性（动手实践、情景模拟）。课程已在试点学校正式开课，反响热烈，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和认同感。

3. 艺术节目创演与社区普及

联合常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团和地名文化宣传推广志愿服务队，将地名故事素材进行艺术提炼，创作了一批形式多样、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自编自排情景剧《恽代英》等。实施“送剧进社区”计划，已在经开区戚墅堰街道东方社区、钟楼区荷花池街道荷花池社区、钟楼区西林街道泰盈社区进行公益性巡演，演出反响热烈，深受市民朋友喜爱。

同时，策划组织“跟着地名学历史”系列公益讲座，邀请地方文化专家走进图书馆、文化馆开设文化沙龙。讲座以四条线路为框架，深度解析地名内涵，场场爆满，有效覆盖了全龄段文化群体。

（四）线路赋能，多元联动：地名打卡激活文旅消费与“苏超”体育文化破圈传播



本阶段成效的核心在于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体验，将主题线路打造成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并借势大型体育赛事实现超常规传播，促进文旅消费，扩大文化影响力。

1. “寻踪地名·魅力龙城”主题打卡线路规划与实施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精心设计并发布了四条主题精品本土地名研学线路：

四大地名文化打卡主题与本土地名宣传推广的关系紧密且互为支撑——地名宣传推广是激活主题线路价值、拉近文化与大众距离的核心载体，而主题线路的文化内涵则为地名宣传提供了鲜活内



荷花池社区演出红色情景剧



经开区图书馆授课《你不知道的青果巷冷知识》



新闸中学授课《戚墅堰的“前世今生”》

容与情感锚点。两者通过“场景化呈现、互动化体验、本土化渗透”的结合，共同推动市民与游客对本土文化的感知、参与和认同。以下从四大主题分别解析其与地名宣传推广的关联：



“寻踪地名·魅力龙城”主题打卡点

（1）名桥主题：

“桥见时光”名桥漫步线：从广济桥（运河畔）启程，串联文亨桥（西瀛里）、天禧桥（历史风貌区）、新坊桥（旧市中心）、琢初桥（城市更新区域）。线路设计融入桥梁构造讲解、运河风光游览、沿桥老字号寻访（如麻糕店）、古诗词赏析点。以“线性空间”串联地名宣传，强化“桥与城的共生记忆”。

（2）名镇主题

“古镇溯源”名镇文化线：聚焦万绥东岳行宫（古刹与民俗）、孟河古镇（医派文化、斧劈石盆景体验）、齐梁故里（南朝石刻寻访、萧氏家风解读）。强调古建筑保护修缮成果展示、非遗技艺体验互动。以“区域文化生态”激活地名宣传，强化“镇与乡的烟火传承”。

（3）名人主题

“先贤风骨”名人追思线：串联“常州三杰”纪念馆、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群访古）、东坡公园（舣舟亭怀古、品茶）。重点打造沉浸式讲解、东坡诗词会。以“先人风骨主线”引领地名宣传，强化“地与人的精神共鸣”。

（4）名城主题

“龙城印记”名城风采线：以御码头运河游船体验开场，经季子文化中心（诚信文化展示、礼乐互动），访龙城书院遗址（现常州文化广场可设展示点），至天宁禅寺及宝塔（登塔观城景、感受“龙城象教”气象）。突出古今交融的视觉对比与文化体验。以“城市文脉主线”整合地名宣传，强化“城与魂的古今对话”。

在不断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深入细致地阐释地名文化，在浩瀚的历史文化中追寻地名的价值和意义，积极推动文化遗迹、工业遗存转化为文旅资源，深度展示地名地标历史文化的底蕴内涵，推动更多成果多元转化与社会共享，增强公众的地名地标保护意识。例如：在“龙轨智行·应‘运’而生”轨道交通科普研学活动中，全面展示了中国轨道交通行业跨越百年的壮丽发展历程，戚墅堰地区百年老厂房的活化利用和蝶变更新，成为老工业基地复兴、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面向游客与文旅从业者：设计制作精美的纸质版《常州地名主题打卡护照》，在各景点、旅游集散中心、特色酒店发放。提供定制化讲解服务包供旅行社选用。

2. 文创衍生开发与文旅消费促进

鼓励并协助文创设计公司、景区、非遗传承人，围绕四条线路的核心文化符号开发主题文创。已初具成果的包括：

古桥系列：古桥文化印章、茶具、古桥剪影金属书签。

名镇系列：孟河医派药香囊、齐梁文化桌面摆件。

名人系列：“三杰”人物形象文化衫、背包。

名城系列：天宁宝塔形象冰箱贴、青果巷打卡地图。

在打卡线路的核心节点（如景区商店、运河游船、特色民宿）设立主题文创快闪店或专柜。结合线上（抖音、小红书）进行推广。有效拉动了旅游商品的销售与本地文化品牌知名度。

3. 借势“苏超”，体育文化破圈传播

敏锐抓住“苏超”（江苏省足球超级联赛常州赛区主场比赛及相关衍生活动）这一巨大的流量入口和城市庆典契机。借助媒体力量深度嵌入对常州地名文化主题打卡活动的介绍和推广，塑造“观精彩赛事，赏千年龙城”的城市新形象。将研究转化出的主题线路与创意体验进行落地推广，成功实现了“打卡活动聚人气，文创产品促消费”的目标。特别是巧妙嫁接“苏超”这一热点，开创性地将体育赛事作为地域文化传播的“超导媒介”，策划一系列联动性强、参与度高、传播力广的活动，能够显著提升常州地名文化及关联旅游资源的曝光度和吸引力，有力推动了文旅融合消费，使地域文化传播从文化系统“圈内热”走向了更广泛的市民圈层和全国体育迷视野（“破圈”、“出彩”）。

（五）机制创新，社会共创：政府引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常州实践”

1. 政府扶持与平台搭建

政府部门(如市文广旅局、宣传部)提供专项资金或购买服务,支持地名文化传承项目征集孵化:面向社会(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公司)公开征集基于地名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播方案(如剧本杀创作、数字产品开发、研学课程升级),择优资助落地。

线下活动品牌打造:固定举办"'龙城记忆'地名文化周/月",作为年度品牌活动。此间整合:优秀文艺节目巡演、公益讲座集中举办、"最美地名故事"征文摄影大赛、"小小讲解员"选拔培训、文创市集等,形成聚集效应。

线上平台协同推广:官方文旅平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开设 # 地名里的常州 # 长期专栏,持续推送四条线路故事、打卡攻略、活动预告、优秀作品展示。形成线上持续声量。

2. 社会机构深度参与

老年大学:"地名故事与城市变迁"系列课程。将地名文化与老年人生活记忆、城市发展史相结合,形成怀旧与教育兼备的精品课程,成为老年大学热门课。

青年夜校:"解码常州地名,玩转 Citywalk"实践课。利用周末或晚间,面向社会青年开展地名知识普及、实地调研方法、解说技巧、摄影/短视频制作培训,培养了一支热爱本土文化、具备传播能力的青年文化志愿者骨干队伍。他们已成为后续地名主题 Citywalk 活动的主力组织者和导览员。

骑行与徒步社群:与本地知名骑行俱乐部(如龙城骑迹)、户外徒步协会合作,联合规划发布地名主题精品骑行/徒步路线(如运河古桥线、孟河古镇越野线)。将运动健身与文化探访结合,深受年轻人喜爱。并在活动中融入地名知识打卡点。

行业协会联动:发挥旅游饭店行业协会、旅行社协会、文创产业协会作用:鼓励酒店在客房、大堂等位置摆放地名文化宣传资料、放置《打卡护照》。

推动主题线路纳入地接社常规推荐产品。组织文创设计对接会,帮助设计师与景区、非遗传承人合作。

3. 其他行业协同促进文旅发展

商业综合体联动:在常州知名商业中心(如江南环球港、新世纪商城)中庭举办小型"常州地名文化微展览",展示老地名照片、地图、微缩模型,并销售相关文创。延长顾客停留时间,促进商文旅融合。

交通体系渗透:与公交公司、地铁公司探讨,在部分线路(特别是途经主要地名遗产点的线路)的报站语音中,增加对该站点历史地名及文化要点的1—2 句特色播报(如:"前方到站文化宫,本站可换乘前往东坡公园、前后北

岸历史文化街区，探寻东坡遗踪、名人足迹”），让日常出行也成为文化感知的窗口。

校园赛事与文化结合：鼓励中小学在举办体育节、艺术节等校级活动时，加入“地名文化”元素（如以四条线路命名的趣味运动项目、表演地名主题的文艺节目）。

旨在探索了一种“政府引导扶持搭台、专业研究筑基、社会机构发力、公众广泛参与、关联行业协同”的文化传承传播新模式——“常州实践”。它有效解决了传统单靠政府或文化部门力量进行文化传播的局限性问题。苏超的“文化出圈”成功，本课题的落地实践（进社区、进校园、借赛事推广），以及政府引导下各类社会力量（老年大学、青年夜校、骑行社群、行业协会、商业体等）的积极响应与深度参与，充分证明：成功的文化传播绝非坐享其成，需要地方敏锐捕捉热点、精心策划项目，并主动“推一把”。关键是要通过机制创新（如项目孵化、政策支持）、平台整合（年度活动周、线上专栏）和跨界合作（文体旅商融），激发社会内生动力，形成“共创、共享、共赢”的文化生态。这为未来常州乃至其他城市系统性地开展地域文化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操作范式。

（文/刘锦岚）

藤花旧馆(孙氏馆)考

——五陈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之我见

编者按:本文写于2004年7月,时拆迁之风席卷龙城,“改造”历史文化街区口号四起,一批有识之士为了保护文物,积极上书建言献策,本文为其中之一,作者其心可鉴。今特刊登,以供参考。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遇赦北归,在常州人钱济明的帮助下,借得前北岸孙氏馆作为寓居之地直至终老。苏东坡六月十五日到常州,七月二十八日病逝于孙氏馆。虽然在孙氏馆只住了一个月十三天,但毕竟是苏东坡的终老之地,是他一生飘泊,最后行踪的归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所以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寻访探源,也是苏学研究的难点和热点。由于时隔千年,资料缺失,加上战乱,尤其先有元兵屠城,后有太平天国战争,使一些史迹灭失。有关孙氏馆的传闻,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省、市有关部门在公布省级文保单位时,仅以传闻确定楠木厅就是东坡终老之地藤花旧馆,简单而且武断,缺乏科学严谨,对苏学的研究起了误导,官方的“介入”更使问题扑朔迷离,难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质疑。实际上,尤以顾祖年、戴伯元的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在赵翼、洪亮吉的诗文都会涉及汤雄业、汤朴斋,一些学者认为正史没有记载,他们的依据是科第录及《常州府志》《阳湖县志》,所以连雄业与朴斋是何关系都没有搞清楚,以失传而解释。1979年,我曾结合汤雄业致书当时的市文管会,还附了汤宅的平面图,谈及孙氏馆的原址只能在汤宅,因为战火可以烧毁房屋,甚至可以夷为平地,那宅基不可能变化的,建筑的集群也是不可改变的,汤宅门庭进深,气势恢宏,楠木厅是不可相比的,可能是“钦定”孙氏馆的原因,信函发出后杳无音信。因此,要查清孙氏馆确切位置,关键是查清汤雄业、汤朴斋的有关资料。找到家谱又是关键的关键。据悉,美国盐湖城图书馆有一本汤贻汾重修的家谱。我的一位朋友出差在美,驱车250英里到图书馆,查到确实有此书,但是没有图书卡及非会员无法借阅和复制,只能无功

而返。家谱一时无法找到，改变策略到任职的所在地查考。很快广西图书馆、广西桂林图书馆从州志、府志、《广西通志》及《清高宗实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摘录了汤雄业官职变迁及政声。长沙图书馆、常德图书馆寄来了汤似瑄（世俊）的资料，是雄业的曾孙，汤成烈之子，但没有汤朴斋的资料。这时又传来上海图书馆藏有汤成烈同治十三纂修《汤氏家乘》，有六本十四卷（藏书号 JP637）的消息。在《汤氏家乘》卷九“居徙录”中明确记载：“九世毅堂公第（汤雄业）居顾塘桥东，曰湛露堂。有古藤一株，相传为东坡手植。后楼高出城，颜闔曰俯云，下临白云溪，画舫烟波汤最宜消暑”。而八世蓉溪公汤大宾（汤雄业之父）居西下塘之恭寿堂，又置宅青果巷，规模极深邃宏敞，名承露堂。所以，是汤雄业置宅于孙氏馆，也为孙氏馆的座落定了位。在《汤氏家乘》的卷八的《冢墓录》的汤朴斋的墓志中记载：君姓汤氏讳绍业，字立



2003 年的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西首


2006 年改造时的前后北岸一角

方，一字朴斋。曾祖说，祖自任，皆赠中宪大夫。父大宾官广西浔州知府，诰授朝议大夫例封通奉大夫。汤朴斋是汤大宾五个儿子之一（雄业、敦业、康业、绍业、浔业）。汤朴斋不是失传，也不是汤雄业之子，赵翼称汤公子朴斋是对大宾而言。至此，汤朴斋身份的确认也为孙氏馆乾隆年间汤氏所得作了诠释。至于人们说的东小楼也是确有其楼，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烧毁。民国中期，由汤和甫召集四房借资在东小楼废墟上造了五南五北的四合院平房（位置在花厅旁边）。汤成烈系道光辛卯恩科顺天举人，甲辰大挑一等，历任浙江武康、嘉善等知县，归主延陵书院。编修了阳湖县志。与赵瓯北、洪亮吉为同代人，其言可信也。汤宅与楠木厅结构有很大差异，汤宅在前河有大照壁、门房有石鼓（磐陀石），有轿厅，有大厅，有花厅，有备弄；每一厅屋前后有庭院，既可解决通风见光，又有紫藤石榴，玉兰紫薇，竹影婆娑，丹桂飘香。还有风火墙可防火，五进三厅还有后楼，后楼（观云楼）俯视白云渡龙舟竞发，烟波浩渺，难怪受慈禧赏识的画家汤世澍把后楼作为画室。现在除第一进和轿厅在建造延陵路拆除以外，是前后北岸唯一保存最好的最完整的民宅。不仅有历史的积淀，而且在午门、仪门上都留有栩栩如生的镂雕石刻，对研究明清建筑有着重要意义。汤宅与楠木厅有围墙相隔，至于一条弄出进，是 1958 年大跃进把原来的大厅变为针管厂，才在柴屋的山头开个门，那些说方、汤一门出入的人，不知到过现场否?设想一下，汤朴斋宴请赵瓯北、洪亮吉等名士，不是正门出接，大堂相迎，花厅落座，而是走夹弄，穿柴屋，不能因为写了一个“藤花旧馆”，因为领导发话，更不能因为市文管会的“行政许可”，就把楠木厅认定是孙氏馆，是大谬也。

从一陈到五陈，我除了向领导、向规划部门提出如何建设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建议外，还收集、提供了从北京南池子到上海新天地、南京秦淮河的经验，也提供了拆迁宋庆龄、胡适等居住的内史第的教训，提供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包括吴良镛、贝聿铭及弗雷德·曼森等的学术著作外，花了四年时间来考证孙氏馆，现在向有关部门交出了答卷。所以，对文化街区进行规划、开发、利用，首先是要尊重历史，严格考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科学就是指以历史的唯物观，以史实来鉴定史迹，照历史原貌“修旧如旧”，不搞子虚乌有的碑林、围廊，更不要搞为商周鼎镬去铜绿、上油漆的蠢事，造假、克隆是对文物区的亵渎。历史文化街区科学观第二个概念就是延续文脉并与周围协调，说实在话前后北岸难度很大，南有常州大酒店、常信大厦，北有一院综合大楼，东有物资大楼、基督教堂等。高楼林立，倚角相望。42500 平方米的项目区内又要保护文物，又要发挥市场作用提升功能，鱼和

熊掌不能兼得，但绝不能因为要提高土地的使用价值，就把双子星座、金茂大厦造进文保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靠科学发展，科学是基础，发展是第一要务，要搞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要树立一个理念，走出一个误区，做好一篇文章，树立的理念是“保存—更新—延续”，延续文脉，以功能来定位，改善人居环境为目的，不要一搞文保区就是拆屋赶人，要腾笼换鸟。误区就是要么不保护，要么全保护，42500 平米最好保护 43000 平米的文物，全保护等于不保护，要保护精品。事实上，即使孙氏馆的保护，从建筑学讲已经不完整了，已经拆除了门楼、轿厅，马上延陵路要放阔，将逼近大厅，恢宏的气势已经没有了，但两害相权取其轻，毕竟保护了历史遗存和历史信息，更保护了文化，当文物与整体规划有矛盾时，出现既不能保护，又不能发展时，两利相权要取其重，1959 年埃及、苏丹建造阿斯旺水坝，就把阿布辛贝神庙腾挪了一下，神庙搬家成为世界保护与发展的成功典范，“阿布辛贝运动”产生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前后北岸从难度和重要性来讲，与阿布辛贝是不可比的，关键是理念和办法。要把保护和发展同时纳入视野。要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文章，六个字的内容要相互渗透，交相辉映。

本来孙氏馆考证和五陈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是两个内容，两篇文章，但考证目的是以历史唯物观和务实的科学精神来对待历史文化街区，服务于历史文化街区。本篇就作为前后北岸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之见的结束篇。

我们面对前进道路上的挫折与缺失，要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关键是坚定信心，振奋精神，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各项建设，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挫折，让决策者、规划者加上公众的参与，使我们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经得起历史的验证，使子孙后代多点赞美，少留遗憾。

（文/汤祚永）

江左文脉　家学渊薮

——清代常州族塾考略

族塾，又称族学、祠塾，为清代民间办学之重要形式。清代民间教育体系多元，大要有三：世家大族为本族子弟所设之族塾，官绅士商倡设惠及乡里贫寒子弟之义学，以及官倡民办之地方社学。三者之中，族塾依托宗族力量最深，影响亦最远。

常州所在的江南地区，宗族制度向来发达。明清两代，常州府城及附郭武进、阳湖二县，望族林立，科甲蝉联。族塾之兴办随之而盛，庄氏、盛氏、蒋氏等皆有名塾传世。此类族塾不惟课子弟识字明经，更是一方学术酝酿、人才辈出之渊薮。

一、族塾之渊源与性质

族塾之设，源流甚古。北宋名臣范仲淹为本族创立天平山族学，以义庄田产赡族兴学，后世族塾多循此制。入清以后，江南市镇望族竞相仿效，以族田或义庄拨款为经费保障，族塾遂成宗族教育之常制。



清代塾馆旧影

族塾通常附设于宗祠或义庄之侧，不取束脩，凡本族子弟皆可入学。宗族借此“敬宗睦族”，更寄寓培养人才、光大门楣之深意。虽未能脱离

科举取士之大框架，然较之官学与一般私塾，其宗族性、地域性尤为鲜明。

二、庄氏族塾与毗陵庄氏之科甲鼎盛

常州族塾之中，庄氏声名最著。毗陵庄氏始祖庄秀九于宋元之际迁居常州，家谱载其曾于废井中得白银而不取，后逢灾荒，遂引导乡人取出赈济，此举奠定了庄氏济世恤民之家风。

明代万历庚戌年，庄起元、庄廷臣同祖兄弟双双成进士。自此庄氏科名日盛，至清代晚期，族中进士达 34 人，举人 82 人，状元、榜眼、传胪各一人，入翰林者 11 人。仅清代一朝，生员以上科举出身者 97 人。美国学者艾尔曼在所著《经学、政治和宗族》中，曾以此数据称毗陵庄氏为清代科举家族之冠冕。其科甲之盛，与族塾教育之绵延密不可分。

庄氏族塾设于星聚堂内，东邻济美堂，原有屋五进。现移建于民元里一号，坐北朝南，现存五开间二层楼，荷包月梁、挂落长窗等明清构件保存尚好。此塾馆亦被视为常州文脉之教育摇篮。

庄氏族塾本为培养本族子弟而设，然亦惠及外姓。据《洪北江先生年谱》，洪亮吉 17 岁时曾于庄氏塾中，从金坛荆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举义。刘逢禄 11 岁随母归省外家，外祖父庄存与试其学业，逢禄应答无滞，庄存与喜曰："此外孙必能传吾学。"逢禄 13 岁即自求《春秋繁露》，发愤研读《公羊传》何氏解诂。庄存与于乾隆十年中榜眼，倡导今文经学，开清代今文经学派之先声，其侄庄述祖继之，外孙刘逢禄融通考据与今文家法，遂成常州学派之基干。庄氏一门的学术成就，与其族塾数代涵育之功实相表里。

三、龙溪盛氏与拙园义庄、人范书院

常州族塾中，以龙溪盛氏所办之拙园族塾条件最为优厚。盛康（1814—1902），字勖存，号旭人，武进人。道光二十年（1840）中举，二十四年（1844）成进士。同治七年于常州创建拙园义庄，以敬宗睦族为宗旨。义庄经营得法，岁有盈余，除完课赡族外，兴学助教为一大用项。

盛氏族塾规定，本族子弟 7—15 岁者皆可入学，书本纸笔由义庄供给。塾师须择"耐性坐定，摒除一切应酬者"充任。学生生活亦有定例："每季折灯油点心茶叶钱一千，四季共钱四千。每日午晚饭两餐，祠丁供膳。本祠贴饭买菜钱五十文，按在馆日计给。"教学首重识字明义，根基扎实。

光绪八年（1882），盛氏于拙园义庄之东建人范书院。书院筹划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其名取自盛康祖父盛隆所编《人范须知》。至光绪八年，由盛康

叔父盛赓捐廉俸千缗，盛康补足余额，始得动工。院址在铁市巷拙园义庄内，专课盛氏子弟，入学免费。

义庄规条中奖惩分明：能识字、诵经、作文者，依次给予奖赏；学业荒疏或规避不到者，停发修金。书院每年举行文课，仿科举乡、会试之制，“先期邀订，辰集酉散，掌庄出题，备中饭四篇，早晚点各一次。穷日之力，课以一文一诗，不准结烛，次日将卷送耆宿评定甲乙，优者酌与花红”。正式应试之际，族中子弟不论贫富，凡赴乡试者发给六千文，赴会试者发给三十千文；若领钱而临场规避，一经查出，即行追缴。

盛氏办学，初止于本族，后渐扩及邻境贫寒子弟，由宗族育才渐次向社会育才延伸。盛宣怀日后创办实业与新式学堂，其祖父盛隆任职安吉时曾修复古桃书院，其父盛康经营拙园义学，家学渊源实有以致之。人范书院入民国后改为汉文专修学塾，兼习术科，至民国 18 年（1929）改为人范小学，教育一脉绵延不绝。

四、族塾之教育模式与社会功能

综观清代常州族塾，其教育模式可约略归纳为四端。

一曰经费依托族田义庄。族塾之设与维持，多赖族田收益或义庄拨款。盛氏拙园义庄“每年皆有盈余”，庄氏亦以族产支撑塾馆。义庄兼具救济、助学、祭祀三途，助学又分启蒙、科考、习业三等，层次分明。

二曰教育对象以本族为主而不废外姓。盛氏人范书院专课本姓，庄氏塾馆则兼收洪亮吉、刘逢禄等外族才俊，盛氏且以义庄余资救助邻近贫寒子弟。族塾虽以宗族为本位，然非全然封闭。

三曰教学次第由识字进而科举预备。初课识字明义，继则诵经作文，人范书院每年文课即仿乡、会试之式，课以一文一诗。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实为族塾教学之长。

四曰管理制度渐趋周密。盛氏义庄规条于学业优劣各定赏罚，应试者按程给赀，规避者追缴所领，制度设计既见宗族育才之用心，亦折射科举时代务实之取向。

五、族塾之历史地位与影响

常州族塾之兴盛，与江南宗族制度及科举文化相互激发。晚清以降，常州宗族通过族内教育，既培育子弟，亦维系宗族秩序。宗族士绅修缮府县学宫、重建书院义塾，于地方教育恢复与维持用力甚勤。



族塾于常州学术文化贡献尤大。常州学派核心人物多出庄氏，庄存与开今文经学之新境，庄述祖继之，刘逢禄奠立学派之基。就此而言，常州学派在相当程度上实为庄氏家学之结晶。庄氏第八世庄起元尝于家训中告诫子孙：读书向圣贤，做官安民济世。此类理念经族塾代代相传，终使庄氏成为“江左科名之盛尤推庄氏”之科举望族。

常州族塾之影响延及近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瞿秋白，祖母出自庄氏。光绪二十九年（1903），瞿秋白随家迁居庄氏星聚堂后厅九皋楼，次年五岁时入庄氏塾馆，从庄怡亭读《三字经》《千字文》等书。庄氏塾馆为其启蒙之地，亦为其后来探求真理之起点。自庄存与至瞿秋白，庄氏族塾之教育血脉横跨百年，其影响实已溢出学术一隅，波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之进程。

清代常州族塾，以宗族为凭依，以科举为标的，以养才为旨归，在地方教育体系中占据独特位置。庄氏族塾之科甲蝉联，盛氏人范书院之规制完备，合而观之，可略见清代常州族塾教育之丰富面貌。其培育之人才，不惟光大门楣，更为地方与国家输送了大批士人与干才，遗泽至今，犹有可寻。

（文/秦大峰）

孟宪民院士梦想起航的地方
——孟宪民读书楼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2026年9月3日，这是一个特殊而庄严的日子。81年前，中华民族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个值得全体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日子里，我们相聚在常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共同见证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暨孟宪民院士档案文献捐献仪式的隆重举行。作为孟宪民的孙女，此时此刻，站在祖父曾经读书、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千言万语涌上心头，难以言表。

首先，请允许我以孟宪民后人的身份，对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在百忙之中莅临今天的仪式，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感谢！你们的到来，是对祖父孟宪民院士一生贡献的最大肯定，也是对我们孟氏后人莫大的鼓舞与鞭策。

同时，我要向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民建江苏省委文化委员会、民建常州市委文化委员会，承办单位——钟楼区政协，协办单位——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正是因



孟小星发言中

为你们的精心筹备和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这个意义非凡的仪式，让祖父的学术精神和爱国情怀得以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和弘扬。你们为保护和挖掘常州名人文化资源所做的工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代表孟氏后人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当这块纪念牌即将在这座饱经沧桑的读书楼前揭幕，当把与祖父生前有关的档案文献即将无偿捐献给国家，我的思绪不禁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回到了祖父将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一生。

我的祖父孟宪民，1900 年出生于常州乌龙庵一个书香门第。这座读书楼，是他少年时代勤奋苦读的见证，也是他求知之路的起点。青砖黛瓦之间，曾回荡着他朗朗的读书声；窗棂书案之前，曾映照着他伏案苦读的身影。正是从这里出发，他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赤诚，远渡重洋，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系统学习地质学和矿床学理论。学成之后，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回到了积贫积弱、战火纷飞的祖国，将他的一生与祖国的山河大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37 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山河的宁静，全民族抗战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大片国土沦丧敌手，我国的战略矿藏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矿产，是战争的血液，是国防的命脉。没有钨、锑、锡、汞、铋、钼这些特种矿产，就无法制造先进的武器装备，就无法换取外汇购买武器，就无法支撑旷日持久的抗战。然而，随着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何保证矿产命脉不中断，成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翁文灏、钱昌照分别担任正副主任。这个委员会的前身是 1932 年 11 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资源委员会主要从事矿石、冶金、电气实验和勘察、调查、研究等工作，并对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种矿产实行统制。通过以这些战略矿产为抵押，国民政府获得了大笔外国信用贷款，再通过以货贸易的方式，从国外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和机器设备，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和经济实力。可以说，资源委员会实际上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部门，它不仅支撑了中国的抗战，更为战后的中国工业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慧眼识珠，力荐我的祖父孟宪民出任个旧锡矿勘探队队长，后改为锡矿工程处主任。祖父临危受命，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他肩负的不仅是一个工程处的责任，更是抗战大业

对战略资源的殷切期盼。

在个旧那片崇山峻岭之间，祖父带领勘探队员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工作。云南的山，险峻陡峭；云南的水，湍急深邃。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物资匮乏的年代，勘测条件之艰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他们就靠手中的地质锤和罗盘，靠双脚丈量大地的每一寸褶皱；没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他们就节衣缩食，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经过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反复的科学论证，祖父创造性地提出了“双子”竖井方案。这个方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要求在复杂的矿体地质条件下，同时开凿两口竖井，形成一套高效的开采系统。这一方案的实施，面临着技术难题、资金短缺、设备匮乏等重重困难。但祖父以他渊博的学识和坚韧的意志，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他日夜坚守在工地上，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指挥每一个技术环节，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最令我难忘的是：祖父左手无名指就是在当年修建锡矿矿井时，由于发生矿洞塌方事故，为抢救事故被塌方的岩石砸伤，指甲部分已经变形，这也是当年修建个旧锡矿留在他身上的永久的记忆。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得益于这对“双子”竖井的建成投产，云南锡业公司终于实现了大规模、高效率的锡矿开采，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锡矿产品。这些锡矿，通过资源委员会的统制渠道，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需要的地方，换回了宝贵的武器弹药和战略物资。可以说，祖父和他的同事们在大后方用智慧和汗水，为前线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祖父那一代科学家，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独特的精神光芒。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呢？我想，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毫不犹豫地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毕生所学奉献给抗战救国的大业。而且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他们敢于突破常规，勇于技术创新，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祖父的一生，是与中国地质事业紧密相连的一生。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奋战在地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学术职务，比如：清华大学采矿系主任、云南大学工学院院长等，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1955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的院士。这是国家对他学术成就

的最高认可。然而，即使功成名就，他依然保持着谦逊朴实的本色，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地质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今天，我们站在这座读书楼前，我仿佛又看到了少年祖父伏案苦读的身影。这座楼，是他梦想起航的地方，也是他精神的原乡。从这里走出的，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地质学家，是一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更是一位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真正学人。如今，这座读书楼旧址被列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孟氏家族的记忆，更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种需要永远传承的精神。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抗战精神时曾经深刻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祖父孟宪民和他的同时代科学家们，正是这种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践行者。他们虽然没有持枪上阵、冲锋陷阵，但他们在另一个战场上，用知识和智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的功绩，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天，我们以揭牌和捐献的方式，向祖父孟宪民致敬，也是向所有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致敬，向那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致敬。铭记，是最好的纪念；传承，是最好的告慰。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传承精神，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感谢所有为这次活动付出辛勤努力的单位和同志们！祝愿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暨孟宪民院士档案文献捐献仪式圆满成功！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贤、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谢谢大家！

（文/孟小星）

同心同行：我与民建的情缘

在人生的旅程中，总有一些机缘巧合会改变我们的轨迹，而我与民建的缘分，便是这样一段充满意义的邂逅。

2011 年，我正式加入了民建，屈指算来，至今已有 15 年之久。在这之前，民建于我而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词。那时的我，每日忙碌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对民建的历史、宗旨和使命一无所知。

直到 2011 年初，一个改变我人生方向的契机悄然来临——时任常州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会主委邵明与我进行了一次深入而温暖的谈话。他目光真诚，言辞恳切地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民建？在交谈过程中，他仔细向我介绍了民建的发展历程、光辉历史以及那些为其创立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民建前辈。当他提到爱国实业家刘国钧先生是常州民建的创始人时，我的内心仿佛被一道光芒照亮。

刘国老，那是我最崇拜的先贤之一。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



本文作者（前排左四）出席民建常州市十五届委员会文化专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本文作者出席民建常州市十五届一次全体会议

诗。在国家动荡、民族危亡的年代，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投身实业。他创办的企业，不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在困难时期为无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对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凭借着敏锐的眼光和不懈的努力，收集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这些文物，不仅仅是物质的财富，更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他深知文物对于传承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给国家。他的事迹，真诚感动我，他的精神，深深感染我，我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渴望，想要加入民建，追随他的脚步，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我郑重地写下了入会申请书。

加入民建后，我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与信任。民建市委会经过慎重考虑，推荐我为市委委员，并任命我担任民建市委会文化委员会主任这一重要职务。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对我的高度认可。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要做好文化传承工作。

在出版地方文化图书方面，我深知地方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记忆，而图书则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于是，我深入挖掘常州的历史文化资源，编撰并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书籍。像《常州青果古巷》，详细描绘了青果巷的历史变迁、建筑特色和人文故事，让读者仿佛穿越时空，领略到古巷曾经的繁华与韵味；《常州宗教遗存》则对常州地区的宗教文化场所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展现了宗教文化在常州的发展与融合；《闲话乌龙庵》以优雅的笔触讲述了乌龙庵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中国地质事业先驱：孟宪民传》则全面地展现了孟宪民院士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这些图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地方文化的宝库，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常州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文物保护方面，我充分认识到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注：文物泰斗谢辰生先生言）。我积极建言献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影响力，为文物保护工作奔走呼吁。通过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重点推动了崔桥吴氏宗祠、崇真女校旧址、焦溪古镇、牛塘老街、西林老街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崔桥吴氏宗祠见证了吴氏家族的兴衰变迁，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崇真女校旧址则承载着常州教育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焦溪古镇、牛塘老街和西林老街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是常州传统建筑文化的活化石。在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经过不懈的努力，这些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为常州成功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添砖加瓦。

在弘扬院士精神方面，我深知民建先贤孟宪民院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为了纪念孟宪民院士，我发起组织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纪念孟宪民院士诞辰125周年座谈会，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孟宪民院士的亲属参加，大家在座谈会上共同缅怀孟宪民院士的生平事迹，探讨他的科学成就和精神内涵；孟宪民院士亲属回乡座谈会，让亲属们分享了院士生活工作点滴，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院士的成长历程；《地质之光：孟宪民院士的科学人生》首发式暨孟宪民院士手稿捐赠仪式，不仅为研究孟宪民院士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为中国地质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举办“乌龙庵走出的孟宪民院士”讲座，讲述孟宪民的事迹，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孟宪民院士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举行孟宪民读书楼旧址挂牌仪式，让院士精神永存。通过这些活动，我们深切缅怀了民建先贤孟宪民院士，传承和弘扬了他的精神。

值此民建常州市委会成立70周年之际，回顾这15年我与民建共同走过的历程，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感谢民建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所学、所感、所悟融入到文化事业中，为文化传承和保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秉持常州民建“思民、包容、敬业、厚重”的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常州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文/包立本）

纪念横山桥党支部成立100周年暨包焕赓书记诞辰119周年座谈会召开



纪念横山桥党支部成立100周年暨包焕赓书记诞辰119周年座谈会现场

2026年2月28日上午，纪念常州第一个中共组织横山桥党支部成立100周年暨包焕赓书记诞辰119周年座谈会在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召开，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常州党史界、文史界的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时光回溯到20世纪初，彼时的上海大学犹如一颗璀璨的启明星，在黑暗的旧中国夜空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这所学校汇聚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其中不乏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等常州籍共产党人和名师贤达。他们在这里任教讲学，将先进的思想、进步的理念传播给大众。上海大学不仅成为了进步思想的传播地，更成为了改造社会的实践地，吸引着诸多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的进步学生前来求学。在众多学子之中，有一位来自常州武进横山桥镇的青年，他就是包焕赓（1907—1947）。包焕赓出生于横山桥镇包合兴南货店老板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生活的年代，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

摇的困境之中，目睹国家的衰弱、人民的民不聊生，年少的他便在心中种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在中学读书期间，包焕赓就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他常常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从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同时，他还热心地帮助穷困同学，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善良与担当。1925 年，18 岁的包焕赓只身一人奔赴上海大学求学。在这所充满革命气息的校园里，他深受同乡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董亦湘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包焕赓在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和革命觉悟。最终，他坚定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1926 年 2 月春节前后的某一天，在横山桥包合兴南货铺二楼的客厅里，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重要会议正在秘密召开。共产党员包焕赓、王玉如、朱瀛海（朱云峰）等人小心翼翼地控制住自己的嗓门，怀着庄严的心情，唱响了那首气势磅礴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激昂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里回荡，在歌声中，中共横山桥支部正式成立，包焕赓担任首任书记。这标志着常州地区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它如同一颗闪耀的星星之火，在常武地区的大地上悄然点燃，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中共横山桥支部的建立在常州地区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它就像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在黑暗中为人们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这面旗帜是血染的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铸就而成的。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常州儿女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不懈奋斗。

为了纪念第一个中共组织横山桥党支部成立 100 周年，缅怀那些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者，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党支部精心筹备并举办了此次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专家们纷纷发言，他们充分肯定了中共横山桥支部成立的重大意义。他们指出，中共横山桥支部的成立是常州地区党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为常州地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更为后来的革命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精神动力。同时，专家们也呼吁要保护好这处革命旧址，铭记历史，更好地传承和弘扬革命先辈的精神。

（文/袁国华　毛　玮）

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40年座谈会隆重召开

2026年4月1日上午，由民建江苏省委会文化委员会、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名人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40年座谈会隆重召开。众多领导、专家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刘国钧先生的卓越贡献和伟大精神。



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40年座谈会现场

会议正式开始时，民建常州市委会副主委、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叶霞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专家的到来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叶霞提到，刘国钧先生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他的奋斗精神和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此次座谈会的召开，不仅是对刘国钧先生诞辰140年的纪念，更是一次传承和弘扬他伟大精神的契机。她希望通过这次座谈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刘国钧先生的事迹，汲取他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随后，民建江苏省委会文化委员会主任、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包立本为大家作了刘国钧生平简介。他从刘国钧先生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讲起，娓娓道来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刘国钧先生出生于常州府靖

江县一个普通的家庭，但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奋、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商业领域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纺织印染工业的发展，编演了中国纺织印染工业光彩夺目的场景，令世人瞩目。他创办的企业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财富，也为中国现代民族纺织染业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民族工业的骄子”，这一称号实至名归。

在领导、专家交流环节。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刘国钧先生的贡献和精神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有的领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指出，刘国钧先生的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在当时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为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注重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理念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的专家则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刘国钧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实业家，更是一位具有深厚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国家面临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他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积极投身于爱国事业。他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支持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敬仰。

最后，民建江苏省委会副主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对此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对各位领导、专家的精彩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施大宁强调，刘国钧先生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一面旗帜，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 140 年，就是要传承和弘扬他的爱国精神、创新精神和奋斗精神。

刘国钧先生不仅是爱国实业家，还是常州民建的创始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国钧先生积极参与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1951 年 6 月 24 日，民建常州分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共有 7 人，其中刘国钧为召集人。1955 年 1 月，民建常州市分会委员会建立，刘国钧先生当选为主任委员。1956 年 6 月，民建常州市委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民建在常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59 年，刘国钧先生担任民建江苏省委主任委员，继续为民主党派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此次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 140 年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回顾历史、传承精神的重要活动。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刘国钧先生的伟大贡献和精神价值，也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文/思　耘　毛　玮）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编纂工作推进会召开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编纂工作推进会现场

2026 年 5 月 9 日上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五)(六)》编纂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市名人研究会顺利召开。宝卷分卷编委会成员、知名书法家、资深文史专家等十余人齐聚一堂,围绕分卷编纂工作进展、现存问题及后续推进计划展开深入研讨,全力推动常州宝卷民间文学整理编纂工作提质提速。

本次会议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江苏卷·宝卷分卷(五)(六)》主编、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主席包立本主持。会议现场,包立本向全体与会人员详细通报了宝卷(五)(六)分卷当前的编纂推进情况,全面梳理了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并就后续问题解决思路、编纂工作细化安排等内容进行了细致说明,为下一步工作开展明确了方向。

该宝卷分卷编纂项目于去年 12 月正式获得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项目立项以来,全体编委会成员深耕民间文学一线,扎实开展宝卷文献采录、整理、考证工作,全身心投入文稿编纂、校勘等各项任务。在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学专委会崔月明、黄靖两位专家的专业指导下,全体编纂人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凭借严谨务实的治学态

度和勤勉高效的工作作风，短短半年时间内，已顺利完成60多部宝卷的点校工作，高质量完成阶段性编纂任务，为该卷本稳步推进筑牢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常州作为中国宝卷的重要起源地和传承地之一，拥有底蕴深厚、传承有序的宝卷文化资源，在全国宝卷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早在南朝时期，常州（南兰陵）籍的梁武帝创始《炉香赞》，这一作品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最早的科仪宝卷，开启了中国宝卷文化发展的先河。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释善伏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常州）窦刺史闻其（善伏）聪敏，追充州学。因尔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博士责之。这是全国关于俗讲（宣卷的前身）的最早记载。与此同时，常州至今还留存着诸多极具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珍贵宝卷卷本：其中有江南地区最早刻印的宝卷之一，由常州地藏庵于明代万历年间始刻的《念佛三昧经路修行西资宝卷》，还有堪称全国罕见的孩童手抄宝卷，9岁常州幼童朱少铨精心抄写的《一本万利宝卷》，这些珍贵文献都是常州宝卷文化传承发展的鲜活见证。此次编纂的宝卷分卷（五）（六），计划系统收录常州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宝卷共计100种，总字数规模预计达200万字左右，目前各项编纂工作均按计划有序推进、进展顺利。

研讨交流中，全体编委会成员纷纷表态，宝卷编纂工作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文脉的重要文化工程，意义重大、使命光荣。后续将继续秉持初心、携手奋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严谨的态度投入到后续编纂工作中，策马扬鞭、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编纂任务，用心守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民间文学瑰宝，圆满完成这项传承中华文脉的千秋伟业。

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常州市工艺美术家协会主席王明盛出席本次编纂工作推进会。

（文/常　文）

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仪式隆重举行

传承科学精神，赓续家国情怀。2026年9月3日上午，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仪式在常州市北大街社区隆重举行。此举标志着这位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少年时期的读书场所旧址，首次以挂牌的形式向社会展示其人文历史价值。



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仪式

孟宪民（1900—1969）是我国现代地质学与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他早年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深造，归国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矿产资源勘探研究，在云南个旧锡矿、长江中下游铁铜矿床等领



施大宁、赵正斌、李东华、丁华芬为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纪念牌揭牌

域取得开创性成果，为中国地质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次挂牌的读书楼旧址，是他在少年时期勤奋苦读、立志科学报国的重要见证地。

上午 10 时，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来自民建江苏省委会、常州市政协、民建常州市委会、钟楼区政协的领导及孟宪民院士亲属代表、文史界专家学者等 50 余人出席活动。在众人的共同见证下，民建江苏省委会副主委施大宁、常州市政协副主席赵正斌、民建常州市委会秘书长李东华、钟楼区政协副主席丁华芬将覆盖在纪念牌上的红色幕布被徐徐揭开，一块镌刻着“孟宪民读书楼旧址”字样的大理石纪念牌正式亮相。该纪念牌不仅标示了建筑的地理坐标，更承载了从这座小楼旧址走出的科学巨匠为新中国地质事业奠基的厚重历史。

在揭牌仪式上，孟宪民孙女孟小星介绍了孟宪民事迹、并举行了孟宪民院士档案捐献仪式，季子文化中心公益艺术团进行了《地质之光：孟宪民》情景剧表演、主办方宣读了钟楼区人民政府批文。

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一同参观了读书楼（今北大街社区）内部历史陈列。墙上，孟宪民院士手执显微镜的大幅照片，静静地诉说着那段筚路蓝缕的科研岁月，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常州市地名专家、文物专家薛焕炳表示，孟宪民读书楼旧址的挂牌，是常州市深入挖掘名人文化资源、推进“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建设的关键一步。随着纪念牌的正式挂牌，这座承载着科学记忆的读书楼旧址，将成为新时代科普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揭牌仪式由民建江苏省委会文化委员会、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主办，钟楼区政协承办，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名人研究会协办。

（文/余知健）

探寻龙城水脉遗韵 聆听古桥百年回响

中秋佳节，月满龙城。2026年9月25日（农历八月十五）上午，当整座常州城沉浸在阖家团圆的温馨氛围中时，一场别开生面的运河文化盛宴在常州大酒店拉开帷幕。由常州市名人研究会与常州市名人研究院携手承办的市民政局公益创投项目“常相伴州到爱，运河古桥行”系列公益讲座隆重举行，吸引了众多热爱本土文化、心系运河文脉的市民朋友到场聆听，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而庄重。

本次讲座以“常州白云溪与顾塘河的古桥”为主题，特邀常州市地名办专家组专家薛焕炳担纲主讲。薛焕炳长期深耕于常州地方文史与地名研究领域，对常州古城水系的演变、古桥的兴废沿革有着极为深厚的学术积淀和独到见解。讲座中，他以翔实的史料、珍贵的老照片和生动鲜活的讲述，将白云溪与顾塘河这两条曾经穿城而过的古老水系以及横跨其上的座座古桥，一一



常州白云溪与顾塘河的古桥讲座与会者合影

铺陈在听众眼前。

薛焕炳从白云溪的历史渊源讲起，娓娓道来这条城市内河如何见证了常州千百年来的繁华与变迁。他详细梳理了顾塘河与白云溪的水脉关系，讲述了两河沿岸曾经商贾云集、舟楫往来的热闹景象。更令人神往的是，薛焕炳对那些已经消逝在岁月烟尘中的古桥进行了翔实的考证与还原——桥名由来、建造年代、形制结构、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一桥一景，一桥一传奇。有的古桥曾是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风雅之地，有的古桥承载着寻常百姓世代往来的烟火记忆，还有的古桥则是常州漕运兴盛时期的重要见证。在薛焕炳声情并茂的讲述中，那些早已隐没于城市肌理之下的古老桥梁仿佛重新浮现，带着历史的风霜与温度，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

讲座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听众们在主办方的组织下，实地走访了白云溪与顾塘河的旧址遗迹。虽然昔日的潺潺流水已被现代城市的道路与建筑所覆盖，但在薛焕炳的现场讲解与指引下，大家依然能够凭借残存的地名标识、历史地图的对照以及老一辈人的口述记忆，依稀辨认出当年河道的走向与古桥的方位，让每一位参与者都深切感受到了常州古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运河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活动最后，主办方还精心为到场的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丰盛的文化厚礼——《人文常州》《中国地质事业先驱：孟宪民传》等精品图书。这些书籍承载着常州的人文精神与历史荣光，让市民们能够将这份珍贵的文化记忆带回家中，在书香中继续品味龙城的千年风华。

（文/毛　玮）

《大宋忠烈:包圭传》首发式举行

2026年11月2日上午,民族英雄包圭诞辰800周年纪念会暨《大宋忠烈:包圭传》新书首发式,在常州化龙巷内北大街社区举行。

活动现场气氛庄严肃穆而又热烈隆重。会上,民建江苏省委会文化委员会主任、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包圭后人包立本怀着对先祖的深切敬仰与追思之情,向与会嘉宾详细介绍了包圭的生平事迹与精神风范。包立本从包圭的家世渊源、研学之志到抗元壮举,一一娓娓道来,他特别提到,包圭作为北宋名臣包拯的八世孙,身上传承着包氏家族刚正不阿、清廉爱民的





《大宋忠烈:包圭传》首发式现场

优良家风，并将其发扬光大，最终以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忠烈传奇。使在场听众仿佛穿越700余年时光，亲眼目睹了这位民族英雄忠勇报国、视死如归的感人形象。

接着，活动进入赠书环节。包立本、肖飞两位作者向常州图书馆、常州市档案馆、钟楼区档案馆、武进区图书馆，以及毅诒堂、瑞芝堂、孝肃堂等常州包圭后人代表，赠送了刚刚面世的新书《大宋忠烈：包圭传》。

在随后的座谈交流环节中，来自各界的专家、学者们围绕包圭的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以及《大宋忠烈：包圭传》的学术贡献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包圭在宋末元初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坚守民族气节、誓死保家卫国的崇高精神，认为他是常州乃至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忠义典范。大家一致表示，在当今时代，更要深入挖掘和弘扬像包圭这样的民族英雄事迹，以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最后，民建常州市委会副主委、江苏理工学院副校长叶霞发表了总结讲话。她高度肯定了本次纪念活动的深远意义和《大宋忠烈：包圭传》出版发行的重要价值，指出缅怀民族英雄、传承忠烈精神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途径。她号召大家以包圭为榜样，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有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叶霞副主委情真意切的讲话，为整场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包圭出生于南宋宝庆二年（1226）。在德祐元年（1275）时，元军大举南侵，常州城危在旦夕，包圭毅然挺身而出，署理武进知县，与太守姚訚等率众奋力抗敌，最终在化龙巷壮烈殉国，年仅49岁。他用生命践行了忠君报国的誓言，其英勇事迹在常州民间世代传颂，有口皆碑。今年恰逢包圭诞辰800周年，回望800年沧桑巨变，英雄的浩然正气依然长存于这片他深爱并为之献身的土地之上。

据悉，本次纪念活动由民建江苏省委会文化委员会、民建常州市委会文化委员会联合主办，常州市名人研究院、常州市名人研究会、钟楼区档案馆共同承办。各单位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确保了活动的圆满成功。

（文/毛　玮　袁国华）

人文常州·第 7 辑

编　　者：常州市名人研究会
责任编辑：张来胜

出版发行：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8 号楼
电　　话：（010）85924730
印　　刷：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6 年 11 月第一版
版　　号：ISBN 978-7-89595-700-8
定　　价：5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使用作品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